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榆下说书

  
eBOOK  
网络资料 非精英

## 榆下说书

## 书的故事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最近，这些失了踪的书开始一本本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中，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厚厚的材料，是当年抄去的书的部分草目。要我写出几份清单来，然后才能一本本地找出、发还。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面对厚厚一本残乱、错讹的草目，灯下独坐，慢慢翻阅，真是感慨万千。每一本书的名目，都会引起我一些回忆，述说一个故事。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怎样的知识，据以写过什么文字，获得过怎样的欢乐……这样的故事，如果一一回忆，写下，那将是另外一本厚厚的有趣的书。当然，有趣也只是我自己觉得有趣，在旁人看来到底怎样，那可一点都没有把握。

如果说多年来从买书中间曾经有过一些经验的话，自然也可以这么说。这种“经验”，是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什么用处，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只是搬出一些“掌故”“趣闻”，虽然也多少会有些资料价值，但到底过于无聊了。今天书店里已经很难看到线装书，如果按照这些“经验”企图加以实践，那也不免是笑话。因此，我不打算写什么“书林清话”之类的东西。此外，我开始买书时，本来是以搜求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书为目标的，不过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兴趣转向线装旧书方面去了。旧有的一些新文学书的“善本”也陆续送给了与我有同好的朋友。因此这里所谈的大抵以买线装书的“经验”为主。

说起“经验”，其实也是平凡无奇的，甚至有些可笑……也说不定。我首先想说的第一条“经验”是，如果希望买到好书，在过去，只有肯出善价才是惟一的办法，其他种种门径，说来说去都是无效的。

如果说这也算是“经验”，在有的朋友看来，是不免过于可笑而且沾染了浓重的铜臭气味了。这样的话，就连过去以附庸风雅为要旨的达官大贾也不肯说出来的。然而它却是实在的，没有法子想。

我过去曾经一直不肯相信这一条，而且事实上也无法照办，因为我毕竟不是达官、大贾。我倒是一直跑小铺、逛冷摊，总希望能有好运气，会遇见什么宝贝。不过实践的结果是，巡回书摊 20 年，好像只买到过一册较中意的书。那是王国维的诗集《壬癸集》，薄薄一本，开本却很大，用的是日本皮纸。这是王国维住在日本时用古江州木活字所印。书中有墨笔小楷校字，是王观堂的亲笔。估计这书是他送给况蕙风的，因为卷中有蕙风的儿子又韩的印记。不知怎样流落在地摊上了。除了这本书以外，好像就不曾从摊上买到另外什么好书过。

事实上所有比较好的书，毫无例外，都只能从书店里得来。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张宗子（岱）的手稿《史阙》以及康熙原刻的《西湖梦寻》，不禁为之激动了。书店主人告诉我这些书是从浙东山中收来的，是张

氏家传之物。说得也真历历如绘。没有办法，只好预支稿费。多方设法，终于买到手中。等我捧着书又路过书店前街的书摊时，才知道这些书原来就睡在这里的地上。是被书店发现了买去的。什么浙东山中云云原来不过是书店老板创作的美丽的故事。

这件事给我颇深的印象与教育，从此逛地摊时就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好兴致。

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验，是买到了崇祯刻的《吴骚合编》。这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要列入“善本”书目的，但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孤本秘笈。少具规模的图书馆大抵都是有的。不过我所遇到的一部却不是平常的东西。这是最初印的本子，项南洲、洪国良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图，真是锋芒毕现，飘举的衣袂的线条、人物眉眼的细部刻画都清晰生动，和画本几乎没有区别。那张棉纸蓝印的封面，附有朱印牌记，起着三百年前出版广告以及版权页作用的扉页也完好地保存着。这种印本，是连“四部丛刊”续编的底本也是望尘莫及的。看书上的藏印，知道是九峰旧庐王氏的旧藏。当年此书从杭州出现，郑振铎曾与王绶珊争购。最后结果不问可知，教授当然不是盐商的手。为了此书，我除了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这中间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这件事很快就为书店中人哄传，认为我是干了一件“蠢事”，也算是一桩“豪举”。这以后他们有了好书就总希望让我看到，虽然那结果是看得很多而买得甚少，但为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却是不容抹杀的。

这两个小故事都发生在解放前后那段日子里。当时，书坊的景况很不好，几乎连维持都困难。旧书又大量从乡下、城镇流出，最大的出路是进入还魂纸厂。一个常到浙东收书的老店员一次向我叹气，说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旧书被当做爆竹的原料。其中很有不少明版的白棉纸书，还有一部初印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他想买了新的纸张向爆竹作坊换下这些旧书，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新的“洋纸”在质量上远远赶不上旧的棉纸、竹纸，做起爆竹来卷不紧也没有韧性，放起来也不响。

我又听到一家书店的店主说起，从上海城里一个旧人家称出了一大批旧书，都已捆好堆在旧纸店里了，第二天就要送到造纸厂去。我就要求他去选一下，答应他以“善价”收买。他很不情愿地终于去了。第二天我去找他时，他递给我两本旧书，同时叹气说，旧纸店不情愿打开已经扎好的一捆捆旧书，因为每捆能选出几本是毫无把握的。他费尽唇舌，也只打开了一捆。他选出的两本书是万历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大方册，是最精的徽派版画，和另一册黑格旧抄的《续复古编》，是顾氏秀野草堂的藏书。扎成一捆捆的旧书一直塞到纸店的天花板，难怪他们不肯一一打开，重扎……据藏印知道这家人家姓奚，藏书室名“铸古龕”。关于这个藏书家，我也一直没有能查出更多的底细来。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更大。不久，郑西谛路过上海，当时他是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局长，正在视察各地文物图书的保存情况，我就将这些反映给他，同时提议，人民政府保护文物图书的法令和宣传教育工作都是极为重要极为迫切的工作，此外，必要的经济措施也是不能忽视的。国家应该用“善价”来收买有价值的古书。在当时，所谓“善价”，也不过是比废纸的价格高出若干而已。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运用经济规律阻止一切应该受到重视、保存的书籍进入还魂纸厂。这样做了，宣传效果可能比一纸公文更大，很快就

能收到不胫而走、家喻户晓的成效。而这将起保护全国城乡直至每一角落留存下来的古文献的作用。在国家来说，花费看来是极为有限的。

郑西谛确是一位对祖国文化遗产抱有极浓挚热爱的好同志。我至今还记得他听到反映以后的焦急和激动。他立即采取的措施是组织了一些旧书店的店员拣选即将投入还魂纸厂的“废纸”；这种关心以后又发展到将投入冶炼厂的“废铜”……我不曾继续了解这些新开展起来的工作的细节，只记得曾被邀参观过一些拣选出来的旧书。有一册宋版宋印的宋人别集，书名忘记了，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残本”，但却是几百年来未见著录的书。

这些都已经是旧话，也是历史了。不过我想，也许至今它还有一定的意义，还不失为一种小小的“经验”。在着重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恰当地辅以适度的经济措施，实践证明是有效也有益的。不只在经济战线上，在文化战线上也同样是如此。

1979年4月13日

---

这书是宋葛洪撰《蟠室老人文集》。宋刻、宋印，只剩下了十四、十五两卷。今在南京图书馆。《中国板刻图录》著录。

## 古书的作伪

对于版本目录之学，过去有一种流行的片面理解。不少人是干脆把它看做版本鉴定学的，这自然很可笑。不过这种看法的产生，也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古旧书籍本身一旦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就必然发挥作用。一切在市场上出现的通常现象也必然随之而来。买书的人和书店构成了既同一又斗争的矛盾统一体。“斗争”的焦点就集中在商品的质地和价值上面。时间久了，买书的经验积累渐多，逐渐形成体系，这就是所谓版本鉴定之学。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上面所说的那个“矛盾统一体”几乎已经临于解体。旧书店的招牌，在一些大城市里虽然偶然尚能看到，但旧书，特别是旧刻、旧抄本书却基本上消失了。因此所谓版本鉴定学似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然而不然。既然这已经成为带有科学性的东西，就已有存在下去、并进而丰富提高的理由。目前，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确实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属于古文献的图书部门，就迫切需要大量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关心、整理、保存、利用。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万万离不开这一环的。

今天，依然健在的版本学老专家真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中青年的接班人的培养，已成为极为迫切的课题。我们现在有极为优越、为旧社会所不可想象的学习条件，在国家图书馆里藏有大量珍贵的古刻本、抄本书，用来比勘、研究的条件是前人所不可想象的，按理人才的培养是并不困难的了。不过事情往往又并不如此单纯。记得我曾听到一位老专家向我诉苦，他曾把手教过一些青年，把宋元明刻的实物放在面前，细细地讲解那区别、特征……说得舌敝唇焦，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过两天试试看，依旧还是分不清什么是清刻，什么是明刻……自然更不必提更细致的问题了。他最后喟然说道，“当年我出了××元，买进了一部染纸充宋的假宋版，回来经人说穿，有好几夜睡不好觉。从此就懂了这一手，再也不会上当了。”这故事很可笑，所以今天也还记得清楚。不过我想，这应该不是笑笑就完的事。

要取得学习的成绩，付出学费是必要的。学费的付出也有种种方式的。那位老专家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对事物取得了比较深刻全面的认识，归根结蒂是由于他付出了“创痛巨深”的学费的原故。这还不只从经济意义上说是如此，像他所犯的那种错误，对一个“收藏家”的声誉，损失也是巨大的。

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再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专家，但它依旧不失为一种能够引起人们思考的思想材料。同时，我也并不想作为一个庸俗的笑话介绍给读者。

像这一类的“经验”，每一个买过旧本书的人都会遇到好多起，应该说是并不奇怪的。同时有一点也应该指出，过去有许多著名的收藏家，尽管他们藏有大量好书，有的还在版本目录研究上作出过很好的贡献，他们的著录，也不是完全可以凭信的。他们也会犯错误，也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来。

季振宜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有《延令宋板书目》，读起来也真使人为之向往而佩服。不过我却买到过他所藏的《汉书》，那是

明代正德嘉靖之间汪文盛的刻本，一些都不难识别的。但在卷前却珍重地钤了“御史之章”等三方大印。以后在每卷卷首，又钤了“季振宜藏书记”朱文长方印。细看那钤印之处，恰在“唐颜师古撰”一行的所在。而颜氏衔

名之下却有挖补的痕迹，原来汪文盛的衔名被挖去了。那用意是明明白白的，是企图灭去明刻的痕迹，冒充宋刻的，而作伪者恰是季振宜自己。这就使我对他的“宋版书目”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那一册书目所收全都是宋刻了。

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曹寅的外甥董斋昌龄那里。我买到一部《七经图》，棉纸初印大册，用鹅黄的蜡笺作面，书页里用宣纸作衬，全是康熙中内府的豪华装。每册卷前都钤了昌龄的藏书印。过了不久，又得到同书的残册，却是没有重新装池的明代原装，是四明卢氏抱经楼的旧藏。等我将两本进行对照时，奇怪地发现昌龄的藏印却钤在原来刻有新安吴继仕熙春楼字样的所在，原来也是挖补过的，和季振宜改造《汉书》是用了同样的手段。类似的情况我遇到过好多起，这两件都出之于著名的收藏家，所以记得格外清楚。

杜诗的版本可谓多矣，不过多半是注释本，白文的比较少见。我有一部八卷的杜诗白文本，版心下有“净芳亭”三字，前面有序，也不记刻者姓氏。但据版刻风气可以断定是明代嘉靖中所刻。前有阳城张氏省训堂的藏印。后来却发现，松江韩氏读有用书斋在书目里却指之为宋本。有一种韩氏书目，还附印了书影，对比一下，就正与我所藏的一本相同。看来这不像作伪，只是鉴定上出了差错了。后来又知道，“净芳亭”是许宗鲁的斋名，许刻的《国语》、《尔雅》等流传颇广，版心下题“宜静书屋”，知道的人不少。但这“净芳亭”却少见。细看一下，字体之古怪方板，也确是许刻的风气。像这种情况，一个鉴定者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断定书册刊刻的大致时代，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就只好多看，多作对比研究，留心书目、题跋以及有关的一切记载。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系统记述这一类知识的著作。我们今天的条件到底比前人好了不知多少倍，避免再犯韩应陞那种错误的保证也更充分，不过重要的还是艰苦的研究，没有这一条，别的条件都将不起作用。

过去在古书作伪的勾当中玩出种种花样来的大抵是旧书坊。染纸充宋、割去牌记、伪造印记、挖补缺卷、用旧纸伪造旧抄、临仿名人校跋……创造发明也多得。不过买主付过“学费”，就像传染病患者产生了免疫力，也会变得聪明起来的。要取胜就得别出心裁。我曾遇到过这种崭新的花样，虽然上了当，到底也还是爱他的本领。

有一次从苏州的某书肆看到一种题为《烟花小史》的书，是明代万历刻本。它包含了八种书，记得有《秦淮四嫩诗》、《薛涛集》、《仙仙集》等种种名目，十分别致。回来查《千顷堂书目》等多种书目，都找不到那名目。书中还有昆山叶氏的藏印，确是未之前见的怪书，赶紧出重价买了回来。仔细研究，发现其中一种在版心下面有“右编”二字，编者属名有“澹云王路”字样。前面那张扉页，大书《烟花小史八种》，用纸确是明代竹纸，但较厚实；刊刻字体也极似明人风气，但到底微觉板滞。几经研索，我断定这其实是一种残本。王路曾刻有《花史左编》，这大抵就是所谓“右编”了。王路是晚明出版业向资本主义急速发展时期出现的一个出版家兼编辑人，是马二先生的前辈。不同的是他经营的并非举业书而是迎合时尚的“通俗文艺”，看那作风是要算作明末的鸳鸯蝴蝶派的。这八种，除了薛洪度集分量较多以外，其他大抵是小册子。至于前面的扉页，则是书坊新刻的，那名目也取得好，完全掩盖了原来残本的面目。

我想，作为晚明通俗出版物的一种标本，即使是残册，也还是值得重视的。马湘兰、郑如英、朱今燕、赵彩姬等的诗集，也由于王路的介绍得以流传。书坊的花样玩得十分巧妙，可惜的是，原书前面想来原有总题和细目，

却因此湮灭了，这自然是版本目录研究中的一种损失。

我之敢于断定这是一种新的作伪的花样，因为我还从这家书店买到过用同样方法炮制出来的书，祝允明的诗、文、词、曲杂集。前面也有一张崭新的扉页，题曰《枝山先生柔情小集》，下面还刻了一个葫芦，中题“四全”两字。这回是从《千顷堂书目》里马上找到了那破绽，祝允明这样的著作有七种，不是四种，总题也并非什么“柔情小集”。

也是这家书店，又曾发现过二本《陈大声散曲三种》，万历刻本。陈是明代著名的散曲作者，这书也是不见著录的。此书曾引起藏书家的很大兴趣，不记得最后是被郑西谛还是傅惜华买去了。那扉页，不用说也是新刻的，那风格和我所得到的两种完全一致。这样看来，原书一定也是一个残本，也必不只三种。傅、郑两位都是著名的戏曲收藏家，我猜他们都不会知道这里是玩了花样的。

傅、郑两位同志都已逝世，陈大声这部散曲集如果历劫尚存，在编目的时候，我希望添加一个附注，说明《三种》云云是值得怀疑的。

1979年6月4日



## 西泠访书记

1957年4月中旬,我到杭州游览,曾访问过坐落在里西湖的浙江图书馆。这里是清乾隆中所建的七阁之一——文澜阁的旧址,是著名的江南藏书胜地,那抄写了七部之多的“四库全书”复本之一,遵照“十全老人”的意愿,就藏在这里。杭州是江南文风兴盛之区,大批的读书人都到这里来借抄、借读经过删削、改造、加工的钦定典籍,颇发生了一些影响。这无疑是清代文化统制政策取得的一个不小的成功。后来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争,这里的“四库全书”损失了一部分,也流失了一些。地方上一些有钱的读书人就又来辛辛苦苦地补抄,后来不知道终于补全了没有。不过那时的人力物力到底远远不及“乾隆盛世”,补抄本无论纸墨、抄工、装潢比起原本来是天差地远了。

在过去,浙江图书馆在全国公私藏书家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地方性图书馆。解放以后,浙东故家藏书大量流出,一些地方上的藏书家的藏书也先后聚集在这里。它的收藏丰富起来了。1957年我访问时,曾经被接待到楼上看了一些旧本,还带回了两部新印成的“特藏书目”。细细检阅,发现新入藏的书籍中间,其实也并无值得注意的宋元旧版,精华所在倒是一些明清以来的浙人著作的刻本、抄本和稿本。这中间颇有未之前见的秘书,而这恰恰是全国性的重点图书馆无法相比的特色。当时曾摘记了一些名目,想什么时候再到杭州来借读。可是“人事粟六”,一眨眼20年,没有机会再到湖上,而且后来这愿望好像也成为一种荒唐的梦了。

当时我所希望借读的群书之一是“明季刻本、抹云楼旧藏”的柳隐如是撰的《戊寅草》一卷一册。这是一册异书。关于柳如是这个人物,我很早以前就发生了研究的兴趣。曾经搜罗了她的《湖上草》和《尺牋》的旧抄本,她的《事辑》,还有附在钱谦益文集和清初诗词总集中的她的作品,此外就是大量散见于清初文集、野史、笔记中有关她的记述。可惜的是,一直没有看到明末原刻的她的诗集。我只在王闻远的《孝慈堂书目》中看到过著录,还注明“棉纸”印本,可证是明末原刻无疑。此外,在马叙伦的《读书续记》卷六中看到一段详细的记载。那是高欣木旧藏的《柳如是尺牋一卷、湖上草一卷》,一共24页,不只是原刊,还有林云凤的题诗,许多名人题跋、印记,和王国维的三首题句。据马夷初说,这书曾经张元济与高野侯“竞购”,最后高以50银元买得。这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高价了。这书后来不知流落何许。现在见于浙馆书目中的《戊寅草》,是怎样的书呢?可能就是《湖上草》的改题重刻之本,也可能是另一种未之前知的诗集。戊寅是崇祯十一年(1638),正是如是下嫁钱牧斋之前活跃于湖上的时候。

为了一决此疑,1962年曾托到过湖上的陈凡代为探询此书,后来还承他亲笔抄了一卷副本见赠。可惜他所见的并非《戊寅草》,而是张宗祥手抄的《湖上草》,一些都没有与通行本不同的地方。

这次在睽隔了十多年以后重游杭州,特别是看到陈寅恪教授《钱柳因缘考证》的序言以后,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书,终于在一个春晨又来到了文澜阁的旧地。庭院依然,只是更增添了一些萧寂。一般的游人是不会到这里来的。走进去看,那楼房,楼梯,还有管理图书的人员,好像与过去都没有什么变化,到处都充满了一种古意。我说明了来意,还取出了一位过去浙江文化界领导人的介绍信,并出示了工作证。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用。那位老同志是20年前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故将军”。要看“善本”

书，这些都无用。还得向领导机关申请，得到批准才行。

后来经我说明住在上海，来一次杭州不容易，可否给予通融，这才打了电话，向领导机关请示。最后的指示是必须指定一位馆员在旁监视，才能阅读。这使我异常高兴了，监视就监视吧，这又有什么关系。我被安置在会客室里等待管理员登楼取书。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得到了答复：“找不到”。原因是专门负责善本的同志下乡调查善本去了，原有的善本因为编目的原因被打乱了，这里没有人能摸得清。“什么时候熟习善本的同志才能回来呢？”答曰，起码半年。要想快，就只有申请、批准，打电报叫回来。

这时，我终于最后地断念了。我既非长官，又非学者，想看一本旧书也算不上什么“要公”。打电报调人，这样的提议是真的使我吃了一惊的。

这就是过了二十多年，几经努力，终于还是看不成一本小册子的始末。

走出图书馆，坐在湖滨的石凳上，面对春光明艳的西子湖，不禁想起了许多事情。

多年以来，我对跑图书馆一直缺乏勇气，尤其是去看善本书。在旧社会，只有专家学者如胡适之之流才有看善本的幸福，不必说了。解放以后，情况大大改变，但善本书的神秘性却又增添了新的成份。为了保藏善本所制定的新办法也更完备而丰富了。在阅读国家藏书的权利上，如陈伯达和那个“理论权威”以及十年来崛起的林彪、“四人帮”写作班子的大小头目……简直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他们不但可以无视一切规章制度，任意取阅藏书；甚至还发展到了动用国家力量任意劫掠公私藏书，任意迫害读书、藏书人的地步。

在“四人帮”覆灭前夕，私人藏书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罕见的现象。连新华书店也开设了租书部，这就说明了个人买书一事已经不合时宜，甚至连新华书店本身的存在似乎也发生了疑问。这大抵也是张春桥念念不忘要加以消灭的“资产阶级权利”的一个方面吧。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想到“善本”呢？就是在梦里也难。

善本书是国家的瑰宝（在日本是叫做“文化财”的），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加以保护，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也不单纯只是一种“宝贝”，只要锁在保险箱里就好了；还得想到利用，使之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大家知道重视书籍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办法却不多，看来惟一的措施就是锁在什么妥当的地方。说“妥当”好像也不尽然，有些胡乱堆了十多年的书库，据说就已经发了霉，不可救药了。林彪、“四人帮”非法劫掠来的书物，发还的积极性也不高。与其还给原主去研究利用，好像总不及锁在图书馆这样的地方来得稳妥。理由么，有好多条，而且都十分堂皇，可惜的是都和实际有不短的距离。

保护善本，古今中外都有一套办法的。为了满足查找资料的需要，像显微胶片那样的设备，是若干年前就已经在使用了。为了其他的理由，必须接触原物时，就要另有一些严格的规定。怎样读书，其实也是衡量文化水平高低的一种尺度。记得孙从添在《藏书纪要》里就有着详细的说明。最常见的一种必须避免的手法，是用右指给舌头一舔，然后去掀那书页。古书用纸以棉料、竹料为多，哪里禁得这样的掀弄呢？好像这在过去还是颇为通行的办法，相传《金瓶梅》的“作者”，就将书页下角浸了毒药，送给严东楼，当他用那种手法读得津津有味时，就不觉地中了毒。可见即使是大官，看书时也往往采用此法。此外，如用指甲去划开书面，翻动书页，也是要不得的。

一切书，不只是善本，都受不了这样的待遇。诸如此类，必须订定一种规程，即使有些繁琐，也还是省不得。

现在全国的图书馆都在进行善本编目的工作，这是完全必要、亟应完成的。不过也不可忘记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要作。为了编目，连书都找不到了，事实上等于关门。这可不是好办法。

好像这也不只是图书馆里才存在的独特现象。最近报上在讨论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有人就主张当前最重要的是“总结”，然后再来“选择”、“改革”、“提高”，最后才是为人民提供醇正无疵的优秀剧目。这是不能不称之为高论的。依了它，戏院就得先行关门，等待这个伟大的过程的完成。这和图书馆的有些情况有些类似，但也有不同。善本书睡在那里，只要不火烧、水湿、霉蒸……什么时候打开门来都不成问题，传统剧目则不然，它们多半活在一些仅存的老艺人身上，现在就来抢救还嫌有些晚了，哪里等得到那伟大的“总结……”过程的完成。老艺人还会有多少活下来；即使没有死光，还有多少能工作呢？

这样的高论，其终极目的不过是取消而已。希望在对待善本书的问题上，不出现这样的倾向。

1979年7月13日

## 谈“善本”

“善本书”这名目，现在知道的人不能算少了，但要具体地下定义、立界说，就不大容易。自有书籍之日起，应该说就已经发生了善本与非善本的争论，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一一浏览，是会使人头昏脑胀的。但仔细一想，争论之起，总是由于标准的不同。而标准在抱有不同目的的人眼中，又总是不一样的。以古书而论，它既是文献，又是商品。这就基本上划清了两种不同标准的界限，一切争论，大抵总是由此而起的。

清代中叶有一位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尧圃），以收藏宋版书著名。他有一个别号是“佞宋主人”，可以想见他的主张的坚决与真挚。他主张一切古书，以宋版为最好，因为它古。他校起书来，即使宋版书中明显的错误，也必据以“改正”非宋版的并不错误之处。他是主张越古越好的，可惜唐版还不曾发现，否则一定改号“佞唐主人”无疑。黄丕烈收集、鉴定、流传古书的功绩是不可否定的；他主张古本可贵，也并不错。不过他把事情搞过了头，终于弄得可笑而荒谬了。

黄丕烈并不是这一主张最早的发明者，在他以后这种主张又有了惊人的发展，一直到今天也还不曾消失。黄丕烈是藏书家，但后来又开了“滂喜园”的书铺，经营旧书交易。在古书商品化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萌芽的浪头中，他都很有些代表性，因此在这里提出他来作为一种典型。

留心书市风气变迁的人，可以看出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不同时代，人们对书籍价值的评断是不同的。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群经的地位一直占据着最高的宝座，那原因是容易理解的。到了清末，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时晚明野史、清代禁书的身价突然上升了。这是民族主义思想风起云涌的结果；紧接着是群经地位的一落千丈；再以后是小说戏曲书变成了珍品，这自然是五四运动以后，俗文学研究兴起的必然趋势。再后来，是过去无人过问的地方志大行其时，这与帝国主义者的大力搜罗是密切相关的，他们为了不可明言的目的，想尽力占有资料，对中国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不过往往美其名曰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

以上粗略的勾勒，是就书籍门类横断面观察的结果。大致说来，发展趋向还是健康的，那就是知识界摆脱了经义和道学，逐步走向实际，眼界也开阔得多了。其间每一变化，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原因。越古越好的教条终于打破，“善本”的定义有了新的内涵。

如果我们拿宋人明人的藏书目录与清初、清末、晚近的目录书加以比较，是会发现很有趣的差异的。宋人不必说，明人目录中也大抵不记版本。从清初以毛氏汲古阁为代表的常熟派藏书家开始才有版本记录。同样，过去的藏书家很少记载地方志，但范氏天一阁与祁氏澹生堂是例外；记载小说的，除明人《百川书志》外，只有钱遵王曾加以注意；戏曲的命运尤为寂寞，只有也是园、祁奕庆藏书楼曾加记载。这都不能不使人佩服他们特异的眼光。如果谁收集了清末以来旧书店作广告用的目录，那就能看得更为清晰，因为照例在这些目录中都附有定价，不但可以看到书籍流转的踪迹，也能看到书市风气、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些，照我看也同样具有文献价值，不可忽视。

前面提到的黄丕烈，一方面在藏书家中有重名；但同时也为讲求实用的学者所讥嘲，他们给他加上了“古董家”、“赏鉴家”……等徽号，大加调侃。我想余嘉锡先生的见解可以作为代表（见《论学杂著》），那意见不能

说是没有道理的。不过也不可说过了头，否则也会向反面转化的。有些旧时代的学人，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可能看到丰富的古刻、旧抄的实物，他们讲求目录之学，往往是从目录到目录，缺乏实践经验，因此也容易发生不应有的谬误。版本学是一种科学，到底离不开实践。

说到这里，我想在为“善本”作界说时，至少要考虑两个方面，它们的文献的和文物的价值。

有些书籍，不只因为它古、稀少（所谓“孤本”、“罕本”）而可贵，还确是极可贵的工艺美术品。韩愈和柳宗元的文集，当然算不得罕见的东西，但宋世彩堂刻的韩柳文则无疑是国宝。那纸墨、刻工，就绝非后来别的刻本所能比拟。这两种书都有明万历中郭云鹏的翻刻本，也算是刻得好的，但与原书一比，实在是天差地远了。这样的古书，珍藏在国家图书馆里，是人民珍贵的财富，我们就绝不应讥之为“佞宋”。

过去有一种可笑的办法，就是在时代上画一条线，作为判别“善本”的标准。这条线大抵又是随着时日的流逝而逐渐后移的。清初的《汲古阁秘本书目》中就没有明版书，到了解放前，就将崇祯以前刻本通通算作“善本”，后来觉得不够妥当，就把一些清刻列入“乙目”，实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其实还是逃不开尊古的旧框框。好像至今那影响也还没有完全消失。真的照此办理，明人所刻大量草率的“书帕本”……也将全部列入“善本”。自然，即使是明人的恶刻，也是值得保存的，但保存是一事，“善本”是另一事，没有混淆的理由。

如果真有这样一条线，则太平天国刻行的书，以及大量近代的刻本、稿本、抄本又将怎样看待呢？鲁迅、西谛所印的《北平笈谱》，成书不过四十余年，其文献、艺术、版本上的价值，难道是什么通常明刻所能比并的么？似乎文物出口的规定中也有这样一条线，同样也是极不科学的。这些，看来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推行的“一刀切”作法的例证，都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和这个问题有关，可以看看当前出版机构印行古籍方面的一些问题。已经证明是伪书的李卓吾的《史纲评要》，被印成了精致的大册，这是叛徒江青的“杰作”，不必大惊小怪，但至今还被人们当做必读的历史课本，就值得注意了。朱彝尊的《词综》、沈德潜等的《五朝诗别裁》都不是什么“善本”。特别是《清诗别裁》（原名《国朝诗别裁》），沈德潜为了逢迎清朝皇帝，竟将一些明遗民的作品，改得一塌糊涂，连他自己祖父沈钦舆的诗也改得俯首贴耳、吞吞吐吐（可惜我所藏的沈钦舆集尚未发还，这里举不出例证），真是令人发指而且气短。印行这样的选本，而且浪费了人力物力大册精印，看来实在没有什么必要。

曹寅的《楝亭集》列入“清人别集丛刊”影印了，而且有两种版本。曹寅的著作是有印行的价值的，但是否影印，似乎也还值得考虑。当前纸张和印刷力量都还较为紧张，像这样的书，看来还是排印为宜，为读者的负担考虑也应该如此。听说还要印行纳兰容若、朱彝尊、金冬心等的别集，这些书之为“善本”，是无疑的，但它们究竟并非孤本，在雕版上也并没有影印的突出特色，排印之余，附加两张原刻的书影也足够了。

我是赞成搞好影印的工作的，国家所藏的重要善本是大量的，值得影印的也是很多的。过去一些学人以个人的力量印行过一些古书；商务印书馆那样的企业也印行过大量的古籍。但印制水平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今天，我们应该努力用最好的技术、有选择有重点地印出有代表性的国藏善本来，这在

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研究资料、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上，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数十年前，日本静嘉堂文库曾经影印过我国归安陆氏旧藏的《东京梦华录》等书，质量是不坏的。但在我们看来，也还有可以大加改进之处。我相信，我们完全有可能印出更精美、更能体现我国悠久雕版事业优异成果的复印本。这无疑是在出版战线上应该进行的一种重要工作。

1979年6月30日

## 谈“题跋”

一向喜欢读藏书题跋，买旧书时遇到书后有前人跋文的尤为高兴，辑录跋文的专集也搜罗得不少，好像对这个题目很有些话可说。可是稍稍过细一想，就感到要谈出些较有系统的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例如题跋与后记之类应该怎样区分就不大说得清楚；又如“四库全书”的“提要”，事实上也是一些题跋的汇编，不过它是“钦定”的，过去的读书人一向对之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即使发现了其中有错误，也不敢指出；斗胆想提些意见，一开始也还是得先写上“伏读……”再进行声述，这可不是“百家争鸣”应有的气氛。因此，准也不敢把《提要》当作题跋来考虑。此外，题跋本身也是五花八门，内容多样，有涉及考证、校勘的，有广告性的，有杂记琐事有如日记的……总之，大别之不外两类，即学术性的与文学性的两大类。我所喜欢的则是后者。

题跋小文，是从宋人才开始注意并大量写作的。影响最大的应数苏轼和黄庭坚。他们所写也还不是书籍的跋文，过去一向被视为散文小品，这是与他们集中的大篇正宗文字对比而言的。此外，欧阳修、叶石林等也都写题跋，陆放翁更是此中名手。他们的流风余韵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晚近也还不曾消歇。南北宋之交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所写的《金石录后序》更是突出的作品。这并非小品，而是她为丈夫赵明诚的三十卷学术著作所写的跋文。《后序》详细记录了他们夫妇从青年时代起辛勤收集古文物书籍的经过，以及靖康之变转徙流离中藏物损失的过程。李清照是文学家，《后序》的文学性也特别强烈，是写尽了家国身世之感的名作。《后序》留下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影响主要不是表现在学术性，而是在文学性方面。

长夏理书，随手翻得一些实物例证，现在就依次引录，少加说明，也许可以对题跋这一品种，略窥涯略。

《陕西四镇军马数》一卷，后附《会兵御虏》，明嘉靖刻本。收藏有季振宜三印，又“姑苏吴岫家藏”印。这是一册官书，也就是当时官刻的一种内部文件，应该算是机密的。因此流传不多，好像只在“近古堂”、“绛云楼”、“传是楼”的书目中有记录，那名目也多少有些不同。这是奇怪的。推想此书一定不只刻过一次，每换一任主管官员大约都要重刻几次。那些见于旧目的本子也都找不到了，无从对校。这本书是明代苏州著名藏书家吴方山（岫）的藏书。在吴岫看来，这并非古书，而是崭新的出版物。但他却在卷中留下了五行手跋：

陕西设总制，自石淙杨公始。嘉靖七年春召归。晋溪公王琼继之，撰为此书。公由谪所起用，一平吐蕃，再平套虏。实以兵马素练，钱粮敷足，根本已固故也。下有会御事宜，乃其经略，故并刊焉。继其政者，当珍藏检阅勿忽。姑苏末学吴岫题。

此书原不著撰人，从吴岫跋中可以知道作者是王琼。所谓陕西四镇是“陕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和“甘肃镇”。书中详记各镇所属卫、所、堡设官及兵马数量，陕西一省民屯夏粮秋粮数目，以及《会兵御虏图》等，后面所附帖、札付等文件则是嘉靖七年冬至八年夏所发出。吴岫的跋算不上什么考据，这在他看来原不过是一本新书。但从他的看重此书，可以知道明朝中叶的藏书家还是重视当代文献的，并不像清初的常熟派藏书家，一味地追求古。其实也难怪，清初的政治气候已经不允许读书人留心当代政治、经

济、军事等等事物，他们的一头钻进古书堆里，是应予原谅的。

《老子全抄》一册，竹纸绿格写本。版心上有“聊尔编”三字。书衣有墨笔跋：

此先夷度府君手自点阅之书也。计其时尚为诸生。先人手泽，子孙当世珍焉。不肖男骏佳谨识。时辛亥孟春，已七十八岁矣。

夷度是祁承 ，明代浙江著名藏书家澹生堂的主人。祁骏佳是他的长子，彪佳的哥哥。辛亥是康熙十年。乙酉清兵下江南，祁彪佳自沉死。祁家诸子图谋兴复故国，组织抗敌力量，被人告发，破家。澹生堂的藏书就在此时散佚了。那详情在黄梨洲和全谢山等人的著作中都有记载。祁氏诸子佞佛，骏佳尤甚，常常把家藏书籍随意送给和尚。不过一些先世手泽还珍重保藏在家里。这一本《老子全抄》和另一本《易测》，就是因为是承 少年时的读本，保存下来了。这两书写手都极精，不像是抄书人的手笔，应是万历以前写本。卷中有朱笔、蓝笔圈点，是出于祁承 之手的。八千卷楼曾有澹生堂抄本《蝶庵道人清梦录》一卷，卷首有“旷翁（承 ）题，男骏佳书”的跋语，就都是这一类的“澹生堂抄本”书。

这两行跋语，中间隐藏着一段残酷的斗争故事，但跋文本身却一些都不曾透露，这是当时政治情势下必然的产物。祁骏佳不像李清照，虽然逃来逃去，到底还在南宋的版图之内，所以还能畅所欲言地发挥家国之痛；这在祁氏诸子就不可能，他们只能“寄沉痛于悠闲”，说两句“谈话”。

清代著名藏书家留下的题跋是很多的。如何义门、吴尺凫、鲍以文、黄荃圃、顾千里、吴兔床、陈仲鱼、钱竹汀……这里只是随手拈来，自然还有很多漏略。不过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他们都已将兴趣集中在版本、校勘上面，学术性的成份在他们的跋文中空前增大了。他们的劳绩是值得重视的。至今，在涉及版本目录之学时还不能不时时求教于他们的著作。这中间自然也有二三位是别有特色的。如鲍以文，他平生收藏、刊刻了大量的古书，但他并非完全是书呆子，他爱刻宋元人集，如汪水云的诗，这中间并不是毫无用意的。他也是个有风趣的人物，我有他所校的元人集，不只是卷中朱墨杂下，在每卷之后，还记下了何时、何地校毕此卷，还随手记下了气候、风物、人事……是很有文学意味的随笔，较早的严虞惇也喜欢这样做，他在川江舟中读苏诗，每卷后的跋文，几乎就是一篇小小的游记，集在一起，就是一卷很好的出蜀目录。

黄荃圃也喜欢在题跋里记琐事，买书经过，书肆、书估、书价、藏家……包括日常生活，都随手记在跋文里。虽然有些学者很不以这样的作风为然，加以讥笑，但我却喜欢读这样的题跋。他的题跋已经被搜辑汇刻为厚厚一叠，他曾经跋过的书的身价也被抬高到不可思议的荒谬高度。不管是怎样的破书，只要有他一两行题跋，就会身价百倍（其实百倍也不止），这则是很没有道理的。

我记起了二十几年前偶然得到一部《王注苏诗》，是万历刻本，是很普通的书，印本也很不好。不过这是翁同龢的批校本，从常熟翁家散出的，书中有许多跋语特别有趣，曾随手抄下，也至今不忘。这书先有虞山钱简臣的批语，翁常熟又借得严思庵的评本，用紫笔过录下来。翁的题跋是这样的：

光绪庚子四月朔，邑子翁同龢获观。

评点极矜慎，而于鄙意有未尽合者。余粗疏任气，老将至而未知所裁也。雍正辛亥距今百六十六年，展卷兴感。龢记。光绪庚子五月。



光绪庚子首夏，得此书于邑中书估。有雍正九年钱公简臣批点，丹黄烂然，颇极矜慎。是年六月汪柳门侍郎由吴门寄示严思庵先生手批本，前后数过，最后为康熙五十年辛卯，则又在此评本之前廿年矣。钱公于严先生为乡里后进，而手眼各别，因以紫色笔移写严评并圈点于册内，以证吾虞诗派之同异。

思庵先生古之狷者也。其罢官居京师时，至于绝粮，得人馈青钱二千始济，非其人必不受也。余削籍归田，生计日迫，然犹有书画数篋、墓庐一区，仰愧先生多矣。龢记。

批本中题记，往往涂抹过半，意当日文字之禁严耶？卷末有味闲居士鏊者，先生长子也。

庚子六月，北方有警，讹言纷然。回望神京，魂神飞越。此岂吾读书时耶？然舍读书又何为也。嗟乎，嗟乎！以庸流参大计，以华士谈书，以沾沾格律绳古仙之奇作，同一憾事！是月望，松禅。

自十六以后，无雨。几于流金烁石矣。余假慕卿侄舍以居，书室如斗，蚊雷轰然，临圈点毕，因记。六月廿九日。

在这十册书中，翁同龢用紫笔过录了严思庵的全部圈批，还在每一卷尾过录了有时长达数百千字的跋语，一色小行楷，这是翁氏晚年书法极好的代表作品。在这一切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几段题跋中透露出来他的内心活动。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师傅，人所共知的“帝党”。康有为就是经他的保荐得到重用的。一般都把他看做戊戌政变的重要人物。其实他在四月二十七日就被罢斥了，而变法的诏书是五月初一日才颁布的。翁罢相后并未出京，在西太后重新垂帘“训政”，杀了六君子以后，才来追究他保荐康有为的罪案，终于被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懿旨”中并有“毋许滋生事端”字样。据马叙伦记，“常熟循故事，月具文投地方官云，‘具稟奉旨驱逐回籍严加管束原任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稟知：本月同龢在籍并未滋生事端’云云，皆亲笔”（《石屋余渚》）。这大约就是“四人帮”横行时“思想汇报”之类花样的先河，不过比起清朝故事来，后者可是要严厉、紧张得多了。翁同龢幸而早生70年，不但可以虚应故事地交差，还敢在旧书上白纸黑字大发牢骚，看样子他是并不担心抄家或追查“黑材料”的。翁同龢在乡下读苏东坡诗集时，正好是义和团起事的庚子年（1900）。他虽久已退归林下，可是还念念不忘“神京”，并痛骂“参大计”的“庸流”（我不相信这是他的自我批判），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自己是否就不是“庸流”，在当时却是有争论的。他的同乡曾孟朴就在《孽海花》里为他绘制了大体上颇为传神的画像。他和李鸿章是政敌，甲午之役，他是主战派的首领，与主和的李鸿章是对立的。不过他也并非什么值得佩服的政治家，并没有什么远见。充其量不过是平庸的“状元宰相”而已，不只是书生论政的典型，也是将派别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物。这在同时人的评论中是可以找到不少记录的。不过即使如此，他的那些题跋，依旧不失为有意义的文献。他的关心国事，自然也是不错的。

与翁同龢同时或少后，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题跋作者。如沈曾植，收入《海日楼题跋》中的藏书题跋，大半论及版本源流，应该归入学术性一类，不过他的文字写得好，有一些是可读的散文。他是“遗老”，文章中带有浓烈的遗老气与寒酸气，有时十分可笑。如后来成为“四部丛刊”底本的《中

《兴闲气集》和《河岳英灵集》，就是他的旧藏，但在影印时，他的题跋却被删去了。收入《海日楼札丛》的也不完整，查原书，在“甲寅三月……”之前是被灭去了“宣统”二字的。甲寅是1914年，已在辛亥革命后三年了。沈曾植和其他一大群遗老，躲在上海的租界里，还在奉着“逊清”的正朔。又过了七年，许多遗老在“宣统辛酉正月万寿节”（按即溥仪的生日），又在沈的家里聚会，还在这两部书上写下了“观款”。遗老的名单是“冯煦、王秉思、邹嘉来、余肇康、吴庆焘、朱祖谋、郑孝胥、王乃征、章梈、杨钟羲、胡嗣瑗、陈曾寿、陈曾任、沈曾植”，共14人之多。这些，在商务印书馆影印时，就都灭去了。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见原书，是不能发现这种有趣的差异的。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到两条经验：一，一切影印本，不只是“四部丛刊”，都是靠不住的，多少总有些有意无意的删削、改动，作为历史资料，还不是可以完全凭信的。二，看来版本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有助于提供真实的历史资料。

最后，不能不提到郑振铎。西谛是有名的藏书家，也喜欢写题跋。从他的题跋文中人们可以接触到他对书籍爱好的真挚的心。他在题记中经常会写下“大喜欲狂”、“为之狂喜”、“惊喜过望”这样的词句，只要与西谛相熟的，都会知道这些都是他得到一本满意的书以后真实心情的写照，不是故作出来的。他为《天一阁抄本录鬼簿》所写的长跋，可以算做标本，原文已收入《西谛题跋》与影印本《录鬼簿》了。我在这里想介绍的是他的另一篇题跋。这是他自己手书上版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后面的一篇手写跋。此书刻成于1937年秋，共22页。刻成后只印了少量的蓝印本。那木版就寄存在上海的来青阁书店里。书店的老板怕这篇跋惹祸，就把刻了跋的那块木版毁掉了，剩下来的21块木版却还在。抗战胜利以后，来青阁又曾用这旧版印过少量的蓝印本，但已经没有原跋了。我的一册是书友郭石麒所赠，还是宣纸的最初印本，时间已经过去了40年，书口处两行的蓝色都已退掉，但字迹还清晰，现在就转录在这里。

余性喜聚书。二十年来，节衣缩食所得，尽耗于斯。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唯一书之获，往往历尽苦辛。有得而复失，失而复于他时他地得之者；有失而终不可复得者；有始以为终不可得，而忽一旦得之者；有初仅获一二残帙，于数月数年后始得全书者。盖往往有可喜之奇遇焉。人声静寂，一灯荧荧，据案披卷，每书几皆若能倾诉其被收藏之故事。尝读黄尧圃藏书题跋记，于其得书之艰，好书之切，深有同感。二十一年正月，丁上海之役，历年友好贻惠之著述，与清末以来之印本，胥尽于一炬，而所藏他书，以别度北平，获免于难。收书之兴，亦未少衰。五年来所获滋多于前焉。前夏举室南迁，藏书亦捆载而南。以所寓湫狭，将非所日需之图籍万数千册移储东区。不意今乃复丁浩劫，其存其亡，渺不可知。连日烟焰冲天，炮声动地，前方将士正出生入死，为国捐躯，区区万册图籍之存亡，复何足萦念虑，而歌词戏曲小说诸书，以藏于蜗居，独得幸免。抗战方始，此区区之幸免者，又安能测其前途运命之何若耶。唯中不乏孤本稿本，历劫仅存者。先民精神所寄，必不忍听其泯没无闻。爰竭数日之力，先写定所藏善本曲目如右。通行刊本千余种，均摒去不录。呜呼！书生报国，不徒在抱残守阙。百宋千元之弘业，当待之驱寇功成之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郑振铎跋。

这是一篇文情并茂的跋文。可贵的是，在一般藏书家照例要感叹唏嘘的场合，作者却表现了十分昂扬的气概。而这就正像他的为人，他就是这样一位热爱祖国文化典籍，生气勃勃，努力工作至死不息的人。

1979年7月21日

## 谈“集部”

我不知道，藏书到底有没有什么秘诀。按照简单的逻辑，只要有一间房子，若干资本，到书店里买下、运回、摆好，就行了。事实上当然没有这样简单。从前有不少藏书家都曾写下过他们的心得，读起来也头头是道的。可是想照抄照搬几乎都行不通。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一旦变化，即使是头等的经验，往往也只不过成为美丽的空想而已。

回想自己的买书，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足以称为经验的东西是没有的。例如，藏书家大抵都有自己独特的搜求目标，或戏曲、小说，或方志、杂史，版画、禁书、弹词唱本……都可成为一种专藏的特色。我这里说的是二三十年前读书界的风气或“时尚”。像这样特定的目标，在我说并没有。我的最早跑跑书坊，原也不是完全没有目的，那就是想找点晚明野史看看。后来发现，当一些通常习见的册籍一旦粗备，就再也难以发现什么新奇可喜之物。当然，有也还是有的。如傅节子抄的“明末五小史”，原也不过是百来年前抄成的东西，但从“九峰旧庐”拿出来时，就已装在特制的楠木匣子里，用大红洒金的书皮装订，成为十足的“宝贝”了。我诚惶诚恐地翻了一下，连价钱也没有打听。

买书是时时需要有新鲜事物的刺激的。不只是新书，旧书也一样。不必说十年前，就是现在，我们也还没有达到想读什么，就能在书店里买到什么那样理想的境地。只能从书架上幸运地偶然发现，并买到自己所欢喜的东西，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逛书店的乐趣，看来恰恰也就在这里。过去我的走走旧书坊，采取的就是一体“人弃我取”的“方针”。这样做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不是众矢之的，就可以摆脱竞争的麻烦，也免去了力不能及的高价的威胁；更重要的是，不为人们注意的东西，数量往往较大，新鲜的、未之前见的书本可能出现的机会也较多。而这正是十分重要的，读者最不能忍受的是那种一片荒漠、没有生机的可怕景象。

这样，我多年胡乱买书所得，比例最大的就只能是明清人的集部。

集部书是一直不为人所重视的，特别是那些并非“名人”的作品。这当然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事物往往有另外一面。非“名人”的作品，未必就不足观；如果我们能进一步从“艺术第一”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就可以从作得不一定怎样“漂亮”的诗文中发现值得珍重的东西。我这里所指，就是思想史、社会史的大量纪录与素材。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古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注意及此了。如果说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还没有摆脱诗的范围，到了厉鹗作《宋诗纪事》、陈田作《明诗纪事》……就大踏步地离开了“文学史”的樊篱。但能注意到这种变化的人是不多的，人们往往总是离不开“文学”、“文学”。钱谦益作《列朝诗集》并撰集“小传”；朱彝尊作《明诗综》，也写了“小传”，后来为人辑成《静志居诗话》。方式不同，用意则一。这都不是什么纯文学的著作。1965年出版的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就是最晚出的一部出色著作。邓先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写在序言中。他首先提出黄宗羲“当以诗证史，不当以史证诗”的意见，进一步说道，“诗有异于史，或为史所无者，斯足以证史，最为可贵。”邓先生这书，与其说是一部文学史的著作，还不如说是一部历史学的著作。他为每一个“诗人”所写的评传，也显示了非凡的功力，虽然某些见解不无可以商榷之处，但总的说来是极好的一种开山之作。读了

以后，使我们对那个动乱的大时代的面貌能获得一个大致的理解。虽然限于作者的识见与原书的篇幅，所入选的作品还是太少了。

还不能不提到的是阿英同志。阿英是藏书家，但却不同于藏书家中的“庸流”。他也是对清人集部有浓厚兴趣的一人。他的收藏目标集中在鸦片战争前后直至清末这一历史时期。这种书在二三十年前真是汗牛充栋，没有受到图书馆的应有重视，被划在“善本”的线外，大量地落入了还魂纸炉。阿英以个人的微力，经久地、孜孜不倦地收集、研究，那结果就是“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几部“文学集”，还是《晚清文学丛抄》。这些著作的学术价值今天是有目共睹的了，但在他进行收集、研究的当时，是很少有人懂得那意义的。阿英走着一条寂寞的路，他也终于走出了一条路。

刚才看到许涤新同志的《百年心声》，如作者所说，这是一部“中国民主革命诗话”，当然是一部新型的“诗话”，那办法似乎也可以为上面的说法张目。

现在就来随手找两本书谈谈。说随手，一以说明这只是一点漫谈，没有系统；此外也想向读者告罪，目前还只能在随手发还的几本旧书里找一点材料，即使想有些系统，事实上也困难。

最近因为重新上演了京剧《恶虎村》、《连环套》（只“拜山”一折），人们对施不全和彭鹏关心起来了。纷纷议论他们是不是“清官”，他们的业绩是“除暴安良”呢，还是“镇压了农民起义”？泛论了好半日没有什么结果。恰巧这两位不但都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都有“作品”传世。晋江施世纶撰《南堂诗钞》十二卷，有雍正中刻本；“闽中莆田彭鹏无山”有《中藏集》和《古愚心言》八册，康熙刻本。“诗人”施世纶的集子我没有见过，无法评论；彭鹏的集子我是有的。可惜现在回到手里的只是《心言》的第七册，所收都是“详文”，是康熙二十六至二十八年他任三河县令时审理案件的文稿。但只这一册，也多少反映了当时京东一带阶级斗争的面貌。这里收有旗人争地，庄民失盗，番役诬民为盗，详革勾旗乡耆，投旗邑民捏讼，驻防领饷等等有关案件的文件。可以看出，清初京畿一带因为出现了圈地、驻防这些新情况，新兴的满洲贵族庄田经济出现了，投旗、勾旗之类现象大量发生了，驻防的供养也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盗贼”的蜂起，自然是不足怪的。彭鹏是一个“能吏”，他的担子不轻，责任重大。虽然不过是个小小的县令，却曾受到康熙帝的殷殷“垂询”。皇帝问道，“地方旗下庄头何如？”彭鹏回奏，“臣赋性戆直，从不徇私。四载以来，毫无姑容。旗人皆谅臣心，一一遵法。”这当然是官话，但也可以看出皇帝还是明白的，他知道主要的矛盾所在。彭鹏在皇帝面前，敢于吹嘘自己性情戆直，不徇情面，可见所谓“清官”的称号，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彭鹏说，“若使洵邑保甲不行，道里蒙混，旗民杂揉，当时天语下询，臣何辞以对。”可见他是忠心耿耿并十分看重保甲的作用的。在“详稿”的开头又说，“为弭盗首、严保甲，旗民势必均编等事。”这就透露了当时复杂的斗争情况。“八大拿”中“霸王庄”的“皇粮庄头”黄龙基，看来就是这一类贵族庄田的主管，与《红楼梦》里的乌进孝是一流人物，与于六、于七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某种联系，情况实在复杂得很。不彻底弄清这些错综迷离的情况，只凭几条原则是作不出使人信服的结论的。

还有一本书是“江南程庭且硕”的《若庵集》，康熙刻本。原书六卷，现在只剩下卷四一册，是《停骖随笔》，内容却全的。程庭是原籍安徽久住

扬州的大盐商，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六旬万寿”，他也跟随地方官员进京祝嘏。这随笔就是行旅日记。特别有趣也有史料价值的是对畅春苑等处的描写和祝寿觐见经过的记载。记畅春苑说，

按畅春苑乃明季武清伯李皇亲园亭旧址，今上因之，置为御苑。苑周遭约十里许，垣高不及丈，苑内绿色低迷，红英烂熳，土阜平陀，不尚奇峰怪石也。轩楹雅素，不事藻绘雕工也。垣外行人于马上时一窥见。垒垣以乱石作冰裂纹，每至雨后，石色五彩焕发，耀人目睛。玉泉山之水走十余里，绕入苑河内，复作琤琮戛声，流出宫墙。苑后则列诸王池馆，花径相通。车则有悟真庵，尼僧也。西北则永宁观，羽士处焉；圣化寺，喇嘛处焉。正西则广仁宫，西南则万寿寺，皆缙流处焉。其余梵刹颇多，惟此数地为上所常驻辇云。苑门南向，匝以红栏。栏内立铜狮二，遍身作翡翠色。每当朝期，群臣方由此出入，其于平日，则有东红门二，西铁门二，惟视上所临御焉。

祝寿的内容之一是由宝华僧众的西顶寺礼忏。此寺距西苑约五里许，“一水湾环，直达寺门，夹岸长堤，尽植桃柳”，关于“西顶”，程庭说：

帝畿四隅，各有一项，以寓四岳之象，西顶其一也。敕名广仁宫，内供女像三。中坐碧霞元君，右光明菩萨，左送子菩萨。珠冠龙帔，皆自大内所出者。今上五十年特发内帑修造，轮奐巍然，丹雘焕然，御制满汉字碑文各一座，令内务总管大人一员，游击、千总、拔什库各一员，率披甲四十名，昼夜防护，其慎重也如此。

康熙帝由畅春苑回宫。

庭等跪迎于西直门道上。已刻，皇太后銮舆先入城，舁用阿监十二名，后车十二乘，悉皆朱轮黄幟，窗嵌玻璃，每一辆用阿监八人，居前挽鞬者三，夹翼扶轮者二，殿后推毂者三，皆团花茜袄，绛帽黄纓，簇拥而行。少顷，则有华旗芝盖，月扇云麾，隼翠节，豹尾金幢，按队分镳，鱼贯鹤列，不敢少紊。执持者披天青绉袍，遍排织金寿字，次则教坊全部，象管龙笙，箫韶缓奏，融融怡怡。次则侍卫从官，蟒衣名马，各捧彤弓卢矢，宝剑鸾刀，金交椅、金几案各一，金盆、金盒、金提炉各二，瑞烟缭绕，香霭缤纷，中露赭黄曲柄小盖。夹道臣民，咸知圣天子将临，一时尽屏气调息，肃容伏谒。上御大辇，金碧璀璨，绮疏玲珑，舁用三十六人。诸亲王服团龙绣袍，珠冠玉带，徒步扶辇，和缓雍容。第二天，午门朝贺毕，帝后又返回畅春苑。

皇太后及诸后宫车乘驰过后，卤簿銮仪，若斧钺戈戟旌旄旗节之属，较昨陈列者迥乎不同，持仗宿卫皆乘骑矣。铙吹画角，嘹唳悠扬，则有绣服诸郎，各手控御马，共二十骑，骊骅骝，无色不备……雉尾团扇。中御驾肩舆，舁者十六人，舆四面不施轩棂，就日瞻云，尤为亲切。伏见上服织金赭龙袍，外笼石青团龙缎褂。

这些相当详尽的记录，出自亲历，写来真是历历如绘。如果与故宫现存描写清代诸帝活动的大幅画卷对照研究，则两百多年前皇家的具体仪制、服饰……是可以掌握得较为精确的。这对写历史小说、摄制历史电影，都将有不小的帮助。在读以上这些片段时，不由得想起《红楼梦》里所写元妃省亲等场面，觉得那几乎全是写实，而非虚构。两者反映的正属同一时代的现实。程庭还仔细描写了他在畅春园里参观“皇会”和“买卖街”的详情，帝后乘船到西顶寺礼忏的场景，都是颇有文献价值的记录。程庭在《若庵集》外，

还有一部笔记《蓉槎蠹说》，也是刊刻精美的康熙本。这位盐商，有许多著名文士的朋友，又喜欢刻书。在曹栋亭作江宁织造兼两淮盐政时，程庭这样人物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甘泉林苏门撰《邢江三百吟》十卷，嘉庆刻本。这是有关扬州的一部诗集，分“播扬事迹”、“大小义举”、“俗尚通行”、“家居共率”、“周挚情文”、“新奇服饰”、“趋时清赏”、“适性余闲”、“名目饮食”、“戏谑方言”等10个门类，共300题。每题后有小序，然后才是诗。作者是阮元的舅舅和老师，曾经参加过四库全书的校勘工作。他对扬州这个地方的风俗、饮食、服饰……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仔细加以考察、记录。在地方性的“竹枝词”中，这是很有特色的一种，不像别的作者，只将兴趣集中在古迹、名人上面，他关心的却是当代的事物，特别是与城市平民有关的平凡琐事。这就很是难得。作者生活在乾嘉之际，正是扬州从极盛转趋衰颓的时候，恰好可以与曹栋亭那个时代衔接。如与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加以比较，就分明可以看出一个是庙堂或山林的，一个则是市井的。我觉得，这书有些像关于扬州的小型“百科全书”，当然只是在大体上相像，深广都还远远不能使人满足。但比起一百多年后出现的各种导游书，还是好得远。

在“新奇服饰”中，有“长耳挖”一题，注云，“此即俗名一丈青也。金银不一，妇女头上斜插之。”诗共两首，都不高明，但这注却可贵。原来《红楼梦》写晴雯用来向小丫头手上乱扎的就是这东西。曹家在南京、扬州前后住了几十年，雪芹的家庭里习惯使用江淮方言是毫不奇怪的。未必一搬回北京就上下一律改说“官话”。不料这却成为一种“把柄”，使雪芹的著作权都变得可疑了，实在不能说不是出于“意表之外”的。

此外在“蝴蝶履”条，详细说明制作方法，鞋帮“或全仰素缎，或杂色洋呢羽毛线绉宁绸等”；“趋时清赏”记“厅上闹钟”云，“自鸣钟以定时刻。扬城趋时之家，间亦用之。近日有用闹钟设于厅上者，时刻周流转换。未换之先，隐隐声如击柝，一换则如撞洪钟声，时刻之分，原以钟声之数而定，此钟惟于时刻欲换之际，忽铿铿然如奏乐一般。闹毕即撞，撞亦以数定。厅上乃宾客往来之地，借以骇人见闻。”“带三针表”云，“此亦定时刻之物也。用铜胎磁面，再加玻璃罩。内皆螺丝篆攒之，全借法条为准。面上画如八卦，另嵌以针，走时罩内一望，针向某处，则知某时刻，正未几分。洋人一针表售出价不过数十金。近日面上三针，校定更准，其价更昂。扬城趋时人借定时名目，亦多于腰间佩带，以为饰观。”

这些时髦的“舶来品”，都曾在《红楼梦》中出现过。嘉庆中市面上还算是稀罕的东西，在织造府里大约若干年前就已在使用了。

作者在“真宋板藏书”条，推崇马佩兮、秦敦夫，而对自己的外甥则颇不客气，他说，“阮伯元中丞，历年刊刻固多，收藏不少。试问盈箱满架，宋板耶？明板耶？真者能有几十函耶？”他还提到当时扬州的名画家，有郑板桥、罗两峰、张桂岩、奚铁生、王椒畦、李复堂等，他对板桥的评论是，“郑板桥先生夔，兴化进士。以庶常改山东潍县令尹。晚年乞休归里，往来扬郡，字画易钱。时人但以字之怪、画之随意，不惜分金而换易之，而不知所擅长者则在闲言戏语题幅中多妙趣耳。”“郑公行世之字，皆尚古怪。余闻其中年学欧，因不能取炫于世，改而自成一家。小斋现藏‘竹疏烟补密，梅瘦雪添肥’一联，板桥楷书真迹，笔笔中锋，迥非行世一路，可以证矣。”

这是同时人对板桥的看法，也是有趣的文献。特别赏识板桥题画的一点，

则是颇有眼力的。

无论是彭鹏、程庭还是林苏门，都算不得诗人，在文学史里是找不到他们的名字的；也为此，他们的集子经过一两百年之后也都临于消灭。这是不公平的。他们的著作也自有其应该存在下去的价值。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十分重视诗和文章，几乎成为判断文化遗产首先考虑的重要标准。太史公的《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远远高出它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无论是哪一门类的著作，想流传下去，首先的要求是文字好。《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这样的著作，也不能逃出这一通例。影响所及，古代的知识分子人人都想作文学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集部书。其中当然绝大部分是劣作，日就湮灭原也是难怪的。胡乱买了许多诗文集，翻阅的结果，像上面提到的几种，实在也真是凤毛麟角，这也是事实。

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史学家郑天挺教授的一个意见。他认为史料应该不只局限于“史”的资料，还应深入到各个人的文集之中，深入到方志、笔记之中去寻找。有许多到处找不到的历史资料，往往是被当做文学作品的成绩保留在文集中间的。这是很好的见解。现在，组织起更多的人力，有领导有步骤地深入到更深更广的领域中，发掘、分析、整理出新鲜而有质量的史料，制成索引，编作长编，这样的时机的是已经来到了。这将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从苍白无力状态下解放出来。



## 谈禁书

不记得是谁曾经说过，“雪夜闭门读禁书”，算是人生一乐。我想这是说得不错的。要选一个下雪天，还得是晚上，外加关门上锁。这样的典型环境实在刻画得好，没有切身体会，怕是万万想不出的。

因此读禁书也就被赋予了一重浓重的神秘色彩，寥寥七字，包含的内容实在丰富得很。

溯本穷源，发明了禁书的手段并严格付诸实施的还是不能不首推秦始皇。这以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继起无人。虽然提起“图籍之厄”，烧书的事确曾不断发生，但那大都是战乱之间不问青红皂白一把火通通烧光，与嬴政的有目的、有纲领、有明确规定而且著之律令的焚书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禁书与文字狱发生关系，较早也较著名的是宋代苏轼的“乌台诗狱”，清代的张秋水有《眉山诗案广证》，就是专论此案的。张鉴的《冬青馆集》里收有许多有关南明史事的论文，他生于嘉、道之间，正当清代中叶文字狱盛行之后，他的特别关心宋代诗人苏东坡的命运，应该不是没有缘故的。

清代的乾隆皇帝，确是遥遥继承了秦始皇的传统，并后来居上。论手段、论规模，也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单是“禁毁书目”就先后修了几次，成书若干册。“禁书”成为一种通行的术语，也就从这时开始。不过有清一代，人们明明知道这一客观存在，但口中、笔下却谁也不敢提。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旧书店的商人才公然堂皇地把禁书字样标在书目上，同时售价也就相应飞快地提高，终于在有些图书馆的目录上也逐渐露面，做为审定“善本”的一种根据了。

为了习惯与方便，这里谈到禁书，也姑且以此为限断。

“禁书”虽然已经成为宝贝，但我居然也先后得到过若干种。这就使我悟出，禁书者，不论是有着无上威权的封建统治头子还是别的什么聪明人，也不论他们用尽了怎样的心机，到头来也终于是无效的。书是禁不绝的，因为有无数的正直、公平的读者的保护。

唐末的词人韦庄，写过一篇著名的长诗《秦妇吟》，诗中涉及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时的一些情况，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样的句子。韦庄自己后来觉得不大好，“公卿”们看了自然不舒服，新朝的头目也不会喜欢的，因此就自行“抽毁”，从《浣花集》中删去，还给家属留下了禁令。这以后一千多年中人们都无法看到这篇著名的作品。不料终于从敦煌的石洞里发现了那抄本，而且有三卷之多。韦庄用心良苦的安排终于还是无效。那原因就是很有一些读者喜欢它，作品还是被传抄、保存下来了。

韦庄后来虽然贵为蜀相，他到底只是一个人，与能动用国家机器，在全国范围内搜查禁毁的皇帝是不能相比的。不过皇帝又怎样呢？事实证明，成绩也并不理想。不过200年，清代禁毁的一些作品，也还是陆续出现了，并没有禁得一干二净。那原因也并不两样，也是得到了人民保护的结果。

近30年前，我看到过从浙江绍兴梅市流出的一些山阴祁氏澹生堂的藏书。这是一批由祁氏子孙深藏密锁了三百多年的先世著述。大半是抄本与稿本。其中绝大部分是符合禁毁的条件。经过清初的残酷镇压，祁氏遭到了家破人亡的惨祸，但还是冒着杀头、灭族的风险保存下了这些著作。事实本身就是极为悲壮的。

这批书中有一部祁承 的《澹生堂集》，是崇祯刻本，在禁书目中是有

著录的。仔细一看，凡是集中“奴”、“虏”、“酋”……等字，都已用浓墨仔细地涂去了。同时我还看到一部清初抄本的《澹生堂诗文钞》，是祁氏子孙选抄待刻的稿本。原书中那些涂掉的地方，都经过细密的修改。这些工作，想来都是在“雪夜闭门”的情况下进行的吧？

后来在苏州又得到过一部刻于崇祯甲申（也就是典型的弘光刻本）的钱梅撰《城守筹略》，则是南明政府官员为了抵御“北虏”南下而提出的作战方略。奇怪的是这样的书，禁书目中也并未收入。可见清初统治者花了如许气力搜索、审查，工作也还是粗疏得很。原书卷一第一页的书名和作者名字都被什么人撕去了，撕得很马虎，卷一以下都还好好地保留着书名和撰人。这就不能不使人揣测，藏书者要应付即将到来的大搜查，他所藏的这种违碍书又很多，在惶急中只能这样马虎地处理一下的吧？那时代可能就在钱梅被捕杀头的前后。

我还有一部清初刻的《新乐府》，是吴炎、潘柟（潘耒的哥哥）的作品。这两位都是在庄史之狱中被杀头的。书前的作者姓氏也同样被撕去了。这样的残迹，好像意在提醒后来的读者，书册曾经历过怎样的命运，才终于保存下来，好像直到今天也还能隐隐嗅到血腥气，以文献论，是非常可贵的。

提到庄氏史狱，就不能不联想到偶然得到的一册稿本，《私史纪事》（这是经过修改的，那原题是《史祸纪事本末》）。这可是一册很有价值的稿本。作者是范骧，与陆丽京等三人都受到“庄史”的牵连。他们大概都曾为此书写过序或曾列名参校。案发以后一起被逮，被押解到北京刑部听审，后来总算放还了。此书详细回忆记录了起解途中，下狱审讯……以及如何打点营救，被释还家的全过程。浙江离开北京有一千多里，天气又是严冬，范骧等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的身份是逆案的“钦犯”，在押解兵下的驱赶下赶路，后来到了刑部狱中，前后半年光景，过的是怎样非人的生活，都有十分动人的描绘。不只是文字狱的珍贵史料，作为社会风俗史，这也是难得的原始纪录。尤其使我吃惊的是，这本回忆录记下了三位老人在遇祸以后，彼此间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猜疑和互相责难。在书册的上端，有陆丽京的后人署名“宗楷”的墨笔批注，都是驳斥范骧、为丽京辩诬的。他们被释放归以后，不用说，家都已破了，陆丽京的结局是离家出走，不知所终。看来与这种纠葛是不无关系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在明遗民内部散布的矛盾……这一切都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的。

《读书堂诗集》，原刻的黑格纸，精抄，无疑是康熙中的清写稿本，不题撰人也没有分卷，后面还有许多空白页，可证尚未编定。这是钱塘汪无己的诗集，无意中得之市肆，也是一种当然必禁而不见于禁书目的异书。无己名日祺，后改名景祺，是钱塘汪东山（霏）的儿子。此集所收都是少年时的作品，后来他投入年羹尧幕，因《西征随笔》一书获罪，“律以大逆不道立决梟示”。《西征随笔》的原件后来在故宫里发现，曾经有过新印本。作者是有才华的，笔记中有些纪事的篇章，其实是很好的短篇小说，此外也有一些揭露官场丑行的纪事，我读过以后始终未能发现获得如此大罪的根由。其实江景祺最大的过错是成为年羹尧的亲信。当时议政大臣所定年羹尧的“大逆罪”的第三条就是“汪景祺《西征随笔》，见者发指。羹尧亦云曾经看过，视为泛常，不行参奏。”后来查嗣庭文字狱发，雍正正在“上谕”中还念念不忘于景祺，“去年正法之汪景祺，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指‘正’字有‘一止’之象。”雍正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完全可以和他的

继承人乾隆之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媲美。他写起“上谕”来，往往下笔万言，反复声说，终于使臣民陷入五里雾中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权威”而后已。他运用种种奇怪的逻辑，惊人的捏造，将他所选中的对象一个个罗织入文网之中，又一个个杀掉，还要罪及妻孥亲属朋友和简直毫不相干的人。雍正正是清代文字狱事业的奠基者，他提供了整套的纲领、理论和实践范例。可惜他的统治只持续了13年，剩下的工作不得不由乾隆来最后完成。

据《永宪录》记，汪景祺“伏诛”以后，妻子照例要“发黑龙江披甲人为奴”。“景祺之妻，巨室女也。遣发时，家人设危跳，欲其清波自尽。乃盘蹙匍匐而渡。见者伤之。”简单的几句话，写尽了一场阴森的闹剧的阴冷凄凉的结末。

汪景祺的《读书堂诗集》不过是少作，并无可观，全书充斥着封建文士无聊生活的描绘，但书前却有七八通诗序，作者都是当时的名家。除了朱彝尊、韩菼，现在已经记不起还有谁了。我曾经查过这些作者的文集，发现没有一篇序是保留下来的。这是奇怪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卷二十，还保留了与景祺在西湖“夜泛”的五首诗。这是因为朱集刊成在景祺获罪之先。但后印的本子，“日祺”两字就已经削去了。出于同样的原因，朱集卷二十三“喜青宫再建”诗，在康熙五十一年再废太子以后，重印时也削去了。一个作者的文集，由于政治情况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印本就会有不同的面貌。这就是藏书家重视初印本的理由之一，也是判断重印时期的重要根据，也算是版本目录之学的一点小小的知识。

上面随意想到的几个例子，几乎无一不是清初文网的漏网之鱼，这就说明，尽管皇帝雷厉风行，作为头等政治任务来抓，效果还是很很理想的。当时各省的封疆大吏和中枢的文化官员实在值得同情，他们担着身家性命的干系，一字字地读着汗牛充栋的书本，又实在捉摸不透皇帝老馆的定案标准，他们的为难是可以想见的。手边有四册《无闷堂集》，闽张远超然撰，康熙刻本。四库未收、禁书目也没有著录，照我看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只要看卷中有许多地方都开了天窗，就可以知道了。文集卷七有一篇《徐烈妇小传》，照例这样题目的文章我是不大看的，但因为篇中挖去了将近一行而引起好奇，终于发现这实在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字。传末“野史氏曰”以下的一节是：

甲寅之变，生灵涂炭。身污名辱，终于不免者，不独女子也。女子为尤惨。楚蜀两粤，不可胜数。以予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其死于锋镝、盗贼、饥饿、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其姿容少好，骡车马背辇之而北者，亦不具论。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以下挖去十五字）累累若若，若羊豕然，不可数计。市之者值不过数金，丑好老少，从暗中摸索。

甲寅是康熙十三年（1674）。这里所说的是三藩之变，干出种种惨绝人寰的兽行的正是平定三藩的清军。其在浙闽江右一带作战的则是讨伐耿精忠的部队。扬州、南京的人肉市场，竟与奴隶社会无异。不见旧记，是无从想象的。那挖去的几句也不知道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事物。但仅此一节，难道就不该劈版禁毁、追究作者吗？可惜的是乾隆一伙竟自轻轻地放过了。

乾隆肚皮里的标准，捉摸起来是困难的，但只要翻翻“文字狱档”，就可以约略知道那大概。不是连测字先生的方法都已采用了么？又还有什么标准可言？其实这也正是一种标准。运用之妙，也未必全出自“圣心独断”，

大小臣工的努力也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皇帝也自有他的聪明，早已发现这样蛮干下去不是事了，必须转变作风，采取新的积极措施。这就是《四库全书》产生的背景。聚集群书，暗暗改削，写成“正本”，颁示天下。既得“稽古右文”之美名，又收统一思想之实效。确是一条好计。但这也并非乾隆自己的发明创造，列祖列宗早已有见及此并付之实施了。入关以后首先为崇祯帝治丧；康熙下江南专程去孝陵致祭，他写的“治隆唐宋”的“御碑”，到今天也还完好无恙。已死的明臣给以美谥，尚存的就用“博学鸿词”的办法招徕。这原是一整套政策的两个侧面。不懂这一手，是不能理解禁书的全部奥妙的。禁书是一种历史现象，非常丑恶的历史现象。人类社会本来是没有这种事物的，但后来出现了，在某些时候还颇行时。我相信，它终究是要消灭的。前些时曾经就此进行过一些讨论。我自己是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的。当然，一时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只要具有健康、正常的头脑的人，我想都应该赞成并努力创造条件把禁区彻底打破，并最终消灭这一丑恶历史痕迹的吧。那种一听见要取消禁区就不舒服，惟恐这种宝贝事物断种、失传的精神状态是奇怪的，不正常的。

“神农”尝百草，在他心目中本来就没有禁区。后来发现了毒药，他也只是向人们提出警告，同时写入本草，研究利用。他设了“禁区”，然后又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了“禁区”。假使一开始“神农”就是满眼“毒草”，不敢触动，科学的本草学、药物学是不可能出现的。

三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马列主义曾是“禁区”里的“禁书”。多少人如饥似渴地“雪夜闭门”读之，后来终于诞生了新中国。“禁”的后果往往却是相反的宣传，这是反动派所不及料的。这些事过去了还不算太久，大概我们总多少还有些印象吧。

1979年11月28日

## 书痴

看题目，这好像是从《聊斋志异》上抄了来的。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废寝忘食地在书斋里读书，半夜里，一张少女漂亮的脸在窗外出现了……后来，自然要有一段曲折、甜蜜的恋爱生活，然后，书生得到少女的帮助，终于考中了状元，作了大官……

自然，这不过是说笑话，蒲松龄的思想境界是不至如此低下的。但在风起云涌继《聊斋志异》而出现的什么《夜谈随录》、《夜雨秋灯录》之类的作品里，这样的故事就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然要出现的了。在那样的社会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美妙”幻想，在读书人的头脑里，简直是独霸着的，这就使他们不能不整天价作着此类的白日好梦，也自然要进而写进他们的创作中间。

不过关于读书人真实的并非捏造的故事，也是有的。如果图便捷，不想翻检许多书本，我想，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是可以看看的。

叶昌炽辛苦地从大量原始纪录中搜罗了丰富的材料，依时代次序，把许多著名藏书家的故事编缀在一起，是煞费苦心的。他的书在这一领域不愧是“开山之作”，过去还没有谁就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叶昌炽的书另一值得佩服的特点是，他在取材时尽量选取的是那种“非功利性”的读书人的故事，因而也较少封建气息的污染。当然这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和“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百分之百的“为读书而读书”是不存在的。读书，无论在什么时代，总都有它的目的性。但取舍之间，不同作者的眼光是大不相同的。我想这和叶昌炽自己就是一个生性恬淡，习惯于寂寞的研究，因而热爱书本的书呆子不无关系。

如果想探索一下，是什么促使人们热爱书本，那原因看来也只能归结为强烈的求知欲。司马光是爱书的，他所藏的万余卷文史书籍，虽然天天翻阅，几十年后依然还像“新若手未触者”一样。他对自己的儿子说过，“贾豎藏货贝，儒家惟此耳。”这是很坦率的话。书是知识分子的吃饭家伙，是不能不予以重视的。这里我把“儒家”译为知识分子，和“四人帮”的论客的解释是不同的。虽然在政治上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对立的，但他这里所谓“儒家”看来也只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泛称，并没有什么格外的“深意”。

司马光自然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人，他编写《通鉴》的目的是为了“资治”，一点都不含糊。他的得力助手刘恕也是一位藏书家，他受司马光的委托，经常走几百里路访问藏书家，阅读抄写。一次，他到宋次道家看书，主人殷勤招待。刘恕却说，“此非吾所为来也。殊费吾事”，“悉去之，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

也是宋代的著名诗人尤袤，则公然声明他的藏书的目的是，“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这个著名的声明，出之诗人之口，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他是道出了“为读书而读书”的真意的。近代著名学人章钰为自己的书斋取名“四当斋”，就是出典于此。

书籍是传播知识的工具，在知识还是私有的时候，知识分子对书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有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干出来了。有一些还被传为“美谈”，其实正是丑史。过去的藏书家喜欢在自己的藏书上加印。除了名号之外，也还有一种“闲章”，有时要长达数十百字，就等于一通宣言。从这些

印章中，很可以窥见藏书家的心思。

陈仲鱼有一方白文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这是很有名的印记，读了使人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印象，觉得陈仲鱼是挺可怜的。他这里所说的后人，并非指自己的子孙，而是后来得到他所藏书籍的人。在这一点上，他还是明智的，比有些人要高明得多。风溪陶崇质“南村草堂”藏书，每每铃一楷书长印，文云，“赵文敏公书跋云：‘聚书藏书，良匪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策。随开随掩，随损随修。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陶松谷录。”这也是很通脱的。爱书，但私有观念并不怎样浓重，是很难得的。明代著名藏书家、澹生堂主人祁承的印记则说，“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则已明显地露出了贪惜之念，而且要向子孙乞怜，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结果当然是失望。祁家的藏书后来被黄梨洲、吕晚村大捆地买去，吕还为此作了两首诗，其一云，“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斤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说了一通风凉话，却料不到他自己连同所藏书籍的命运比祁氏还要来得悲惨。

清末浙东汤氏藏书也有一方大印，“见即买，有必借，窘尽卖。高阁勤晒，国粹公器勿污坏。”说得更是开脱，而且毫不讳言，必要的时候尽可卖掉。这就分明可以看出，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子孙世守”那样的观念已经日趋淡薄，而书籍作为商品，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已大大改变了。

但在明代或更早，这种通脱的意见是难以遇见的。著名的天一阁，就历世相传着极严格的封建族规。藏书应怎样保管，要经过怎样烦难的手续才能看书……都规定得十分明确。有清一代，有许多著名的学者想登阁观书都被回绝，这样的纪事是很多的。约略与范钦同时的苏州著名藏书家钱穀有一方印记则说，“卖衣买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随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鬻之何其愚。”就大有咬牙切齿之意。钱叔宝是一位贫老的布衣，也是真正爱书、懂得读书的人，他的这种愤激的言辞是可以理解的。说得更为可怕的是明末清初宁波的万贞一（言），他是万斯同的侄辈。我买到他的藏书，读到他的手铃的藏印时，是吃了一惊的。他说，“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椁。子子孙孙永勿鬻，熟此自可供粥。”在我浅薄的见闻中，像这样说得斩钉截铁、血肉淋漓的可再也没有了。

为了保护藏书，一方面是训斥子孙，另一面则是威胁买主。可以作为代表的是另一方大印，不过已说不清是否是钱叔宝的手笔了。“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

话虽如此，有些人肚里明白，他们寄以殷切期望的孝子贤孙往往是靠不住的。明代的杨仪吉年老时就将所藏书散给了亲戚、故旧，同时还恨恨地声明：“令荡子鬻妇无复着手，亦一道也。”他大概看够了官僚地主家孩子“不肖”的实例，才想出了这一条计。他是隐约地看出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的，自然并不明白那原因。

以上通过几方藏书图记，约略勾画了藏书家愉快、痛苦交错的矛盾心情。这些位，如称之为“书痴”，大概是并无不合的。当然具有较为高明的识见者也不是没有。明末的姚叔祥就说过“盖知以秘惜为藏，不知以传布同好为藏耳”这样的话，是很有见地的。可惜的是并不多见。

“嗜书好货，同为一贪。”这是并非藏书家的极平凡的常识性见解，恐怕事实也确是如此。旧记中常常有人们千方百计搜求书籍的故事，有些自然是使人佩服的，有的就难说。比如朱彝尊买通了钱遵王的书童，把《读书敏求记》的手稿偷出来传抄，就被当做“佳话”写入了序文。这其实就是孔乙己著名的自我辩护的蓝本。“佳话”与“笑柄”的区别，完全以是否“名人”为准，事物的本质往往是被忽略了。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行动是不能不受社会阶级地位的制约的。孔乙己如果没有落魄，或有朝一日又阔了起来，他就会使出不同的手段来抢，人们也不但不敢笑，而且还要眼睛望着地面的。

关于《清明上河图》或“一捧雪”的故事，人们是熟知的。因为有戏曲和小说的宣传。严嵩、世蕃父子的收藏，详细记录在《天水冰山录》里的，恐怕无一不是用同样手段取得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严家父子的前辈，秦桧父子早已玩过同样的花样了。

陆游《老学庵笔记》记，“王性之（名铨，是作《挥麈录》的王明清的父亲）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气焰熏的。手书移郡，将欲取其所藏书，且许以官。其长子仲信名廉清，苦学有守，号泣拒之曰，‘愿守此书以死，不愿官也。’郡将以祸福诱胁，皆不听。熺亦不能夺而止。”这是八百多年以前的故事，但今天听来也还耳熟得很。同时还不能不叹息古人到底“淳厚”，王廉清顶了一下，秦熺也就算了。如果换了陈伯达或那个“顾问”，你顶一下看，谁都知道那后果是什么。

中国历代皇帝有一种高妙的创造发明，好像一直不曾引起过怎样的注意。那就是“抄家”。一个奴才，受到主子的宠信，逐渐爬起来了，一路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终于积累了一大笔家私。到了一定的时机，皇帝就将面孔一板，抄家问罪。既平了“民愤”，皇帝自己也在“山呼万岁”声中写写意意地将贪官的辛勤集聚搬到内库里来。这实在是极为巧妙的一举两得的方法，比起自己出面接受“孝敬”要干净得多也省力得多。因此一代代继承下来照办无误，不过一直心照不宣，也从不写进什么总结里去。到了十年浩劫之时，“四人帮”之流就全盘继承了这个办法，并加以发展、提高。原来只限于几个贪官的，现在就推广到全民中去。原来的口号是惩治贪污，现在就改为破除“四旧”。在深度、广度的变化上，都不能不说是受了清代文字狱的启示。一切书籍、文物、艺术品……只要用“四旧”的尺子一量，就再也没有地缝可钻，一古脑儿被抄了去了。

奇怪的是，当时作为“罪证”的“四旧”，今天在许多人的眼睛里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当党和政府三令五申、拨乱反正、责成清理发还时，有的人就很不愿意。在他们看来，“四人帮”的反革命掠夺，在理论上是非法的，在实际上却是一种“成果”。

我不敢确说这样的思想状况有多少普遍性。因为即使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大抵也不肯坦白表示，他们嘴里说的往往倒是更为动听的词句。不过从具体的现象中可以知道它是确实存在的。我自己的几本破书被“四人帮”的爪牙抄去，已近八年。有些书就放在上海图书馆里，我也早就看到了那详目，知道是完整地保存着的，可是至今也还没有发还的讯息。偶尔去打听一下，就会听到全套公程式的答复。最后这种繁复的套话浓缩成一句，是“尚未清理完毕”，而且已经重复了若干次了。真是奇怪，难道那几本书就一直是点不清楚的么？

1979年12月20日



## 祭 书

时令还没有进入农历己未年的腊月，不知怎的忽然想到了“祭书”。过去时代的读书人，特别是藏书家，到了一年向尾的某一天，总要举行这样一种仪式。把自己心爱的书陈列在案头，藏书很多的，大抵只是选取少量有代表性的书本，多数还要用鲜花酒醴作供，可能还焚香，然后大礼参拜，口中念念有词，不外是“长恩默佑”、“子孙永宝”之类的虔诚吉利话。这样的仪式常常要请好朋友参加。仪式结束后就大家一起赋诗。会画的朋友也许还要画一张画，接下去就是吃酒，再就是将有关的诗文刻进自己的集子里去。

过去我经常从诗文、题跋里看到这种纪事，觉得很有趣也很可笑。买了几本破书，居然还要玩出这许多花样。地主阶级也确是空闲得可以。

这种仪式所反映的思想也是明明白白的。首先是“知识崇拜”。过去是只有地主阶级有文化，要占有文化就得依靠书本。因此书就成了他们稳稳站在统治阶级内部、对被压迫的阶级实行统治的必要武器，即宝贝。而对宝贝是必需表示充分的敬意的。

其次，在旧社会，书籍也和其他物质财富一样，流转无常，易遭毁失。一般的说法是书有五厄，什么水火兵虫之类。仔细想想，其实又何止于此。如果每种书印出以后，一本都不毁失，那就真正不得了，现有的图书馆无论怎样扩充也将装不尽，而善本这名目也就不存在了。经验教训了读书人，他们为了免除这种厄运，也只能采取一种迷信的手段——祭。

我在这里讲起这样的故事，自然不是想来推荐什么封建迷信。其实用不着推荐，在我们这里，封建的事物还多得很，至少在目前，还用不着担心它会断种。同时，物质基础也到底不同了。把什么《基度山伯爵》之类供在桌上，对之顶礼膜拜的喜剧，用不着担心，是肯定不会出现。

我的忽然又想起了祭书，自然也有自己的原因。那就是，最近我又时时想起了我的几本破书，情不能已，这才产生了这样古怪的念头。仔细回忆，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这样的念头确是从来也不曾出现过。不过近来不同了，又开始动笔写写文字，也必然要想到过去曾经思索、考虑过的一些问题。有时想有所引据，或企图更过细地加以钻研，或想为久已酝酿的主题搜寻较完备的资料，往往只能掷笔而起，叹口气完结。明明知道自己有哪些书，所需的材料就在某卷某页，可就是看不到、摸不着。明明知道这些书都安然无恙地放在图书馆里，“蓬山此去无多路”，但还是没有法子想。

已经是八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正在干校里当泥水小工。一天，换上了劳动服正准备上工，忽然一位头头来通知了，要我马上回上海去，第二天一早到单位里去报到。这是出乎意料的，是吉是凶，完全不能预卜。但自己明白，八成不会是好事。第二天遵命去报到了，先是受到大声呵斥，坐在门外，接着那位头头出现了，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要按政策没收你的全部藏书”。这时我就立刻省悟，为什么采取了如此神秘而迅速的手段，那是防备我会进行私下的转移。

在这简单的宣布之后，就是立刻出动。三十多条大汉、两部运纸卡车，浩浩荡荡向我的住所开去。车上带了几捆麻袋，人们花了一个整天又一个上午，总算把我全部印有黑字的本本全部运走了。我这样说，是因为到底还给我留下了几卷高丽笺，有的还是乾隆时的旧物，就因为那上面没有字迹。后来我就拿来一张张都写满了字。明知自己不是书法家，也不配用这样的旧纸，

但还是写了。我想，除了检查、交代、汇报之外，我还应该有些另外白纸黑字的东西。

在查抄过程中，还有许多有趣的细节，但在这里，略之。

我向另一位头头提出，是否留下一份目录呢？他向我大喝一声，道：“嚣张！”这是当时习用的词汇，我们都明白那意思。但今天出版的辞书里的解释却是不完备的，至少没有反映那特有的丰富而微妙的涵义。我想这是有些可惜的。

真是出乎意料。第三天，头头来通知了，决定要编一本目录，而且要我也去参加。我不明白，我的“嚣张”的建议是怎样终于被采纳的。但这种神秘的决策过程，也还是不去研究的好。

到了机关的一间大房间里，发现我所藏的白纸黑字的东西都堆在那里了。更出乎意料的是，发现了已经坐在那里的顾起潜先生。他是研究版本的老专家，是清代苏州著名藏书家顾氏秀野草堂的后裔。二十多年前就刊行了“明代版本图录”的，我过去在图书馆里也曾看见过他。我想，在当时，他应该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可是竟被弄来参加审定编目的工作了。那细节，我自然也没有打听。

我的工作只是编目，但只是一些被认为够不上善本资格的书才由我来处理。专家们自己动手的对象当然是不同的。我按照常规努力地编着，记下了书名，版本，册数，编成一种不折不扣的书帐。但到第三天上，头头来训斥了，说我在搞繁琐哲学，要我更加紧、简化地编。我想，单是杜诗，我就有十多种不同的刻本、抄本，用简化法怎么能行呢？但这样的“繁琐哲学”头头怕是不要听的，解释起来又太费口舌，因此什么也不说。这样，我自己只负责编了极小部分的目录。到了第五天，头头下令了，我还是回到干校去当小工。以后那些白纸黑字的事物的命运，就一些都不知道了。

这以后一晃就是五六年。说一些消息都没有也并不准确。曾经有好几次得到朋友通知，“写作班”里出现了我的藏书；图书馆里也有我的目录书在任人翻阅；甚至有些人从不知什么地方弄到许多画册在看，上面也有我的签名。这也是我的一种坏脾气，买到一本书，随手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或题跋，有时还要铃印。因此也就成了这些消息提供者的依据。当时，听了这些消息，我也只是“一笑置之”。并不是真的看破了“红尘”，只是觉得愁眉苦脸或痛哭流涕都并不雅观也于事无补，还不如淡然处之的好。这也是我的一种坏脾气，二十多年前，一位头头就曾指出我这是“强颜欢笑”，自然就是不认识错误罪行的表现，因而给了我加重的处罚。

一直到1978年的年末，我才又去拜访了顾起潜先生。从他那里得到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他告诉我，我的藏书中间的线装书部分，都很好地保存在图书馆里，没有什么散失。同时因得到他的照顾，有些残破的书册，还修补装订过。只要等政策确定、发布，立即就可以发还。

此外，我还在另外的地方看到了顾先生手制的我的藏书中间属于“二类书”的一份详目，并奉命照抄了三份。我还好奇地打听过，怎样的书才算是“一类”呢？回答是并没有。我想，那大概是指宋板元抄之类的国宝吧。

我的几本破书够不上“国宝”的资格自然用不着多说，但对我却是珍贵的。因为它们被辛苦地买来，读过，记下札记，写成文字，形成了研究构思的脉络。总之，是今后工作的重要依据。没有了它，就只能束手叹气，什么事都干不成。

一年以来，也曾为此奔走过许多回，遇见过各种人物，经过的细节不想在这里细说了，总之是没有什么结果。人们的论调、手法，也都是极平常的，我们大家都非常熟习。如实写下，就难免要犯“公式化”的错误。在这里，我只想以一个遭受“四人帮”无情掠夺的受害者的身份提出一点卑微的愿望。何妨让我有条件继续工作下去呢？何妨落实党的政策使物归原主呢？今天，我能说出这些平庸的看法（在大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日子里，这就不只是“嚣张”而是“反革命谬论”）是不容易的，很需要一些勇气。因为想到古人祭书的故事，牵连讲了这许多废话，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免过于饶舌了。

1980年1月15日

## 再谈禁书

在《谈禁书》里讲了一点有关禁书的故事，意犹未尽，想来补充一下。其实哪里说得上“未尽”，简直是差得远，真的不过只是碰到了一点皮毛而已。即以禁书的性质而论，曾经碰到的一点是属于政治性一类的，此外还有另一个大宗则是属于“道德性”的。例如一般所说的淫书、猥亵书、色情书、黄色书……就都是。这最后一个名词是十年前才时髦起来的，是集大成的，意义更为“广泛”、“深刻”的一个专用词。就连过去最正统的道学家听了也会为之吃惊，好像世道人心之“古”，再也没有逾于此日者矣。我至今也还弄不清楚那真切的定义，除了几本确凿无疑的正经书之外，简直就不敢保险哪一本不是“黄色书”。

我还曾经表示过，我是赞成读书没有禁区的。我想，如果要受到质问，极可能出现的问题将是，是否对“黄色书”也主张不设禁区呢？甚至是，是否主张公开发行《金瓶梅》呢？这不是过虑，我想不少同志是必然会有此一问的。我想，我的回答依旧只能还是那样，当然，我也曾说过，“一时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早已安下了必要的“伏笔”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迹近“离经叛道”的坚定信念，这就不能不追溯到四十多年以前，当我还在中学里读书时从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那是报导新上台的希特勒在德国的“政绩”的，详细内容已经说不清楚，但那要点倒是记得的。那时在纳粹党的鼓动之下，德国的一些大学生捣毁了一位德国著名科学家和教授创立的一间图书馆，把所有的藏书（自然是“黄色书”）都搬到柏林大学，定期焚毁，同时还大声唱歌，那歌词因为是译成古诗形式的，因此到今还约略记得，他们唱道，“日耳曼妇女兮，今已得到保护兮。”

在当时一个中学生的头脑里，这消息确是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学生烧图书馆，一也；烧了“黄色书”女性就得到了保护，二也。这疑团一直维持了很久，后来总算逐渐明白了一点，但最后的恍然大悟，是在过了四十多年，“前中学生”看到了在林彪、“四人帮”恶意煽动之下的一些“今中学、大学生”们的烧书“壮举”之后。论规模、论气魄，都远非今日的纳粹希公所能望其项背，这就是直到今天我依旧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的一个重要的根据。

照例要讲一点自己的经验。可惜的是这种经验并不多，因此发言权也就很有限了。记得也已是三十多年前了，商务印书馆新出版了据明刻本排印的“古今小说”，买来看了，其中有些篇中出现了一些，虽然数量不多，但读了究竟不免气闷，就写了一封信给张菊生先生。张先生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年纪也有八十多岁了。但第三四天就收到了他一封亲笔回信，作了详细的答复，还请馆员把缺文抄下来附给我。这就使我对这位“戊戌”一役仅存的老新党非常佩服。已经近九十的高龄，又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但头脑并不冬烘，也不道貌岸然，依旧恪守着一位版本学家的好品质。比起另外一些年纪不比他大，但患得患失，说话荒唐，举止失态的老人来实在是好得远了。

1950年初，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无事闲逛琉璃厂，在一家书店买到一小册抄本《痴婆子传》。这是我买的第一册黄色古书。抄本并不旧，只是书坊制造的假古董。但却使我看到了一种久闻其名的“名作”，长了见识。后来到清华园去访问钱默存教授，谈起此事，被他大大地取笑了一通。后来

还写了一联诗相赠，那上联就是“遍求善本痴婆子”。又过了几天，我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去看书。在办公室里看到穿了大衣索索地坐在那里的向觉明。承他的好意，允许我到书库里去随意阅览。在这里，不但翻阅了李氏木犀轩旧藏的许多宋版明抄、顾批黄跋，后来竟又闯入了“不登大雅之堂”文库。这是北大故马隅卿教授的遗藏。大约有两间房间，深绿漆的钢书架上满满地放着线装书，其中有许多就是这类该死的东西。没有好久，门外有人探头进来问讯，原来是来参观的一队中学女生。她们大约以为我是图书馆的管理员，问我这间书库藏书的特点。这真使我大吃一惊，立即颇为粗暴地采取了挡驾的措施。回想起来，当时我的举止神情，就俨然是一位标准的卫道的道学家。

提起马隅卿（廉），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太多了。他是五四运动前后就在北大工作的一位著名的小说戏曲研究者。喜欢并努力收藏着这方面的书籍。他的书斋取名为“不登大雅之堂”，用意也在此。要收集旧小说，就必不可免地要包括了黄色小说，也许这倒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真义。当然，正人君子看了是要摇头的，后来马隅卿因为中风，死在讲台上，有人就说这是他收藏这类坏书的“报应”。

那天我随意翻阅了大量的这种坏书，收获真是非常巨大。在旧日记里，还记下了所见的一部分书名，现在就抄在这里：《迷吏》、《奇缘记》、《蕉叶帕》、《花阵奇》、《比目鱼》、《桃花影》、《定情人》、《醉春风》、《牡丹奇缘》、《觅莲记》、《意外缘》、《归莲梦》、《杏花天》、《绣屏缘》、《警寤钟》、《催晓梦》、《双缘快史》、《如意君传》……我当然并未一一通读，只是凭着作编辑的经验，少少一翻就明白了这些完全是用“三突出”的方法生产出来的标准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那些“英雄人物”，都是非常“高大”并“完美无缺”的。他们的本领也真大，譬如常人一顿能吃四五碗饭就已了不起了，这些“英雄”就有吃一百几十碗那样的“天才”。依此类推，这些一眼就能看出是极端虚假的捏造，无论作者反复声说是如何美妙、快活、圆满也都是完全无效的了。当时读后的感觉也完全不是“味如嚼蜡”所能形容的。我想，我后来没有变为一位黄色书收藏家，主要要归功于那一次的见识了这许多“样板”。我又想，这些书之所以变为“珍本”、“秘本”、“孤本”，并非由于历代皇帝以至“道德家”们的努力禁毁，而是事物本身判了自己的“死刑”，正如前些年的“样板戏”、“样板小说”……一样。历史是真正无情的，这里又有了一个例证。因此至今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仍旧不能忘情于“样板”，一部《红楼梦》里据说有几十条（？）人命，在“样板戏”……背后又有多少条人命呢？人民群众之所以热烈欢迎近三年来涌现的大量优秀小说、话剧……那原因又是什么呢？人们终于不能不得到这样的结论，想要真正打倒一种事物，只靠口号、声明、命令……是无效或收效甚微的，最聪明的办法莫如让它表演，彻底地公开地表演，请它自己打倒它自己。

顺便说说，在已出版的北大书目和“西谛书目”以及其他图书馆的目录里，都是把这些宝贝驱逐出境了的。这种作法并不一定妥当。出借可以慎重，但名目却应该保留。就如前面开列的一大堆书名，我大胆地抄了下来，因为这许多原已早见于公开的出版物，如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里就收了清代官员“销毁淫书目单”等文件，那里就有着更为繁多的记载，使我们知道曾经有过这许多名目，也是不为无益的。

我还曾被邀到“碧藻馆”去看过书。惜华非常好客，事先作了准备，找出来准备给我见识的“秘本”也有数十百种。不过因为有了在“平妖堂”（也是马隅卿的斋名）里的经验，对这些专讲“妖精打架”的故事丧失了兴趣，因此不但没有细看，连名目也不曾抄。后来听说这些宝贝一鼓脑儿都被那个“顾问”抢了去了，不知道现在还无恙否？著名的明刻《素娥编》也是那次在惜华家里看到的。书前有许多幅版画，人物长大，但图绘和雕版却不精，比起同时看到的一套“风流绝畅图”的照片来差得远了。这图是明代万历中刻本，还是彩印的，现藏日本。从版画史的角度看，是重要的作品。此外，也可以使我们知道，明代末叶社会上弥漫着的是怎样的一种风气。这样的文字和绘画，就是那么大量地、公开地刻印发卖着。人们一些都不以为怪，就好像火山爆发之前的庞贝古城里的情景一样。

如果要问这些该死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处？我想这就可以算作一条。我们平常看历史书，遇到讲起一个朝代到了没落衰亡前夕时，往往只能碰见一些原则性的义正辞严的分析批判，而且无论哪个朝代都几乎完全一样。结果只能得到一些虽然正确但却模糊的概念。在这种场合，这些宝贝实物就能给我们一点小小的帮助。

我的知识浅薄得很，见闻也不广。此外曾经见过的这类古书，除了影印的《金瓶梅词话》以外，就只有叶德辉所刻的《双梅景闇丛书》、排印的《宋人话本两种》等。丛书里所收几乎全是道士的胡说八道。我还买到过一厚本棉纸黑格抄的药方，是明代正嘉之际“卧云山房”抄本。从中居然发现了许多西门庆之流曾经使用过的配方，可见小说里所写也并非全是子虚乌有。还有就是从阿英同志的《小说闲谈》之类著作中，得到过一点零碎的知识。外国文献，同样也知道得极少。在印度，我曾买到过一本 Nefza-oni 所作的《香园》（Perfumed Garden），是 16 世纪阿拉伯著名的古典作品。印度这类书还多得很，买不胜买，只得了这一册。此外，就是 Havelock Ellis 的七卷两大本性心理学。这也是名著，在外国也曾是禁书，后来作为医学院学生的读本，公开发售了。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学术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读物，给了我很多知识。我知道外国的道学家也并不比中国少。有一位著名的研究这种学问的学者死后，他的妻子就将他的全部手稿都烧掉了，认为只有这样做才算是尽了一个合格妻子的天然职责。像莎士比亚，也曾被斥责为“猥亵作家”。更不必提左拉和劳仑斯了。还曾有人作过规定，以尾巴骨为中心，画一个尺半左右的圆圈，禁止谈论圈内的一切东西，只赦免了胃。这样的事，我们也应该知道一点。于是对许多奇怪的议论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外国也有的！”

没有什么人会来主张无原则地开放诲淫诲盗的坏书，我想这一点是可以放心的。看来现在问题所在倒是我们应该有怎样一种精神状态。是应该解放思想向前看，努力打破一切束缚人民思想的旧框框，日益进步呢？还是抱残守缺地向后看，拚命维护今天看来已是奇谈怪论的“道德规范”，以至胆战心惊、不知所措呢？

至今也还是有不少同志把一切上层建筑的力量看得过于不可思议了。一有风吹草动，就向这里来找原因。小孩学坏了，是看了外国影片的结果。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只有这是唯一的原因么？思想混乱，是讨论引起的恶果，好像只要大家闭起嘴来，思想就会自然而然地趋于一致与纯正了似的。这样看问题的同志把我们的人民和青年到底放到怎样的位置上去了呢？他们又是

怎样看待经济这个基础的呢？我们学习了很久的唯物史观怎么一下子都忘记了呢？

1980年2月21日

## 《鸣凤记》

最近在“俞振飞演出生活60年”的纪念活动里，幸运地看到周传瑛、张娴两同志演出的《写本》。这是《鸣凤记》里的一折，是写杨椒山（继盛）的故事的。演出给人带来很大的震动。不久前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谈到心有余悸，引用了一个老故事，说明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看了《写本》，就进一步知道，不只在笔记小说里记有这类事，在几百年前的舞台上也早已存在着逼真而痛切的深刻描写了。同时这里写的还是真人真事，艺术夸张自然有，却并不多。这就使今天的观众在欣赏号称我国现存最古老剧种的演出时，感受到并不比描写当前现实的戏剧稍逊的震撼。真正的艺术品，正确反映了时代真实的艺术品，那生命力必然是长久的。只要类似（有时还几乎是全同）的社会现象没有完全消失，它的生命力就不会减退。即使有朝一日人们都已在非常理想、完美的社会里生活，我相信，它的艺术魅力也将依旧存在。

我又想，长久以来，人们对昆曲有着一种并不准确的印象（或偏见），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种旧时代士大夫欣赏的红氍毹上浅斟低唱的玩意儿。什么《游园》、《惊梦》、《酬简》、《偷诗》，都是“无病呻吟”的事物。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游园》、《惊梦》所反映的也并不只是简单的儿女私情，且不去说；就是酣畅淋漓地暴露了李隆基荒淫无耻的《小宴》，下面不就紧接着来了《惊变》么？一阵“渔阳鼙鼓”，立即惊醒了他们的好梦，紧接着就是马嵬的《埋玉》了。细想一下，除了大量随生随灭质量低劣的剧本，至今仍然流传（可惜多半只在案头，不在场上了）下来的作品，绝大部分是非常勇敢的“干预生活”的戏文。

看戏回来就找出《鸣凤记》来看，是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中的汲古阁本，可惜未能看到藏在北京图书馆里的万历读书坊的刻本，我想那应该是更接近于原来面貌的。

《写本》就是原书第十四出的《灯前修本》。这与今天的舞台本是有些不同的，也不清楚那演变的过程。

我又找到了一本破烂的《李卓吾评选杨椒山》，还是万历或少后所刻。看那名目，就知道这是一种坊本，极可能是嫁名于“卓吾老子”的，因为他是当时著名的选家和批评家。这书收有诗集、文集、奏疏和自撰的年谱等。卷首大题下属“吴山俞允谐汝钦正”。这才是真正的编辑，也从而知道这是杭州书坊刊印的一种供一般读者阅读的小册子。这是颇值得注意的。这本书出版时距离杨椒山就义已经五六十年了，但出版家还感到有重新编印的需要。这是很可以说明杨椒山及其业绩历久不衰的影响和广大读者的心理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见于旧记的传说，使我们知道直到明末，《鸣凤记》一直是一出演唱不衰的保留剧目。严东楼的家优兼内宠，在严家父子事败之后，还常应邀在《鸣凤记》中扮演严东楼。侯方域作《马伶传》，记明末南京有两家著名戏班还曾以《鸣凤记》打对台。“华林部”扮演严嵩的马伶演出失败，“易衣遁”，失踪三年，后来又在安徽大商人的宴席上突然出现，要求遍请旧时的观客看他重演《鸣凤记》，结果是三年前扮演严嵩的胜利者、“李伶忽失声，匍匐前称弟子”。原来马伶在这段日子里在北京当了三年现任相国的门卒。“日侍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这位马伶自述深入生活的正确态度，是大可佩服的，他



深深懂得只有生活才是艺术唯一源泉的道理。尤可佩服的是他挑选生活原型的方法与眼光。“我闻今相国某者，严相国侑也。”到了封建时代的后期，腐朽透顶的剥削机器总是无可救药，一个严嵩垮了台，他的“侑类”却依然在，这情形，马伶明白，当时的老百姓也都明白。

这就是《鸣凤记》终明一代始终传唱不衰的根本原因。

《明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容城椒山杨继盛自著年谱》是很可贵的一件历史记录。这是杨继盛杀头之前在狱中完稿的，《年谱》的最后一句是：“凡此皆据匣床书也。”这是一篇正气凛然，浸满血泪的文字。

（嘉靖）“辛亥（一五五一）年三十六岁……赴京考满，投文日即升兵部车驾司员外。予虽不才，然素妄以天下事为己任，况此时虏患最急，又官居兵部，志欲身亲兵事，扫除胡雾。岂意一入兵部之后，见其上下所行，俱支吾常套，不得着实干事。”这时，正碰上了马市的争议。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寇大同，又攻古北口，取道通州，威胁着当时已经成为国防前线的北京。明朝自成祖以来保卫京城的兵备体制这时已几乎完全废弛，兵部尚书丁汝夔点查结果只剩下五六万残兵。率兵勤王的咸宁侯仇鸾不敢开战，派人和俺答议和，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只要不来攻城。后面策划主使的严嵩拒绝了兵部尚书请战的要求，等俺答饱掠以后退出长城，却把丁汝夔作为替罪羊，由明世宗杀掉、“振作纲纪”了。第二年大将军仇鸾又不敢开战，坚主开马市以羁縻俺答，那就是每年用若干币帛粮食，换取一批无用的马匹，还美其名曰进贡。杨继盛坚决反对马市，结果是：“下八臣会议……此时鸾之宠势甚盛，而诸老亦无有实心干天下事者……虽徐公（阶）亦中慑之，不敢异。会议本上，遂下予锦衣狱，拶一拶，敲一百敲，夹一夹。后命下，降予陕西临洮府狄道县典史。”

嘉靖三十一年，明世宗忽然罢了马市，收了仇鸾的大将军印，中国与鞑靼之间又恢复了战争态势。杨继盛也在半年之中，四次升迁，被任命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说：

先是，得刑部报，即图归家，以救命事焚黄祭先父母，期告病不出。及得兵部报，则翻然思曰：“一岁四迁其官，朝廷之恩厚矣，尚何以有身为哉。”舟中秉烛静坐至四鼓，妻问其故。予曰：“荷国厚恩，欲思舍身图报，无下手得力处。”妻曰：“奸臣严阁老在位，岂容直言报国邪？当此之时，只不做官可也。”予闻其言，乃知所以报国之本……遂欲因元旦日食，奏劾大学士严嵩。稿成，恐过家则人事缠绕，或不能元旦抵京，乃由别路，于十二月十二日到京，十八日到任。

他终于在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一五五三）正月十八日，递上了本章，第三天就得到了预料必然得到的后果。

上面抄的这一节，应该就是《鸣凤记·写本》一折的本事。焦循《剧说》有一条说：

《弇州史料》中杨忠愍公传略与传奇不合。相传《鸣凤》传奇，弇州门人作。惟“法场”一折，是弇州自填词。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这故事也很有意思。那位县令不用说是心有大悸的人物，他的情报工作也做得很差，看了邸抄以后，虽然勉强终席，但不待说肯定是心有余悸的。

《鸣凤记》一般都认为是王世贞或他的门客所作，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

问的。《李卓吾评选杨椒山》卷四，首列“杨忠愍公行状”，就是“同年生吴郡王世贞谨撰”的。他们是同年，又是志趣相同的好友。曲本填词也确是文彩斐然，还喜欢掉弄书袋，处处都显示了弇州山人的特色。原本写杨继盛灯下修本，先上小鬼，“隐灯下，作叫介”，继盛说，“我晓得了，是我祖宗的亡灵，恐有祸临，教我不要上这本了”。这鬼不听劝说，最后还现了形，扑灭了灯。然后张夫人才持烛上场。

今天的演出本则是先上张夫人，她在等候继盛，又提出同饮数盅庆祝复官之喜。继盛却紧张地在灯下修本迟迟不去。张夫人知道修的是参劾严嵩的奏疏，就婉转劝阻，不听，才假扮被迫害死去的杨母亡灵，扑灭了灯，最后被继盛发现，接下去则是夫妻之间的一场辩论。张夫人的理由是：“妾闻皋夔稷契，优游无事，谓之良臣；龙逢比干，因谏而亡，谓之忠臣。妾愿相公为良臣，不愿相公为忠臣。”“况相公职非谏官，事在得已。纵然要作忠臣，养其身以有待如何？”最后还分析了严嵩的“宠固君心，贿通内监”，劝他“投鼠必忌其器”，这许多都不能使继盛回心转意。周传瑛同志演到这里，说道，“夫人，你是明白事理的，”接下去脸一板，说明再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我看这是改得好的。不只是避开了一个真的鬼魂，同时作为一个独立演出的单折，情节交待也更清晰、完整。这一场，无论原本或改本，都尽力从正面刻画了采取重大政治决策之前尖锐的思想斗争，写出了舍身捍卫正义的正面人物形象，而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是许多生活在今天的人曾经普遍有过的经验。演出在今天依旧有非凡感人的力，那原因也正在此。

中国戏曲从来就有着非常鲜明的反映现实斗争的传统，这当然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传统。元曲如此，明人传奇也如此。特别是当明代后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民族矛盾也更加突出时更是如此。借古喻今的作品出现了，再后来，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现代戏”也大量出现了。像《鸣凤记》这样的作品正是不折不扣的“现代戏”。它创作于这场尖锐政治斗争尚未全部结束之前，初演于严氏父子刚刚垮台之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当日万人争看、经久不衰的热烈情景。我们今天看到的穿了明代衣冠的演出，在当时也正是一种“时装戏”。

这以后，反映与魏忠贤斗争的剧本大量出现了。如《鸣冤》、《磨忠》、《请剑》、《喜逢春》、《广爱书》、《秦宫镜》诸记都是。我们还从旧记中知道，当时在每次大的政治斗争之后，反映这斗争的剧作总是大量出现的。当然这中间有些是粗糙的甚至是“赶任务”的作品，但这不也正好说明人民群众强烈的政治感情和对戏剧的要求么？

像写海瑞故事的《十五贯》和《朝阳凤》、谴责严嵩父子的《冰山记》和《一捧雪》，都是在这前后出现的“现代戏”。袁于令作《瑞玉》传奇，是写逆珰魏忠贤徒党毛一鹭和织造太监构陷周顺昌故事的。也是赶写赶排，随即上演。上演之前，还缺太监的一段引子。袁于令赶来看戏，要过笔来就填了一阙“卜算子”：

局势趋东厂，人面翻新样。织造频添一段忙，待织造迷天网。

这是很尖锐的讽刺。毛一鹭听到消息，托人带了“厚币”来说情，袁于令就把一鹭的名字改作了“春锄”。（《剧说》）看来当日这些文士不但没有什么顾忌，甚至还要敲一点竹杠。这对我们理解少后出现的著名“现代戏”《桃花扇》中所写名士与阮大铖的种种关系，也是有帮助的。

借名影射、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剧本也出现了。有一本已经失传的《绿牡丹》传奇（不是梨花轩五种的那一本），据张秋水《冬青馆集》，说是“吾乡温氏启衅于复社之原”。其中的角色各有所指，如复社张天如、周介生和王玄趾、陈章侯等。“大致如《风筝误》、《燕子笺》，亦明季文字风气所趋。而语语讥切社长，极嬉笑怒骂之致。宜愧庵当日按试，械时相闻人，究及书肆贾友，而毁板厉禁之。”这剧本据说是买雇了剧作家写出的。张秋水说，“如以为三百年国社所关，则一茎草现丈六金身，又焉得以宋元杂糅少之。”这话说得不错，他是看出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能认识到戏剧的作用的。

清初著名的剧作家苏门啸侣李玉写过一本《清忠谱》传奇，在戏剧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不只写了魏阉与清流的激烈斗争，更可贵的是反映了苏州以纺织工人为主体的市民暴动，后来一直演唱不衰的《五人义》就是本于此剧。此书的顺治原刻本前面，有吴伟业的一篇序文，后来刻《梅村集》时删去了。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字，简直可以说是一篇东林、复社的政治宣言，也是他们对晚明历史的一份政治总结。难怪易代之后，梅村不敢在集中保留这篇著作。按照封建社会的习惯，戏曲不过是“小道”，是“倡优”之流的玩意儿，士大夫偶然高兴填词，也只肯属一个笔名。像《清忠谱》的直书剧作家姓氏，并冠以大字的“梅村吴伟业题”序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吴梅村的政治观点，在今天看来，当然有许多根本性的谬误，不过他指出了朱明一代宦官（以魏忠贤时期为代表）的罪恶，他说：

上自宰辅禁近，下及省会重臣，非阉私人，莫参要选。时倾险之士思逞志于正直者，亦愿为之爪牙，供其走噬，甚至自负阿父养子而不惜，而东林之难作矣。故自辛酉至丁卯七年之中，在朝诸贤，无不遭其坑戮，而国家之气以不振。

这些话说得却相当深刻，今天读来，也还觉得新鲜。吴梅村还称赞了民变的义士：“事闻。诏捕首乱，颜佩韦等五人，毅然诣官府，自列赴死，无改容。”

又说，“逆案既布，以公（指周顺昌）事填词传奇者凡数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谱》最晚出……而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这一段话，指出了当逆案公布以后，立即出现了反映这一政治斗争的多种剧作，直到二十多年以后，还有人进行再创作。这许多都是按照历史真实写出的现代戏。李玉虽然是有名的剧作家，但在当时的文坛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吴梅村说他“言亦雅驯”，是带有一些居高临下的奖掖之意的。不过他肯出面写这一篇序，也是不容易的。这也反映了当时文化阵地出现的统一战线的一个侧面。

1980年4月21日

## 残本·复本

大部书，因为种种原因，不完整了，只剩下几本或孤零零的一册，这就成了残本。在线装书中这情况尤其容易出现。除了单本书之外，即使是小部头的也大抵有两本、四本或六本，因而极易拖散。过去的藏书家和书坊店，都很看不起残本，认为这是不值得收藏的，价钱因此也定得便宜。我开始买书，所得就往往是残本，后来也一直采取着这种人弃我取的策略。

试去翻翻过去的藏书目录，时代愈早，所记的残本就愈少。似乎到了明代的内阁书目，才大量出现了残本。不过那是帐簿一类的东西，是向皇帝报帐的，性质不同。到了毛子晋的秘书书目，才偶有残本出现，不过大抵是绝无仅有的宝书。黄丕烈的“百宋一廬”中所著录的宋版书，就有许多是不全的；到了30年代的《宝礼堂宋本书目》，则绝大部分都是残本。并不是藏书家们忽然思想解放，而是宋版书日渐稀少下去的原故。除了宋元以外，明刻的残本他们还是不屑一顾的。了解放后编印的一些书目，如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的，才不计钞刻、不论时代地著录了大量的残本，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是读书界实事求是作风有了长足进展的标识。

经过十年浩劫，旧书剩下来的不是很多了。除了彻底消灭不留痕迹者以外，残存下来的残本是大量的。它们大抵被堆集在仓库这样的地方，保管的条件有些也很不理想，听说发霉变质的情况也不是个别的。这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的。应该组织足够的人力，抓紧抢救。首先防止仅存的书籍进一步毁灭；然后再来进行整理编目。必须彻底打破旧时代藏书家心中的“完缺之见”，重视残本、保护残本。把一切有历史文献价值的书籍保存下来。不这样做，不积极抢救，那在客观上似乎就是在继承着林彪、“四人帮”未竟的“事业”，这可有多么荒谬！

前些时到富春江上去了一次。经过桐庐时承有关同志的好意参观了县文化馆。他们还珍重保存着一些线装书，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贫乏的。我翻检了一过，明刻本和旧写本也不过只有几种，其中有的就是残本，是明代晚期浙江作者的诗集，颇罕见的名目。像这样的残本，极可能同时也就是孤本，当然是应该保存下来的。他们仅有一部地方志是乾隆刻本的《桐庐县志》。这部书可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正在修复桐君山和钓台，都从这书得到了极有用的参考资料。最近新发掘出来的游览胜地“瑶林仙境”，是明初诗人徐方舟（舫）曾经游览过的地方，但徐舫的诗集和事迹却知道得很少。他们想恢复钓台被毁的碑碣。县里本来保存得颇完整的钓台碑石的拓片，在前些年被当作“四旧”一股脑儿烧掉了。我有一本《选刻钓台集》，原四卷，现在只剩下了前二卷，也是残本。不过残佚的只是历代名人的题诗，“碑记”、“论”、“辨”……等却完全保存了下来。前面有“上章摄提格”（庚寅，即顺治七年，公元一六五五年）钱谦益的大字序。请钱牧斋来作这书的序文，实在不大合适，他只得说，“尘容俗状，靦然挂名于斯集，贻逸民遗民之羞，亦所不暇计也。”倒还是比较坦率的。

50年代们期，在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的许多书坊里，都还藏有大量的残本。像来薰阁、修绠堂这些书铺，大抵都在后进的许多间屋子里满满地藏着残本。1950年1月，我在来薰阁买到的《平海图》就是很有趣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被老鼠咬掉了下半的残册。前面有两通大字序，撰人姓名都啮掉了。下面就是“图”，版心上面题“平海图”三字。开始是六页“北至莺

游门，南至普陀山沿海地形图”。整幅都是大海波涛，中间点缀着山峦、岛屿、城池，都标着名目。再下面就是27开好像连环画似的版画。在每幅的左上方都写着“标目”。例如“贼髻王四等淮河谋抢漕船”（一）；“三月二十九日贼犯新开河王百度死难”（五）；“苏松道程请抚院方略”（八）；“抚院黄移镇江阴出师”（九）；“四月二十二日高家嘴官兵大捷”（十二）；“擒获张海山报功”（十四）；“五月念六日北洋新港烧盗船六十二只”（十七）；“苏松道程移驻金山抚贼”（廿三）；“洞庭山计擒髻王四”（廿六）等等，可以看出这是按了时间顺序采用大事记形式记下了这次镇压活动的全过程，前后大约三个月。这是非常精细的版画，可以与晚明最好的版画相比而毫无逊色。更可贵的是，它不同于一般戏曲小说的插图，是写作的作品。其中描绘海战、会议、行刑等大场面的画幅，往往人物多至数十百人，也都工整细致，绝不潦草。从中可以得知明末的战船形制、人物衣冠、礼节仪制、战斗实况、旗帜器械、枭斩场面等等，这对了解真实历史事件面貌都是可靠的资料。这里所详细描画的一切与今天我们在戏曲舞台上所见大致是一致的，从而可以证明今天我们所说的古装戏，在明代，则正是时装戏。而明人在搬演更古的历史题材时，也大胆地运用了时式衣饰，并不事事遵古。

得到这残本以后五年，又偶然从苏州旧书肆里得到这图的残页12幅，虽然也有破损，到底是较完整的全幅，就重装在一起。此外，不曾见到过第二本。

偶然读王重民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见我国善本书的文章，知道有“《壬午平海记》二卷，活字本”一书。猜想可能就是同一部书，这一册序和图，因为残损，却幸运地留在国内了。

关于这历史事件的记载，却只在谈迁的《国榷》中有简略的几行。那是在崇祯十五年的三月，“盗犯太仓新开河，杀把总王百度”，同年六月庚戌又记：“崇明盗平，兵道程恂（当作恂）散其党二千余人，籍其兵四百四十人。”

关于此书，谢国桢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著录于《晚明史籍考》中。书录则又据《永丰县志》转录程恂事迹。“恂初名士凤，字垣公。童试时知县瞿式耜大奇之。登崇祯甲戌进士，为部郎，升镇江守，有治声。报最。擢苏松兵备道，迁江南督粮道。闻闯贼陷京师，吐血盈斗，死而复苏。值留都裁督粮道缺，奉亲入粤，升惠潮巡抚。寻遇刺。”“恂官苏松兵备道时曾剿平海，此即当时往来书札及檄揭也。”

彭士望在《耻恭堂诗》自序中记他在崇祯庚辰在镇江曾受到程恂的接待，作诗说，“此邦妙山水，主人逢李邕。”彭士望后来还记下了程恂的死事，列入“王事兵乱死”的项目中。

封建时代的作者，根据当时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准则，把程恂写成了一个“高大”的形象，这是不足怪的。不过，我又在明遗民徐树丕的笔记《识小录》中看到有关程恂的另一则“逸事”：

兵备程恂者，永丰人。其在京师，与窠妇杜氏有情。此妇后嫁吾苏缙绅彭某。彭痴蠢人也。娶时为一武弁主婚，武弁认为妹故也。甲申春，武弁来吴，至彭家，与妹坐谈间，兵道适至。虽避屏后而以目送情，种种慕恋。程遂寄柬送之。中称“水丰人顿首”及“可怜相思救命”请话，贿彭仆诸人以达。杜作回书，仍用官封。而衙门人不晓其故，遂直致。进时程方与粮道庄者对坐。庄见官封，意紧急事，促程启封。程亦叵测。

才启而红汗巾角露矣。上有诗八句并情语。程不能隐，面发赤。遂对庄答来人六十。乡绅者闻之，遂一一根究。知此事起于程，乃大张告示于关庙前，欲同程诅于神，一时哄传，笑破吴人之口。程虽强辩，究竟以此去官。

这记事实太生动了。看来不可能是假造的。这件公案就发生在明亡的甲申年，也正是程岫得意地镇压了农民起义并编印了纪功的小册子之后。什么吐血盈斗、死去活来，八成是十足的鬼话。他是被苏州的士绅贴大字报赶走的，并非为了粮道缺的被裁。这故事好像颇为捻熟，似乎曾经写入过什么戏文里。那情节也实在很妙，比“玉堂春”的“会审”还要来得奇突。程岫寄给情人的信虽然只剩下了片言只语，也不愧为300年前“古情书”的好例。

从这里我们更可以明了过去正经书里的官话都是很靠不住的，而野史则往往比较真实。程岫后来怎样死去，不详。但只要纳入“王事”一类，就可以算作好人了。当然这也是靠不大住的。过去晚明史册中常常有一大堆“殉难”、“殉节”的名单，情况非常复杂，真实性更是值得怀疑，需要清醒地对待。

即使如此，这一本《平海图》也还是有价值的。被程岫镇压了的“海盗”，是一支很了不起的农民起义武装。他们抢了漕船和福山营的哨船、刘河的营船，杀掉了哨官、把总，惊动了抚院、总镇、参将等文武大员，被官军在北洋新港一次烧掉的“盗船”就有62只，可见这不是一支微弱的力量。这就不能不使人们想起清初纵横海上的张煌言、郑成功的水师，看来他们之间是有着一定的关涉的。

我举这个例子说明残本值得重视。下面想顺带谈到复本。这也是不应忽视的。

周密的《绝妙好词》，是宋人著名的诗余选本，现在已经算不得什么“秘籍”了。但在清初，却是湮没了好几百年、许多人想看也看不到的东西。第一个把它介绍给读书界的是和朱彝尊一起编选《词综》的嘉善人柯崇朴。他所根据的底本是常熟著名藏书家钱曾家的抄本。崇朴序中说，“余从子煜为钱氏族婿，因得假归”。这是此书清代的第一刻，时在康熙乙丑。

得到这原刻之后，我又买到另一个吴枚庵的批本，底本也就是柯本，不过印本较晚了，面貌也有所改动。那变动是，一、抽掉了柯崇朴的大字序；二、武唐柯煜序的最末一行“康熙乙丑端阳日”也被删掉了；三、原刻卷首大题下“小幔亭重订”五字被挖改为“清吟堂重订”；四、卷首大题第二行原作“弁阳老人辑”五字，在“老人”下添刻“周密”二字；五、书前新增“康熙戊寅夏五”高士奇序一通。经过这样的改变，过了13年，“小幔亭本”变成了“清吟堂本”，版片还是旧版片，主人却换了。

也许这些细节只是研究版本的人才会发生兴趣的吧。然而不然。这一具体事例提供了一个作伪的标本。买到前人雕槧的版片，改头换面，就算是自己的业绩了。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剽窃行为，不过在“清吟堂主人”高士奇说来，却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他是连皇帝都敢骗的。传说他收藏的法书名画，记入《江村消夏录》的，多数有真伪二本，许多假货后来都入了“内府”。在高士奇看来，掠夺一下柯氏的劳绩，又算得了什么呢？旧书版片易手的事是常见的，比较老实的人，会说明版片源流的大略，也不没原刻书人的名字；比较调皮的就笼统他说一下什么旧版漫漶，重新墨版之类的话，仔细一看，其实还不过是旧版；最无耻而霸道的就是像高士奇的这一手。这些

小小的常识，研究版本学的人是应该知道的。在鉴定版刻时代……的过程中，有许多错误就都因此而产生。

《绝妙好词》雍正中还有过项氏所刻一本，写刻精绝。我前后买到二本，第二本是最初印本，原来的扉页尚在，题“群玉书堂”刻。过去以为是“玉渊堂刻”的，现在知道不对了。这都是多收复本才能得到的知识。

聂晋人、曾道扶所纂的《百名家词钞》是清初词人总集中著名的著作。刻于康熙中，金闾绿荫堂梓。此书我先后买过三部残本，最后才得到叶誉虎旧藏的一部全本，共100家。但这书是“随到随刻，未及次序”的，所以不能说最后的“全本”就是真正的全本。就我所得残本保留的总目细校，当日所刻，至少也在120家以上。别出“全本”之外的就还有米汉雯、严曾渠、陆葵、周金然、彭桂、丁滢、吴岩、徐吴升、侯文耀、沈季友、钱芳标等家。而吴秉元的作品，“全本”题“摄闲词”，而残本则作“慎庵词”，内容也完全不同。这部《词钞》的价值，不只在于收集了许多没有单刻传世的词人作品，即使已有专集的，内容也大有不同，足资比勘。它所提供的知识，也不只是文学史上的，更多的是政治史、社会史上的。编者收集的原稿有许多都是钞稿本，到后来刻入全集时，往往有删削改动。如有名的词人顾梁汾，他有许多作品都经过仔细的修改，有只存原作一两句的。这种删削、修改，有出于艺术上的考虑，也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至今还没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情况。又如曹寅的《荔轩词》，就有许多不见于《栋亭词钞》和《别集》的。余怀的《秋雪词》，也与《玉琴斋词》不同。萧山来集之是明末清初一位值得注意的作者。他从事过抗清斗争，写过剧本，留下了诗文集。约二十年前我在杭州曾看到过他的一大叠稿本，写在黑格的稿纸上，已经忘记了那名目。他比较著名但传世很少的著作是《倘湖樵书》十二卷。这是一部读书笔记，选集若干内容相近的资料，写入一个专题，有时也发一点议论。后出的《蓉搓蠹说》以及俞理初的《癸巳类稿·存稿》等，可能都从他那里受到过影响。30年前我买到一部原刻，但已较后印了。过了些时，又买到一本“卷一”的残本，却是刻成以后最早的印本。和旧有的一本对读，不禁大吃一惊。版片无疑是同一版片，但内容和序次大大两样，原刻每卷前的目录第二行的题属是“倘湖樵人来集之元成父著，男燕雯拂云校阅”，后印本则大抵铲去了“男燕雯……”的半行，有几卷连来集之的名字也铲去了。原本文中有圈，后印本也没有。有许多篇目见于原本的，后印本削去了。如一条题目“忠义强直之人不死”，后印本就只剩下“忠义强直”四字。卷二“甲申十同年图”一条，变得有目无文，其他改削之处还很多。来集之是明遗民，书中常记明太祖和明代诸帝事，语意恭谨，遇“上”字必空格。虽然也有的地方奉承着清朝皇帝，但遗民的立场还是很鲜明的。这部书刻成以后一定经受过不少磨难。如果不是偶然得到初印残本，就不会知道中间还有这许多花样。

1980年5月30日

## 陈圆圆

我最爱读的鲁迅杂文中间，有一篇是“阿金”。回忆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手里什么书都没有了，却意外地还“藏”着一本《且介亭杂文》，破破烂烂的，倒是初版本。记得这是先生逝世后一年左右，我跑到上海四马路的开明书店买来的。这本书前后读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了，可是每次一上手，总还是兴味盎然。而且每次总要读一遍“阿金”。后来又忍不住向“硕果仅存”的一两位朋友去推荐。他们不置可否，只是给我一个鬼脸。我想，他们大概都是读过的，不但读过，也许同样读了不只一两遍了。

“阿金”里有一段文字，我一直极佩服，而且这佩服的历史也有了30年以上了。鲁迅先生说：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鲁迅先生接下去说，不料阿金的出现却动摇了他的“宿信”，使他“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这是别一个问题。我在这里想说的，只不过是曾经由前面那一节话引出的一些奇怪想法。

我曾想，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士，大抵都是很喜欢对历史人物发表各种意见的。这当然不只是诗人才如此。可惜一般老百姓有的只是口头意见，不曾录音，也自然没有文集流传下来，因此只能由文士们逞强。诗文中集中有“史论”和“怀古”这样的门类。遇见历史上的名人，人们大抵总是不肯放过的。最近我翻过一些诗集，发现几乎每本都多少有一两首钓台诗，说明着他们对严子陵的意见。而早在明代前期，就已有有人搜罗了这样的诗文，汇编了一部《钓台集》了。严子陵是“隐士”，人们对他的兴趣尚且如此浓烈，更何况西子、王墙这些赫赫的绝代美人。譬如，在明清之际有关西施的《苧萝志》（还不只一种）就早已编印了，而且有厚厚的四大本。当然也有漏略，关于王昭君的专书就至今还没有人来动手编辑，我想这工作还是值得做的。我们现在要开王昭君讨论会，规模搞得大些也许可以邀请一百来位专家作者吧。可是好好编一本《青冢集》（姑妄名之），就等于邀请了两千年来不同时代不同观点的人物来开大型座谈会，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成绩将更为可观。

照我想，这样的名单是可以开出一长串来的。

三十多年前住在昆明，无聊得很，也许是偶然记起了鲁迅先生的话吧，忽然想起300年前一位有名的女人——陈圆圆。她的最终归宿就在昆明。同时起劲地寻访起她的遗迹来，最后还写了一篇杂记。说来可怜，当时手边几乎没有什么参考书，想借也借不到。我知道有人编过一本《畹芬录》的小册子，却是隔了十来年之后才在昆明市上搜到一本。后来又看到了一册《陈圆圆事辑》，“临桂况周颐夔笙辑”。于1931年由李根源在苏州刊成，后面附83有李氏的“续辑”一卷。这书收集的资料并不算怎样完备，不过一些有关系的文件，是大致都在的。一晃又是多少年，最近看到《李自成》的作者、小说家姚雪垠的《论〈圆圆曲〉》（《文学遗产》季刊1980年第一期），立即拜读了。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围绕着陈圆圆活动的种种人物、展开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探索，对历史的真实与评断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位小说家



肯下这样的功夫做研究，首先就是可贵的。因为这是创作的基础与出发点。记得也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像这样花了极大气力写成的历史小说，虽然会被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倒是很难组织之作。先生是深知、也说出了此中甘苦的。

除此以外，在我看来，姚文还提出了以下一些问题：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野史”与小说的分野；史诗与“政治传奇抒情诗”的区别；诗人吴梅村的评价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对大顺农民起义军及其主要领导人的看法，以及由此而来的创作思想、方法问题。这许多，也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姚文的“结论”说，歌妓陈圆圆是被皇亲田宏遇从苏州买下，带到北京的。不久，田死。吴三桂“闻陈圆圆艳名，派人随吴襄到京，从田府将她买去，送往宁远。她到了宁远后，心情悒郁，又过不惯关外生活，不久病死。”“大顺军进入北京时她已在宁远早死。关于她被李自成或刘宗敏所得，以及刘宗敏为索她拷掠吴襄，全是胡说。”

这个“结论”与吴梅村的《圆圆曲》、《鹿樵纪闻》及清初的许多记载是全然不同的，不失为崭新的研究成果。研究者的方法是一方面分析批判了旧说的许多矛盾、错误之处；又从正面举出了“有较多参考价值”的史料，加以推论而成。姚文举出的正面史料的钱 的《甲申传信录》，引据的重要章节是：

闯入京师，伪权将军刘宗敏处田宏遇第，闻寿（按：同为田宏遇买来的著名姑苏歌妓）从优人潜遁，而沉（按：即圆圆）先为襄市去，乃褻优人七人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遣送宁远，已死。宗敏坚疑不信，故掠襄。

陈圆圆不但早已到了宁远，而且随即死掉。这是在刘宗敏逼索之下，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的招供。“结论”中的主要判断都是据此推论而来的。但最重要的基本内容，刘宗敏的逼索陈沅，则被作者断为“误传”而舍弃了。既然刘宗敏不曾为了陈沅而逼问吴襄，那么吴襄的招供也是“莫须有”的“误传”无疑了，怎么又可以据以作出结论呢？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实事求是地看待和使用野史？对史料的取舍应该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当然，也不只是在“野史”上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有一部题为《庭闻录》的书，作者刘健的父亲在吴三桂开藩云南时曾任云南府周知，吃过很大的苦头，有许多见闻。这书是康熙五十八年刘健“追忆趋庭所闻”的笔录，是时代较早见闻较切的有关吴藩的重要史料。光绪中武进庄士敏又据以增删改定为《滇事总录》二卷。这里据《事辑》转录涉及陈沅的几节：

陈沅之事，言者多殊。陆次云《陈沅传》以夺沅者为李自成，不知其为宗敏也。传文虽详，考究未确。其点缀处尤多已甚之词。

崇祯辛巳年，田宏遇进香普陀，道经苏州，购沅以归。三桂奉命出镇，宏遇饯之，出沅佐觞。三桂悦之，以为请。宏遇

许俟终年。后果送至襄宅，襄不敢受，仍归田氏，而客以报三桂。时有入卫之命，疾驰赴京，欲乘便取沅。中途闻刘宗敏踞宏遇宅，挟沅日事酣宴，遂大怒，出关乞师。

吴妓陈沅顾寿，并名噪一时。田宏遇以重价市寿，而沅名更高，不易得。会其婿以细故得罪，欲求好，无以通媚。百计购沅以献。宏遇善

之如初。未几，安遇卒。襄入都。三桂使人持千金随襄市沅。既得，襄遣送宁远。京师陷，刘宗敏踞宏遇宅。闻沅、寿名索之。寿从优人私逸，而沅先为三桂购去。宗敏于是斩优人七，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送宁远已久。宗敏不信，拷掠备至。

关于《甲申传信录》，姚文说，“此书在清代经过长期手抄流传，错字和后人整段加入的地方都有。”可见并不是保持了原貌的旧本。我们试就《甲申传信录》和《庭闻录》所记陈沅被送到宁远的传说对比，可以看出两书大体上是一致的，甚至字句都颇少差异，可证同出一源。惟一的不同是陈沅到宁远后，《传信录》说“已死”；《庭闻录》则说“已久”。这可不是一般的字句微异，因为姚文的主要结论，就建筑在“已死”两字上面。还有一种理解，这是吴襄应付刘宗敏逼问的胡乱推托之词，那么不论“已久”还是“已死”，自然都不关重要了。

野史读起来有时也真令人头痛。异说纷坛，破绽时有，令人为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关于陈圆圆的记载，前人是早就发现了这种复杂错乱的情况的了。《事辑》在引录《庭闻录》的原文时就说，“二说彼此微异。至谓三桂入卫之时，方欲取沅，与谓沅在宁远者皆非也。惟吴梅村《圆圆曲》为得其真。当日梅村诗出，三桂大惭，厚赂求毁板，梅村不许。三桂虽横，卒无如何也。”

值得考虑的是，一旦出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是否就能从中得出结论，连主要的基本事实都不可信了呢？当然不应该如此。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十年动乱中间广为传播、并为“四人帮”所严密追查的小道新闻。有些确是经过辗转流传，渲染夸张，言人人殊的。不过后来事实证明，尽管传说的种种细节都经不起细密的考证，但那重要事实却大抵是“基本属实”的。我们也绝不会因一些细节的出入从而否定“四人帮”人神共愤的如山罪案。在判断300年前的吴陈事件时，我觉得也理应使用此法。

人们认为吴梅村的《圆圆曲》是最可信据的诗史，自然也有他们的理由。梅村此诗和《杂感》诗第十八首、《鹿樵纪闻》中的有关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证明诗歌的创作有一定的史实根据，自然是得之传闻。以吴梅村当日的身份，没有可能自由运用国家的档案。他只能像谈迁那样在民间作些调查研究。何况像这样牵涉到有名歌妓的政治“丑闻”，正史是不记的。正统派的史家也不屑记，吴三桂的同伙就更不肯记，畏惧吴的权势者也必然要多方回避。清初有关记载的稀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有清一代，我们也不曾看见有谁站出来否认过这个传说。

吴梅村一生写了许多以明清易代之际史事人物为题材的长诗，他写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战役，写了杨机部、吴昌时、陈之遴……；出现在他的诗中的还有公主、老妓、歌童……各色人物，很久以来就有不少人对吴诗作过笺注，证明诗篇都有史实依据，颇少捕风捉影的悠谬之说，因此称之为诗史，梅村也以此自许。不能想象，他在吴三桂身上会栽赃诬陷，他是想敲“平西王”一笔竹杠么？却又坚决拒绝了吴三桂的“厚赂”。如果陈圆圆果然早已死于宁远，声势炙手可热的吴平西是不会听任吴梅村“诬蔑”，而甘于缄默的。

吴梅村的诗只写到“斜谷”、“散关”为止，没有涉及圆圆在云南的故事。不过陈其年《妇人集》说，“李自成之乱，（圆圆）为贼帅刘宗敏所掠，我兵入燕京，圆圆归某王（按指吴平西）为次妃。”陈圆圆的同乡、曾经亲

自看见她演剧的邹枢（贯衡）也说，“陈圆，女优也。少聪慧，色娟秀，……后为田皇亲以二千金酬其母，挈去京师。闻又属之某王，宠冠后宫，入滇南终焉”。清代前期昆明著名诗人王思训（康熙四十二年，吴次尾的孙子吴铭道游云南，曾与思训过从。思训为吴的《滇海集》、《京雒尘集》撰序。）有《野园歌》，原诗注云，“吴三桂筑野园滇城北，以处陈圆圆。穷极土木，毁滇人庐墓无算，以拓其地。缙绅家有名花奇石，必穿屋破壁致之，虽数百里外不恤也”。《野园歌》中就有“浮云渺忽春城喂，乐游谁拟姑苏台。夷光未去走麋鹿，红墙碧树鸟栖哀。（原注：滇城破，圆圆犹在。）……亡魂徒结分香恨（原注：吴死衡阳，念圆圆不置），月冷荒台觅燕钗”这样的句子。

王思训还写过一首《圆圆歌》：

东海真珠溷泥滓，多情宜为将军死。  
将军留剑不轻施，怒惜红颜投袂起。  
燕山定后丽人归，千队万骑西南飞。  
玉女城连巫峡水，迷离妖梦春风围。  
春风正奏霓裳曲，锦洞天荒新草绿。  
风高南渡雁无声，望断香魂悲小玉。

出于清代前期昆明诗人之手的这些诗篇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陈圆圆后来是随吴三桂到了云南的。如果她早已死于宁远，吴三桂为什么还要为她起造庭园宫馆呢？乾隆刻仪封张裕毅《滇中消日集》有《滇中秋兴》诗，作于乾隆四十三年，诗注说，“（昆明）悯忠寺侧尚存圆圆妆楼，半就倾敬。”道光刻乌程范锴《苕溪渔隐诗稿》卷一有《安阜园杂事诗》，也有同样的记事。凡此，都可以说明，清代前期中期，许多人都知道，圆圆曾经到过云南。

姚文用了很大力量辩驳存在于许多纪事中的矛盾、错误。其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是前人已经发现并作过分析判断的。《事辑》收有被大顺农民军俘虏的明朝内监王永章的《甲申日记》，保存了吴三桂给吴襄的五封家书，又记：“四月初九日，闯下伪诏亲征三桂。十二日起程。太子定王、代王、秦王、汉王、吴陈氏、吴氏、吴氏、吴李氏、伪后嫔妃皆从行。吴陈氏即圆圆，两吴氏皆三桂妹也。念五日战于一片石，闯大败，退入关。太子与圆圆遂皆至三桂军中。”下面的分析大概是况周颐所作：

按延陵复得圆圆，钮云，驻师绛州，将渡河时，陆云得之京师。据王氏日记，闯败于一片石，圆圆遂至三桂军中，其说独异。吴梅村《圆圆曲》云，“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又云，“蜡炬迎来自在战场”，由钮之说，驻师绛州，追闯未及，无所为战胜；由陆之说，京师觅得，非战场迎来。延陵之师，唯一片石一战，可云全胜，永章身陷贼中，见闻较确，其说固有可信之道。“若非壮士”二句，勃勃有英气，似乎乃公马上得之。梅村诗工于体物，倘由寻觅而得，词意必不如是。其“遍索绿珠”二句，言圆圆被掠，下即紧接“若非壮士”二句，可见当日珠还，未尝甚费周折。其言“箫鼓秦川”在“蜡炬迎来”后，可见迎圆圆一时一事，向秦川又一时一事。再下“画楼”“妆镜”云云，则是延陵追闯，圆圆随军，道途供张之盛也。昔贤长篇名作，通篇有层次，即救句亦有层次。虽极抑扬跌宕之致，而条理不紊，事迹可寻，所以为诗史也。

况周颐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问题讲得也不免有些琐细，但他的

分析是清晰的，对吴梅村诗的解剖也是细致的，对读者颇有帮助。如果不能证明王永章的日记是伪作，那么这里的分析将难以推翻。

姚文也对《圆圆曲》作过一些分析。“按照这一节诗（指“前身合是采莲人”以下30句）看，陈圆圆的出身并非妓女，而是良家少女。诗中先说她‘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后边又说‘教就新声倾座客’这是说陈圆圆原是良家少女，被买到田府以后才教会歌唱。后边又有‘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前一句的‘教曲妓师’是指在北京‘教就新声’的师傅，后一句的‘浣纱女伴’是指苏州家乡的女伴，不是妓女……”下面还有许多引证，主要是说，吴诗说“陈圆圆是良家姑娘，完全与事实不符。”这逻辑是非常奇怪的。世界上恐怕没有天生的妓女（除了明朝某些生下就被指定是“淫贱材儿”的政治敌手的后裔），只有卖入娼门的良家少女。为什么指出陈沅在堕落风尘之前的民间少女身份，就完全与事实不符了呢？“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这一节诗是一个小的完整段落，是描写经过十年左右的岁月之后，圆圆家乡姑苏的女伴（女妓）和妓师得知圆圆在这段日子中的经历、后来终于成为平西王次妃的消息以后的反应。女伴、妓师，都是姑苏的旧侣。羡慕圆圆的“好运”而在“尊前”悲叹自己年长色衰的凄凉身世的更绝不是良家；幸存的也只能是当年教过圆圆习曲的姑苏妓师。这是明明白白的。中国传统的古诗写法，绝不可能在整个抒写江乡的章节里突然插入一个在北京“教就新声”的师傅。这种不谐和的跳跃手法，是不可能在中国古代诗人笔下出现的。

姚文在很多地方，援引明代的法令、规制以及宫廷制度等等，给予非常的信赖；同时对野史则并不尊重，采取了任意取舍的态度。两者之间，对照是鲜明的。野史固然有许多异说、破绽，但经过正确的分析辩证（不是任意草率的处理），其可信据的程度，恐怕要远远超过封建统治阶级的高文典册。这是不待说的。崇祯是著名的“励精图治”的皇帝，17年中发了无数宣言，颁布了如毛的法令，有多少是兑现了的呢？更何况明代列祖列宗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文件、规制……是不行的；完全接受它的制约，捆住了自己的头脑、手脚就更危险。

姚文说，“不但甲申春天吴三桂没有到过北京，而且在甲申前几年内也没有进京机会”。理由是明朝的总兵官不奉召不能进京，和“我们从文献上找不到这几年中，吴三桂曾经奉召进京的任何资料”。吴三桂本来只不过是八总兵之一，直到甲申二月间才被封为平西伯，成为崇祯心目中的救命稻草。在这以前皇帝召见轮不到他，史官也没有为一个小小的总兵作起居注的责任。虽然甲申前数年中东线军事紧张，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间歇。吴三桂因公因私回到北京的机会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像吴三桂这样的小军阀，不能相信他竟能恪守法制，甘居艰苦的军中，长期不到首都来“度假”。吴诗“白晰通侯最少年”一句的“通侯”二字，姚文说是隐喻平西伯，是不错的，下面又进而指实吴诗所写三桂赴田府家宴的时间必在三桂始封平西伯的甲申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许多结论性的判断都是从此开始的。因此姚文不能不进行这一考证。）用这样的方法论诗，恐怕最谨严的史诗也将招架不住。诗人到底还剩下多少自由，用一个“通侯”的泛指瘦词，还要查年表、排时辰，诗人的工作也未免太枯燥也太苦了。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一节诗，姚文的解释是，“诗

中的周郎指吴三桂，是说他在田宏遇宅中听陈圆圆歌唱而爱上了她，使她后来出了大名。”实在不大好懂。我看《圆圆曲》中这六句诗，确是说出了吴梅村自己的意见，这意见是不错的。也就是“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的意思。“重名”是反话，指的当然是吴三桂背在身上、一直背进棺材、千秋万世永远摆脱不掉的“好名声”。

姚文对吴梅村的身世评论，所据也是一些传统的意见，同时还指出了梅村和钱牧斋的区别，说“钱在政治上是一个投机分子，而他则不是。”对吴梅村死前的一诗一词也寄以同情，我想在这里作一点补充。

吴梅村自然和钱牧斋不一样，不过是不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怕也一时不好论定。

人们说梅村诗是诗史，不是没有因由的。他的作品中的故事最多，不只是关系家国兴亡的大事，个人的遭际、感慨也都随处可见。要了解诗人的生平和心事，他的作品是十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梅村集中有一篇《鸳湖曲》，是为吴昌时而作的。此人在晚明政局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复社成员，后来又成为首辅周延儒的心腹。梅村自己也是复社的重要分子，参预党魁张西铭决策的少数核心人物之一，他们策划了周延儒的再相，希望利用周施展复社在政治上的抱负。结果失败了，周延儒和吴昌时都被杀。《鸳湖曲》隐约地写了吴昌时的故事，情绪上特别沉痛，说明梅村自己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牵涉很深。这是明朝覆亡前夕发生的事。

清初，吴梅村应诏出山，在清政府中任职，通常的说法是他被荐之后不得已而就道，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如此简单。其间委曲梅村自己也曾在诗篇中有所透露，不过言词闪烁，不易索解而已。投降了清朝的陈之遴是梅村的儿女亲家，陈之遴在政府里攫得了很大的权势，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和以冯铨为首的北方政治集团较量，迫切希望复社重镇的吴伟业出来参加政府。这才是梅村出山的真正动力。梅村出山以后就一直不曾得意过。谈迁在《北游录》里常常有到梅村住处谈天的记事，那正是他坐冷板凳的时期。这一次政治活动不幸又失败了，结局几乎和前一次同样悲惨。人们看到他写的“误尽平生是一官”的诗句，是会引起同情的，却不知道他的“悔恨”远较一般人所了解的还要更深切得多。其实梅村在《咏拙政园山茶花》、《赠辽左故人八首》等诗中都接触到了这件公案，诗之沉痛也颇不下于《鸳湖曲》。“一官误汝高门累，半子怜渠快婿才”，就是对随陈之遴全家遣戍辽的女儿和女婿说的。从这些事实看，吴伟业实在是一个不能忘情于政治的人。他遗嘱在墓前树碑，要求只写“诗人吴梅村之墓”数字，并非声明自己不是政治家，只是说是个失败了的政治家。

对于吴梅村，清代前期人还是比较了解的，批评、讽刺他的很不少。后来离开那个时代愈来愈远，旧事也日益模糊，难怪慢慢糊涂起来。现在介绍仁和王曾祥的一种意见，在我所见种种批评中，要算是清醒、严正的一类。

胜国之际，乾坤何等时乎！梅村甲申以前，无一忧危之词，见于豪障。其出也，以陈海昌之援。既而陈以权败，遂置不任用。呜呼，天下之恶一也。陈父子（按指祖苞、之遴）负 / PGN0093.TXT / PGN > 贰于昔，而窃柄于今。他日沈阳之窜，不待智者而可决矣。又足附乎哉！或犹以病中一词为原心之论。夫梅村惟不用也，斯沮丧无聊作此愧恨语耳。梅村而用，则阳和回斡（梅村颂海宁语——原注），梅村且有以自负矣。抑请发陵寝者为谁（按，这是陈之遴向清政府上的条陈），独无一言相正

乎！于旧君故国乎何有！（《书梅村集后》二首之二，《静便斋集》卷八）

批判是严酷的，但也不能不说是深刻的。

姚文所力图论证的，归结到一点，就是陈圆圆和李自成、刘宗敏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在大顺军进入北京之前，圆圆早已到了宁远，而且立即死掉了。因此，一切有关的传说，都只能是胡说。不只此也，“所谓吴襄因陈圆圆被拷掠，全家被抄，也是无稽之谈。各种野史所提供的追赃拷掠的名单中没有吴襄，只在谈到陈圆圆故事时提到此事。陈圆圆故事既属虚构，此事也就没有。”

这里说的可谓斩钉截铁。但在姚文曾引用过的赵士锦《甲申纪事》（中华书局据叶景葵旧藏抄本重刊）后面，附有据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瑜探报的“塘报”一件，开头就说，“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就是一个例外。

一切记录，不论出之何人，只要提到陈圆圆被刘宗敏掠去，姚文对之都一概否定。连著名的以毕生精力研究晚明史的全祖望所记当日与圆圆同被宗敏掠去的名妓杨宛的叙述，“据杨宛叔言，与沅同见系于刘宗敏，既而沅为宗敏所携去，不知所往。”也判定为“大概是得自辗转误传，不应作为信史看待”。全祖望尚且不足信赖，其他的野史作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即使把陈圆圆从刘宗敏身边拉开，看来形势也未必会有什么好转。杨宛不是曾被刘将军掠去过的么？还有《甲申纪闻》里所记，“是日，予在宗敏宅前，见一少妇，美而艳、数十女人随之而入，系国公家媳妇也。”（三月二十日）名妓杨宛和美艳的国公媳妇与陈圆圆之间有一条怎样的鸿沟呢？惟一的差别只是她们没有使吴三桂“冲冠一怒”而已。随便什么女人都不妨抢来，只有陈圆圆碰不得。以乎她有一种神力，能使历史发展为之停滞，倒退。

姚文还责怪“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继续作了宣传，扩大了错误影响。”这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姚文说，这是“完全上了清朝一部分谣言的当，制造那些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这种推论方法非常面熟，看来作者是适可而止了，本来是还可以继续推论下去的。不过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都已懂得，尽量使英雄人物高大起来、纯洁下去的方法，并不是真心诚意歌颂英雄的好方法。

300年前的大顺农民军和它的领导人物，和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农民起义一样，必然会带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会作出这样那样的错事，也毫不奇怪。按照历史的真实进行艺术的反映，是会带来应有的良好效果的。比起人为的、离开了真实的画像效果要好得多。沫若同志的论文写于1944年。他看到了并大声提醒革命者警惕存在在李自成、刘宗敏身上的局限性和弱点，大胆地摸了他们的屁股，这样做对人民有好处，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人民的喝采。当然也有人不舒服，在当时就曾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这些往事我们还记得的。在这个问题上沫若同志是看得远、说得对的。今天我们重读此文，依旧感到它有力、有益，也就是说，还不曾过时。

《甲申三百年祭》问世迄今，已经过去了36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起劲地反对并企图消灭“资本主义”。待得背上吃了狠狠的一枪，这才

回过头来，发现那里站着一“封建主义”。怎么办呢？也还只能一刀一枪地作战，没有别的办法。

过去读古人的“史论”，在结尾处常常看见类似“不禁掷笔三叹”之类的话头，觉得很可笑。现在，我可是多少理解了古人的这种心情了。

还有一些小问题，如谈迂在吴梅村处见到《绥寇纪略》，是顺治而非崇祯十一年中事；《宛署杂记》是万历中临湘沈榜撰，不是孙承泽的作品。这里不一一细说了。

1980年8月4日

## 附 记

明兴化李清，崇祯宰未进士。历官刑吏兵科给事中，撰《三垣笔记》。“附识”下记，“李自成陷京师……传吴帅三桂已上表请降，止因闯党权将军刘宗敏闻三桂所娶妓陈沅色艾……至是刘宗敏系三桂父囊，索沅不得，拷掠甚酷。三桂闻之，忿而中改。……”（嘉业堂本）

卢生甫《东湖乘》卷一，“先辈钱穉积（应作穉农）尝至京师，为吴梅村所重，遍为延誉。值甲申之变，杂记其事，作十种。尚记其四。其一曰‘赤眉兵变’，言闯贼之乱；一曰‘大行驂乘’，言怀宗死节诸臣；一曰‘槐国衣冠’，言弘光时马阮奸邪；一曰‘女戎召祸’，言李贼破京师时，吴襄为经营督，子三桂从其舅祖大受于辽东，有爱妾圆圆者，国色也，为贼权将军所得。三桂闻之怒，遂东入本朝乞兵讨贼。钱牧斋吴梅村皆有《圆圆曲》为道其事。”（《戊寅丛编》）

以上两条所记是同时人的见闻、纪录。说明陈吴事件在当时家喻户晓，广泛传说的状况。在辗转流传中，有种种不同异说，有明显的误说，但基本事实是一致的。

《众香词》六集，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吴绮序刻本。其第五“书集”收陈元词三首，前有小传：

陈元，字圆圆。初为女优，名擅吴中，与某公子有生死盟。田皇新购得之，公子遣盗劫之江中，误载他姬以还。盗再往，已有备矣。力战易归。已而事露，祸且不测。公子度不能争，遂以献。既至，无宠，杂配梨园中。三桂以父荫入觐，皇亲出家伎俏觴，一见陈元，问乡里，遂属意焉。酒半，则供奉者已易人矣。盖家伎有上次两班，初出供客，犹其次也。三桂频问陈元，皇亲知其意，攀送旅中。时边报益急，三桂一宿驰去。既而流贼陷京师，陈元已为贼部权将军某所得。三桂入关，首遣亲骑四出，悬重赏购归，宠之并嫡，宫中呼陈娘娘。壬子以前时，达官解饷至滇。官本吴人，娘娘召见便殿，问吴中某某无恙乎，皆平昔所交厚者。盖犹未忘情也。太仓吴梅村祭酒有《圆圆曲》纪其事，有《舞余词》。

《众香词》，玉峰徐树敏、金阊钱岳同选辑，每集前有阅、定者八人的姓氏，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士。选者在“凡例”中评论一些通行的女性作者选集“不免沿袭谬误”，标出此书的选录标准，在清初诗余总集中算是较为严肃的一个选本，采录也比较丰富。陈元的小传所提供的史实细节，与通常的记载又自不同，可供研索。但基本事实则是大体一致的。关于圆圆入滇以后

的记事，更不见于他书。圆圆还曾有词集名《舞余词》，也是仅见的著录。所选入的三词，有《送人南还》的“转应曲”、“丑奴儿令”，后者下片说，“声声羌笛吹杨柳，月映官衙，懒赋梅花，帘里人儿学唤茶。”题为《有所思》的“荷叶杯”词是，

自笑愁多欢少，痴了。底事情传怀，酒一巡时觞九回。推不开，推不开。

这些都是颇有个性化的作品，与通常的“闺词”不同。

钱唐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作为罪证被雍正罗织为年羹尧大逆五罪之一。原稿后来在愈勤殿奉旨封锢的箱子里发现，印入“掌故丛编”中。原书有作者雍正二年序，其中有“女子之祸”一条，文略云，“吴三桂饮田皇亲嘉遇家。嘉遇出歌伎侑酒，其中有陈沅者色艺冠伦。三桂醉，长跪向嘉遇乞沅。嘉遇曰，‘吾老矣，谢世后当以持赠。’李自成陷京师，三桂方镇山海关。自成遣人招之，三桂已纳款矣。时嘉遇已死，遗命家人送陈沅至三桂所，以兵戈载道，未遑也。三桂侦知陈沅为刘宗敏所得，闻之自成。自成谕宗敏以陈沅还三桂，宗敏不可。三桂遂下降，自成竟灭。女子之能祸人家国如此。五月二十八日。”

汪景祺出身于杭州世族，在雍正初发生的年羹尧案中受到牵连被杀。他所提供的李自成曾下令退还陈沅，为刘宗敏拒绝的细节，也不见于他书。

以上，是陈吴事件发生以后不久的当代人记事，可以看出这件哄传一时的新闻在社会上辗转传播的一些情况。

临桂况周颐《阮庵笔记》据《武阳志摭遗》记陈玉汝与圆圆事，亦在入滇以后。又记四印斋藏圆圆画像三帧，“一明珰翠羽，一六珈象服，一缙衣练裙。名人题咏甚伙。”

1980年11月22日重校记



## 杨龙友

好久没有读《桃花扇》了，回想 40 多年前接触这部名作时为之颠倒的情景，直至今今天也还使人激动。在中学的课堂上第一次读到“余韵”里“哀江南”……一套曲子。语文教员孟志孙先生用浓重的天津口音在讲台上高声朗读，他念到“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时，真的是激楚苍凉、声泪俱下。这是不能不使听讲者动容的。因此，这一套曲子不只在当时，就是直至今天我还能背诵得出。当时正是“九·一八”之后，平津几乎已是华北前线，人民的感情和 300 年前身处金陵的人的心情是必然会有某些可以沟通之处的。于是《桃花扇》重新成为使大家激励奋发的古典作品。不只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如此，就连号称国学大师的梁启超也在前不久出版了《桃花扇》的新注本，还用话剧的形式重行排印。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梁启超晚年整理印行了两部古典作品，另一部是《稼轩词》。这就说明，直到晚年，他还保留了尖锐的时代、政治敏感。“桃花扇热”一直延续到抗战和战后的一段日子。这中间，史学界起劲地研究南明史；戏剧界编演了不少以南明历史为题材的戏剧；还出现了与《桃花扇》同样题材的小说。这种“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渐平定下来。一直到 1965 年，才又掀起了另一个高潮，对《桃花扇》及其作者的无情围攻。孔尚任变成热衷于功名仕进的无耻文人，《桃花扇》也成了适应清朝统治者政治需要的大毒草。这次“批判”带有此后延续 10 年更为火炽的“大批判”的声势和作风，具有某种预演的性质，只差不曾为马、阮公开翻案。不过不久以后，一大批新马、阮是确实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

《桃花扇》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历史剧的一个标本。作者在书前首先介绍了剧本的“本末”、“考据”、“纲领”，在每出之下还注明了事件发生的年月。可以看出作者是相当注意历史的真实的。“纲领”其实是一张人物表，但用分类排列的方法表明了作家自己的立场、观点。在全剧中，作者花了最多经营力气的人物也许是杨龙友。他被安排在“右部”中“间色”的位置上。作者说，“男有其俦，女有其伍，以左右别之。”“右部”里确实大部是女性，仅有的例外是位于李香君之下的杨龙友和苏昆生、蓝田叔两个“合色”人物。一个唱曲的，一个画画的。在孔尚任看来，都是只配和娘儿们为伍的角色。这道理是值得想一想的。

杨龙友在《桃花扇》第二出“传歌”里出场。出场之前，先由李贞丽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龙友自报家门。接下去就是龙友介绍侯方域与李香君相识，并为他们作伐。下面的“眠香”一折中，写龙友“受圆海（阮胡子）嘱托，送来梳笼之物”；不过随即在“却奁”一出中为香君识破、退还了。在作者笔下，侯方域和杨龙友都像糊涂虫，都不及香君的清醒、严正。当然，两个糊涂虫彼此也是很不一样的。接着写复社会文的“闹榭”，则没有杨龙友出场，虽然他确是社盟中人。以下的情节是杨龙友说服侯方域写信给左良玉，阻其发兵东下，这是为马、阮服务的勾当；清议堂议事，杨又赶到媚香楼通风报信，促方域避祸出走，似乎是作了一桩好事，但随即把香君出卖了，让她给田仰作姨太太去。不但建议，还要用强“逼嫁”，同时还说出了四条应该去当姨太太的道理。李香君以死相拒，血溅扇头。后来龙友却利用了这血污，点染成几笔折枝桃花。风雅确是风雅，但在风雅背后隐隐飘来的血腥气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掉的。孔尚任这一笔写得深刻，构思也奇突新颖。但

他还是对这个细节作了反复申明，“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孔尚任的族兄，崇祯末在南京作“南部曹”）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

李香君被弘光掠进宫去。方域来访不遇，只能捧着扇子叹气。这时，杨龙友又在方域面前说了他百般维护香君的经过。

这以后形势急转直下，新任“苏松巡抚”的杨龙友，在选了出行吉日，束装起马之际，却意外地遇见仓皇逃走、被老百姓痛打得半死睡在地下的“马阮二位老爷”。结局当然是各自作“鸟兽散”。杨龙友说了一句“竟回敝乡贵阳去也”以后就“竟自去了”。其实这是不确的，孔尚任出于戏剧结构的需要，在这里放弃了“历史真实”，就和写侯方域“入道”的并不遵照“历史真实”一样。孔尚任在处理杨、侯的结局时都改变了事实的原貌，但对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从而显示了他的立场和爱憎。综起来看，孔尚任把杨龙友写成了一个清客、高级篾片、两面派和丑角。有时候也作点“好事”，但总的趋向是坏事有余的。因此我们也就明白，孔尚任为什么要把杨龙友安排在“右部”里的真实用意。在作者看来，他是只能与旧院里的娘儿们为伍的。也就是“倡优蓄之”的意思。但毕竟笔下留情，没有把他算在“戾气”里面，还要算是客气的。

杨龙友（文骢）一生的主要成就是绘画，同时他又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和散文作者。他本人是一位贵公子，崇祯后期只在江南一带作过几任小官，但是很喜欢交游、结客，朋友多半是社盟中人。只是因为与马士英这样一位阔亲戚，因此在弘光小朝廷里爬到高枝上去了，但高兴了没有多久，就碰上了厄运。他最后是在抗清战争中受了重伤，被俘，不屈而死的。这就和马、阮有很大的不同。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为文骢立传，多据徐鼐之说，立论持平，简而有法，传文最后说，“文骢跌宕风流，豪迈自意。好推奖士类，其戚马士英当国，干士英者辄缘以进，故为世所诋；然其不屈也，世亦亟称之。”这些话是说得很好的。关于杨文骢的事迹和他的绘画作品、诗文著作，我们一直知道得很少，那原因也正在这里。

杨文骢的著作，过去我只见过陈夔龙所刻的《洵美堂诗集》九卷，这是按照崇祯原本复刻的，使我们借以得见原本面目。陈筱石是清朝的遗老，对他这位抗清死难的同乡有深厚的感情，他在重刻序中说，“（文骢）徒以与瑶草有连，致为世所诟病。实则侍郎全家殉国，大节孤忠，凛然于南都播迁而后。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非乡人所得而私也。”可见他的感情是建筑在超越一切的“孤忠”上面的。《洵美堂集》前有吕阳、陈立政、邢昉、史玄的序文，后三人都自称“社晚生”或“社盟弟”。看诗集的酬赠对象：钱牧斋、张天如、陈眉公、张受先、王月生、王烟客、陈卧子、方尔止、顾子方、郑超宗、董玄宰、杨宛叔、吴次尾、夏彝仲……不是东林复社的巨公，就是有名的山人、伎女、画师。约略可以看出他的交游、声气之广。

杨文骢的另一部著作《山水迻》，前不久我才在北京图书馆看到。这也是崇祯刻本，刻法非常秀整，在晚明刊本中要算是很精致的。卷首署名是“夜郎杨文骢龙友著”，这就很特别，很显示了一种特色。书不分卷，内容是《赤城山赋》、《台荡日记》、《画江行十二幅小记》和《腐侯传》。书前三篇序，作者是邹嘉生、越其杰和马士英。越其杰是曾在《桃花扇》里出现过的人物，“拒媒”一出开场，杨龙友道白说，“下官杨文骢，因叙迎驾之功，补了礼部主事。盟兄阮大铖，仍以光禄起用。又有同乡越其杰、田仰等，亦

皆补官。同日命下，可称一时之盛。”越是贵阳人，能诗文，作过河南巡抚，是货真价实的马党。马序结尾处是“崇祯庚午首夏，题于符离客舍。社弟马士英具草。”三篇序后面是“诸社长送游赠言”，一共有25人之多，多半是吴越之间名士。这样，不但杨文骢，就连马士英，原来也是社中朋友了。但这两位，后来自然都被开除了社籍。南陔堂本吴《复社姓氏录》里就没有文骢的名字，只在最后贵州省项下著录了一个杨鼎卿（爰生），这是文骢的儿子。但在一本黑格旧抄的陆世仪《复社纪略》里，首引张天如的“国表”，那最后一名却正是“贵州杨文骢”。张天如是在甲申以前死去的，他手定“国表”的时候杨龙友还是社盟中间一位活跃分子。从这些小小的变化中间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杨龙友的记载竟如此之少。他有了马士英那样的阔亲戚，经过弘光一局，许多老朋友连躲还躲不迭，哪里还肯记，恐怕连过去写下的诗文也都赶紧删去了。

不过不肯删削，终于还保留着一鳞片爪的也不是没有。多年来流览所及，只有邢昉的《石臼前后集》、方文的《涂山集》、杨补、杨昉父子的《怀古堂诗选》里还保留了一些颇为珍贵的材料。

吴梅村在《画中九友歌》中提到杨龙友，那四句诗是“阿龙北固持戈矛，披图赤壁思曹刘，酒酣洒墨横江楼，蒜山落月空悠悠。”这是说他在弘光中以职方监军京口时的故事。梅村又在《读杨文骢旧题走马诗于邮壁漫次其韵二首》里，更全面的对他进行了回忆、评价：

数卷残编两石弓，书生摇笔壮怀空。南朝子弟夸诸将，北固军营畏阿童。江上画龙图割据，国中指鹿讫成功。可怜曹霸丹青手，衔策无人付朔风。

君是黄骢最少年，骅骝凋丧使人怜。当时只望勋名贵，后日谁知书画传。十载盐车悲道路，一朝天马蹴风烟。军书已报韩擒虎，夜半新林早着鞭。

这两首诗是写得沉痛的。这和他们同属社盟中人一事应当不无关系。诗里讲到南明覆亡的原因，也提到龙友在短暂的一年中飞快的超擢。还提到了他的韬略。旧时代的文人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癖好就是谈兵。连只会“锦衣素蟒、临师江上”的阮胡子，也写过什么“谈兵夜雨青油幕，买笑春风锦瑟房”的诗，不知道杨龙友的韬略是否也属于此类。不过邢昉在诗里确也多次谈起他这方面的才能，和早在永嘉令任上就在海上用兵中作过监军的经历。这可能就是后来监军京口的张本。不过就邢昉诗中所说，“杨子好文亦好武，乞得闲官一尺组。堂前日日罗众宾，左染丹青右挥麈……白日腾腾气亘无，杨子拔剑怒起舞。马前止列一健儿，马后更带两疆弩，千人一呼城门开，观者如墙声如雷。……”也还差不多是作戏。可以推想，他在弘光防江一战中，也无法有怎样更好的表现。不过也不像吴梅村所说那样的一溜了事，“福王时擢右金都御史，巡抚常镇，兼督沿海诸军。清兵破南京，命鸿胪丞黄家鼐往苏州安抚，文骢袭杀之于嘉定，遂走处州。”他是袭杀了降敌的说客以后才出走的。这以后，“唐王立，进浙闽总督。顺治三年七月，清兵入闽。文骢急移军卫仙霞关，清兵已间道先入，不能御。负重创，退至浦城，被执，不屈死。”（陈垣）

清军入闽，阮大铖扮的是投降并带路的角色，最后“鞠躬尽瘁”死于仙霞岭上。杨龙友在这关键时刻是站在他的“盟兄”的对立面上的。

龙友死难的消息，过了很久才传到江南一带。我们今天还能读到不多几

篇悼诗，就弥觉珍贵，不只因为这是难得的史料，同时也由于这是出色的诗篇。

长洲杨补字无补，是明末著名的诗人、画家，入清以后则是突出的风骨高峻的遗民、隐士。他和杨龙友是好朋友，龙友在浙东作小官时，杨补和邢昉都是他的亲密诗友、画友和游侣。杨补的诗集《怀古堂诗选》，清初刻，流传很少。我所见的是王乃昭旧藏的一本。杨补的儿子杨炤字明远，有诗集十二卷，康熙刻，名称也是《怀古堂诗选》。在杨明远的诗集里有一首长诗，诗题是“岁丁未（康熙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夜梦少司马杨龙友先生入室。角巾素袍，颜色如平生。余跪而奉其手曰，不意此生复得见先生也。失声一哭而觉，旋睡去，梦呈先生令永嘉时画赠先君子兰卷曰，将持此作西台恸哭。忽而觉，又复梦去。歌载驰之卒章曰，我行其野，芄芄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歌未竟而又觉。声琅琅犹在耳也。家人闻余寐而哭，哭而歌，屡呼余问故，悲不能答。起而识之，复哭以诗。”诗是五古长篇：

先生贵阳秀，弱冠登贤书。胄既承华诩，身复挟才谔。当时出其技，海内谢不如。人知擅三绝，是以得士誉。谁知抱英略，廿载困公车。头白始监军，社稷将为墟。姻娅虽秉国，志业卒未舒。仅能右正人，缓急借吹嘘。不使挟仇怨，善类肆诛鉏。君子免钩党，小人恨切肤。三江既失险，八闽奉銮舆。督师建宁州，戮力效驰驱。拉天柱倾，几见只手扶。成仁惟一死，庶不负心初。被执义不屈，不愧烈丈夫。桐城瘞其首，建宁葬其躯。孙临桐城侠，慷慨捐头颅。挺身认都督，鼎卿遂得逋。两首并函归，实借孙氏奴。化碧垂二纪，血食斩诸孤。魂今千里来，风波越江湖。巾带宛平生，不改颜色腴。江山文藻留，高价重珊瑚。西台越江滨，洒泪迷榛芜。正气公则有，得士皋羽无。小子荷提挈，忆昔在留都。勤学蒙奖借，文会偕凤雏。许附元礼舟，考试还姑苏。率我谒文靖，徒步到吴趋。付托既得所，问讯时双鱼。厚意久衔戢，未尝忘须臾。梦见最分明，昨夜倍欷歔。桐城与建宁，何时抚坟呼。

诗后有双行小字注：“鼎卿，先生长子也。登武进士。历官都督。建宁城陷，先生谓其郎官孙临曰，‘吾受国厚恩，此而不死，非人矣。子可速去。’临曰，‘如此好事，让公一家作耶？’先生被执，复索杨都督。临曰，‘我杨都督也。’亦被害。临给事晋之弟，素善鼎卿，遂代之死。”

这是我所见有关杨龙友结末最详尽的记载。孙临，字克咸，桐城人。也是复社的成员。杨鼎卿，字爰生，文骥子。唐王时加左都督，太子太保。见《复社姓氏传略》。

在杨补的诗集里也有两首悼念龙友的诗。《有美》两首，题下小注“怀杨少司马龙友也”，这是南都倾覆以后，消息未定时所作，在怀念之余还抱有万一的希望：

有美春江别，东风又绿波。崎岖遭国难，消息畏人讹。幽愤应如病，贞心洵匪他。莫将青翰舫，徒拥越儿歌。

未觉桑榆晚，还收浴日勋。勉旃尝胆苦，感激枕戈勤。长夜几时旦，忧心方坐焚。西倾如再起，不死会逢君少后，无补“得龙友死节实信，哭而挽之”：

擅名君最早，才气实超伦。士论推机岳，时危见远巡。国存犹尽瘁，事去独成仁。大汉恩如海，无多似若人。

方文的诗集里也有“闻杨龙友孙克咸同日死难，诗以哭之”和“高淳晤

黄叙百，得杨龙友李卓如死难消息”诗。又有《与程穆情感旧》诗：

万岁楼前司马台（杨龙友先生以职方监军润州——原注），与君觴咏日悠哉。惊沙一起秋风乱，故里重寻晚角哀。湖海相逢犹历落，肝肠不语自崩摧。南徐以后无知己，薄俗谁怜樗散才。

方文和程穆倩都曾是龙友监军京口时的座上客，此诗最能写出龙友对朋友的热情，不只作县官时如此，在出任方面大员以后也还是如此。“南徐以后无知己”、“不死会逢君”这样的句子，都不是敷衍应酬话，而是诗人出诸胸臆的真实感情。杨补和方文都不是作应酬诗的人，他们作这些诗时，龙友已被杀，写这些诗除了可能招来横祸之外，别无好处。这就使我们能借以认识龙友的为人。

在杨补诗集卷前，保存了七篇序文、寿序、行状、墓志、传记、诔。其中徐俟斋枋所撰《隐君杨曰补先生六十寿序》，记录了一段故事：

弘光时，权奸构党祸，杀戮名贤。遂煽蜚语染逮先文靖（徐汧），势岌岌殆矣。亲戚交游，畏祸观望。而先生独策蹇至金陵，语所知曰，天下事可见矣，而尚欲杀大贤以快己私耶？先生旧居金陵，金陵之名公贵人，无非先生友者，故其言足重，而事亦寻已。

杨补到南京营救徐汧所访问的“名公贵人”，就是杨龙友，不过徐枋不肯明白说出。在吴门法柄撰的《杨隐君传》里，就记得更为详尽：

时贼臣构徐文靖公甚急，而杨文骢为柄国者至亲，官武部郎，贵用事，所言无不得当于柄国者。隐君闻之曰：“龙友不言，可以绝交矣。”龙友，文骢字也。乃立起如金陵，语文骢曰：“天下以文章声气推君，垂三十年。天下之所以交重君者，以君能右善类、附止人也。君于柄国者为至亲，君言无不得当者，天下莫不闻。徐公负天下苍生之望，天下方倚望之为相，以佐中兴。君居能言之地，而不为推毂，天下故失望。今事急，君固何以谢天下。”语未卒，文骢曰：“子责某是也。微子言吾已谒之相君。此非相君意，寻当解耳。”于是隐君即出金陵而归。

这里的记事不但更详密，也更真实。像杨补那样的旧交，对处身南明小朝廷中的新贵杨龙友，也不能完全没有疑虑。30年来，杨文骢在清流中的交游、声望，是为马士英所深知、重视，也必然要加以利用的。不过在政治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个人之间的交游、情愫。杨龙友生活在夹缝中间，心情的矛盾、痛苦，可想而知。他虽然努力作一点调和补救工作，又能有什么作用呢？事实上从迎立福王开始，甚至从更早的《南都防乱公揭》开始，他就已从清流中分化出去了。《桃花扇》中有些复社的集体活动，都不让他参加，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但因此也失去了更深刻地刻画这个充满了矛盾的人物的机会。全部《桃花扇》中的人物，论性格的复杂恐怕没有谁超过杨龙友。他既非正生也不是净，“脸谱决定论”者在他面前是会踌躇无策的，只要一看面色就能决定人物好坏，这样“岂不快哉！”的便宜事，可惜这里并没有。

我想杨龙友不可能是一个两面派，这从杨补父子的悼念诗篇中可以推知。杨补和龙友是老朋友，但在去南京营救徐汧时曾对龙友产生过疑虑，这也是完全真实的。说了要说的话以后就立即告辞回家。这以后杨补（包括更多的人）必然会密切注视龙友此后的言行。直到得知他殉难的确讯后写了沉痛的悼诗。这说明，即使杨龙友是那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他的一些老朋友最后还是拥抱了他。像杨补那样的人，是不可能热情拥抱一个两面派的。

龙友的死难，自然会给他带来好名誉，不过这也不像是杨补判断事理的惟一根据。应该指出，这一条确曾为某些人奉为检验人物的重要标准。如卓尔堪在选《明遗民诗》的“凡例”中就说，“遗民惟重末路，苛求其他，吾则何敢！”这就是把死难或隐遁作为首要标准的意见。还有一位在弘光小朝廷作礼部主事的黄端伯，不肯迎降清军，后来被豫王捉去，两人之间有一段对话，是很有趣的。“王问，‘弘光何君？’曰，‘圣君。’问，‘何以指昏为圣？’曰，‘子不言父过。’问，‘马士英何相？’曰：‘贤相。’问，‘何指奸为贤？’曰：‘不降即贤。’遂下狱。”（《小腆纪年》卷十六）这个黄端伯是不怕死的，他也是主张只要不怕死、不投降就是好人的。不过他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死抱着“子为父隐”那样古老的封建教条，就不能不闹出绝大的笑话。人一旦死掉，就会变成一个毫无缺点的完人，何况还是光荣地死于“国事”，这种评价人物的习惯，也确实有了长久的历史。只是到了最近，我们才发现这方法不够妥当。杨补、方文等自然十分着重“死难”，但我相信，这也不会是他们所持的惟一标准。

毛氏汲古阁刊《八唐人集》，前面有文骢一篇序，手书上版，作于崇祯己卯。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他仅有的一篇论文。他提出声情、风味之说，补充前人“气格、神韵”论之不足。他认为这是唐诗宋诗之间、唐诗初盛中晚之间，“密移潜换，关纽甚细”，“界画分明”的重要原因。

龙友的主要成就是绘画。但作品传世甚少，研究者也几乎没有。只能举出周亮工《读画录》中的一节：

杨龙友文骢，一字山子。贵州孝廉，家秣陵。工画，善用墨。初为华亭学博，从董文敏精画理。然负质颇异，不规规云间蹊径也。后贵阳（指马士英）之势渐张，急于功名，不复唱渭城。人有求者，率皆盛伯含、林玉兄弟及施雨咸捉刀。董文敏题册中一幅云：“意欲一洗时习，无心赞毁间作生活者。”……

周亮工指出，龙友从董玄宰学习，但并不墨守家法，又引释无可的评论说，“同辈墨妙，推龙友、超宗、子一，皆以苍秀出入古法，非复仿云间毗陵，以濡弱为文澹也。”也指出了他努力打破云间派的樊篱，跳出濡弱一路。我没有看过他的山水画，只在多年前见过一帧墨兰，真是笔墨纵横，似乎早在百来年前早已开辟了扬州画派的道路。在画苑中他也应该是一位豪杰之士。吴梅村《画中九友歌》中写他“酒酣洒墨”于北固山前、横江楼上的姿态，很能传出画家的风貌。

过去曾写过一篇《贵阳杂记》，根据手头的几本旧书，粗略勾勒了杨文骢的始末。以后随时注意有关的新史料，荏苒30年，今天才能写出这一点，算是前文的一个补充。这是不能不使我感到惭愧的。同时回想当年对南明史事人物的热衷，真的也好像是很难追寻的旧梦了。

1980年8月5日

## 插图

人人都从儿童时代经历过，也都有一些直到老年也不易忘却的记忆。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事物，可爱的人，有趣的游戏……都会留下这样的记忆。这中间，最早接触到的美术作品留下来的印象，也是极重要的，往往还能准确地透露出一个人毕生生活情趣的趋向。从前小孩生下满了周岁，要举行一种“抓周”的仪式，用意也大抵在此。据说贾宝玉在抓周时一下手就抓住了胭脂不放，引起贾政老大的不高兴，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预兆。贾政不能理解“抓周”，不足深责。曹雪芹指出了这是一种“爱红的毛病”，很有些哲理性了，但这是后来才作出的“总结”。在只不过刚满岁的宝玉看来，胭脂只是红得可爱而已，至于这是女儿的专用品这一节，恐怕当时还是莫名其妙的。

近三年来，为儿童所编写的出版物，确是有了很大的成绩。非常惭愧，不但没有很好地留心，也不曾买过一本半本，我的印象只是从新华书店门市部里得来的。每次走过儿童读物的柜台，总会面对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书本画册而吃惊。觉得今天的儿童，比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实在是阔气多了。这时我就想，当年自己曾经有过怎样的喜欢的事物呢？除了过年时新贴上的两张花纸，几件粗拙的耍货，大约最有趣味的就是香烟画片了。父亲那时吸的是一种“大联珠”牌号的纸烟，每包中间藏着一张彩印的《封神榜》人物画片，在我看来，确是了不起的杰作。什么哪吒太子、申公豹、土行孙，都是首先从这画片上认得的。年纪稍大一些，又冒险取来父亲藏着的《红楼梦》、《聊斋志异》偷看前面的插图。这都是老同文的石印本，绘图印刷都相当精工。故事看不懂，但宝哥哥、林妹妹却立即从这些“绣像”上认识了。至于对“熊夫人的幼稚园”发生兴趣，那是更后来进了小学后的事了。

这些从人生中最初得到的经验，使我明白，文学作品中间的插图，是很重要的一种美术形式。它并非只是专家学者眼里的“小人书”，或正经人心目中的“玩物丧志”、有害无益的东西。这种今天看来不免古怪的看法，在过去却正是正统的社会舆论。

直到今天，我觉得国家出版社的文学出版物，对插图还是不够重视，不能令人满意的。绝大部分是根本就没有插图；即使偶有一些，用心设计绘制的也不多。

鲁迅先生是非常重视书籍插图的，他的有关议论，搜集起来，恐怕数量不少，并具有颇完整的系统性。他一生中在这方面付出的精力也是惊人的。鲁迅先生重视外来的经验，也不忘记、可能还更看重民族的、传统的经验。他指出过在我们的出版史上，在插图的制作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他不懈地进行着保存、介绍、继承、创造的工作。今天，我们实在应该郑重接过先生未竟的遗愿努力工作下去。

在过去中国，书籍的插图基本上是木刻版画。最早、也是迄今最重要的研究著作是郑振铎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事实上也就是中国古代书籍的插图史，而且是以小说戏曲的插图为主干的。除了年画和以图为主的一些画谱、笈谱以外，中国古版画也确实以小说戏曲的绣像、插图内容最为丰富。它的黄金时代是在明代后期万历以后的短短70年中间。

由于种种偏见，过去的藏书家没有人肯收藏这种带有插图的书，似乎只在缪荃荪的书目上见到过一两种，这是很大胆也很了不起的破格作法。这种

局面得以开始扭转好像也是蒙受了五四运动的余荫。从那时起，旧小说开始公然走入文学的殿堂，紧跟着以戏曲为首的俗文学也得到了重视。学者在努力搜求旧本小说戏曲的同时，又发现并爱上了它的插图。在短短的时间内，这一类书变成了“奇货”，价钱也飞涨起来。经济规律在起着作用，奇书、异本不断地涌现了，使长久沉湮的珍贵文献得以重见天日，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更重要的还有，在那个时代里，要求发布保护文物的全面政策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有，也不过一纸空文，不会发生怎样实际的作用。但书市上价值的涨落却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宣传，使人们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随意毁弃这些带有图画的破旧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那一阵子的小说戏曲热和版画热，郑西谛就不可能编成他的《版画史图录》和《古本戏曲丛刊》。

谈到古版画的搜集，我们不应该忘记吴瞿安、王孝慈、马隅卿、郑西谛、傅惜华等先生。在抢救、保存这一笔珍贵遗产的工作中，他们都投入了毕生的精力。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只靠一两家图书馆，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也许今天研究中国版画史的学者，就非得远渡重洋去寻找资料不可了。他们都是私人藏书家，有两位还一直生活、工作到五六十年代。最近曾与几位同志谈起，虽然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个人收藏的风气还是应该鼓励的。只有在人民中间普遍存在着收藏文物的爱好与习惯的基础上，国家的收藏事业才有更广阔、美好的远景。我们必须少做以至杜绝一些杀鸡取卵式的蠢事。最近报纸上报导的某些“文物仓库”里收藏的大量古书画霉坏报废的新闻是触目惊心的，同时也并不是个别的。事实上人民可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良好的习惯。他们热心地收藏着新出版的书籍，现代画家的作品和一切美好的事物，并不因为曾经有过康生那样的恶棍的叫骂与恐吓而减少自己的兴趣。康生曾经指责收藏家们垄断资料，不肯化私为公，甚至投机倒把。但最后将人们收集的文物一骨脑儿抢回家去的也正是这个康生。这中间就包括了傅惜华所藏的大量古版画。

明代后期大量出现的版画作品，以小说戏曲插图为最多，但绝不只是仅在这些地方才有版画的踪迹。它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阔的。粗略地想想，诸如宗教宣传品、出版家的广告、科技图书（包括医书和动植物、武备、建筑、营造等等）、连环图画、人物肖像、名胜导游、通俗读物、美术专著（如画谱、笈谱、墨谱等等）、赌具（如叶子）、酒牌、进行封建道德教育的读物、黄色画册……必然还有漏略，但仅此种种，也可见当时的版画的应用之广，它的影响所及也绝非仅限于知识阶层，它的力量比起圣经贤传来也不知道要大到多少倍。

曾经有过的几种版画史，都是以时代先后为经的；我想不妨也可以用“横”的方法来试试看。按照版画应用的不同方面，选取一二实物，加以考查。

我国地方志的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文献价值不久以前才得到较充分的认识。作为地方志的支流，又出现过一些山志、名胜志。一座名山、一个名人、一所祠庙，以至书院、乡镇等等都可以有志。在这种书的前面，也往往附有人像、风景画、导游图之类。这类版画不只因雕刻时代的先后而显示出风格的衍变，更因为它们多系刊成于特定地区，故而又能表现地方特征。说起明代版画，人们大抵都知道有徽派、金陵派、建阳派、杭州派等等，但就全国范围论，这只不过是一些重点。要想有更全面的了解，就不能不求之于刻于不同地区的插图书。



有一部《文潞公轩诗》，三卷，翼城王泰编辑，是成化二十二年（1486）山西刻本。这书是纪念宋代的文彦博的，他在宋仁宗天圣六年曾在翼城作过县官，在河边造过一座亭子。这书就是收集了许多诗文题咏编成的。前面有一张图，古拙朴茂，可以作为明代前期北方山西地区版画的标本。

这是一张鸟瞰图，仿佛是一幅坐在飞机里拍摄下来的照片。作者撇开了实物的远近距离、大小比例，只是按照要求突出表现了应该突出的东西。城外的山水树木，是用传统的山水画法表现的。城内的“轩”就不同，那是更写实、更细致的。有趣的是穿了公服的文彦博，神态宛然，案上放着纸卷。他大概并不在办公，而是欣赏山川云树，在作诗。下面的空白处补了一丛竹枝。刻法、刀工都是粗犷的，但并不草率，那几笔竹枝就刻得很好，表现了画家的笔情墨趣。

同样也是地方名胜专集的就还有《钓台集》。

这是为了纪念严子陵富春江畔的祠庙而编刻的书。我见过两种明刻，但其实是一副板子。书二卷，看前面的旧序，最早有弘治元年（1488）的纪年，但看版刻，也不过嘉靖、万历之间的东西。署名校刻的是桐庐知县杨束、曾振宣，不过这是算不得数的。在过去的时代里，作地方官的人都有附庸风雅的习惯。为当地修复几处名胜，刻点书，把自己的名字也塞进去，以为这样一来，就也可以“不朽”了。那用心与趣味和今天在许多名胜遗迹上放手涂写“某某到此一游”的正是一脉相传。这样的书刻成以后，版片就留在衙门里。后任官上任，就加上一篇序，挤上一个名字，刷印送人，算是也有一点微劳。久而久之，署名的地方挤不下了，就索性换刻第一页，只写上自己的大名，将前任官名一概取消，书也成了自己的创作。明刻书中，往往有同为一副版片，却只有第一页（或未页）不同的，原因大抵如此。这样的书著录的时候是必须留意的，很容易上当受骗，发生错误。

在这本《钓台集》前面，有一张《严先生遗像》和一张《钓台图》。图版的风格也是非常古朴的，但从版心、画上的题字看，依旧不过是万历中刻。但肯定有更古的一个底本无疑。如果拿这两张版画作为明代中叶浙江严州开版的标本，大概是不会错的。

过去没有去过钓台，只从图上看，觉得“奇山异水”确是“天下独绝”（梁吴均语）。世上真有这样古怪的风景么？近来去富春江上走了一转，这才明白，这图是一张颇为“忠实”的“导游图”，也是采取了突出重点的手法，将“次要”的、哪怕是真实的峰峦树木，都一概略去了。最有趣的是两座山峰中间蜿蜒上升的曲线，不必说，它指示的是登山的路径，不过必须“攀藤附葛”才能登涉的山路。从图上看，竟与马戏团里所走的钢丝无异，不到现场，恐怕是无法领会此中奥妙的。

“严先生祠”的牌坊，客星亭，还有那座祠堂，今天都没有了。富春江水被刻成波涛滚滚的样子。全部构图风格，与明代地图或方志插图的刻法没有什么两样。可见画家、刻工都不像是后来突起的虬村黄氏那样专业的木刻工人，他们还不曾掌握那种圆熟的技巧，也没有将插图作为美术作品进行考虑。

几十年后，到了清初的顺治六年（1649），又出现了一部严州知府钱广居编的《选刻钓台集》。这次没有沿用旧版片，是全新的刻本，前面也有两幅图。严先生像看得出是照旧本抚刻的，但《钓台图》则是崭新的作品。钓台之外，还写出了上游的部分江景。比起旧图，是更为真实也更近于山水画

的版画了。显而易见，这是经过了晚明版画的鼎盛时期以后的作品，明代前期那种粗犷、简略的风格已经不再有一点余迹了。

这里又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上距明亡虽不过六年，但这里的两图却纯属清代版画的风格，与晚明的作品显然不同。清初的版画并非不精工，制作方法继承的也是旧有的传统，但风格、面貌确是不同了。有经验的人很容易看出两者的区别。清初有些带圆图的曲本（即所谓“月光图”）、清初雕工名手鲍承勋所刻的一些版画（如《杂剧三编》及《秦楼月》等）都是优秀的作品，但确已非复晚明的风貌了。这种雕版风格上的变化，有时不必改朝换代也会出现。如明代嘉靖与万历之间，只不过有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隆庆，风格就截然不同；清初康熙与雍、乾刻本的差异也几乎一样。这种现象，还没有人进行细密的研究，给以科学的解释。

1980年10月5日

## 晚明的版画

版画作为一种艺术品，最早给以重视的却并不是专业的艺术家，也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从诞生时开始，它就一直是普通人民群众的恩物。它是人民自己创造、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土生土长的艺术。虽然早期版画有不少出于佛经，而佛经正是外来的东西，一定的影响自然不是没有，但从历史实物看，这影响小得很。在风格、技法上佛教版画自成一个系统、一个相当完整的流派，与其他门类的版画是泾渭分明、很少牵涉的。既然社会上对版画有着强烈的需求，它的产生、发展就是不可阻挡的。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盛衰、兴替，这中间起着重要调节作用的是封建社会里的手工业和商业。不管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得如何激烈，经营雕版、印刷的手工作坊的生产肯定很早，而版画的出现，肯定也迟不了多少时候。

一切人民创造的美好事物，当它一旦出现并受到热烈欢迎以后，士大夫就要看中、眼红，要拿过来加以利用了。这种热心的“艺术爱好者”甚至包括地主阶级的头子——皇帝在内。我举不出哪位皇帝曾经下过提倡版画的诏书，但实例证明这并非毫无根据的揣测。跟着起劲的是大臣与各级官员，以至地主阶级中的种种头面人物。至于有名画家挤进版画创作者行列，那是颇晚的事了。如丁云鹏、陈老莲、萧尺木都是人所共知的版画画家，他们是应邀客串参加这一工作的，向他们发出邀请的则大抵是出版商人。画家自己发现了这一艺术形式的魅力，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创作，他们的眼光、魄力是值得佩服的，他们不愧是画苑里的豪杰之士。至于唐伯虎、仇十洲似乎自己并未参加过这工作，出版家有时借用了他们的粉本，有时简直只是打出了他们的招牌。如有些据说是唐寅作的版画的题属就写着“吴趋风魔解元”。唐伯虎无论怎样“风流”、“浪漫”，这样的别号怕是不会采用的。

附有版画的出版物绝大部分是通俗读物，售价是低廉的。日本的尊经阁文库藏有明万历中闽建书林拱唐金氏绣梓的《新调万曲长春》，书前扉页上有一方朱文印记，“每部价银一钱二分”，使我们约略可以知道这类书当时的市价。读者对象大抵是文化不高或只是多少认得几个字的市井小民。“万曲长春”是一种戏文唱词选本，每页分三栏，上下都是曲文，中间一栏则是“汇选江湖方语”，也就是江湖黑话大全。所收条目有些我们可以在明人话本小说上看到，是研究古代市语和俗文学的极好参考资料。此外就是精致的插图。可以揣想，在市镇的茶楼酒肆旅舍里，在走南闯北小商人一类人物手上会出现这种书本。它们的毁失也是极平常极容易的。没有哪个收藏家会保存这些东西。它们幸存到今天的怕也不过千百分之一二，而偶有所见也几乎都是“孤本”。这就给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现存明刻插图本的一般情况大抵就是如此。

《养正图解》，是明万历中曾经担任过皇太子讲官的焦竑编著的。经理镌刻的是“南京吏科给事中”祝世禄，于万历中刻于金陵。全书凡60图，每图后有故事说明，大抵从古书中节取。接下去是焦竑的讲解，间用口语，并有所发挥。祝序中首先提到“高皇帝尝命诸臣绘农业艰难图、古孝行图进太子诸王”，可见朱元璋是注意用形象教材对皇位接班人进行教育较早的一位皇帝。接受了朱元璋的意旨并进一步发展为大型图说的则是焦竑。他认为，“盖讲读止于析理，图说兼以征事。理之用虚，虚故隐约言之而不必有所指；

事之指实，实故览之者易竟，而愈以明理之用。”（祝序）这大约可以算做古来一切看图识字类读物的理论说明。焦竑“仰遵祖训，采古言行可资劝戒者，著为图说”。他宣传的当然是封建道德规范与家法、教条。这书不同于一般民间通俗读物，是为皇太子准备的教材，所以刻版十分讲究，祝世禄在序中特别指出了“绘图为丁云鹏，书解为吴继序，捐资镌之为吴怀让，而镌手为黄奇。”在序文中郑重介绍画家、书手、刻工，这办法就不多见。金陵是明代的留都，也是出版中心之一。丁云鹏是安徽人，黄奇是新安诸黄的先辈，这许多，就都使《养正图解》在版画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爱惜郎官”，写的是汉明帝与妹子馆陶公主的故事。公主在皇帝哥哥面前为儿子讨一个郎官的职位。明帝不肯，只赏了她 1000 元钱。明帝的理由是，郎官虽小，可也是天上的星宿（传说天上太微垣里有 25 颗“郎位星”）。到了地方上，起码也是一个县官，要管 100 里地方的百姓，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所以不能答应。看来，汉明帝还是比较清醒的一位封建皇帝。他懂得不能把权轻易交给亲近人，在经济上马虎应付一下却不要紧。这种对“大节”“小节”灵活掌握的道理，今天看来当然不足为训，不过在 2000 年前要算是难得的了。

另一幅“克己任贤”，画的是有名的唐玄宗照镜子的故事。照范文澜同志的说法，这是玄宗还不曾变为昏君时的著名故事。这里引一节焦竑的说解，从中多少可以领略一点给皇太子讲书的气氛。

“玄宗一日临镜，照见貌瘦，默然不乐。左右便逢迎说，‘自韩休为相，凡事违拂上意，以致陛下消瘦如此，何不逐去他，以自快乐。’玄宗说，‘韩休乃贤相，每事规正我。我得他为辅，百姓都阴受其福。我貌虽瘦，天下必肥……’”焦竑把古书译成接近口语的文字，读起来有些像小说，这与“朱子语类”之类都是难得的古白话文标本。焦竑说完故事，抓紧时机对未来的小皇帝进行了教育，将开（元）天（宝）作了对比，说道，“一人之身，而敬肆不同，治乱相反。人心之难保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戒哉！”自然不免有点英雄创造历史的气味。不过这些话是面对特定对象讲的，所以不能不如此，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和《养正图解》性质相近而规模更大，读者对象也更广的可以举出祝世禄的弟子汪廷讷编刻的《人镜阳秋》。汪廷讷是徽州休宁著名的富商，环翠堂主人。除了《人镜阳秋》以外，他还写过十几种传奇，是个剧作家，有名的《狮吼记》就是他的作品。《环翠堂乐府》在明刻附图的曲本中也是非常有名的。此外，他还有《坐隐先生全集》，其中有《棋谱》，也附有插图。

汪廷讷的社会地位（除了经营土地和商业以外，后来还出任过盐官），他对文化事业的非凡兴趣，他在版画发展史上的推动作用，都是值得研究的。一般的著作都把环翠堂刻本算作金陵产品，其实这并不一定准确。南京是汪廷讷经常往来的地方，但他活动的基地应该仍旧是安徽。《人镜阳秋》是黄应组刻的，这是一位虬村黄氏著名的雕手，他为环翠堂主人长期服务，刻了大量版画作品，因为他们是同乡。环翠堂诸种所附的版画与同时金陵版画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应该说，是他为金陵派版画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带来了徽派版画的风格技法。环翠堂诸种的风格是工整、富丽的，一扫初期版画那种粗犷的风习。人物形象也逐渐变得长身玉立起来，这在女性身上特别显著，后来就逐渐发展到所有人物都是修长美丽的。初期版画经常出现的阴刻，即利用大片木板黑地的方法不见了。同一风格的作品还有起凤馆刻的《王

李合评北西厢记》和《元本出相南琵琶记》。画工是歙县的汪耕，也是绘制《人镜阳秋》插图的画家。在他的笔下，屋宇地面的花砖、屏风的配景、窗格的雕花、衾枕帷幕、桌帔绣墩，无一不带有浓重繁复的装饰味，就连花草树石也有着图案气息。这一切，与汪廷讷那样的社会地位和欣赏趣味都是密切相关的。汪耕笔下的人物，女性往往是丰腴的，近于唐画，与后来流行的纤弱苗条的风调完全不同，就连老年妇女也不例外。反面的或凶狠武勇的人物也并不加以丑化，只在眉目须髯间少作点染。这许多，与汪廷讷及其朋辈的好尚也有很大的关系。

以环翠堂为代表的版画，必然会产生它的缺点，那就是公式化。一切仿佛都有了一定的规格，精致是精致的，但生命力却消失了。特别是像《人镜阳秋》那样有几百幅插图的大型画册，这缺点就更显得突出。环翠堂的版画是有独特的风格的，它使我们联想到清代的皇家版画如《耕织图》、《万寿庆典》，都是工致富丽但缺少生命力的作品。这是民间艺术到了封建统治者手中必然会发生的变化。他们只着意于歌舞升平，企图把现实装扮得尽可能理想，不过艺术的生命却完结了。这一流派不能说没有给明末版画带来影响，不过并不严重，现实主义的传统仍旧在发展、进步着。可能一般的书坊及其读者，没有那样的财力制作、购买这样的出版物，也并不怎样欣赏这种离开生活太远的美术品。

《人镜阳秋》分忠孝节义四大部，每一部又分若干类。汪廷讷希望通过宣传，巩固、发扬封建道德的用心是清楚的。书前请了许多名人作序，还刊出了“就正姓氏”105人之多，都是当时著名人物。可见这是得到广大封建上层人士的批准、同意的。如“国史编修、经筵讲官、充起居注”的黄汝良在序中就说，“余初观其像，窃怪近于传奇，非经史善本，谓其无当也。”就代表了某些头脑僵化者最初接触这书时的反应，不过他随即醒悟了，不禁连声赞叹，“昌朝兹编一出，见者莫不警惕。万古纲常，昭昭在目，是大有功于名教也。”终于得到了完全的批准。

现在从《人镜阳秋》里选取了两图，都是描画在开阔场景中的人物活动的，在全书中要算是一种别格。第一幅写的是范蠡与西施的故事。无无居士（汪廷讷的别号）说，“范蠡灭吴霸越，功成而载西施泛五湖。卓哉，擅千古之风流也。”可见他对范大夫的结局，是非常羡慕而且佩服的，这也正合于汪廷讷的身份，因为他自己就是一名兼作官僚的商人。看图中所写，范蠡与西施虽然过着逃亡生活，但依旧颇为阔气而悠闲，除摇船人外，还有三名僮仆。小船也挺讲究，案上还有瓶插珊瑚和书卷，这许多，正是无无居士自己理想生活的描画。范蠡的打扮也像一位道士或仙人，和同书中庄周与诸葛亮的形象没有什么区别。“想其洞庭橘熟，江乡蟹肥，维艇白苹渡口，垂钓红蓼滩头。友者白鹭沙鸥，瓦盏蓬窗，独斟浊酒。向之战姑苏而刎壮士首者，尽付之五湖烟水中矣。回视文种，鸟尽弓藏，难共欢乐者，越绝哉。”这不只可以作为图版说明，汪廷讷的思想境界也表达得明明白白了。

另外一幅是刊于“义部”、“惠爱类”之末的汪仕齐事迹图。这是编者的父亲。廷讷在自序中曾反复声明，由于“乡人”的坚持，才不得不添入的。读者却借此得以了解仕齐是怎样一位能“得万货之情”并使人们“无不骇且神之”的能干商人。这图的经营也很别致，退休林泉的老封翁坐在堂上，大概正在施舍棉衣；下面的粮仓里则在放赈。远处的民工则正在取土、运土和打地基。两名雅人正悠闲地负手参观，他们是在监工也说不定。在这一幅中

出现的人物有 40 个。动作不同，神情各异。把繁复的内容，组织在一幅之中。画家是费了心思的，刻工也显示了出色的功力。使用的只是简单但有利的线条，却能成功地传达出各不相同的神态。这是明代后期徽派刻工的真实本领。几十年以后，这种手段就已经不再可见。雕工可以作到更为工细，画面可以更为繁复细腻。为皇家服务的雕版业无论在人力、物力哪一方面，都不是民间艺人所能比拟的。但作品的神态却差得远了。

关于汪廷讷，陈垣先生《跋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一文中曾有所记，可以使我们知道他是怎样一位达到了可笑程度的好名者：

汪亦徽人，其书（《坐隐棋谱》）刻于万历卅六七年，亦遍征当世名人题赠。据自跋，此则为万历卅三年利玛窦所赠。《坐隐集》并有酬利玛窦赠言一绝。然试译之，词句不可通，盖割裂《墨苑》利玛窦赠文及图说而成，殊可笑也……信手剪裁，任意联缀；不顾其汉音文义如何，欺当时识罗马字者希，特取其奇字异形，托之利赠，以惊世炫俗，可见当时风尚，士大夫以得利玛窦一言为荣也。

自从颜之推在“家训”里斥责了教育儿子学习鲜卑语、弹琵琶作为“服事公卿”的手段的齐国士大夫以来，中国历史上这一类记载多半出现于国势陵夷、强敌窥伺的年代。在明末，为某些士大夫所艳羡的是“远西诸儒”带来的近代文明成果，这与齐国士大夫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不管怎样说，佩服是一件事，摇头摆尾地讨好则是另一件事。对此，人民大众是看得清楚的。

封建统治阶级很懂得利用版画为自己服务。明代政府的出版机构——经厂，曾经刊行过大量书籍，其中就有附有大量插图的。如《释氏源流应化事迹》，全书有 440 页之多，是先图后文的劝善书。雕版之精，图像之多，都是惊人的。这种明初北京出版的版画，带有浓厚的宗教画气息，与民间的版画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以推测，一些专刻佛经扉画的工人，当时已被吸收到经厂中去，因而切断了与民间出版业的联系，也没有给坊刻留下任何影响。民间版画也有以佛教题材为主题十分出色的作品，风格就完全不同。这里可以举出万历中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作为代表。

这是一种白棉纸印的大方册。共 18 番，每页正面是图，背面是赞，大字隶书，六行，六字。最后一赞末属《海阳汪圣修书》。每页版心下有刻工姓名，有“黄应瑞刻”、“黄应泰刻”、“思桥”、“应道”、“伯府”、“应绅”等。现在选刊的第九幅，是一位“托钵持仗、偏袒衲衣”的罗汉。伯符是黄应瑞字，这位雕版名手在这一帧里确是表现了非凡的技巧。衣袖的飘举，神态的从容，眉目的安详，袈裟的富丽，这一切都是用极纤细的线条表现的，但纤细决不等于纤弱，线条似乎是带有弹性的金属丝，构成的人物体态、肢体、颜面轮廓，都饱含着跳动的活力。连袈裟的厚重与内衣的轻柔都有明显的差异。这是晚明版画所能达到的极高境界。

这种大方册的版画，似乎是万历中开始出现的一种习见样式。它们大抵是极为精美的作品，比一般书本插图的要求更高。近 30 年前我曾在济南市上见到一厚册《东方三大图》，也是这种类型的大方画册。刻工是徽州汪志高，书前有万历甲寅朱延禧序，《东方三大赋》，谢在杭序，杨 序。所谓“三大”是东海，泰山和孔丘。全书 180 页。可以算作一部煌煌巨制。

不只是堂皇重大、宣传封建道德最严正的事物，连最赤裸、淫秽的题材也是这种大方册版画的内容之一。它们同样是徽派版画刻工最精心的作品。这一奇特现象是很能尖锐地反映晚明社会的本质的。一方面是无比的正经，

另一面则是极端的腐朽。在明代后期，徽商在全国是最活跃的商人，典当是他们经营的重要业务。徽州的朝奉就是非常有名的专业人员，可以与绍兴的师爷媲美的。当铺最怕失火，而据说这种内容的版画画册是有非凡的避火功能的。这就是徽派版画出现这一品种的原因。在二三十年前，北京、山西的一些几十百年历史的老典当、钱庄往往就神秘地收藏着这种画册。我在傅惜华的家曾经见过几种，后来是被康生一骨脑儿抢了去了。这些版画，在艺术史、社会史、民俗学上都是珍贵的文物。但过去一直没有人肯著录、议论。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释道三家地位的排列虽然时有上下，但道家的势力无疑是最弱的。不过它也不甘示弱，时时企图巩固、扩展自己的阵地。他们在进行宣传的时候，也没有放过版画这一重要武器。

《道元一气》五集，俞俞道人曹士珩元白撰。崇祯中刻于金陵，也是一种同型的大方册。全书有四十几张插图，画者是曹元白自己，刻工无署名，看风格也是徽派名手无疑。书前有芝岳老人序；龙眠学仙童子燕胎道人郭士豪序（崇祯九年）；惺惺道人张延誉序（九年）；弟子汪瀚序（崇祯七年）。作者和校订者都是新安一带人，他们请了徽州工人来雕版是很自然的。在全书前面，有作者隶书上版、蓝印的一篇告白，是很有趣的文献：

是书也，独畅祖真秘旨，合阐性命微言，渐顿咸明，始终毕举。允为后学章程，远作丹经印正。年来自揆園中，甲戌行携白下。偶为诸宰官鉴阅，遂命精梓流通，用开后觉，以求外护。俾读是篇者，发欢喜心，破贪悭想。独助三千，同登八百。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云。

这是中国出版史上难得的“版权所有”广告宣传的实例。它告诉我们几件事。首先，这书的刊行是得到留都贵官的大力支持的，其次是这类书会有“无知利徒”企图翻印，可见是一种颇有销路的商品。作者维护版权的意图则不明确，似乎不大像是为了保护版税收入。至于前面讲到书的优点，所发挥的秘旨、微言，我虽曾翻看过一遍却终于不能懂。

释、道都是宗教。佛家宣传轮回，寄希望于来世或虚无缥缈的西方净土，总难免虚幻、空无的缺点。这对性急的人来说，不能算是怎样有力的宣传方法。这就是后来某些佛教大师提出顿悟说，提出不必念经、修行照样能成正果捷径的原因。但到底还是比不上道教的“现实”。道士主张长寿，力求获得眼前的享乐，允许养妻子，还可以进行烧炼，这是既能取得金银，又能得到长生的妙法。这样看来，佛家“出世”，道家则是“入世”的。按理道家会在宣传上占有优势，但实际却又不尽然。我想这是因为道家所用的一些方法过于自私也过于神秘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活了几千百岁的神仙至今只存在于武侠小说之中，人们不相信，这就反而不如和尚所宣传的来世、天堂之虽然朦胧却较有吸引力。以上这些完全门外人的臆测，与哲学范畴中的释道理论没有什么关系，记得多年前我在青城山上遇见过一位有名的道士，曾向他打听有关炼丹、采补……的秘密。结果受到了一番委婉的驳斥。他说那些都是旁支、外道，不是道教的正宗。我想这大概也是事实。但在《道元一气》这样的书里，所见的却大半是后者。这类书之出现于晚明并受到欢迎，当然也是毫不奇怪的。

《三家图》是两张合幅的图。左面的一张写老子手里拿着一张太极图，释迦手里执了禅杖，在悬崖上对坐。手捧宝珠的龙女凌波而至。龙女的衣襟和鬃发都迎风飘拂，映衬了汹涌的波涛，是很美丽的形象。我不能明白这中

间暗示了怎样的哲理，只觉得这是一张高妙的版画。另一张是《内篇》《金液还丹次第》中的一图，这是道家说教中最为反动荒谬的一个部分，是赤裸裸地把女性看做一种器具的“理论”，是真正抓住了封建主义的精髓并发出强烈诱惑力的一个部分。那些“宰官”们之所以欢迎并大力支持道士，他们希望通过道士的帮助获得的往往不是发财，而是纵欲的法门。从很古的时候起，道士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就大量出现了，叶德辉刻过一部《双梅景闇丛书》，其中所收大半是这种货色。谁想真正了解封建主义的实质，只从儒家的教条中寻找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懂得一些释道二家的花样。《三家图》这个题名倒颇能说出一点内幕。

但以版画而论，这两幅却是很好的作品，都是新安派刻工技巧烂熟时期的作品。不过与通常的戏曲、小说插图比较，风格还是有所不同，我想这是因为不同画家的不同画风所引起的差异。中国的古版画，大抵总是画工一人，刻手又是一人。在雕版事业发达的地区，大抵有着一些专为书籍绘制插图的作者。他们熟习业务，和刻工合作得久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怎样的线条适于刻刀来表现，对传统绘画技法上有所舍弃也有所创新，这样就逐渐摸索出一套方法，与雕工配合形成了一种特异的风格。

状元，是封建社会由科举制度进身的最终优胜者，也是人们（特别是读书人）一致羡慕争夺的对象。最初发明这方法的不愧是聪明的统治者，他所运用的大约是和发明彩票的商人相同的策略，但更为巧妙而成功。皇帝已经消失了70年，但到今天许多人还知道状元这名称和它所代表的涵义就是一种明证。

早在明代中期，“昆山顾氏”就已编成了一部纪录明代历科状元的书，这之后又陆续出现了“京省诸刻”多种不同版本，可见这是很受欢迎的读物。到了万历后期，海阳吴承恩又增补重编为《状元图考》五卷，精雕行世。这是一部受到当时读书人高度重视的书，是各地书坊和举行种种科举考场的书棚里都必然陈列的畅销书。这书传世著录有几种刻本，重要的是万历丁未所刻一本。刻成后又陆续添上新科状元，补刻行世，其实并非都是新版重刻。我所有的一本所收状元共77人，每人一图。目录至钱士升止，但实际最后一图是周延儒，可见印刷已在书刊成九年之后了。这书所附的图绘是极精工的。在卷首大题之下，编校姓氏之后还特列“黄应澄兆圣父绘图”一行，可见编者的重视。吴承恩的凡例中有两条说：

图者像也，像也者象也。像其人亦像其行。……得良史黄兆圣氏，以像属焉。……

绘与书双美矣。不得良工，徒为灾木。属之剗削即歛黄氏诸伯仲，盖雕龙手也。

明刻附图书中像这样在卷前大书特书，表彰画人、书手、雕工的，这是仅见的一例。那位绘图的黄应澄显然与虬村黄氏应字辈诸人是兄弟行，他是专职的画家，也许自己也能刻。雕工姓氏保留在书中的有应瑞、河清、惟乔、伯符、兆元、元吉、德脩、应泰、黄应渭等凡九见。其中有的则是别字。

《图考》的编辑方法是每人一图，后附详考。图画的题材是撷取有关本人的一件故事或传说，而这往往是梦兆、阳德之类，因此包含了大量的因果报应迷信内容，但也暴露了一种思想。在当时，大约没有谁相信状元是靠真才实学得来的，重要的是运气，宿命因果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其实这是对封建统治者抡才取士政策的一种清醒的判定。皇帝大约没有料到也看不到这些



副作用。

不过以版画而论则确是出色的。因为题材广泛，画家又费过一番心思，所以虽然是近百幅的大型画册，也毫无单调雷同之感，比起《人镜阳秋》来要好得多。刻工更是极高明的，它工致，但毫不板滞。线条是细腻的，但不排除重笔。山石、堤岸、花树、发髻，都有用重笔渲染的地方，比起一色细线条来是一种进展。从初期版画的粗线条，到一味工细，再回到粗细并采以细为主，版画发展的痕迹是很清楚的。

这里用作例证的是卷三嘉靖二十三年状元秦鸣雷的一幅。描写的是他常常会有的一种梦境，“骑马上天门”。构图非常别致，它的写梦也与后来连环画中运用的手法相似。现实与幻觉组织在同一画面之中，奔马的描绘也是出色的。

说到连环画，不能不想到《壬午平海图》。关于此书我在《残本·复本》一文中曾作过介绍。这是明朝覆亡前夕江南苏松道程炯镇压了一次“海盗”起事之后的“纪功”之作。共有双面合幅版画27张，“沿海地形图”六张半。用连续画卷的形式介绍了“平海”的全过程。现在介绍的一张“梟斩盗犯图”，正是封建统治者残酷镇压起义者血迹斑斑的实录，是难得的历史文献。行刑的刑场是演武场，坐在堂上的就是程炯和理刑推官知州三位官员。平台上有手执“行刑”号牌和挥动令旗者。左面悬着帅字大旗的台上有一群吹鼓手，他们手中的锣上写着“金”字，说明这就是“鸣金”的用具。刀斧手们就在辕门里面进行屠杀，许多“盗犯”已经身首异处了，还有的则正在“开刀”，等待处决的都跪在左侧一边。平台下面还另有一面“犯由牌”（？），一个役卒手里拿着不知什么名色的东西，正向大堂赶去呈验。旁边站着两个佩剑的武官，正在议论着什么。一个衙役正用树枝赶走看热闹的人群。左右两侧则是手执武器旗帜的兵丁。

这些图没有在画面上留下刻工姓名。不过看刀法风格并不像是徽派，它是更为自如奔放，更有生气的。人物之众多，神态动作之生动，比起只着意刻画少数人物的徽派版画显然需要特有的圆熟技巧。这是可以代表明末苏松一带雕版水平的作品。《平海图》的出现，说明晚明版画施用之广，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对这一宣传形式的重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以版画形式出现的名副其实的连环画，应该说是大部头小说中的“绣像”或“出相”。三国、水浒……等著名长篇小说的明刻本多有绣像，有时它们分别被插入各卷或各回之前，有时就合订在卷首。如果故事是连贯性的，这就应该说是连环画了。有些插画较多的曲本自然也有相同的特点。其中成就突出的作品大抵到晚明才大量出现。影印本《金瓶梅词话》所据的原本是万历刻本，但书前却附有一厚册插图，是从崇祯刻《金瓶梅》中借用的。《词话》原本无图。有的研究者却误会插图与《词话》同出一书。

《列国志》在明代有许多不同的刻本。但成为后来刻本的祖本的则是冯梦龙改编的不分卷、108回本。这书的原本是明末金闾叶敬池所刻，刊刻甚精，有54页、108幅插图，也可以算是一部煌煌巨制。这里选取一张“献地图荆轲动秦王”作为代表。所写是“图穷而匕首见”以后紧张的顷刻。屏风已被推倒，地图还留在案上。荆轲手执匕首绕柱而走，秦王急切间拔剑不出。闻警来救的武士们正登上殿陛，而殿上诸臣则张皇失措出尽了丑。只写了10个人物，但在事变发生的俄顷，他们的不同反映都准确生动地再现出来了。画家刻工都是值得称赞的。看那雕版风格，与新安诸黄也不尽同，可以看做

姑苏版画的标本。

明代版画除了美术作品的功能以外，在科技、医药种种应用图书插绘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注意的人却较少。当时最著名的雕版名手很少参加这种工作，大抵只由普通雕版工人担任。但数量却是很大的。

明人喜欢编写篇幅巨大的类书，有一些还附有大量插图。如《三才图会》、《图书编》都是。后者有 127 卷之多，章潢编。他根据“左图右书”的原则，尽量利用插图，对种种事物加以说明。照四库馆臣的意见，这书的学术价值比《三才图会》还要高些。如“城制”一图，刻工说不上工致，但却是忠实于实物的。不过也不是某一座具体城池的写实，而是一般的概括。这是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类型出版物插图的范例。就世界范围来说也是先进的；至今依旧有参考价值。

医书、本草学、植物学（如《野菜图谱》）、茶书（如《茶经》）、兵书、科技书（如王徵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这类书都附有数量可观的插图。因时代先后、刊书地域的不同，这些插图之间往往有精粗美恶的差异。但判别高下的尺度却应与美术作品的版画有所不同，在这里，忠实于客观事物的要求应是第一位的。例如李时珍的《本草》，原刻附有插图，虽然有些粗拙，但我相信是力图忠实于草木金石的真实物的。我曾见过一部崇祯后期刻印的《本草》，插图要精致得多，刻工是有名的武林项南洲。我想，遇到这种情况，怕还是原刻初印的本子要来得可靠一些。因为这不是艺术品，漂亮起来的翻刻本就很可能走样，没有从李时珍手稿抚出的本子可靠了。但这也只是一种揣测，我不懂植物学，也没有用两本进行过比较。

有一部叫做《修真秘要》的书，断不定应该归入子部道家还是医家，也许都不是。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现象是复杂的，是多种因素交错糅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似乎不伦不类的东西。想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分类，是无效的，前些年有人企图举办儒家法家大排队，就是想用“清理阶级队伍”的办法来给古人作鉴定，每人发给一张身份证。用心不能说不是良苦的，但效果很不理想。李白据说是法家，可是又和道士打得火热，希望长生；常常喝得大醉，可是一醉就能写出出色的诗来。他有时嘲笑孔丘，但也并不全部拒绝圣经贤传中的道理。这就使许多专家发生了困难。对此，李白是不能负责的。这本《修真秘要》是明嘉靖中赵府味经堂刻本，上文下图，共 23 页、46 图。初看，这应当是一种健身运动的图说。但常常说到运气行功，似乎又讲的是气功一类的东西。再看看那些古怪的名目和示范表演者的形象，该是道家著作无疑了。开卷以后七幅都是以吕祖为主的，如“吕祖养精”之类；以下是陈抟，共四幅，都是“睡功”；下面就轮到“李白玩月”，可见在道士们眼中，李白的地位是很高的，仅次于吕、陈二祖。此外还有“仙人指路”、“龙扳爪”、“鸣天鼓”、“双手拿风雷”种种希奇名色。《修真秘要》前面有“前后卫生歌”，后面有“医家秘传随身备用加减十三方”（版心下有“味经堂”三字）那是不必踌躇就可以列入医家的了。

明太祖分封诸子于全国要害地区，是为藩府。用意自然是要他们拱卫中央。不过有时也会弄巧成拙，如明成祖（永乐）就以燕王起兵“靖难”，夺取了政权。因此，中枢往往又对诸藩多方加以限制，设立了许多禁例。只给这些藩王在指定地区内以肆无忌惮地剥削残害人民群众，尽情过荒淫享乐生活的自由。有些藩王在这种环境下喜欢刻点书，算是一种消遣。所刻也大抵是曲本、棋谱、画谱、占卜书之类。地处中州的“赵府”所刻书要算是较多

的。使用了“居敬堂”、“味经堂”两种牌号。前者所刻多半是正经书，后者所刻则以医家道家类书为主。这里所选的两幅版画，则是典型的明代中期北方雕版风格。可以看出，这与南方版画是全然异趣的两种不同作风。

明代科技书中有关武备的著作比例颇高，这与时代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明朝的统治阶级先是要对付、镇压起义、反抗的农民和少数民族；随后又增加了“倭寇”的侵扰与“东夷”的威胁，直至最后席卷朱明王朝以去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这个一直受着威胁、打击的阶级必须重视武器的研究与改进，是不奇怪的。早期的这类著作中所收绝大部分还是传统的武器，自明代中叶以后，从不同渠道传来的外来新式武器就逐渐出现了。至于比较系统的、由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知识，那是要到很晚才开始传播，还来不及运用到武器制造上面去。

《利器解》一卷，万历刻大方册本，是陕西西安前卫指挥金事温编的著作。书中所收种种火器，有威远炮、迅雷炮、万胜佛郎机、噜蜜鸟铳……照郭子章在序中所说，“顾此二器（佛郎机、鸟嘴铳）国初未有也。嘉靖间一来自佛郎，一来自倭，皆东夷器也。”这本书里记录的是简单的仿造方法。看那所附噜蜜鸟铳的图样，也只是粗略的示意图，后面还有前口、火门、机等的细部图。在“上轨”、“下轨”中间的“转轮”，是一种可在两轨之间转动的齿轮，也画得草率，和实际相去很远。还有一种“绷子”，其实就是弹簧，书中的说明是，“绷子用黄铜片，两头交钉。折叠意若锁簧，钩来，则绷子折叠，下轨关轮而上轨至前燃火。放手，则绷子撑开，下轨推去，火管自回。”这种解说是早期科学器械说明书的标本，讲得虽然并不准确而且繁琐，意思则是清楚的。

《利器解》是万历庚子（1600）刻于西安的官书，是明政府军事部门的内部文件，它的插图应该可以代表当时西北地区雕版的应有水平。事实上27年以后刻于北京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所附的许多插图，水平也并没有多少进步。这几乎是按照当时“西海耶稣会士邓玉函”带来的欧洲物理教科书上的图样照式翻刻的，连原有的罗马字也照样翻刻了过来，不过那里的齿轮也同样是很可笑的。西方的科学文化，在闭关已久的中国人看来是一种新鲜事物，是完全陌生的，但表示了应有的好奇与欢迎，也有的人在拚命地抗拒。这就是它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落种、生根时的状况。雕版工人同样也不熟习这些，他们生产了并不理想的作品，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这些300年前的科技书的史料价值还是很高的。

画谱、花草谱、墨谱、笺谱……都是大量使用了版画的图谱。一些著名的谱录都为人所熟知并艳说，如郑振铎的收藏《程氏墨苑》，鲁迅先生的翻刻《十竹斋笺谱》，还有十多年前在浙江发现的《萝轩变古笺谱》，是海盐张氏涉园旧物。此谱刊于天启丙寅，早于《十竹斋笺谱》几乎二十年。黄棉纸精印。逗板，拱花这些技巧在这部笺谱里已经使用，套色有至五六种者。说明这些都不是胡正言的发明创造。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是经过徐森玉先生的鉴定主持收归国有的。我只隔着玻璃柜看见过陈列的一两页，读过一点简单的介绍。多少年来没有人再提起过，实在非常可惜。这是可以导致改写中国版画史有关章节的重大发现，可以据以纠正过去某些研究结论的。其中也包括了日本关心并研究中国占版画的学者的某些结论。现在一些美术出版机构又在开始复印一些古版画了，这是使人高兴的。那么为什么不设法把这书也重印出来并加以研究呢？

关于古版画的复制，我想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一些重要的、有突出特色的作品，就要求我们使用珂罗版或更先进的印刷手段，石印、锌版、胶版都是不足取的。过去人们也曾尝试过用木版重刻，但成绩并不总是理想的。鲁迅、西谛主持重刻的《十竹斋笺谱》是非常成功的。但荣宝斋曾经翻刻过一种古版画集（书名记不真切了）却是一种完全失败的作品。它告诫我们，只凭工细的线条是不能使某些并不只是依赖线条的纤细而成功的原作复活的。有时得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效果。荣宝斋的雕版艺术家们可以成功地用几千百块套版复制一张古画，但却不能用一块木版重现一张明代版画，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一定总结过一些重要的经验，在刀法、工具上都会引出可贵的思索，而这正是研究古代版画应该花大气力的地方。有的中国版画史在书后的附图中就有用了一些可疑的插图，如《青楼韵语》、《三才图会》等可能就是辗转取材于并不成功的翻刻本，却不加以注明，这种作法当然是不足取的。

萝轩、十竹斋两种笺谱，都开版于江浙出版事业兴盛的地区，但都独树一帜，与盛极一时的新安黄氏刻工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注意的。在百花竞放的形势下，流派层出不穷，人才也像雨后春笋那样的涌现出来。万历癸丑（1613），在松江刻成了一部“云间林有麟仁甫辑”的四卷本《素园石谱》，就是很值得重视的一部版画名作。此书过去故宫博物院曾经有过石印复本，但比起原书来是大为逊色了。在原书作者自序第一页版心下方，留下了“云间周有光刻”一行字，可以证明此书刻于松江。此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画家企图表现石块的形与神，它的玲珑透漏与种种不同形态。在一百多幅图版中，运用了笔墨的各种功能，尽力传达出石块千变万化的形貌。刻工则用刀完美地再现了画家的意图，这与新安派用细腻的刀法制造的工丽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刻工不只再现了实物的形态，同是还表现了浓重的笔情墨趣，没有一整套精湛的刀法，是做不到的。这里只能介绍一幅“石丈”，可以约略看出，画家怎样用笔，刻工怎样用刀，完成了他们希望达到的效果。只靠工细，完全不可能做到这程度。

金陵，明代的留都，雕版事业非常发达，确是可以算作一个出版中心。今天所知以汇刻曲本知名的书坊就有好几家，留下来的实物也还不少。经营这种出版业务的几乎都是唐氏一家。金陵三山街唐氏富春堂，有时属名唐对溪，可能就是书坊的主持人，他有时也用寿德堂的牌号。唐振吾的书肆名广庆堂。世德堂的主人则是“绣谷唐氏”，还有一位书林唐锦池。文林阁的主人也姓唐，所刻曲本数量之多可以与富春堂相比。在当时的金陵，除了陈大来经营的继志斋，曲本的出版似乎都被唐氏一家包办了。

在诸唐中间，富春、世德两家是较早的老辈。富春堂诸种的版式与插图都是异常古朴的，是元末以来通俗读物的直接继承者。到了唐振吾就开始出现改革的迹象，插图风格逐渐趋于工丽。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徽派版画的发展给出版业带来了新的刺激，同时也是一种威胁，不改进就不能生存下去。不过唐家似乎并未直接聘用徽派的雕工，而是走着自己的路。这就是后来形成的金陵派版画风格。文林阁和少后的继志斋（刊书于万历三十六年前后）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风格的代表。

《观音鱼篮记》是文林阁所刊诸曲之一，这个故事和今天仍流行于地方戏中的《追鱼》是有些关系的。“包公鞫妖”一图在构图、刻工上都算是成熟的作品。与徽派版画不同的是，还不曾全部使用细线条。人物的中靴、

发髻和树木枝叶，仍旧利用了木版的黑地。从构图上看，画家想象的天地，还较多受着舞台的限制。这是一个尺度，可以有效地判断插图产生时代的先后与成就的高下。正如将舞台剧改编为电影，改编者的高明与否取决于摆脱舞台框框，尽意驰骋自己的想象能力。这在晚期许多有名的插图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陈老莲的画《西厢》有时简单到抛却背景，只写人物；有时又使人物做梦，在梦境里表现舞台上根本无法表现的情境。在画家头脑里，舞台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版画的成就愈高，它在出版物中所占的地位也更重要，也愈受到出版家的重视。前面曾经介绍过《状元图考》编者对图像的评价，这种趋势，到了明代末期，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刊于万历丙辰（1616）的《青楼韵语》，编者张梦征在“凡例”中就郑重声明，“图像仿龙眠、松雪诸家。岂云遽工。然刻本多谬称仿笔，以诬古人，不佞所不敢也。”书前又有郑应台所写的“韵语画品”，可见出版者对插图的重视。天启中刊《彩笔情辞》，明虎林叔周甫张翎选次，张氏在自序中也说，“图画俱系名笔仿古。细摩辞意，数日始成一幅。后觅良工，精密雕镂。神情绵邈，景物灿章。”崇祯丁丑（1637）杭州刻《吴骚合编》前凡例说，“清曲中图像，自吴骚始，非悦俗也。古云，诗中画，画中诗，开卷适情，自饶逸趣。是刻计出相若干幅，奇巧极工，较原本各自创画，以见心思之异。”短短20年中间，杭州书坊先后刊印的这几种书无疑是可以作为晚明版画的代表作品写入美术史的。这是出版者极端重视、刻意经营的成果。我手头的一本《吴骚合编》，原书的扉页还保留着，棉纸蓝印，中间大字双行题“新镌出相乐府吴骚合编”，右上方有“白雪斋点定”五字。上端有龙凤纹大圆印，左下角是小字朱记一方，文云：

词余之传，其来尚矣。佳本之获，世顿罕焉。往刻吴骚诸集，海内风驰，坊刻效颦，终难继武。第流行日久，积渐模糊；选帙屡分，未称合璧。兹特审音选订，精心删补。写丽情而务除俗套，搜旧曲而博览新声。更加画意穷工，增一编之景色；点板合法，师九宫之渊源。敢云大雅之复兴，实彰骚坛之全盛云尔。白雪斋谨识

这方小字宋体刻成的印记，事实上是一则广告，加上上端极为工巧的朱文圆印，都在证明着这是原版初印的本子。但又不曾声明“翻刻必究”，那是因为雕版之精，不是“效颦”者轻易所能“继武”，因此也就不怕冒滥。保留着这样原扉页的印本，是很少见的，它本身也是出版史上的一种文献。

还有一种《绿窗小史》，共收丛著47种，前有秦淮寓客序，后有印记二方，“蕙若”、“白雪斋”。前面有精图多幅，看来也是同一书肆刊行的。又曾见《绿窗女史》十四卷，碧蕖馆藏书，前面也有大量精图，可能是较早的一本。《小史》之出，当已在崇祯中了。《小史》前面的插图，也正与《合编》是同一风格的版画。

《韵语》的插图，由武林张梦征摹像，黄桂芳、黄端甫等刻成。“玉笋漫飞淮浦月，锦箏还趁郢人歌”是马湘兰的诗句。原题是《春日诸社丈过小园赏牡丹，各赋绝句见投，用韵和答四首》。画面所写，几乎与今天苏州园林中所见的光景无异。溪流、小桥、湖石、花树都是写实的，三位雅人对花、焚香、吃酒，一面入神地欣赏着“佳人”指上传出的琴声。小桥上一个跑着送来一盘石榴的小僮正和同伴在答话。六个人物的神情动作各不相同，真是栩栩如生。刻工的技巧也完全体现出了画家的意匠。

另一幅写的据说是桂英的诗意，那题目就是《送王魁》，“灵沼文禽皆有匹，仙园花木尽交枝。无情微物犹如此，何事风流言别离。”《焚香记》、《情探》里的女主角竟自有作品流传，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当然我们不必浪费精力去考证那真伪。这幅画描写的是情人在分离之前依依惜别的情景。画家用浓墨重笔尽情渲染了蓊郁的林荫，枝叶交柯，仿佛有一种浓重阴凉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执手无语、双目交视的一对情人，与桥头整顿着琴囊书卷的小僮，溪中戏水的鸳鸯，互为映衬。小桥一过，就是咫尺天涯，离别的情味真是浓极了。

这两幅风格完全不同的版画，可以使人们消除一种误解。新安诸黄并非只能刻细若游丝那样木刻线条的名手，他们也善于再现另一类笔墨，制造别一种气氛。

《韵语》的插图是当时和后来都公认的名作。它甚至比原书的文字部分还有更强的生命力。我曾见到过一部题为《闲情女肆》的书，看纸墨，也是明末的印刷品，但其中的插图正是《韵语》的原物，只不过一起订在了卷首而已。这是《韵语》旧版落入别一书商之手以后，文字作废，但舍不得那精致的版画，才使它在另一部书中重现的。

《彩笔情辞》的插图是古歙黄君茜刻，也是精丽绝伦的作品。这里复制一幅“斜阳江上烟波疾，怎对却西风立。”这是梁伯龙作品中的摘句，原作前有小序，略云，“癸丑之岁，南游永嘉，道经兰溪，徘徊江岸。凌丽樵之孤耸，见塞羽之长征。川原迢递，旧会难同；云树周遭，故园不见。情来引泣，事往会悲，因动仲宣之怀，敢拟登楼之什。”画面力图表现的正是这种特定情景。

这也是一幅不同于虬村黄氏典型的典雅绵丽风格的作品。画家与刻工根据主题的要求，用几乎接近粗犷的劲健笔锋、线条，勾勒了江水、波涛、山石、虬松。气势之雄浑，韵致的苍凉，在满眼水软山温和好女如花、柔情似水的画面中间，不能不是一幅难得独特的精品，画面上仿佛真的隐隐传来了阵阵潮响、松声，吹来了使人站脚不住的天风。劲挺的松枝、汹涌的江水几乎占却画面的绝大部分，画家构图的胆识，也是无双的。

当多少领略了晚明版画的种种不同风格之后，最后还是不能不回到它所表现的最普遍的题材和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作品。《吴骚合编》中项南洲所刻的“寻芳缓步闻鶗鴂，柳畔黄鹏声弄舌”就是会使人着迷的这样的作品。一位春日游园的少女，迷醉地微侧着头恣意享受着和煦的春风的吹拂。风儿在哪里？在杨柳的柔条上，在少女和女侍的衣带中，也在那扑腾着双翅的黄莺身上。最主要的怕还是在她那惺忪的眉眼之间吧。

洪国良刻的“良霄院落沉沉，立尽梧桐清影”。几乎是同样的人物，但环境变了，情调也变了。清秋、月夜、桐影，此外就是静，静。也许还有秋虫的鸣声，也许并没有。她不正在那里凝神谛听么？画家、刻工既然提供了充分想象的依据，读者自然就有权利运用自己的想象。美好的艺术品的功能不就正在这里么？

杂七杂八地说了许多，有些方面还是来不及考虑，漏掉了。譬如建阳这个雕版中心，也曾产生过丰富的版画作品，有着浓重的地方色彩，就没涉及；明刻书籍有许多扉页、牌记，出版者也常常用版画加以装饰，也来不及讨论。譬如《重刊事物纪原》，是一部宋人编辑的通俗小型百科全书，颇受欢迎，一直传刻不绝，在明代就有天顺、正统、弘治诸本。其实多半是旧版在书坊

中辗转流传，多次修版重印的。我所见的一本有“成化乙酉岁”（1465）的牌记，画面是一个童子，刀法古朴而生动，是明代早期版画极好的标本。又例如萧云从的《离骚图》，弘光元年（1645）刻本，是非常重要的版画作品，《中国版刻图录》说，“《离骚图》为汤复刻，与刻太平山水图画之汤尚、汤义，疑是一家。封面镌汤用先绣梓。”这汤氏也是一个雕版世家，是明末安徽地区的刻工。我所藏的《离骚图》、《天问图》，还是棉纸最初印本，原封面中间篆书“离骚”二字，有上方题“萧尺木先生手授图画”，左下方是“汤复上绣梓”。这应该是最早的款式。可惜此书被掠至今未归。

我国明刻附有版画的书籍，在日本还保存着大量实物。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宫内省图书寮、东京帝大、早稻田大学、无穷会等处都有所收藏。其中建阳书坊刻本尤为重要，往往是国内已佚的孤本。日本私人藏书家也非常重视明刻插图书，研究中国版画史，如薄井恭一先生所藏后来就曾选印为《明清插图本图录》一书。近年他们的研究情况，所知很少。我想在中日文化交流的这个方面，前景是广阔的。

郑振铎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收入了大量的明刻插图本，事实上这也是一部可供参考的明刻版画汇集。不过想作研究还是应该根据原书实物，“丛刊”只能作为一种参考。石印复制的美术作品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何况还有修版的工序，许多真实面貌都被修得失真了。“丛刊”的选材也不是没有缺点，有些重要的本子，因为种种原因就不曾被采用。如《西园记》是有明末原刻的，但采用的却是清两衡堂本，无图；沈采的《千金记》用的是富春堂本，却舍弃了万历二卷本的《仇实父绘画千金记》。一些重要的作品，实在无妨多收几种异本。这二卷本是傅惜华的旧藏，有十张插图，是非常出色的金陵派前期作品。其中“鸿门”、“夜宴”、“追信”、“别姬”诸图，都是使人不易忘记的名作。希望这书历劫之余依然无恙，能早日复制，呈献于读者的面前。

从明代晚期版画的发展过程看，一方面是技巧上的趋于高度成熟，同时也带来了繁褥、纤弱、琐细的缺点，早期的雄健、刚劲风格消失了。内容上的变化则更为严重，这种趋向从大量新创作的剧本中也可以看得清楚，描写儿女私情作品的比例迅速增大，对一些重大的国家社会问题的关心减弱了。赤裸裸的黄色图画也大量出现，如《金瓶梅》的插图，描写男色的小说《弁而钗》的插图……都公然在书坊中发售。当时的“长官”们也视而不见，不予干涉。这当然并不能证明他们是一些“开明”的“长官”。真实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就是这种腐朽文化的欣赏者与支持者，同时在那种社会风气之下，他们没有扮演两面派的必要，只有糊涂虫才会要求这类作品为明朝的覆亡负责。这一切并不是使社会趋于腐朽、灭亡的根本原因，只是它的一种病象。

1980年11月6日

## 关于柳如是

过去随便翻阅晚明野史，经常遇到有关柳如是的故事，逐渐引起兴趣。不过这与许多旧时代的诗人文士的出发点并不相同。

柳如是在她的同时侪辈中间，无疑是声势最值赫的一位。无论是“秦淮四嫩”，还是李香君、卞玉京，她的这些前辈或姊妹行，都远远比不上她的气派。不但在当时，就是在身后，300年来，一切大小文士只要碰到与她有些牵连的事物，无不赋诗撰文，感慨一番。一张小像，一颗印章，一面镜子，一只笔筒，都是发泄幽情的好题目。这些雅人的动机说穿了无非是想吊死了若干年的这个小女人的膀子，却完全不顾在辈份上说，她该是他们的祖母、曾祖母……行，在实际上说，她又是一位“女吊”（女性的吊死鬼），竟忽略了她会在半夜里跑来“讨替代”。

古今有些才子的有些设想，确是十分古怪的。譬如一个人，死了以后变鬼，这自然没有问题。但变鬼之后，会不会一年年也老下去呢？一般的意见又并不以为如此。牛僧孺作《周秦行纪》（或云这是旁人托名所作，用以进行政治陷害的，是颇古的“阴谋文学”，这里姑不具论），说他夜宿汉薄太后庙，会见了戚夫人、王昭君、杨贵妃、潘淑妃、绿珠等一大串不同时代的古美人，一律朱颜绿鬓，宛如当年，饮宴倡酬，最后由昭君伴寝。（在别人都推辞了以后，薄太后选定昭君伴寝，那理由也是非常有趣的。说她嫁给了呼韩单于，后又改嫁，“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所以尽可自由活动，不要紧的。）实在风雅极了。不过想想戚姬后来是成了“人彘”的，杨贵妃缢死，潘淑妃杀头，绿珠跳楼自杀，都是血肉模糊的形象，但牛僧孺却一概不见。自然，这是小说，是才子们的白日梦，但也确实生动地刻画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迄今有关柳如是的许多诗文，大半即属于此类。自然，在这中间，有些议论还是不无可取之处的。我这里所指的是总的倾向。

为了“研究”（姑且这么说说吧），我搜集过一些资料。托朋友从图书馆里抄来了她的诗集，从清人文集、笔记中搜集了一大堆有关文献，几乎有编成一册“靡芜集”的本钱了。又搜集了她的一些逸诗，还买到过一张朱野云所抚的小像，正是如是初访半野堂的小影。画幅四周，题满了吴山尊、费昶怀、严几道等数十位作者的题诗。可惜的是，还没有来得及研究，这一切就都“迷失”了。大概是“有一弊必有一利”吧，摊书满前，未必能写得出文章；面前只剩一张白纸时，倒也会胡乱写下些意见。自然，距离“研究”的要求，那可是越来越远了。

30年前，我组织过梅畹华写他的传记，我的希望是通过他个人的经历、纪录或表现出清末一解放这个历史时代的一个侧面。他后来写出了一部未完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有些人的意见是生活谈得多了，也就是说艺术谈得少了。不过我想，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似乎多半还是谈生活的那些处所吧。

不管类比得怎样不伦，柳如是和梅兰芳，无疑都是很典型的历史人物。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一个则活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末期，在新中国还活跃了十来年。两者都是天翻地覆的大时代，社会的变革都是激烈而巨大的。两人的具体身份又都有可能接触十分广阔的社会面。通过他们的个人活动，具体地、深刻地认识当时的社会，那条件都是十分优越的。

柳如是也是有艺术才能和表现的吧？她写过一些诗词，留下了一卷尺牘，都很有特色，也都是不会磨灭的。她作为一个“名伎”，应该也有些吹



弹歌舞的本领，不过我说不清。她有一幅《月堤烟柳图》的卷子流传下来，后面还有钱牧斋的题跋，我见过照片，却实在幼稚得很。不用说，这一切比起她的生活实践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正如“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口号一般，学得吹拉弹唱，“普天下服侍看官”，则是妓女、歌女……一切最下层的受迫害者的呻吟。两者之间，有被迫与自愿的不同，相同的是都有货色“出卖”，男的卖“艺”，女的就只有卖淫。卖淫也有三六九等的。明末秦淮就分旧院和宁院、猪市（或作朱市）许多等级；解放前上海也曾有长三、么二……许多名色。柳如是是属于高级的名妓，虽然身份不同，但努力方向是并不两样的。她们都要想方设法，早日跳出火坑。说得好听些就是“选婿”。

明末名妓选婿的故事，人们是并不陌生的。像“杨云友三嫁董其昌”，至今川戏里还保留着这样的节目。她们大抵要选择怎样的对象，她们采取一些怎样的手法去捕获对象……这一切，如果加以细密的研究，是会发现许多有价值的启示的。首先，依据当时的标准，怎样的对象，才算得上是头等的？大致说来，不外乎官僚、地主、名士，但当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发展的时候，商人也挤进来了，不过地位还是虚弱的。名士的得以跻身其间，原因是他们或则本身就是大地主，或则可以向大官僚转化。“名士”本身倒并没有什么分量。

记得野史中记如是最早出身于盛泽的归家院，她本姓杨，名爱，柳则是“寓姓”。最早见于记载和她关系亲密的腻客是复社党魁的张西铭（溥）。这是很重要的线索，说明在她开始进入社会之际就和晚明的政治圈子发生了关系。接下去又一个著名的故事是，如是儒生打扮，到松江去拜访陈卧子，递上名片自称“女弟”，她是想下嫁给陈子龙的。这一段因缘又没有成就。“野史”说什么陈子龙“性严峻不易近”，看来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张溥和陈子龙都是晚明党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掌握操纵着舆论阵地，发表政论，组织文社，左右着清流的政治主张，对当时的朝局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是地主阶级的改良派，其对立面则是以阉党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中极端没落腐朽的势力。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中，他们的政治倾向是正义的代表，有颇广泛的政治基础。张溥先死，陈子龙在南明弘光一局以及后来浙东抗清起义的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最后死于清师的镇压。柳如是最初相好和选择下嫁的对象，是这样两位“名士”，确是很值得注意的。

王国维有题如是《湖上草》三绝句，其第三诗云：

幅巾道服自权奇，兄弟相呼竟不疑。

莫怪女儿太唐突，蓟门朝士几须眉。

过去女人写信作文，不是自称为“侬”就是自称为“妾”，这里换上了一个“弟”字，在300年前，可实在非同小可，难怪士大夫要目瞪口呆，为之哗然了。在古今妓女中间，这样毫不气馁地与士大夫平起平坐，蔑视一切的，柳如是是仅有的一例。这是对封建礼法的愤怒抗议，断然将它踏在脚下，勇敢地挣脱身上的枷锁，争取“人”的地位的行径。绝不能仅视之为有趣的“佳话”的。柳如是《湖上草》中有“我是华亭旧时客”之句，顾苓《河东君传》也说“君初适云间孝廉为妾”，这不知何指，大抵总不是陈卧子。如是在下嫁钱牧斋以前，活动地区，不外松江、杭州、吴江一带。徐野君士俊有“菩萨蛮”词，题《初三日与柳姬闲话》：

仙源隐者应如是，桃花引惹渔郎至。一笑不相亲，再来何处寻？春

城寒食句，青满章台路，休道柳如眉，月痕今似谁？（《今词苑》卷上）词中所咏当是如是，试看第一句，作者就将“柳隐”、“如是”字样都组织了进去。此词当作于湖上，别无其他故实，只“一笑不相亲”两句，勾勒了如是若即若离的姿态。因是同时人的投赠之作，十分可贵。

更难得的是在李因《竹笑轩吟草》里，有《赠柳如是校书》二首，题下小注云，“工诗文临池”：

不解长条系别离，一声折柳正相思。  
秋风犹恐成憔悴，好护青青似旧垂。  
昼掩章台自著书，十离诗就寄双鱼。  
扁舟三泖烟霞迥，觅得菰芽伴索居。

龛山亦史是庵李因，也是一位名妓，后嫁葛征奇，是有名的女画家，她的《竹笑轩吟草》共三集，初集刻于明末清初。所收都是甲申以前的诗。集中颇有投赠同时姊妹行之作，如是之外，尚有赠王玉烟、王畹生（玉烟女弟，工弈棋画兰）、李淡生（工诗，善弈棋、音律）、章韵先（善杂剧、画兰）的诗。这两首诗尤可珍重，描绘了如是寄居九峰三泖之间的生活情况。多年来收集如是同时人的投赠之作，仅此而已。

如是另一位密友是为她刻了《尺牋》和《湖上草》的汪然明。他是住在杭州的徽州富商，有《春星草堂集》，收在《丛睦汪氏遗书》中。可惜我不曾仔细看过，现在说不出其中有无与如是投赠的诗文了。《柳如是尺牋》一卷，收31通小札，都是寄给汪然明的。从其中透露的情况看，她和汪然明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如是来到湖上，就借住在汪的湖庄里。时间当在崇祯十二年己卯。在这些信里，如是自称“弟”而称汪为“先生”。汪对如是的生活，多方照顾，还为她的归宿细心规划。汪和钱牧斋也是相识，如是访牧斋于半野堂，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给汪然明的最后两封信都提起过。王国维诗第二首说，

华亭非无桑下恋，海虞初有蜡屐踪。  
汪伦老去风情在，出处商量最恼公。  
就说的是此事。国维又一诗说，  
羊公谢傅衣冠有，道广性峻风尘稀。  
纤郎名字吾能意，合是广陵王草衣。

静安自注云，“尺牋二十五云，‘承谕出处，倍见愷切。特道广性峻，所志各偏。久以此事推纤郎，行自愧也。’纤郎疑即王修薇字，号草衣道人，广陵人，后归许霞城给事。”

这是汪然明为如是撮合，如是辞谢了，而举“纤郎”以自代的一例。这种例子不只一端，如她给汪然明的另一信说：

接教并诸台贶，始知昨宵春去矣。天涯荡子，关心殊甚。紫燕香泥，落花犹重，未知尚有殷勤启金屋者否？感甚，感甚。刘晋翁云霄之谊，使人一往情深，应是江郎所谓神交者耶。某翁愿作交甫，正恐弟仍是濯纓人耳。一笑。

她这里又一次把某些人的殷勤轻轻地回掉了。她甚至不能不向汪然明呼吁，“望先生速图一静地为进退，最切，最感。”因为“浮谈谤谣”不能不逼使她考虑“避迹。”后来她终于离开了杭州，避居何处不详。她有一封给汪然明的谢信，写得极动人：

鹃声雨梦，遂若与先生为隔世游矣。至归途黯瑟，惟有轻浪萍花与

断魂杨柳耳。回想先生种种深情，应如铜台高揭，汉水西流，岂止桃花千尺也。但离别微茫，非若麻姑方平，则为刘阮重来耳。秋间之约，尚怀渺渺。所望于先生维持之矣，便羽即当续及。昔人相思字每付之断鸿声里，弟于先生，亦正如是。书次惘然。

从这封信里，似乎可以看出，她对汪然明的以平等相待，尽情维护，是从心底感激着的。这个饱尝人间辛酸的女人的心，真地被打动了。细味全信，友情更深于爱恋之情。这不只是一篇漂亮的简尺，还凝聚着真挚的情谊。

《众香词》收柳如是词六调，其《踏莎行·寄书》云：

花痕月片，愁头恨尾，临书已是无多泪。写成忽被巧风吹，巧风吹碎人儿意。半帘灯焰，还如梦里，消魂照个人来矣。开时须索十分思，缘他小梦难寻你。

这一阕“踏莎行”，恰好可以作为她的尺牘的“代跋”。

柳如是选婿的结果，选中了钱牧斋。钱柳的结合，不是基于爱情，那是明明白白的。对照我前面所列举的三个条件，钱牧斋是全部合格的。他是“东林领袖”、“文坛祭酒”、大地主、大官僚。据崇祯七年温体仁指使张汉儒揭发的钱谦益居乡不法40款罪状，他有上百个奴婢，夺人田宅妻女，把持官府，操纵考试词讼，其实是个大恶霸地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钱谦益还经营出洋兴贩，获利巨万。这可是个“新生事物”，为一般大财主滥乡绅所望尘莫及的。柳如是亲访半野堂，做了调查研究，决定下嫁给这个老头儿。除了满足于这些条件之外，还看到三年以前，钱牧斋在一次你死我活的政治搏斗中，走了司礼监曹化淳的门路，击败了政敌，使温体仁罢相，压服了浙党。政治前途充满了希望。这个小女人是很有野心和才干的政治活动家，她下了决心，嫁给了钱牧斋。

钱柳结合以后，确实过了一段“好日子”。钱牧斋为如是起造了绛云楼、我闻室，和她一起到浙江去旅行，回常熟时被看不顺眼的人们追着赶打，满船都是砖头、瓦块。可见他们的结合，是很不为“公论”所许的，一致认为“谦益愈放废”了。钱牧斋还为她写了无数艳诗，其中就有十分下流的长诗。这些诗被魏雪窦等所编选的《吴越诗选》选入，但另列一卷曰“艳体诗”。朱鹤龄说，“见一越友选时贤诗，嗤薄艳体，另为一编”，即指此事。这就说明了钱柳结合在当时引起的“清议”。

如是下嫁后写了不少诗篇，如《奉和小岁日京口舟中之作》：

首比飞篷鬓有霜，香奁累月废丹黄。却怜镜里丛残影，还对尊前灯烛光。错引旧愁停语笑，探支新喜压悲伤。微生恰似添丝线，邀勒君恩许并长。就颇费思量，不知道她到底表现的是什么情感，横直不是十分满足的。那首著名的《春日我闻室作》也同样流露了浓郁的惆怅之情：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数诗皆据《吴越诗选》卷二十二“名媛诗”，朱朗诣评：“如是骨理皆妍，故是艳宗。”）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嫁给这样一个年已六旬的老头儿，是很难期待有什么“闺房之娱”的。《柳南随笔》所记的钱柳闺房对话，“我爱你乌黑头发白个肉。”“我爱你雪白头发乌个肉！”就是出色的特写。这一组“警句”由如是写进了《奉答牧斋》一诗，化为“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

外面的流言，多起来了。明清易代之际，野史笔记特别喜欢记载有关如是的是非闻逸事，她一时竟成了新闻人物。大抵和牧斋关系密切的人还肯说些好话，此外大量的则是丑闻。我想，这也不一定全是造谣。

黄淳耀这位老夫子，在钱牧斋家里作西宾，如是要和他诗筒倡和，吓得他要卷铺盖逃走。曾经刻过《绝妙好词》的柯南陔（煜）在《舟中读牧斋先生初学集得一百四十字敬题卷后兼寄孺怡行人》这样的诗里也有“松圆邀翰墨，河东媚房栊”的句子。看那全诗，对钱牧斋是倾倒备至的，但写到钱牧斋闭户著书，就要说左有清客程松圆，右有爱妾柳如是，可见当时士大夫中间的一般印象了。这些还要算是比较“蕴藉”的，赤裸裸的丑闻更是不少。野史中记柳如是养着不少“面首”，随时更换，一旦厌倦了就赶走甚至杀却。又有一次她的一个相好被捕下狱，钱牧斋十分不安，立即出面保了出来，说不然就会使柳夫人不欢。我想这些故事即使有些夸张，但却假造不来的。它们倒是揭露了钱柳之间的真实关系。

不久，就是甲申国变。南明弘光小朝廷在金陵筹建，钱牧斋马上带了柳如是赶去，捞到一顶礼部尚书的纱帽。这是他极力讨好马、阮的结果。钱牧斋以“东林领袖”的身份，替冯铨和阮大铖讼冤，又要翻“三案”的旧案，说得嘴响，却不顾清流的齿冷。柳如是此时也有很“精彩”的表演。钱牧斋请阮大铖吃酒，要如是陪坐，阮胡子高兴极了，送给她一顶价值千金的珠冠，钱要柳如是道谢，还要她“移席”近阮。这些，柳如是都照办了。她陪钱牧斋来到金陵时，穿了“戎装”，头上插着野鸡毛，作“昭君出塞”装束，也着实出了一阵风头。顾云美（苓）《秘图斋存稿》诗（撰于崇祯癸未至弘光三月）稿本有《道中寄钱牧斋先生》一题：

赌棋墅外云方紫，煨芋炉边火正红。身是长城能障北，时遭飞语久居东。千秋著述欧阳子，一字权衡富郑公。莫说当年南渡事，夫人亲自鼓军中。

顾云美是《河东君传》的作者。他这首诗把牧斋视为威望崇高的障北长城，可能是代表了弘光中某些士大夫的意见的，尤可珍重的是他记下了柳如是的一次重要活动。当阮圆海锦衣素蟒临师江上之际，柳如是也穿了昭君装到江防部队里去活动过，大概是搞什么犒师之类的把戏的吧。但此事顾云美后来不曾写入“传”中，可能是出于避忌之故。

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如果仅只把它看做是这个“结束伶俐，性机警，饶胆略”的小女人的喜欢出风头，荡检逾闲的胡闹，那可就不免目光过于短浅了。她不惜出卖色相，讨好阮大铖，目的是为牧斋挣得礼部尚书的官位；她走到部队里去，是想拉拢抓着枪杆子的军阀。这一切，都是她想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中，搞政治活动的手法。我想，弘光一局，牧斋的一切动作，幕后都有她在指挥。这决不是什么忽发的“奇想”，是有事实根据的。

宛平查为仁心谷《莲坡诗话》卷上：“钱虞山之于柳如是，龚合肥之于顾横波，同类燕人之惑易，惜无兰汤以洗之。宣城梅耦长（庚）有题顾梅生画兰云：‘半幅双钩楚泽春，南朝旧部总伤神。靡芜诗句横波墨，都是尚书传里人。’（原往，上有钱宗伯姬人柳如是题句，靡芜柳小字也。）托讽遥深，亦属实录。耦长刻有《漫与集》。”

《鱼计轩诗话》记黄小松赠邱学勳“两尚书墨”，一丸阳书“秋水阁”，阴书“门人吴闻诗上牧翁老师珍赏”；一丸阳书“门人范琦上芝翁龚老夫子珍藏”，阴书“北山堂”，合装一匣。因赋三诗，其一云“北山秋水名相亚，

古墨生香一样新。记取芝香拈素手，尚书传里两夫人。”

多少年来，人们对柳、顾总是“相提并论”，但其实这是不合适的。在甲申、乙酉之际，多少士大夫都要经受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而钱、龚又都有故事流传。据说有人曾责问龚鼎孳当日为什么不殉难，龚答道，“我本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这就是郁达夫诗“莫怪临危艰授命，只因无奈顾横波”的出典了。龚芝麓把责任一骨脑儿推在顾横波身上，是典型的无耻之论。这在钱、柳就大不同。据野史记，乙酉五月之变，柳劝钱跳水殉明，钱试了一试，水冷得很，不敢下去。如是却“奋身欲沉池水中”。当然，这也是野史传说，难保没有出入。但我总想这也是假造不来的。钱牧斋的走下水池，试了试又走了上来，是典型人物的典型动作，不是任何“天才”所能想象得出的。

柳如是与顾横波，她们对政治的兴趣、看法，恐怕是大相径庭的吧。这两人虽同是“名妓”，又同是“相国夫人”，但完全不宜相提并论是无疑的。

乙酉，清兵南下，钱谦益竟靦颜迎降了。柳如是在这当口有过什么表示呢？野史、正史都无记载，不敢悬拟。但野史中还记下了另一小故事。

一次，钱、柳出游，看到一处泉水清澈，钱牧斋想脱鞋袜洗脚，柳如是站在一旁冷笑道，“你当这是秦淮河么！”

这个故事无疑也是真实的。柳如是实在严冷得很。只一句话，就完全吐露了她对钱牧斋的鄙视，厌恶。秦淮河是旧院长桥所在之地，封建地主阶级残酷蹂躏穷苦少女、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地方，也是柳如是出身的地方。

钱牧斋投降清朝以后，打着为先朝修史的招牌，到了北京。蒙“恩”赏给“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明史副总裁”的官衔。不知怎的，过了半年就“以疾归”了，大约总是混得不太得意。第二年，又因淄川谢升案而银铛北上。家人都不敢出头，只有柳夫人单身带了一个包袱，随行护送。在押解兵卒的刀头剑钗之间，照顾牧斋。牧斋的好友、德州程先贞家有“杜亭”，历城王秋史（莘）杜亭诗“红袖裁诗临妙墨”句下注，“虞山河东君题诗亭中”。可能是此次如是陪牧斋北上经过时所题。这一次，据传说是行贿30万金才得无事放归。牧斋对如是感激涕零，作诗说，“从行赴难有贤妻”。当时有人看了还觉得不舒服，因为柳如是到底还是“妾”，不能就这样说的。

这以后，牧斋的经济情况似乎与先前大不相同了。在《尺牘》中常常叫穷，珍重收藏的宋本《汉书》也卖给了宁波的谢三宾。很可能是由于几次官司打点花费了不少。顺治五年，又因黄毓祺案逮系江宁，吃了一次官司。

在这种局面下，钱牧斋并不曾闭门韬晦，还是与南明桂王的大学士瞿式耜有联系，和抗清的郑成功、张名振、张煌言有联系，与山阴祁氏兄弟破家结客密图抗清终被杀头的魏耕（即《吴越诗选》的编者之一）也有联系。在《雪翁诗集》卷五中有《欲谒虞山钱大宗伯，途中书怀先寄柬呈览》诗，中有句云：“前岁纵横计不成，仰天大笑还振纓。授书恰思下邳去，采药乃向玉山行。”诗意也十分显露。魏耕是说他抗清起义未成，要找钱牧斋去筹划兴复方略。从这一类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牧斋似乎还不是怎样的不齿于明遗民，还要和他一起计议抗清的大计。贤如黄宗羲，在《八哀诗》中也对牧斋特致好感。这一切都说明当时斗争的尖锐、复杂。柳如是这期间的活动，今天知道的细节不多了。那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这一类故事，正是干犯新朝大忌的政治问题，野史笔记也无人敢记，即偶有记者，在后来的文字狱浪潮中也大半毁失了。不过也还可以找到一鳞片爪。

上面提到牧斋曾逮系江宁，是由于黄毓祺狱的牵累。黄于顺治三年在舟山起义抗清，据《江阴祝氏孤忠录》，如是就曾亲自到舟山去慰劳过义师。钱牧斋《后秋兴》诗之一有句：

闺阁心悬海宇旗，每于方罫系欢悲。  
乍闻南国车攻日，正是西窗对局时。

据考证此诗就是咏黄毓祺事。闺阁是指柳夫人无疑。可见他们在红豆山庄里过着饮酒下棋的悠闲岁月时，还无时无刻不关心着政局变化与战局发展。柳如是一直没有脱身于政治漩涡之外，是明明白白的。

钱牧斋《后秋兴》诗，题注：“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其第三诗：

北斗垣墙暗赤晖，谁占朱鸟一星微。  
破除服珥装罗汉，减损盐饷饮飞。  
娘子绣旗营垒倒，将军铁稍鼓音违。  
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

钱牧斋在诗中有自注，“装罗汉”句下注，“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囊以资之，始成一军。”这是说神武伯姚志卓兵败，想再度起事，装五百罗汉是当时的隐语，柳如是卖尽金珠，帮助姚恢复了“一军”。“营垒倒”句下注：“张定西谓阮姑娘，吾当派汝抱刀侍柳夫人，阮喜而受命。舟山之役，中流矢而殒，惜哉！”这是明说如是曾入海犒师。“鼓音违”句下注“乙未八月，神武血战死崇明城下”，乙未是顺治十二年，正是张名振舟师纵横海上之时。“视瘠肥”句下注“夷陵文相公来书云云”。

到了顺治十八年，吴三桂杀桂王，瞿式耜殉难桂林。郑成功也死去了，抗清复明的希望消灭殆尽。《后秋兴》诗就作于此际，但不敢刻入文集。我曾见到过抄本。这些诗当然不能说全无夸饰，但事实大抵是事实。在作历史研究时是应该加以考虑的。

还有两个小故事，也是可以说明柳如是政治态度的。

白昼山人阁古古被清廷追捕得急了，如是曾将他藏在家里。

黄宗羲年轻时曾游虞山，住在钱家。牧斋想留他下来读书，怕宗羲因家累不肯。一天夜里，宗羲已经睡下了，牧斋提着灯来到床前，摸出七两银子来相赠，作安家之用，说，“这是内人的意思。”这内人就是如是。黄宗羲后来作《八哀诗》，其一即是“钱宗伯牧斋”，特致感念。有两句是“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箏弦。”原注：“皆身后事”，美人当亦指如是。

柳如是对年轻的黄宗羲持这种态度，自然因为他是黄尊素儿子，在明末就和阉党作过斗争，是《南都防乱公揭》的起草人之一，乙酉以后又曾多次参加抗清起义活动的原故。

柳如是政治态度，是鲜明的，一贯的，几乎找不到什么反面的材料。乙酉以后她对牧斋还是关心的，但这关心总是表现在政治方面。她没有赞成过他的无耻叛降，而是在清廷逮问时给他帮助，在抗清活动中主动地参预并亲身实践，给他以巨大的影响。随着恢复故国希望的逐渐破灭，她和牧斋之间的共同点也终于不复存在，于是就演出了“入道”的一幕。

钱牧斋曾大肆宣传过柳夫人的“入道”，作了不少诗。其实柳如是是永远不会看破红尘的。照我看，如果不是一种政治姿态，就是在生活上对牧斋表示的一种厌绝。

柳如是到钱家时，牧斋的正室陈夫人还在。此外大约还有几房妾侍。现

在只知道其一即孺饴（即前引柯煜诗诗题中的“孺饴行人”）的生母。但二十多年中间钱家的经济大权是掌握在如是手里的。这在钱氏家族中人看来实在不可容忍。牧斋一死，攘夺家产的斗争必然要爆发也果然爆发了。这就是所谓“钱氏家变”，有专书纪事。但，恰恰在这时，如是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显示了她的“政治才能”。她把这些族人请了来，好言相向，盛筵相待，在酒酣耳热之际，她宣称要到后楼上去取人们望得眼红的财物。她最后扫了这帮吃得酒臭喷人的家伙们一眼，上了楼，关好门，一根绳子吊死了。

在这之前，她早已安排妥贴，派人去县里告状，关紧了大门，准备好绳索，等她一投缳就把这帮家伙捆起来送官。果然，这帮家伙在封建法条之下，因家主新丧，迫死主母而伏罪了。

她又一次极为成功地运用了她一向鄙视并加以践踏的封建礼法，反戈一击，制伏了想把她活活吞下去的对手。这是如是一生对封建主义的最后一战，也最后一次地“胜利”了！

但一些野史的作者，许多诗人文士却把它看做柳如是为钱牧斋殉节，真是十足的昏话！

综观柳如是的一生，大抵包括两个侧面。露在外面，为大家所看见的是她的“风流不检”；掩盖在底下，很不惹眼，但确实存在而且极为清晰的是她的强烈的一贯政治倾向。结合起这两者，才能使我们对她能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在她那些“不检”的行径中间，处处浸透了对封建制度的抗议、蔑视与践踏。柳如是荒淫无耻的故事，在晚明那个社会里，并不罕见，倒无宁说是一种典型现象，是在没落的地主阶级中产生出来的市民等级的疯狂破坏性的表现，是它消极的一面。柳如是从封建社会的最下层挣扎出来，当她一旦挤进地主阶级上层以后，随以俱来的消极腐化因素就进一步进发、加强了这种疯狂性。而这种疯狂性是会无

情地破坏旧社会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加速旧的上层建筑的解体，促进了新的社会形态的发生的。我们说这里有消极的一面，是和一切大小卫道者的哗然不满完全不同的，他们是在拚死地保护旧事物，他们把柳如是视为敌人。

在旧社会的文士所写下的大量有关柳如是的诗文中，即使是较有见解的，也很少能看出她那强烈的政治倾向。他们至多是把她看做一个值得同情的美丽的怪女人，加以咏叹。如此而已。

柳如是的作品，《湖上草》一卷，《尺牘》一卷，有明末汪然明的刻本。高野侯曾得到过原刻，是虞山赵氏旧山楼的藏书。原书历经林云凤、车秋龄、贝简香、潘椒坡、徐子晋收藏。今不知流落何许。我过去曾买到一个旧抄本，为嘉业堂故物，卷中别增附录诗文不少，为管庭芬手辑。收藏家所收也大抵是传抄本。原刻少见，只见王闻远《孝慈堂书目》著录一本，注明是“明刻，棉纸”，当是原刻无疑了。此书当刻于崇祯十三年以前。浙江图书馆目有“戊寅草一卷一册，明刻本，抹云楼旧藏”，未见。又张宗祥传抄《湖上草》一册，也在浙江图书馆。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癸丑五月十一日条记，“金陶庐函寄赠《玉台名翰集》，集禾中女子徐范、蹇媛所刻，仅存汉魏茂漪、唐吴彩鸾、薛涛，宋胡惠斋居士（黄由之妻）、元管仲姬、明叶小鸾、自然居士张净妙、河东君共八家。后有冯柳东跋。”因知如是集曾有此汇刻本。

长洲章钰《四当斋集》有《柳如是遗集序》一篇，为常熟张南桧所辑柳

集而撰。说是“尝从赵氏旧山楼传录汪刻，复辑补诗词若干首，而附以康熙以来纪载文字，定名曰《柳如是遗集》。”此本似未刻行，今亦不知仍在人间否？

此外，我曾见过传抄的《旧山楼书目》，其中有如是所作《红豆山庄杂记》等数种，当是稿本或旧抄本。赵氏藏书于抗日战争前后流散，著名的《也是园杂剧》即于丁初我家散出。据说，这本《旧山楼书目》中的书，仍在虞山一带。不过这已是二十余年前的旧话了。我希望这批书仍在人间，则可能使我们见到柳如是更多的作品。

过去我也搜集过一些柳如是的佚作。《柳絮集》、《吴越诗选》、《众香词》、《明诗归》（顺治刻，非钟惺本）等书中都收有一些如是诗词。书已不存，无从引录。谢翠霞和席佩兰《重修河东君墓纪事》诗中有句下小注云：“君寒柳词云，‘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细语’”，又注云：“君有‘酿花酒酌桂郎’诗，桂郎君家孙，早殇。”（《天真阁集》）又见道光刻仁和李堂《缘庵诗话》卷三有一则云：

吾杭之西溪，奥区也。梅花之盛，不减铜坑。明季江浙耆旧多遁迹于此。故某尚书尝往来其间，今永兴寺犹藏柳如是手书小笺，题云：《次韵永兴寺看绿萼梅作》：“乡愁春思两欹斜，那得看梅不忆家。折赠可怜疏影好，低回应惜薄寒赊。穿帘小朵亭亭雪，漾月流光细细沙。欲向此中为阁道，与君坐卧领芳华。”后署河东柳隐，当是和尚书之作，诗字皆婉媚。

这是手头仅存的两则柳如是佚作了。

清人集中多有题咏柳如是遗物的，据所见条列如下：

（一）柳如是砚，背镌“秋水阁”印，印上有“如是”小款。砚右有“壬午”二字。（休宁戴延介《眉妩》词注。砚藏“吴竹桥仪部”处。）

（二）柳如是印，“消寒第八集席上，盾卿出一印章，云得之赵秀才家。朱文如是二字，旁刻癸未春楚秀镌赠，其为绛云楼中物无疑。癸未崇祯十六年也。”（孙原湘《消寒词》注。）（又见潘介彛《晓梦春红词》）

（三）红豆山庄玉杯：“江静萝明经（曾祁），予乙卯同年也。自言高祖处士某，工俞柎之术，陈确庵先生集中有传。处士曾为河东君疗疾，宗伯以玉杯为赠。上镌红豆山庄款识，属子孙世宝之。后为他氏所得。静萝踪迹赎还。今夏值君六十寿辰，出以觞客，属予作。”（孙原湘诗题注，《天真阁集》卷二十三）

（四）唐镜：“周南卿得柳如是所藏唐镜，背铭曰：‘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初白老人有诗云：“宗伯籀清世莫知，籀花映日月临池。点妆中帽俱新样，不用喧传挽镜诗。”见《金陵杂咏》。“南卿拟拓柳本装册，并摹河东小像于左，索同人题句，爰赋四绝。”（钱唐张云璈《知还草》卷五）

“镜背铭曰：（略，上下两联误倒），其旁刻‘靡芜’二篆文，极遒劲。中为夔螭，刻画飞动。小折叠架，上刻‘绛云楼印’四字。……”（邓之诚《骨董琐记》七）

（五）青田石书镇：“石长二寸有半，广二之一。刻山水亭树，款曰‘仿白石翁笔’，小篆颇工致。面镌：‘崇祯辛巳畅月柳靡芜制。’今藏王砚农处。”（张鉴《冬青馆乙集》二）

（六）柳如是沉香笔筒：“陈文述《碧城仙馆诗钞》卷六，有此题七绝



四首，无注。其第二首云：‘也合裘钟记小名，沉香禅味悦温馨。真珠四面泥金字，留得尚书旧日铭。’约略可知原物形状，其上并有牧翁铭记也。”

丁巳小雪前四日写毕

## 后 记

十多年前曾写过几篇有关柳如是和她的诗集《湖上草》和尺牘的小文。后来泛读明清人集部，注意收集有关材料，更集得资料一小册。凡此种种，前些年都被劫掠以去，至今存亡莫卜。偶于劫余丛杂中检得手抄数页，皆有关柳如是事。盖后来陆续抄得者。去年闲居无事，即据此重写为一文。观点还是过去的观点，不过少加条理。资料贫乏，但有些却不多见，怕更因我而散佚，所以也一并写入了。看了以上的叙述，可以知道，这是完全说不上什么研究的。

大约两月前，偶然得知故陈寅恪教授有《柳如是别传》的著作，都 50 万言。真是空谷足音，跫然以喜。今天于《学术研究》中得读其第一章，十分高兴，也颇有感触。陈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者，其专门著述多涉及南北朝隋唐史。陈先生读书极多，又能突破旧史家樊篱，“旁涉梵夹道藏”，运用域外资料，为比较之研究，遂多创获新解。但有一点是很特别的。他虽然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者，但在著述中却随时随地流露出对文学的偏爱。早年的论《桃花源记》，后来的研究元白诗，继以论述弹词《再生缘》，都是证明。而其最终的研究对象乃是柳如是，尤其使人感到绝非偶然。从《柳如是别传 缘起》一章，可以看出他对柳如是的同情与重视，称之为“女侠名姝”，尤看重她的思想、品质。陈先生说，“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这些话说得十分痛切，也是有卓越的史识的。对于女性的同情，尤为难得。陈先生《题牧斋初学集并序》诗有“谁使英雄休入彀”句，自注云，“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金陵。未几牧斋南归。然则河东君之志，可以推知也。”这是说，柳如是和钱牧斋在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是有鲜明的差异的。我没有读过全稿，不能确说，但从“缘起”看来，陈先生因为同情柳如是，是很想为她“辩证”的。他说，“牧斋事迹，具载明清两朝国史及私家著述，固有阙误，然尚多可考。至于河东君本末，则不仅散在明清间人著述，以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中之故，多已亡佚，不可得见。即诸家诗文笔记之有关河东君而不在禁毁书籍之内者，亦大抵简略错误，剿袭雷同，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揣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有关柳如是的传说、记载，确实存在上面所说的种种复杂情况，但是，这中间并不完全是“诋诬”，有些倒是真实的。柳如是是一个被侮辱、损害的女性，但她后来地位变了，挤进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她的叛逆的性格，使她蔑视践踏封建礼法，因而作出许多使正人君子攒眉怒目的事来，但这许多，终究是地主阶级腐朽本质的表现，历史的真实，不能曲为之辩的。同样，对待钱牧斋的态度也是如此。历史上有不少人对钱牧斋采取宽恕态度。如黄梨洲，魏耕……例子不少。这些人往往自己就是明遗民，但并不反对“二臣”

钱牧斋，当然其中有种种复杂的因素，但归根结蒂，他们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的基本利益相同，这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陈先生对钱牧斋的态度与对柳如是的不同，但总还是不无“温情”。他说“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这就是说钱谦益的迎降、出仕，都不过是难免的，这就和陈先生大声疾呼的“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发生了矛盾。而这种矛盾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清金溪蔡上翔撰《王荆公年谱考略》，是一部为王安石辩诬的专著，也可以说是一部旧史学“辩诬”的代表作。其中自然有丰富的材料，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证。但其中也有大量十分可笑的“考证”。蔡上翔以同乡之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按照封建道德的标准，把王安石打扮成一个“完美无缺的高大形象”，作了不少愚蠢的努力。那是不足为训的。这本书前些年被捧上了天，那是“四人帮”别有用心的把戏，出版者是有责任将真相告诉读者的。《柳如是别传》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倾向，未读全书，不能确说，这里不过是对“辩证”问题谈一点看法而已。

明清之际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钱、柳则是在这个特定时代中产生的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柳如是别传》的意义当然不只局限于一本人物传记。作者是很重视这部著作的，他集中了晚年的精力加以研究，而且自述其开始研究的经过说，“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检所学之深浅也。”这绝不是泛泛的谦词。明清易代之际的著作，是很不易读的。除了某些作者研究方面广、运用典实丰富之外，尤为困难的是，同时流辈的生平出处、种种关涉，每每不易索解。困难不在古典，而在“今典”。古典不论如何僻奥，总是存在于古书之中的，可以查。今典则往往只存在于同时人的口耳之间，间有记述，也往往十分隐晦，而且多半毁失了。读起来有时简直就和猜谜相差不多。在这方面，陈先生的研究工作是很可贵的。这里需要的不只是素养，更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艰苦的钻研精神。“缘起”中有一两个小例子，说明他的治学方法和成果是会使读者信服的。起决定作用的往往并非天才，而是实干。当然，对考证的是否繁琐，无论什么时候是都会有不同意见的。我以为，只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解决实际课题，应该都是允许的。虽然对具体课题的现实意义，会有不同理解。但这也应该允许不同的看法并存。

我非常希望这部 50 万言的著作能早日出版。我相信，将有大量使我“瞠目结舌，不知所云”的疑难处所，因之获得解答，对这一时代和一些具体人物获得更全面、深入的理解，使我得以修正、补充过去认识的偏颇、错误。

1978 年 7 月 21 日

## 书之归去来

知识分子和书的关系是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加以形容的。从古以来，读书人曾用种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书本的感情。有些话是说得几乎有些可笑的，但我相信这都是真实的，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因为尽管人们宣传他们如何爱书，也作不成学者，当不了大官，更发不了财。最多也只能使人留下一个书呆子的印象而已。

但在十多年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高论上市以来，情形就有些不妙了。一个人如果有书X册以上，就无疑要成为“反动”的铁证。这个X的界限也并无明确界说，要看老爷的高兴而定。我并不是什么“藏书家”，但旧书是有几本的，其为“反动”自然已无疑义。紧急措施是将书橱、书箱……一律贴上白纸封条。好像这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带放射性的毒物。每天回家看见这些交叉着的十字封条也真使人不舒服。后来，“荣幸”得很，那个和“四人帮”有密切关系的“大人物”说了话了，给了我“以伪乱真”四个字的考语，于是大小喽罗一拥而上，内查外调，翻箱倒柜，威迫劝诱，想方设法要找到我投机倒把的证据。不幸我没有学项子京的样，没有在每件书画上标明进价几何的习惯，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就又动员“专家”写了洋洋数千言的“大字报”，将古今伪造书画、古董的法门统统搬了上去。不过提到我的却只有最后一句，就是说我统统继承运用了这全套本领。还把我常用的几十方藏书印钤在一大张白纸上，在大会上示众。这样我就不只是“藏书家”，而且也是“假古董制造者”了，那个“大人物”的“指示”也因而得到了“证实”。

又过了几时，索性将凡是白纸黑字的东西都从我这里扫数取去，承情只给我留下了几本，以供闭门思过之用。从此我就和书本告别，于今五年。

我至今参不透那个“大人物”在百忙之中何以会对我寄以如此的关注；同时也悟出了过去读书人说的那种以书为性命之类的话，也是夸张过分的了。书去之日，我固然没有感受到“挥泪对宫娥”的李后主式的感情；没有了书，我也生活得很好，并不失魂落魄。但有时会偶然想起，那自然也是难免的。

衷心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从此知识不再是罪恶了；又逐步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最近我收回了一点木版书以外的藏书。虽然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光景，也还是非常高兴的。大部头的，精装的，画册，小说……都大抵失踪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四人帮”及其爪牙，口头上虽然痛恨书本，实际上却是区别对待的。他们对“洋、名、古”也自有其偏爱，不过那取舍的标准有些不同。小说、图画，自然是有趣的事物，这是易于理解的。还有一个标准则是“定价”，在这里，他们到底也不曾逃开他们所深恶痛绝的价值规律。这样，我所能收回的大抵只是一些单本小册，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东西。但即使如此，这些历劫归来的书册，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 《金瓶梅词话》的故事

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在我的藏书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的是一部《金瓶梅词话》。

40年来，我曾经有不少机会在书商手里接触到真正的黄色书籍，不过我不想搜罗这种“宝贝”，因此在我的藏书中间，这种“宝书”所占的比重大抵也只有万分之几吧。就我的记忆，我藏有木刻的《双梅景闇丛书》和铅印线装的《金主亮海陵荒淫》两种，都是叶德辉刻印的。还有四本木刻的《杏花天》，大约是道光前后所刻的，要算做比较少见的本子了。此外就是这《金瓶梅词话》，影印线装本，是近时出版的。

在我的印象里，《金瓶梅》实在也算不了什么僻书。1950年春，我在北京逛琉璃厂，在一家书店的架子上，就看见满满一架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崇祯本就有两部，清初的张竹坡本好像有十多部，后来的各种翻刻本就更多。那胖胖的掌柜对这些“宝贝”也毫无居奇之意，价钱也很便宜。不过这些都不是万历刻的《词话》本。自从北平图书馆从山西发现了原刻《词话》之后，曾在当时的北平引起了轰动。有一个“古佚小说刊行会”借来影印了，郑西谛还将一册初印崇祯刻金瓶梅图附在前面。这就是我所藏的本子的祖本。记得《鲁迅书简》里就收有代友人购买此书的一封信，对这种影印古本小说的工作，鲁迅先生也是赞成的。就在当时，北平的学者（记不清是不是马隅卿了）还将金瓶梅图选了几幅翻刻制成大幅宣纸信笺。20年前沈尹默给我的一封信就是用这信笺写的。沈尹默用浓墨行草写在一张这样的笺纸上，实在可以算得一件“名物”。当时及少后，学人利用此书进行研究的，有吴晗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研究《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关系的论文；冯沅君女士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等。

我记下这些旧事，意在说明早在四十多年前，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运用《金瓶梅词话》进行科学研究。同时也可以说明在五四运动后一二十年中间，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一个侧面。至于我买得此书，目的只不过是开手了的一部晚明历史小说搜集一些资料，希望从《词话》里得到一些晚明的风俗习惯、服饰、饮馔、宴乐、仪节等知识而已。

我虽然并无什么名贵的善本，但这《词话》在我的收藏中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但出奇的是它却是唯一受到许多人重视的“宝书”。十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一位“小将”找我谈话了，拐弯抹角了好半日，言归正传，问是否藏有一部《金瓶梅》。他知道了我确实有，而且还是附有精图一册的影印本时，就“激动”起来，反复申明不该保留这样的东西，这对思想改造不利，这种义正辞严的责难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结论是应该由他取去保管。他若无其事地撕去了封条，从书橱里取了去了。后来这位“小将”因为种种原因，从“风云人物”一下子变为“寻常百姓”，虽然常有见面点头的机缘，但也从来没有想到打听这部《金瓶梅》的下落。一直过了七八年，在清查过程中，有人揭发了此事，又有人告诉我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还有人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这些朋友的好心我是十分感谢的。但却产生了奇异的感想。一部影印的《金瓶梅词话》竟成为我被劫去的两卡车书籍的代表，这实在是我完全不曾料到的。

这次取回了劫余的书册时，一位经管书籍的朋友首先捧出来的也还是这两函“宝书”。他告诉我这部书后来终于被发现的经过，真有些像一个惊险

故事。对这位朋友的好意，我是真心感谢的。

这很引起了我的一些思索。

像《金瓶梅》这样的书，大概在无论什么时代，也不可能成为公开的、普遍的读物的吧？它带有一定的神秘性是不足怪的。不过在几十年中间，尤其是最近的十多年里，它的神秘性却飞跃地增长了。特别是青年一代，他们对祖国的文化传统知道的实在不多，但偏偏记得有这样一部“宝书”，千方百计想看到它……其实也不只是青年，这就是《金瓶梅词话》变成我的藏书的代表的原因。

这实在是值得好好思索的。

## 萧珊的书

这一篇本来是早已写好了的。今天读了巴金怀念萧珊的原稿，觉得文章不能不重新改写了。30年前我和萧珊曾经是很熟的朋友。对于她的死，我是应该用文字来表示自己的悲痛的。除了文字（尽管它是那样的无力），我还能有什么别的手段么？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从12年前的秋天开始，我就不再能到她家去作客，后来连她们的消息也不知道了。记得1967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到报社去上早班（当时我是一名运输卷筒纸的装卸工），在圆明园路北京路的转角处曾经看见她一次。当时她和另一位中年妇女在一起，匆匆地向外滩方响走去。我发现她憔悴得多了，但灵活的举止还是旧样。她大约没有注意我这个穿着劳动服的装卸工，我自然也没有去打招呼。现在想来，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了。

她的病和死，我还是过了很久以后从人们的谈话中听到的，当然也不可能打听那详情。直到最近，我也一直没有向巴金打听过。很早我就知道他在写这篇文章，后来他曾几次谈起，文章只是开了个头，写不下去了。在这样的场合，我不想接口，总是岔到别的事上去。我明白他的心情。我担心他禁不起这样感情的重负。直到从他手里接过了原稿，才算舒了一口气。我为老人的坚强而高兴。我相信他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工作的诺言不只是说说的。通过这一篇浸透血泪的文字，我得到的是激励与鼓舞。我相信，阴暗的过去带来的必然是阳光璀璨的未来。在人类的历史上毫无收获的牺牲还从来不曾有过。

《怀念萧珊》记下的是充满了悲痛的故事，我倒想在这里写下一些欢快的记忆。自然我所知道的并不多，也不过是1946年以后10年中间的一些往事。当时，霞飞坊巴金的家——只是三层的一间书房兼卧室和二楼的一间客厅兼饭厅——曾被朋友们戏称为“沙龙”，萧珊就是这“沙龙”的女主人。每天下午和晚上，这里总是有客人，有时客人多得使这间正中放了一张圆台的屋子显得太窄了。客人当然绝大多数是巴金的朋友，但也有萧珊的一些搞文学的大学里的同学——她曾经是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不过不管是老一辈或同辈的，她都接待得好，客人们都喜欢这个女主人。她是宁波人，不过我好像没有听见她说过家乡话，她好像也不会说四川话，她说的是普通话，不够纯正的普通话。她高兴的时候，用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和朋友谈笑时，真有一种生气，同时也极大地显示了她的善良、单纯、愉快的性格。她一直生活这样的环境里。熟朋友如靳以见面时总要对她讲两句笑话，有时还打趣她，靳以是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的，叫她的名字时总要把尾音提高拉长，巴金也总是这样叫她的。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我一点都不了解她的处境，但那一切却都是可以想象的。我担心，她怎能忍受得住那些超出想象的折磨和侮辱？她能挺过来吗？事实已经证实，她没有能挺过来。

有时候她会显得有些神经质。那是弄文学的人所不可避免的。她常常捧着一小册屠格涅夫或别的欧洲作家小说的英译本在读，蜷着双腿偎在长沙发里细心地长久地读着。这时她就会跟着小说里人物的命运走，有时会提出玄妙的饱含哲理的问题或见解。这一切和窗外的现实是隔得多么辽远，但她提出这些来时是认真的。当她自己发现这一切不免有些突兀可笑时，就腼腆地一笑，合上书，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

就是在这前后，她开始译一点屠格涅夫的小说。我曾读过她最初的译稿。她还要我给她的译文润色一下。可是我哪能有这样的狂妄。她有她自己的风格，她用她特有的纤细灵巧女性的感觉，用祖国的语言重述了屠格涅夫笔下的美丽动人的故事，译文是很美的。

这就是 1953 年夏出版的屠格涅夫的《阿细亚》。前面附有五幅精美插图的一本小书。正因为这是一本小书，它又幸运地回到我的手里。紧接着她又译出了同一作者的《初恋》、《奇怪的故事》，和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现在这几本书的平装本和精装本都已回到我的手中，这是使我感到非常高兴的事。这些书的译成和印制都曾为人们带来很大的愉悦。平装本是毛边的，这是有意继承五四运动以来最早的新文学出版物的传统。从《奇怪的故事》开始，又印了特印本，是蓝绸硬面烫金的，每种印的不多。我在印《旧戏新谈》时曾买了一些重磅木造纸做封面，还剩下几十张，这时就献出来。巴金笑说，这拿来印书一定不好看。但印成的 105 页的《初恋》，却实在不坏。米色布面烫金，封面是两匹马和一个坐在雪橇上的人。

……

我很惭愧，只能用这样的文字来给萧珊作纪念。我希望，她的遗译还会有重印的机会。我相信，喜欢、感谢她的劳动成果的人，在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里，并不只是一个、两个……

## 《先知》

在我开始买线装书以前，曾经有好几年热衷于搜集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的版本的。现在，这当然已经不成问题，但在40年前，如果有谁提出新文学书也有版本问题，大抵是必然会引起哄堂非笑的吧！记得最早的同道就有《书话》的作者唐弢。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唐弢就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弄堂里。我用母亲给的日用钱从旧书摊上搜得的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著作的初版本、毛边本、签名本……就曾引起唐弢的浓厚兴趣。几十年来，唐弢一直锲而不舍，不但辛勤收集，而且专心研究，有了很好的成绩，新文学版本书的重要性也为学术界所公认。我自己则早已洗手不干。不过“零珠碎锦”也还是剩下了一些的。

这次归来的旧书中间，有一本叙利亚诗人凯罗纪伯伦的哲理散文诗《先知》，是1931年9月新月书店初版的精装本。这是黑布硬面装的一本小书，别无任何装饰，只在书脊上端粘有一块小纸片，印着“冰心：先知”。这是冰心女士的译本。

值得爱重的是，这是译者的手校本。在扉页上还有冰心用钢笔写的一段题记。

这本书送给文藻，感谢他一夏天的功夫，为我校读，给我许多的纠正——这些纠正中的错误，都成了我们中间最甜柔的戏笑——我所最要纪念的，还是在拭汗挥扇之中，我们隔着圆桌的有趣的工作。

十一，十七夜，一九三一 冰心

书是用米黄色的道林纸印的，中间插有铜板纸印的插画。校改是用紫色墨水写的。记得还夹着一些用紫藤花编的精巧的小小花环。这次却找不到了。这是抗战初期在上海的地摊上买到的。可以算做我所藏的新文学书中的“白眉”。它的回到我的手中，实在不是我能梦想到的。

不久前，我把这本《先知》托巴金寄还给它原来的主人。后来收到了复信，信中说，“收到巴金转来的您‘还’给我们的那本附有题字的《先知》，真有意外的欢喜和感激！几经离乱，赠书人和受书人的脑海中，都早已没有了那片帆影。为了晚年的慰藉，我们向您深深地致谢。”信是写在一张诗笺上的。三十多年前我曾得到过一张写在同样笺纸上的墨迹，写的是《憩园》里的一段话。后来被抄没了。

1980年11月19日重校记



## 江 湖

从归来的旧书中间，往往也夹杂着另外一些有趣的东西。如旧信，残稿……有些就会引起我久久的思索。

我有个坏习惯，接到朋友的来信，从来不加销毁，有时就随手夹在书本中间。这坏习惯的恶果，在前些年可就完全显示出来了。它们落在“四人帮”爪牙手中，就变成了非凡的宝贝，成为他们罗织罪状，搞瓜蔓抄的资本。

八年前的冬天，在海滨的干校里，当我们这些“审查对象”冒着刺骨的寒风在田里苦干的时候，两位“爪牙”就坐在向阳的宿舍门口，披着棉大衣，一面负暄，一面细细“欣赏”我的日记和信件……每次路过，偶然看见他们脸上漾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时，我的心里就一冷，不知道又被他们找到了什么“罪案”，也不知道哪个朋友又要遭殃……

不过网罗虽密，漏网的鱼儿也并不是没有。这次偶然发现了一封永玉给我的信，看看邮戳，还是1957年3月11日寄出的。信里还附有一幅小画，是应我的请求，为我打算结集的一册散文所制的封面。画面写的是一个少数民族少女用担筒汲水的一刹那。不用说，这张画是白画了。它幸而逃脱了“爪牙”们的眼睛，不然在“黑画”展览里，大约是会占一席地的吧。

今天，我就要求编者将它发表；同时也希望它仍能作为封面，给我带来光宠。永玉的信，我也想抄两段在这里，今天看看这些历史的陈迹，可能也是有趣的。

封面画了几张，选一张，由邮挂号寄上，附信寄上的，只是给您看看，请不必考虑派用场。

……

上课把人累得厉害，今年只刻过一幅小木刻。暑假回凤凰一事亦因旅费过巨，不成行了。但颇想您们二位能到北京来玩一趟。

我的生活较单调，少出门。在家做不了什么事，功课忙且烦，到了一趟学院，回来也就晚了，有机会做专业的或可好些。

想来上海一趟。想虽想，是很难来的。

今天，画家的这些苦闷，大抵都不存在了。想到这里，不能不深切感到政府为文学艺术工作者带来的温暖。

写到这里，我还想将永玉给我的一首词抄在下面。我希望能得到他的同意。

与裳兄久无音问。月前至际垞处，得见一函封为裳兄笔迹，惊喜失态。忆一九四七年曾相约裳兄同游姑苏，惜稿费为绿衣所误，未能成行。今与梅溪同来，思及旧事，不禁怆然。以金缕曲记之。

年少风情惯。太疏狂，每误青蚨，负我游伴。木叶秋光三十载，涕泪平生抛贱。依旧是缸酒呼唤。问姑苏，长街水巷，谁记得慷慨林冲传？过阊门，愁肠断。有情莫怕朱颜变。小百年，两岸猿声，芥舟如箭。划到绝处愿是梦，梦也烦听归雁。曾几次船头站遍。如幸逢纳兰太守，且看我拚醉倾巨盏。君安否？问来燕。

永玉癸丑初冬于苏州南林旅舍

这是用小楷写在一张皮纸上的小条幅。癸丑是1973年，正是风雨如晦的

日子。永玉从苏州来沪，我从干校回来相见。拿到这张词稿时，读了，半晌没有话说。接着永玉就和我大谈其当年同游苏州不果之事，我却一些都没有印象了。永玉当时在上海靠卖画为生。所谓画也只不过是木刻。我则是他的大主顾。说也可怜，在报上发表一幅木刻，大约也只能换得20只大饼吧。有一次我做成了他一笔“大生意”，请他刻了一大批“头花”，给副刊作装饰。在他词里说什么为绿衣人所误，怕也是冤枉了邮递员。我怀疑那笔能玩一次苏州的“稿费”，根本就是虚幻的。

永玉是绝顶聪明的人。记得那次他告诉我，在干校时，夜里在被筒里用手电筒偷读唐宋词的故事。这首金缕曲填得好。好就好在写出了1973年秋人们的沉重的心。这可不只是一个两个人的心。同时词里又是洋溢着乐观的调子的。正如永玉当时也还是滔滔不绝地说着的无数绝妙的笑话。他对那一切，是充满了蔑视的。

这以后，紧接着就是那场铺天盖地的“批黑画”运动。又是长久地没有消息。又过了些时，他给了我一大幅荷花，这可真正是一幅“黑画”。在风雨如磐的荷塘里，在枯枝败叶中间有三朵大红荷花，花瓣上钩了金。画上有小楷长跋，大大称赞了一通《红楼梦》里林姑娘所激赏的李义山的诗句，留得残荷听雨声。

这以后，又是“久无音问”。不过和过去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可真正是值得高兴的事。庄生有言，“泉涸，鱼相处于陆。相濡以沫，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于江湖。”

相濡相煦的日子是值得怀念的。可是到底不如大家在四个现代化的江湖里“相忘”的好。

## 阿英的一封信

这次收回的藏书中有几册阿英的著作，但六七种大部头的书都不见，这都是他签名见赠的本子，是很可惜的。阿英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终于死去。在他逝世之前，始终没有能看到收回被抄去的藏书。据说陈伯达得知阿英“靠边”的当天，连夜派了车子到他家去把所有的善本书劫去了。陈伯达是知道阿英的藏书情况的，因为过去阿英曾接待他参观过。陈伯达和那个与林彪、“四人帮”有着密切关系的“大人物”就是这种挂着“风雅”招牌的大坏蛋，他们的行径比起钤山堂主人严嵩来是尤有过之的。像《一捧雪》那样的故事，三四百年以后还依样重演，不能不说是一件触目惊心的事。

阿英在文学研究上的业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新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新文学大系》中的史料索引卷就是一个证据。他收集的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出版物是非常丰富的。抗战中他出走苏北根据地之前，藏书都留在上海，后来全部星散了。有一个时期，上海的旧书店、旧书摊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藏书，书上都钤有一方《阿英》两字的朱文小印。我也曾买到过一些，可惜的是当时没有有力而又好事之徒为他抢救下来。

解放以后，阿英的研究兴趣似乎已经转移到戏曲、弹词、版画和晚清文学、社会史料方面来了。虽然多病，而兴致一直不衰。这次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他 1961 年给我的一封信，也要算是不无价值的史料了，现在就摘抄在下面：

很久想写信给你，却拖了下来。

大样转给郭老（他在地休养）后，昨接他回信，说“勉仲一文很好，一文，尚值得商榷。焦理堂《云贞行》是否作于乾隆五六——五七年，未见原稿本，不敢肯定。稿本不知是否焦之亲笔。如为别人所抄，则纪年未必可信，不然，何以刻本《雕菰集》却无纪年的”。另一名字我看不清，故以代。不知你能代查讯一下否？

《绘声阁正续集》（我有正集），《碧城仙馆集》（他已看过，但没有见到原刻），已转寄郭老，并请其翻阅时小心。他带回后，当即日寄回给你。

.....

近来工作情况如何，极念。何时还有机会偕尊夫人北来一游否？

数年来一直在病中，近已能开始工作。买书癖日甚，数年来，已聚鸦片后清人集五千余种。戏曲可说无所得。弹词近又续收乾嘉本及旧抄本，但来源似甚枯竭。不知沪上情况如何？如时逛书店，不知能否代注意一下。

我的地址你可能记不得了。是北京交道口南棉花胡同甲二十四号。

匆匆即请

双安

英十六日

这是我们分手七年以后的第一次通信。当时郭老正在以很高的兴致研究《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而我正好藏有端生妹长生的诗集正续集，为“织

云楼台刻”的两种。就托阿英寄给郭老，后来郭老又写了一篇长文论定。那两本“合刻”是在来青阁买得的，已经蠹吻如丝，郭老在阅读过程中还手为粘补。现在这两册书，却已有目无书，不知何往了。

1954年我曾到阿英的棉花胡同住所去访问过，他以非常好的兴致搬出书来给我看，记得看了许多明刻本，留给我颇深印象的是，其中颇有一些是他在新四军转战苏北时，抢救下来的。由于时间匆促，没有能够看到他藏书中的精品，我想，他的“善本”，不一定是明刻本，倒应该是晚清罕见的别集和俗文学史料吧。但陈伯达之流是肯定不会理解这一点的。

到了1962年，他还有那么好的兴致搜书，“书癖日甚”，这一点确也不易为人们所理解。我希望将来他的藏书能集中在一起，作为一个专藏，将是给他留下的一个很好的纪念。

## 《革命者的乡土》

从发还的藏书多半只是零星小册，而开本大、册数多的，就往往“迷失”的情况看，“四人帮”的爪牙们的取舍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在他们的头脑里起决定作用的，恰恰是那个该死的“价值规律”。当然，书，不过是印上了黑字的一堆纸而已，就是论斤，也是大的、厚的、重的价值来得高。这是除了白痴都明白的道理，不必大惊小怪的。

不过在留下来的小册子当中，却正有所十分爱重的东西在。一本《革命者的乡土》，1946年6月时代社出版的，就是不折不扣的一本小册子。扉页上有作者1947年11月在上海题赠的手迹。这正是我们的“论交之始”，距今已是31年了。我们是同行，也是同道，不过那时我已被打破了饭碗，而他却不曾。我读了这本小册子，产生了一种肃然的心情，就保存了起来，和一些喜欢的书本放在一起。这次又重翻了一遍，这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历史，不过肃然的心情依旧不曾改变。

同一作者的诗集《往日集》，印成于1961年，纸墨讲究得多了，不过依然是一本小册子，所收的诗也还是以40年代的作品为多，这次也一起回到我的手中，那么就与《革命者的乡土》作伴，重新藏在书柜里。

商务印书馆出过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装制颇精，也全是小册，这次回来了三本。朱自清的《你我》，卞之琳译的《西窗集》和郑振铎的《西行书简》，全是我喜欢的书。特别是那后一本。记得那是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不久，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打听到郑振铎的住址，就跑了去访问。果然在静安寺“庙弄”的一座小洋房里找到了他。这是第一次相见，也并无介绍。他穿着一身半旧的西装，就在他家的小花园里和我这个年轻的读者谈话，我说完了准备好的几句话以后，就从袋里摸出了《西行书简》，请他题字。他就站在花园里，取下钢笔在扉页上写道，“旧游之地，今已沦为狐兔之窟，何日得重游？郑振铎。”他那“龙飞凤舞”的钢笔字，特别显露出一种凌厉之气，使我今天还能记起当时被激起的敬佩之情。

.....

书的故事是说不完的。这回真的是写倦了。且待下次有机会再接下去吧。

（注）《革命者的乡土》、《往日集》，陈凡作，为通讯集和诗集。

## 日记·日记文学·

### 日记侦察学

多年来的习惯，临睡之前，枕侧一定要摆几本书，好像不翻看几页，总不肯安然入梦。有时白天有什么事，当天的报纸有重要的文章来不及看，想在枕上补课，但效果往往不好。不是失眠就是弄得头脑发胀，引人入胜的小说也要不得，它会使你不能掩卷，就算下了决心熄灯，也还是要辗转反侧……我的经验，枕上读书，最好是短篇的散文、杂文，郁达夫的日记尤佳，简直是找不到更好代替物的了。

达夫的《日记九种》和后来的《达夫日记集》我都是多次读过的。说来可笑，二十多年前要写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文章，缺少参考资料，达夫日记就曾帮了大忙。这怕是无论谁也想不到的。

不久前遇见刚从富春江上归来的苗子，闲谈中听他说起，达夫的日记手稿还安然保存在富阳的老屋里，由他的儿子珍藏着。最近这日记曾整理了一些陆续发表在浙江的刊物上，我曾草草翻阅过一点，说不出什么。据说，这日记的原稿和《日记九种》中所载，颇有不同。原来，达夫在发表之前，是曾加过工的。我这才恍然大悟，仿佛摸到了从“日记”到“日记文学”的途径。达夫先生在《再谈日记》一文中说起他发表自己日记的经过时，也没有透露这一节，这就使我非常高兴，因为又学到了一点过去所不知道的知识了。

日记，大抵总是写了给自己看的。不过当然也有例外。有些作者，当下笔之初，就已经打定了传世的主意了。如李慈铭，当写好了半年或一年的日记，就装钉起来，准备旁人来借抄。不过《越缦堂日记》里常常会遇到大片大片用墨笔涂得一塌糊涂的地方，使人看了气闷。可见他老先生在借出以前，曾经仔细地检查过一番。这可不是我心目中日记的正宗。此外，如曾国藩的《求阙斋日记》、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大抵都有类似的气味，不过这些到底都是名人，他们日记的手迹，也都早已影印出来，而且研经治史，朝章国故，以至封建教条的种种内容也各已辑印行世，当然也都是有其参考价值的。但这毕竟不是我所向往的读物。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日记竟成了一种危险的恶习。特别是过去 10 年，不少人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往往只不过是在日记里被发现了什么把柄。因为是白纸黑字，是定罪的头等证物，因此也更为某种人物所重视与欢迎。如此这般，我发现，一门崭新的学问，姑且名之为“日记侦察学”吧，已经产生。这确实不是我的耸人听闻，而是有确凿的事实根据的。

我是有写日记的“恶习”的，而且也已持续了数 10 年之久。解放前写日记，虽然因为年轻，阅世未深，不知此中利害，但到底心存顾忌。即使如此，今天看来，违碍之处着实还是不少。但上帝保佑，竟平安地保存下来了，没有出什么乱子。解放以后，放心大胆地记日记了，每年总有一本或几本。除了日常活动，书信往来，也记些读书笔记，创作意图，山川风物，文物图书。在我，是记得津津有味的，自然做梦也想不到有出版或辑录成书的好运。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奇怪，这些日记，十年前的一天，一古脑儿被拿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英雄”们发现它们时得意的神色。当时我还奇怪地想，这又不是银行存折，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可证执迷不悟之深。

不久以前，这些日记又回到我的手中了，足足装了一麻袋。有趣的是，

每本日记中，都有几十百条夹签，上有红笔批注；在日记里面，又划满了红杠子，也就是夹签指出的要害所在。每本日记的封面上，都贴上一张纸，上写编号、年月、“已抄”等等字样。此外，就又发现了扎得整整齐齐的一大捆“抄稿本”。这就是根据夹签的指示，恭楷抄下来的分门别类的“日记摘抄”。这实在不能不使我惊异、佩服，而且感激了。真是做梦也不曾想到，竟变成了如此伟大的人物。在“四人帮”的爪牙们看来，我大抵是有被“宣付国史馆立传”的资格的。不知道到底应该放进“黑帮传”还是什么传里，反正是一展卷而材料皆备矣。真是不胜其惶悚屏营之至！

至今我还不忍擅自整理，夹签也一张都不敢抽去，也没有时间仔细研究。现在只能举几个例在这里。如日记中记与友人吃饭，就被归入“腐化生活”类；有记买书事就归入“进书”类；（按，这是执行那个所谓“理论权威”的“指示”，搜集我“以伪乱真”的“罪证”的。）记写了什么文章，就归入“炮制毒草”类；记采访荣德生、郭棣活事，就归入“吹捧资本家”类；出版了一册新书分送朋友，就批“从赠书名单看黄的关系人”……我只不过多少翻了一下，就发现我的平凡生活竟是如此丰富多彩！真使我开了眼界，重新发现了自己。

从一个角度看，这正是新兴的“日记侦察学”的发展与实践的一个好例。那用心之细密，分类之严谨，着实使人吃惊；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四人帮”的道德观、是非观……总之是世界观的极丰富、全面的展览。我想什么时候稍有闲空，就要加以整理、研究，这是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的。这可实在并非什么笑话。

1979年3月23日

## 春夜随笔

自从“半个红学家”江青垮了台，《红楼梦》研究的空气又浓厚起来了。报刊上出现的这类文字风起云涌，有些还是煌煌巨著的摘要，殊使人有目不暇接之势。鸿篇巨制自然不是咄嗟可办的，那么是早经着手的无疑了。可见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也还有不少人闭户研究，并不跟随“半个红学家”起哄。也许，此中还有着与清代乾嘉考据之学盛行相同的因素，也说不定。

我见闻有限，消息不灵。不过也曾浏览过部分论文，有些感想，当然这只能是一个读者的读后感。

总的来说，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比过去大不同了。对曹雪芹的家世，已经探索到他的远祖；通过几个古钞本的比勘研究，探索原本面貌的工作，也有人着手了；对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研究，也铺展得较宽了；有关作者传记材料的新发现，也时有所闻，而曹雪芹的文学传记也开始出现了。连曹寅的《楝亭集》也已影印出版。至于分析研究作品人物、创作思想、文学技巧的文章就更多一些。当然不能说全部都是精彩之作，这怎么可能呢？不过质总是建筑在量的基础上的。如果只准许一两个人发言，而且声明只有这才是惟一正确的，那可实在危险得很。万一这不幸而是昏话，后果如何，不问可知矣。盖不只“红学”一事为然也。

如果要说一点意见的话，那么我想指出，有些论文，水平是不能说怎样高的。例如有的作者在研究有关《红楼梦》研究中的“随笔论著”，这自然是很好的。但所举出的不过是几种极少参考价值的小册子，而且花了很多篇幅来介绍那些明明是无聊、荒谬的论点。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又有人重新提出了，但说来说去不过是重复十多年前已经提出过的论点，使人读了意兴索然。有些学术刊物，好像不编入一两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就不够时髦似的，但后果如此，不能不使人感到白报纸确也使用得可惜。

清初禅悦之风和《红楼梦》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是有的，可能还很密切。这是个出色的研究题目。从作者排列的目录章节看，也是很吸引人的，但读下来的感觉是有如在灵隐山门外面摸了一下冰凉的石柱础；蒙眬地望了一眼大殿的影子，终于没有能得到些微向往已久的知识。只好叹口气，废然掩卷。此外，还有一些过于“高深”、“细腻”的考证之作，是我所看不懂的。当然也要怪自己缺乏闭户读书的功夫与耐心。这样的研究也许是必要的吧，但可以大胆地说一句，它与大众的关系是不大的。

由于读者对曹雪芹的尊敬与因此而产生的关心，有关作家的遗事、遗物、遗作……一直成为研究者搜求的重要目标，而这种搜求是日益困难起来了，因此凡有发现，也必然要引起注意。在这方面吴恩裕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30年来，他曾提供过不少有关资料，至今还为研究者所运用。最近的消息是他又有新的发现了，曹雪芹的遗稿和遗物。不过对这些发现目前正在进行着颇激烈的争辩，真伪尚无定论。不过这种争论究竟还是比较实在的，不那么虚无缥缈，因此读者是多的，也更为人们所理解和关心。此外，就是所谓大观园的遗址，也是争论得非常激烈的问题。我见过一篇有趣的论文，是反对大观园实有其地的。当然这也是一种意见，说出来也并非难事，但文章却花了极大力气，从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起，下至《大观堂文集》、《大观录》……凡有“大观”字样者一一排比而罗列之。其实这对作者的论点并无若何关涉。而且我想，这种排比，也肯定仍是挂一漏万的。我看，这倒应该



算是《红楼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别格。

《红楼梦》研究成为一时风气，人人争作红学家，这自然是一种盛况。不过作为一个读者，我想冒昧地提出更加切实些的要求，避免花拳绣腿，虚饰浮夸；少争个人闲气，多下实在功夫。学术文章，特别是“红学”，不一定非得做得那么神秘、复杂不可。科学研究是需要深入、细致下去的，但绝非“八阵图”，使读者进去以后就钻不出来，难怪有些人只是在阵图门口探头张望一下，立即避开了。大概这并非作者的本意，不过也难说，可能倒正是本意也说不定的。

以上，只是一些极为粗略的印象，也一直不曾有过写下来的意兴。同时，也没有看到过有关《红楼梦》研究风气、趋向的意见。最近，先是从报纸上得到介绍，继而从《北方论丛》上读到了戴不凡《揭开 红楼梦 作者之谜》的文章，这才深切感到我所一直抱有的某些“隐忧”，确已公开化了。因为论文作者不但提出了新的论题，而且表现了空前英武的姿态。他宣布过去的《红楼梦》研究，有的“大概也就全部完蛋”，有的就该“相应予以报废”，有的要让它们“见鬼去吧”……而他的论断将使某些研究者“满头冒汗瞠目结舌”或“暴跳如雷”。总之，在他看来，干脆彻底得很，包括我上面所列举的那些研究文字在内，统统无非是“胡（适）说”，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 “新”“旧”“红学家” ——春夜随笔之二

在我们的《红楼梦》研究者中间，似乎长久以来就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了。有些作者，或是自封，或经指定，是要比另一些研究者“高出一等”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个“红学家”的专称，这是个半开玩笑，带有嘲讽意味的头衔。第一个发明者大概对“小说家流”抱有一定程度的蔑视，认为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居然有人会来研究，居然又七嘴八舌弄得如此热闹，真是咄咄怪事。没有办法，跟“臭老九”一样，在九流之末，姑且为之安排一个座位，也算做一“家”。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红学家”又有了新旧之分。那标准也颇为模糊。一般的看法，是王梦阮、蔡元培等算是“旧”的，而从胡适开始，就是“新”的了。（戴不凡称俞平伯为“老红学家”，是为特例。）另外一个虽不成文但有特定意义的标准则是，凡是注意研究作者家世、版本源流，注意脂砚斋批，探索原稿、残稿面目的总都被视为“不大正派”、“邪门歪道”；只有一空依傍，专论微言大义者才是正经的“文学评论家”（他们是从不肯厕身“红学家”之列的）。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本来是非常分明的分界线竟又有些模糊起来，“评论家”也开始引用“脂批”，真是纡尊降贵，面子不小；“脂戚本”、“脂京本”……这些令人头痛的代号也在“评论家”的文章中出现了……总之，在研究工作中，较多地有了共同语言、学术交流，这是很可喜的现象。但身份还是马虎不得。“评论家”们似乎是“天生的”，写起文章来，必称对方为“先生”，采取一种“高屋建瓴”的架式，在气势上就先已压服了对手。虽然也要引用一些“红学家”发掘出来的成果、资料，但必多方表明不屑之状，反复撇清自己并不掌握任何“珍秘史料”，好像研究资料是什么不干净的事物，沾不得。当然一扭头就来夸说自己如何目光如炬，在“红学家”视而不见之处，发现了可贵的真理。这与某些“长官”以“大老粗”自豪的精神状态是有些相通之处的。至于写起论文来，无疑就要势派惊人，一鼓作气，形成势如破竹的击溃局面。

这种形势的逐步形成，大抵始于批判胡适之时，至十多年前而“发扬光大”，登峰造极。因为那时所谓“新红学家”大半都已被打翻在地，连呻吟也不敢了。

这种局面，看来是有打破的必要的。不然就谈不上什么学术民主。两年来学术界出现的一点团结的萌芽，争鸣的气氛，在戴不凡的文章中一些都不见，他霸道得比任何“评论家”还要霸道。

与此同时，在“新红学家”群中，又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文人相轻的现象。有时争论起来，竟自面红耳赤，失去常态，难道他们是百分之百地为真理而争辩么，好像又不是。在这种公开争辩之外，在字里行间，笔锋所及，更多的是“微言大义”，不是细心的读者，往往是不易察觉的。这不能不涉及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早已有之的一种并非怎样高明，也不宜全面继承的“传统”。人都希望进步，这是很好的事；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竞争，这也是必然的。大家都是“新红学家”，好像都觉得不够光彩，谁都希望能够摆脱这种身份，爬到“评论家”的高枝上去。这可能也是产生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不是“红学家”，新、旧都不够格，这不过是我的猜测。

向上，是无可非议的。向上，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因而这个“标准”就

值得研究。希望达到一个新的“标准”，同时也就希望摆脱一个旧的“标准”。是怎样的“标准”呢，这在戴不凡的文章中不是无迹可寻的。

戴不凡用来“克敌制胜”的重要或惟一的武器就是“胡（适）说”论。借了1954年批判胡适主观唯心主义的余威，把《红楼梦》研究者的工作，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有益还是有害，一股脑儿都拿来与胡适挂起钩来，使之统统具备“完蛋”的条件。也不过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

你说脂砚斋是史湘云，这是“自叙”说，是该死的；我说“曹頔基本上可以确定他实即畸笏。评（疑当作“详”）拙作《脂批考》。”这是工作需要，无可非议的。

《红楼梦》中有过这样的话，“所以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戴不凡用并不繁琐的考证方法，证明了“坐于窗明几净房子中的红学家”所不曾考虑到的事物。

“蓬牖”只能用于南方，在北京可万万用不得，要冻死的；“瓦灶”呢，那是“缸缸灶”，“是吴越贫民以及职业乞丐、小庙僧道的日用必需品。”不是“博物君子”，哪里知道得这么仔细呢？不敬得很，将这种随手点染的四六对仗句考证坐实，实在不能算是什么严肃的作法。这一切都是为一个论点服务的，是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是久居南方的，是为了这个假设而求证的需要。记得严绳孙给纳兰容若的信里就曾有嵌入“朱门”、“蓬户”的一组对句，也是用来作贫富对比的。而当时住在北京明珠室内的严绳孙也的确并未冻死，他不过是说两句俏皮话而已。

一切必须服务于自己的论点，客观实际是不必顾及的。这就叫做实用主义。

支持着这实用主义的，恰恰正是“胡适的自叙说”（即“胡说”论）这根大棒。

## 关于“自叙说” ——春夜随笔之三

先引用一点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关《红楼梦》的论述。

而世间信者特少（按指“明言雪芹之书，所记者其闻见”），王国维（《静安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歿……

又评论《红楼梦》云：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

先生此书之成，距今已近60年。在这中间，对于《红楼梦》的研究，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和论辩成果。《史略》中个别具体结论，也有些需要进行修改了。但我们所应注意的是先生立论的精神。《史略》于1930年重校刊行，先生撰有题记；《史略》又于1935年译为日文，先生为撰序文，对新发现的资料可以纠正旧说者，都声明改正，而不及有关《红楼梦》的论断。这是足以证明在先生的晚年，也依旧保持原来的论点的。此外，在别的地方，先生又曾数数批判胡适的政治立场并指摘“特种学者胡适之”的“自传说”谬见。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今天慎重的考虑。

“自叙说”，是一种从简单平实的看法发展到荒谬地步的错误论点，是应该反对的。导致这种错误论点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应予批判的。这统统没有疑义。但这不是说胡适及某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从一开始就统统要不得。这样的论者，终于还逃不脱形而上学的牢笼。而鲁迅先生就不是这样。

鲁迅根据自己写小说的经验，深信“亲见亲闻”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同时作为参考，并记下了王国维的“间接经验”说。他的肯定胡适的考证结论，也正正在此，也仅在于此。至于一旦恶性发展成为自然主义，鲁迅就坚决地加以反对，斥之为“特种学者”。鲁迅是清醒的唯物论者，他的敏锐，他的实事求是，都是最可宝贵的品质。如果我们因为反对自然主义的“自传说”，就将一切研究作者家世生平……的工作都与“自传说”等同起来，一棒打杀，事实上就连王国维也不如，不能不落入最不光彩的“境由心造”的营垒里去，成为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的对立面。

写小说不是写历史，曹雪芹也没有录像机和录音机，怎么能要求他的小说无一事一字无来历呢？

曹雪芹也不是魔术师，怎能要求他在一张手帕下面变出一座“大观园”来呢？他必须看见过实物，这才能综合取舍，创造提高。写出一座大观园，没有“蓝本”是不行的。至于这“蓝本”在北京或在南京，原型是一个园子或是多少园子的综合，这些问题尽可由研究者自由探讨，各自摆出自己的论据来。我们不是不可知论者，相信正确的结论终于是会做出的。

这些也真无非是老掉了牙的老生常谈，但今天还要来重复则是可悲的。

从戴不凡的长文里可以知道，他确是下了功夫的，还写了《脂批考》。但他在运用脂批的时候是很谨慎的。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回避的。例如和《风月宝鉴》及黄色小说都有密切关系的天香楼事件的脂批，就不引。原因何在？无非因为这些脂批说明了一个事实，天香楼事件是确曾发生过的“历史真

实”，不论曹雪芹是作家还是编辑，也不论已删的小说有关天香楼事件原文与原状有怎样的差异，都脱不了真人真事的干系，自以不提为是。“因命芹溪删去”，这种白纸红字批语，在现实主义反对者看来，是过于刺目、过于可恶了。“雪芹自叙”是该死的，难道“石兄自叙”就要得么？

戴文主张“石兄生平亦需重新研究”，我是很赞成的。只要不是信口开河，与小说产生有关的一切人物（姑且承认“石头”是个生物吧）的事情，我们都盼望能多知道一些。不过又不能不想到，还有那位“空空道人”呢，那位居然为小说改了书名的东鲁孔梅溪呢？“世法平等”，我们也要求知道一些有关他们的事情，自然愈详细愈好。按照小说的铺叙，着眼于他们与小说的关系，这些“人”的地位殊亦不在曹雪芹之下。

曹雪芹由于种种客观条件，在写作这本伟大的小说时，在笔头上是弄了不少狡狴的。我们自然应该原谅，并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我们也务必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防止走上两个极端。一方面不可将孙悟空的颈后毫毛一一当真，顶礼膜拜；一方面也必须停止“禹是一条虫”故事的重演。我很担心，曹雪芹由作家化为编辑，怕还不是最后的结局，弄不好连这个人也会考成“乌有先生”的，这可不是笑话。

1979年3月26日

## 论焦大

焦大可以算得是贾府的屈原。焦大不过为了看不惯贾门不肖子孙的行径，酒后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捆了起来扔在马圈里；又为了防止他讲出更不好听的话来，给他塞了满嘴的马粪。其实焦大的原意是要贾府好，不忍看它陷入破败的境地，动机原是可嘉的，但结果如此，因此他演出的应是一出悲剧。这些意思记得都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

归结起来就是，焦大不去为贾府歌功颂德，反而借发酒疯，暴露了贾府的缺点，实属缺德，理应得到如此这般的处分。

这是谁人的观点呢？自然是爬灰、养小叔子的那些老爷、太太、少爷、少奶奶们。下令捆起焦大来的就是凤姐。至于坐在祠堂里的太爷，怕是站在焦大一边的，但对发酒疯，可能也不大赞成。宝玉的态度不大清楚，因为他不懂“爬灰”……这些字眼的奥义，还不识相地向凤姐打听。这也是戴不凡所主张的有大小两个宝玉的一条根据吧？岂有在“初试云雨情”之后很久，还听不懂这些话的道理呢？不过也很难说，封建时代的贵公子有时确实是有些古怪的生物，很难以常理论。不是作了多年皇帝的溥仪连穿衣、吃饭还不大熟练么？这不是造谣，是他自己说得明明白白的。我想如果宝玉真的懂得焦大说的其实是什么，他也不会主张捆人，呆若木鸡，甚至发起呆病来，都有可能。当然他也不会痛哭流涕，当众检讨，或到祠堂里去请罪。总之，宝玉和凤姐是不同的。

凤姐向盘根问底的宝玉进行恫吓，不许再提了，不然连你也要打死。曹雪芹写得实在深刻，使我们懂得为什么有些人一听见写真实就要吓得灵魂出窍。老爷、太太、少爷、少奶奶们就全靠这层朦胧的、柔情脉脉的纱幕保护了作戏，雾里看花，一切荒淫无耻看来似乎都是高贵文雅的。谁来动一动他们这命根子，可了不得，他们必然站出来誓死保护，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行为。

凤姐下令原不过是“捆起来”，塞上满嘴马粪可就是站在一旁的小厮们的发明创造了。这一创造也实在不能不说是天才的。不过无论怎样天才横溢，小厮们还想不到要切断焦大的喉管，看来这只有归因于“时代的局限”了。

1979年9月5日

## 话说乌进孝

《红楼梦》第53回上半写“宁国府除夕祭宗祠”，是小说前80回中最有艺术光彩的篇章之一。可以说是笔酣墨饱、仪态万方。细节安排极为精妙，使用非常简约、精确的笔墨，写出了十分繁富的内容。不只限于出色的平面描写，更具有厚重的烘染暗示效果。至于人物的生动凸现，语言的神情逼肖，在全书中也应该算是最出色的部分。

前些年，这一章曾特别受到了重视，也遭受到可惊的歪曲。除了别有用心者不论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出于许多人的焦急。写下满纸富贵繁华、儿女嗔痴的曹雪芹，为什么不写“阶级斗争”呢？为什么还不正面描写农村中的斗争场面呢？等了好半日，到底盼来了一个乌进孝，一个贾府田庄的奴隶总管，怎能不高兴，惊呼，吹捧……这一切原是可以理解的。

像乌进孝这样的人物，在清初人的文集、官府案卷、甚至戏曲小说中间，原是多次出现过的。但足以使人念念不忘，成为一种艺术典型者，还只有曹雪芹笔下的这一个。贾珍，无疑是个大大的坏种，但他也有道貌岸然的一面，他训斥贾芹的一场，就是最好的标本，但又绝不同于贾政。贾珍对“老砍头的”乌庄头的几节话，那身份、那口吻、那志得意满，真是活画。曹雪芹写贾珍倒背着两手，细看由贾蓉展开捧起的红禀帖时，那神情，简直就与京戏“法门寺”刘瑾从贾桂手里看状子一般无二。伟大的艺术家曹雪芹早已把表演艺术家在舞台上创造的身段、神情，移到纸上了。

“又来打擂台了。”“不和你们要，找谁去！”只是寥寥数语，实在也并未吹胡子瞪眼，但那效果，不是远较用“三突出”法造出的“阶级斗争”高出万分么！

在这“闲闲写来”的一节中，又写出并暗示了多少内容呢？皇家“恩赏”的作用、光禄寺“穷官儿”的觊觎、贾府请吃年酒的排场……以至铺在石阶上的大狼皮褥子等等。作者特别着意透露的是已经走在下坡路上的贾府现状。凤姐与鸳鸯设法偷老太太的东西当当的绝密小道新闻的传播，和贾珍的估计，极巧妙地暗示了贾蓉与阿凤之间的关系。这一切，正如古代文学评论家所说，“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实在是妙透了。

至于乌庄头的那张单子，当然也是十分珍贵的，不过那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加注意的事物了。

以上，就是我对这一章节的内容深度的极为浅薄的蠡测。同时也觉得，怕不一定只有细节描写一种方法才能达到反映现实的目的。特别是在作品的具体结构要求有所限制时是如此。

1980年1月22日

## 古槐书屋

古槐书屋是俞平伯的书斋，知道的人不少。不过他曾有《古槐梦遇》一书，由世界书局于1936年出版，恐怕收藏者就不多了。世界书局是很少刊行新文学作品的，这也是此书不为人注意的一个原因。书刊行后不久就抗战了，这就为它的流传带来了极大的限制。全书收近似语录的100则纪梦小文，前有序：“梦醒之间，偶有所遇，遇则记之，初不辨醒耶梦耶，异日追寻，恐自己且茫茫然也，留作灯谜看耳。古槐者不必其地也，姑曰古槐耳。”可以见其风格之一般。其中也颇多辛辣语，不一定全是“闲适”的东西，如第19则云：

站起来是做人的时候，趴下去是做狗的时候，躺着是做诗的时候。

看来这也不大像是梦话，书的扉页上又注明曰“三槐之一”，其余二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又收到过一本《古槐书屋词》，是一本木刻的小册子，大约只有二十几页，由作者手写雕版。也是少见的。

此外又有一本《遥夜闺思引》，恐怕流传就更少。这是作者的一首五言长诗，通3700余言，前有自序。全书由作者用极漂亮的小楷写的“仿绍兴本通鉴行格”的纸上。卷尾题“岁次乙酉九月二十四日写于北平德清俞铭衡平伯”。自序后钤一印，白文，“僧宝”二字。此书于1948年在北平由彩华印刷局用玻璃版影印，不过用的乃是洋纸，而装订法甚古，用黄丝线于上下串订，可以说是相当别致的。记得我曾向作者购买初版、再版本各一册。现在手头只剩下1948年5月再版本一册。再版共印300本，价12万元。

诗写得极美，小序用四六文。这些姑不论。我从此知道他写得一手极美的褚河南《枯树赋》。真是漂亮透了。因此前后请他写了大小若干张字。可惜一张都未剩下，而仅存的一张条幅则被“英雄”们在那上面打了一个大大的红笔叉子，不能裱了。这怕是代表了若干年来对俞平伯的评价的吧。

解放以后，俞平伯大概只出过一本《红楼梦研究》，而此书正是一本著名的书。我还藏有一本，未遭祖龙之厄。我还存有一封他1950年11月2日的来信，信中说：

《红楼梦辨》拟改版，名《红楼梦研究》……先君于上月十二日逝世。弟本无心做文，但与出版方面既有成约，不得不勉力删改旧稿也……弟俞（在苦）平伯顿首。

这封信恰好说到《红楼梦研究》，而且记下了俞陛云先生逝世的日子，应该是有些文献价值的。1954年秋我偕内人到北京游览。友人在全聚德请吃饭。俞先生恰在隔座单间内，曾一招呼。以后不久，以他为靶子的大批判开始，从此就更无音问，以迄于今。

在手边又找到几封他的旧信，都是解放初期所寄。当时我曾向他数数约稿，结果却寄来了三首绝句，是写在洋纸上的。也还是颇认真地用了《枯树赋》的字体写成的。他在信中说：“近少作文，却多赋旧体诗，亦可笑也。”又一信则说：“弟近来颇作诗，皆七言绝句，以文章不大好做，非诗兴之佳，实文思之窘耳。承加谬赞，如何如何……尊嘱写件可如命……惟先生于海王村肆访得之佳楮，乃以鸦涂浣之，岂不可惜欤。盖旧制笺纸，实用一张少一张了。”

记得我寄给他的是在琉璃厂买到的“内用”笺。那是一尺来长的镜面高丽发笺，折成几叠，装在特制的小封套内。据说是乾隆时物，是“十全老人”



用来做便条的。当时市价大约是一元一枚。这张字写得颇精，现在是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

1979年3月31日雷雨之夕

## 碧藻馆

碧藻馆是傅惜华的书斋。惜华以收藏戏曲小说，特别是附有精图的本子著名，他的收藏在近代藏书家中间是有重要地位的。

搜求古本戏曲小说的风气起于五四运动以后，在北方，最早注意及此的是董康，他的《书帕庸谈》是最早出现的专门性的著作。其后有陶兰泉、王孝慈、马隅卿诸位。在南方，就有吴瞿庵、郑振铎、周越然等。

惜华久居北京，他和哥哥芸子都努力收藏俗文学书。解放后惜华入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元明杂剧传奇著录方面写有专著。我承他招待曾到碧藻馆看过他的收藏。和马隅卿的“不登大雅之堂”一样，惜华的藏书中也有一大批所谓黄色书，上海的周越然也是如此。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史的资料，这些东西自然也有它们的文献价值，应该收集保存的。事实上，这种书艺术价值较高的是很少的。大部分是千篇一律，不近人情，只要翻看一两本，就早已知道即将出现什么花样，味如嚼蜡的事物。真正是典型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有一种名为“性心理学”的科学分支，好些年没有人提起了。著名的英国学者霭理斯的七大册巨著中就采录了不少实例，有一些也援引了文献记录，据我多少年前读后的记忆，那内容实在远不及我们的同类作品的奇突和花样繁多。如果外国学者能看到这些作品，大抵是会为之惊异的吧。这些作者的变态心理活动，明白无疑都是社会压抑的结果，不过其反射采取了特殊的渠道形式而已。

写到这里是必须有例的。那么就举一二。

有一种著名的《素娥编》，本来是周越然的藏书，后来转归惜华了。这是万历刊本，长方板框大册，人物都是“长身玉立”，与《人镜阳秋》的风格相似，而实不太精。前面有小引与近似唐代传奇文的故事一篇，插画就是故事的图解。这是极有名的“宝书”，我有幸得见了，其实也不过如此。

另外还有几种棉纸精印的大方册页，却实在是精妙绝伦的版画。这是万历中新安刻工最精的作品。左图右文。题辞用四体书写成，形式有诗、词或小记。画面出于技巧高绝的画工。与通常此类册页不同的是，故事展开的场合，绝非通常的庭园居室，而是更为平凡也更显露了非常特色的普通生活场景。记得其中一幅是描写渔家生活的。在芦苇丛中，一叶扁舟之上，天空悬着一轮素月，环境的描绘极幽美。无论怎样的事物，在这里也就完全净化了。这确是艺术精品，虽然是不能公之于众的。我自己也有同样形式的出于新安诸黄之手的万历刻本，但内容却不同，是《罗汉十八相》。可见当时这种形式的画册也是颇为流行的。在画工雕手看来，降龙伏虎的道行与“妖精打架”也并无任何高下文野之别。在俗人看来，大约是不可思议的吧。

惜华告诉我，这些画册，都是从北京的旧典当里买来的。它们有一个专用名，曰“避火图”。往往被供奉在帐房内隐蔽而神圣的地方，据说可以防止对当铺说来最可怕的火灾。藏有这样“宝贝”的典当大抵都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店主与朝奉大抵是安徽人，他们就从家乡带来了这种作厌胜之用的版画。中国的火神也是道家的好朋友，不愿看见不登大雅之堂的事物，人们利用了火神爷的这一洁癖而获得了意外的平安。这种“常识”好像过去的书本里还不曾记载过。

惜华是有高血压的。久久得不到他的消息，存亡莫卜。最近向北京来的朋友打听，才知道他已故去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倒还是平安的，

书籍也没有损失。但在他死后不久，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几部卡车，把所有的藏书，当然也包括那几卷“避火图”在内，片纸不剩地统统运走了，至今一些都不知道它们的下落。朋友过去曾听惜华说起，康生是常常到他家里看书的。因为这位“理论家”也在“研究”《西厢记》，惜华还曾将一种罕见的《西厢》刻本送给他。“碧藻馆”藏书的踪迹，看来大约可以从这里找到。

1979年4月2月

## 《版画丛刊》及其他

下面是阿英 1954 年 11 月 25 日给我的一封信。

《猎人日记》收到，深谢。

以为还有机会和你们夫妇同游碧云寺，没想到你们竟未曾留，殊以为憾。

不知最近仍有机缘来京否？

其实最近几天，我倒逐渐闲了。

有两个问题想和你谈一谈。

你们编的版画究竟是否出版并出下去？我主张最好能印出。前嘱作序，我早告惜华同志力不胜，他说供给全部材料，我答应代为整写。后来问他要材料，他又说没有，我就无从下笔了。也许我当时听错。我意只要有一个简单例言，也就可以了。若决定不出，我认为与出版家也应结束一下。不知以为何如？

尊藏女性词集，不知是否将罕见者开示一目，李一氓同志很想看看。

兄常跑书店，我很想找几部光绪同文印本的小说，如《水浒》、《红楼梦》之类（有石印图的），因为想搜集一点石印插图材料。我现只有《聊斋》一种。光绪其他有好插图的石印

书也想选存一点。望你为留意。同文《三国》也要。北方很难找。如有，望将书价示知，当即寄来。本子，至少图页要干净一些的。此事不必急急。

最近有何著译？精本小说、传奇，有所得否？

请代问你爱人好。匆请俪安。 阿英

十一月二十五日

1954 年秋天，我和妻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遇见许多朋友，那些日子是过得很愉快的，至今想起也还难以忘记。阿英先是在缀玉轩里遇见，后来又招待我们吃饭，还约我们一起到西山去看红叶，但我们终于没有践约，就匆匆回沪了。阿英是我所尊敬的前辈，年纪也要比我大好几岁，但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前辈的架子。他是极诚挚的人，有时甚至使人觉得他忠厚得过分了。其实他革命半生，在旧社会过着长期艰苦、危险的战斗生活，理应“深于世故”了，至少是有些警惕性的吧，可是并不。在这封信里提到的编印版画的事就可以作为很好的例证。

我在北京时曾到傅惜华的“碧藻馆”去欣赏过他的藏书。惜华是缀玉轩的旧友，我在梅家与他相识，早就知道他是有名的藏书家，他收藏的明刻戏曲小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藏。我几乎看了他所藏全部插图的本，真是为之震惊了。当时郑振铎编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早已出版，这是一部开山之作，所收之富和印制之精都是了不起的。但由于此书编刊于抗战中，北方的私家藏书没有能充分利用。因此惜华的藏书几乎都为郑氏图录所未收。我当时年少气盛，也完全没有考虑许多复杂情况，就贸然提议将这些精美的古版画编为《版画丛刊》，陆续印行。大致以新安、金陵、杭州……不同地域的作品为经，以时代先后加以贯串。并无另起炉灶编为全史野心，只想早日把这些珍贵资料提供出来，使之化身千百，可期垂远。惜华慨然赞同。我提

议请阿英写一总序，因为他是内行，同时也是极有资格的美术史论的作者。我以为我这想法是不错的。阿英是谦虚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匆促中不可能进行全面的论述；材料固然丰富，但还不能说是全面的……这些因素他都考虑到了。即使如此，他还是答应有了材料，来做整写的工作。这就说明他没有任何个人考虑，他盼望此书能够刊行，甚至比我们还要焦急。

后来我们接受了他的意见，把简单的例言，化为在一定程度上详悉的提要，尽可能使之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深度。稿子写好了。珍贵的样书也寄来了。一起有十大大包，而且都是头本，也就是全部精图所在的卷首。微型照片也拍好了。我和出版家交涉了很久，跑了不知多少趟，但最后也还是不成功，终于功败垂成。甚至直至最后我也没有从出版者那里得知明确的印或不印的决定或理由，每次都被一副笑嘻嘻的面孔挡了回来。今天想来，我原应早就悟出那道理了，但当时就是那么天真，那么一厢情愿。今天想来，阿英对我的依赖，也实在使我感动，他的天真也不下于我这样一个幼稚的年轻人。后来我将一包包书样重新寄回给惜华，再一次欣赏那些珍贵的古版画时，那种憾惜之情，到今天也还是如在目前。更令我抱憾的是辜负了阿英真诚、善良的热望。他自己，还为搜集石印的插图资料而独力奔忙着。比起明刻版画来，晚清石印插图算得了什么呢？这就是我当时的看法。我是应该在前辈面前脸红的。因为没有这些“晚近”的资料，也就没有了完整的插图史，我竟连这样基本的事实都没有认识。

1979年4月1日

## 往事回忆

在信堆里又找到了两封阿英的旧信。窗外下着淅沥的春雨，灯下独坐，翻阅着这些发黄变脆的纸张，蓝墨水早已变黑。我于是想到，日子像流水似的过去，一转眼已经快 30 年了。

我还是想把它们重抄下来。

《西厢记与白蛇传》收到，谢谢。前寄金石书一帙，亦收到，迄此补谢。

《曲品》原稿，前在文物局见到。兄将此记发表，真是功德无量，惜论断评介未能全部发表。不知你曾否录有副本，如有，甚盼能一借抄也。（如有并可以，请交慧珠同志，她今日返沪，二十后来。）（到后一周，即可寄回。）

前托之方所觅，系嘉业堂本《武梁祠画像考》，后又托人在苏寻觅，亦未找到。拟托兄代为留意买一部，需款请随时示知即寄上。

不知你何时能再北来了。

一年来写了一部反官僚主义的话剧——《模范段》，除此发表了几篇研究性的东西。最近写了一部《中国年画发展史》（人民美术出版社）。下月，拟从事第二话剧写作。此外别无可告。

姬老想常晤见，看通讯，你要去体验生活，不知何时离沪？勿此敬礼。

弟阿英

八月十三日

此信写于 1953 年。信里是有一些故事的。我买到祁彪佳的《曲品》、《剧品》原稿后，先将摘要发表在《西厢记与白蛇传》里，作为附录。随后就将原书赠给了北京图书馆。阿英说他在文物局看到此书，那是在团城郑振铎的办公室里。阿英、西谛都是古本戏曲的热烈爱好与搜集者。《曲品》的出现引起他们怎样的狂喜是可以想象的。他立即想要借抄，拳拳之心，到今天也还灼然如见。我的校注本，在两年后也印出了。当时曾写信告诉他。我知道，这书寄到北京以后，必然是当做宝贝“深锁琅嬛”，无论谁想借抄也很困难，那就还是先设法印出为妙。

《武梁祠画像考》是《嘉业堂丛书》的一种，不知何故，流传极少，我终于也不曾为他找到。嘉业堂是刘承干的藏书处。鲁迅先生曾称刘为傻公子，虽然行事有许多可笑之处，但他确也刻过一些别的聪明的阔人所不肯刻的大书。这就是傻公子的可爱之处。

从这信里特别使我感动的是他那生气勃勃的战斗、工作精神。他当时担任着全国文联极为繁重的工作，可是写了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剧本，还想另写一个。又写成了年画史的著作，还在搜集汉画像，戏曲资料。真是了不起旺盛的精力和工作意志。从这里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 1953 年老一辈革命作家的精神面貌吗？这种极为可贵的精神面貌在不久以后就开始受到摧残，到了十几年后索性被彻底搞垮，终于只剩下了魔鬼的舞蹈了。

信里还提到了言慧珠。

慧珠的追悼会是前些时和徐森玉等五位合并举行的。那天我去参加，大

厅里已经挤不进去，只好站在门口“吃柱子”。面前的柱子上就正好挂着姬老写给她的一副挽联。我一直念着挽联上“惊变埋玉”、“还巢失凤”的字样，望着厅里挂着的她的照片，听着悼词，想起了许多事情。慧珠当然够不上江青所鼓吹的什么“高大完美”，不过作为一个演员，她是优秀的。她聪明，肯向前辈虚心学习；她继承了梅兰芳身上的某些可贵的艺术素质，她也有自己的特色，不过还来不及凝聚、融化，形成自己的风格就去了。而且去得那么凄凉。听说她是在某一天受尽了侮辱折磨之后，回家，上理发店，上饭店，回家，盛装，然后……“惊变”、“埋玉”不只是她曾演过的两折曲子，她的结末，也和“埋玉”里的杨玉环没有什么两样。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女吊》里的几句话，觉得好像正是说的她。

1979年4月1日

## 陈寅恪

中国历史学界，曾经有过著名的南北二陈。北陈是陈援庵（垣），却是广东新会人；南陈则陈寅恪，江西义宁人也，晚年则久居广州。所谓南北，可能是指他们掌教登坛之地而言。两位陈先生都有专精的学养，门弟子满天下，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有深远的影响。现在两先生都已谢世，虽然晚岁荣枯颇有不同，不过现在都已得到正确的评价，遗著也都先后陆续刊行了。这是使人非常高兴的事。

抗日战争中，寅恪先生辗转来到昆明教书，援庵先生则留居北平，著作不辍。所作多含有深痛的民族意识与家国之感。其《明季滇黔佛教考》一种，于1957年重刊。前有陈寅恪所撰一序，重刊时照样收入。其时援庵已参加中国共产党，而寅恪方大受批判。我得读此序，深感援庵先生的风义，同时也发现寅恪先生虽然以“资产阶级学者”著名，而其言论却颇新颖而正确，并不如举世哄传之谬。此文为我所最爱读的文字之一篇，现在忍不住想重录一过，以飨读者。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隘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先生先后考释摩尼佛教诸文，海内外学者咸已诵读而仰慕之矣，今复以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远寄寅恪读之，并命缀以一言……抑寅恪读是书竟，别有感焉。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是书所述者言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地。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呜呼！昔晋永嘉之乱，支愨度始欲过江，与一伦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愨度果讲义积年。后此道人寄语愨度云，“心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也。”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今先生是书刊印将毕，寅恪不获躬执校讐之役于景山北海之旁，仅远自万里海山之外寄以序言，藉告并世之喜读是书者。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岂非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而终不能无所关涉之一例证欤！

此序写于1940年7月。今天读来，则不但陈援庵1957年不抽去此序为不可及；1940年初刊时竟登此序也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寅恪所说宗教与政治不可分割的道理，自然是正确的。他引支愨度南渡事，更是对动乱社会与人民心理有深刻理解的表现。序文写得更是文情俱胜。这在寅恪先生晚年著述中更是一个特色，也许可以称之为“历史学与文学虽不同物，而终不能无所关涉之一例证”的吧。

上面一抄就抄了许多，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大合适。不过我还想更抄一段



另外的文件，这是从我过去的一个抄本里转录的。那是陈寅恪先生为冯著《中国哲学史》下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也已是40年前的文献了。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承审查此书，草此报告，陈述所见，殆所谓“以新瓶而装旧酒”者。诚知旧酒味酸而莫肯售，姑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可乎？

幸亏这一段并不太长，抄起来还不费力。可是其意见之尖锐、犀利，态度之坦率、风趣，也正不易企及。虽然他的某些见解是属于百家争鸣的范畴，可供讨论批评的；但他在40年前的意见，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也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几十年中间，有多少学人、志士曾经为此事而反复考虑。即使不能称之为先进的中国人，但敏锐的中国人这一称号，在陈先生是可以当之无愧的吧。

我抄下这两节并不太长的文字，用以介绍寅恪先生思想的一两个侧面，看来比我吃力地说许多废话效果要好得多。

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

昨天看到新刊《中国史研究》中收有陈垣的《治史遗简》，是从援庵先生的家书中选录出来的。其中有许多精语。1940年7月31日一信中说：

前日接到十七日函，并寅恪先生序。第六卷将印毕，正好赶到，喜出望外。兹有复先生一函，便寄去。《佛教考》稿现在何处？寅丈看过后，口头有何批评，至紧告我。

这里所说，就是寅恪先生为《佛教考》所写序文从昆明寄到北平的事，援庵先生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寅恪先生的尊重，对诤友的指摘的竭诚欢迎，都是极为动人的，因附记之。

1979年5月12日

## “寒柳堂”的消息

陈寅恪教授的遗稿《柳如是别传》的“缘起”已由广东《学术研究》发表，他的《论〈再生缘〉》也已由上海《中华文史论丛》刊出。“论丛”本较1959年香港印本多“校补记”一节，系1962年对《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身世有了新的发现并考证之后作的补充研究。

这两种著作是寅恪先生晚年用力最多的研究成果。它们的一种共同特色是应该指出的。这虽是两篇学术论文，但《别传》的“缘起”和《论〈再生缘〉》的结尾都有作者近于自传性质的叙述，并附载了十多首诗。陈先生的诗写得极好，这些诗多成于抗战期间流离转徙之中，感情尤为深挚。他虽自嘲“论诗我亦弹词体”，但这实在是笔端沉痛，声韵凄楚，写尽了时代声音和家国之感的一组好诗。像“钟阜徒闻蒋骨青，也无人对泣新亭。”这样的句子写于“九·一八”事变之际，确是吐露了当时广大人民的心声，不只是诗人的个人慨叹而已。

陈先生在“文革”中间，也无例外地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幸于1969年10月7日逝世，陈夫人也在同年11月21日死去，前后相去不过一个半月。身后遗下三个女儿。

寅恪先生的著作，生前付刊的不过三四种。多年来散见各大学学报及学术刊物者都还可以收辑，这是不成问题的。晚年用了十多年工夫写成的50万言的《柳如是别传》现在已经交给上海的出版机构，正在付印，出版可期。这部原稿共有30余册，是他在多年失明的情况下，由助手协助写成的。此外还有几种重要的遗稿，则前后遭到抄家劫掠，至今下落还在若明若昧之间，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忧虑和关切。这些遗稿是《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二编、《寒柳堂纪梦》（未定稿）和由陈夫人手抄的《诗稿》三册。

其中值得特别提起的是《寒柳堂纪梦》，这是一部分六个部分的带有自传性质的著作，据说这不只是个人身世的叙述，而是作者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带有评论性的回忆，自然更偏重于对清末以来数十年间学术文化变迁的看法。我们悬想这可能是寅恪先生有意识写下的一部学术总结之作，而且并不只是局限于个人。据说这部“未定稿”曾抄成两份。陈氏家属保留了一张当时抄没时的收条，收条的签署人现在也还可以踪迹得到。

《诗稿》据说是还保存在什么地方的保险箱中，至今尚未还给家属，其他的几种著作遗稿也是如此。这些情况已经由寅恪先生的门弟子向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人做了汇报，相信不久必然会得到妥善的处理，这是应该向关心寅恪先生遗著的读者报告的。

我们重视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当然不是说他的业绩是完美无缺的。无论是论点或史料搜集以及考据方法等方面，也都还有可以商榷之处，这是毫不足怪的。在出现了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时，他自己也在一直进行着补正的工作。《论〈再生缘〉》如此，《元白诗笺证稿》也是如此。从《柳如是别传》的“缘起”可以看出，他在客观地评价柳如是这个人物的同时，也不免流露了为她“辩诬”的迹象。对钱牧斋也是如此，在指出他的丑恶一面的同时，也还不免有回护之词。例如他说，“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就对钱谦益的迎降，视之为难免的“通例”，这和他自己大声疾呼的“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不免发生矛盾了。这里我也只不过是随便说说，陈先生的全稿我还未得通读，这些感想也可能是片面而不正确的。无论如何，这是

一部极重要的著作，而实在也并非专门研究“钱柳因缘”，其实倒是涉及明清易代之际政治思想斗争的极重要的一部著作。史料十分丰富，同时又是十分缺略的。由于特定的政治特点，他在大量复杂、矛盾恍恍迷离的素材之中，进行探索，他的劳动其实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提供了一条门径。读者也自然应该从中得到应有的结论，学到有用的东西。

1979年4月10日

《寒柳堂集》和《金明馆丛稿》已陆续出版。可惜的是《纪梦》依旧是一部残稿，而《诗存》也是很不完备的。即使如此，出版社还是作了很好的工作，值得感谢。同时也希望，那些至今没有下落的遗稿，能早日找到，印行。

1980年11月20日起

## 槐聚词人

——一篇积压了 30 年的报道

真的是在很早以前就想写这样一篇报道了，可总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被延宕下来。这其实并不是出于主笔、编辑……的作梗。在这里我愿意先抄下一封旧信：

北来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略）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余地。兄笔挟风霜，可爱亦复可畏。（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语请略）赵家璧君处乞为弟一促，谢谢。即上裳兄文几。徐、高二公均候。弟钱钟书再拜。内人同叩。三十一日

这信写于 1950 年 1 月末。当时我正在北京小住。一天去看吴晗，他约我到清华园去玩，去住了三天，就住在西园 12 号他的家里。我当时是一名记者，到了清华园这样的地方，是决不肯放弃机会，入宝山而空手回的。吴晗陪我访问了一大串名教授，收获是相当丰富的。后来也陆续写了一些通讯。但也有一些很精彩的见闻没有写，只好忍痛割舍。例如我去访问梁思成、林徽音，在他们住宅的晒满了阳光的客厅里坐了好半日，听梁思成谈古建筑，谈北平解放的故事……那时林已病得很厉害了，一直睡在一只小沙发上，也没有说几句话。就在那只沙发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她盛年时所照的着色照片，真是一位非常非常美丽的少妇，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人相信就是睡在沙发上的那个人。对于梁、林，我是非常钦佩的。并不因为他们是梁启超的儿子和林长民的女儿，其实他们夫妇都是有非凡成就的古建筑学家，我早就拜读过而且爱读他们发表在“营造学社”学刊上的许多篇论文了。同时，林徽音又是一位才华洋溢的小说家，《大公报》印过一本《小说选》就是她选编的。我觉得在编写现代文学史时，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忘记这位出色的女作家。当时他们谈话的内容已经统统忘记了，但当时那间小客厅里的氛围、情调，和作客的我的心情，到今天也还是新鲜的。那天在他们那里还遇到了金岳霖教授，冬天，还在室内戴着一副绿色的打网球时用的遮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似乎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钟书。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访问安排在第二天的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杨绛两位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也坐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也许是火炉不旺，只觉得冷得很，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只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妇就静静地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的环境。

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时来访，高兴极了。接下去，就是快谈。听钱钟书谈天真是一件非凡的乐事。这简直就是曾经出现在《围城》里的那些机智、隽永的谈话，只是比小说更无修饰、更随便。那天晚上几乎是他一个人在谈笑，我也没有拿出笔记本来，一直谈到深夜才告辞。谈话的内容全忘记了，可惜。惟一记得的是，当他听说我到琉璃厂去逛书店，只买了一小册抄本的《痴婆子传》时，大笑了。这就是他赠我一联的上半，“遍求善本痴婆子”的本事。

第二天我还碰到他一次，后来他又进城来回访一次。这就是“三晤”。当时我真想把他的话记下来，就是因为这封信，没有写。当时我头脑里也确实有不少清规戒律，其实，开会太多之类，算得了什么呢？有什么可避忌的呢？可是我终于遵从了他的告诫，没有写。我向他约稿，他说自己诗情文思都如“废井”。反而说什么“笔挟风霜”，那自然是涉笔成趣。东坡诗“舌有风雷笔有神”，实在应该赠给他才对。

他的《围城》在晨光图书公司出版，销路很好，但没有拿到过一文版税，他托我向晨光的主持者赵家壁催问此事。可惜的是我没有能完成他的委任。

1980年4月3日

## 关于《管锥编》的作者

还是先抄下一封信来。

奉书失喜。年光逝水，世故惊涛。海上故人零落可屈指……契阔参商，如之何勿思也。弟无学可讲，可讲非学。访美时绝未登坛说法。彼邦上庠坚邀，亦皆婉谢。报章煊染，当以疑古之道疑今。兄旧是个中人，美言不信，必不受眼谩耳。明年或尚须远役，自知不舞之鹤，难为伏枥之骥，贻讥腾谤，且食蛤蜊。拙选初非惬意，本勿欲灾祸梨……未及细校，讹错殊多，重劳齿及，徒增颜汗。有小集一种，月内问世。差如韩陵片石，君堪共语也。×君美才，通函以少作相询。弟老而无成，壮已多悔。于贾宝玉所谓“小时干的营生”，讳莫如深。兄不为锦被之遮，而偏效罗帏之启，薄情忍心，窃有怨焉。弟此番在美，睹博士论文，及拙作译本小传，语多不经。一作者自加拿大来见，问之，则云曾至港台，遍访弟师友，采撷轶闻，弟乃知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Voltaire 所以言 Pyrrhonisme del'histoire，身外是非谁管得，隔洋听唱×××矣。佳笺玷污，愧甚。即颂近祉。弟钱钟书上，杨绛同候。四日

此信距离“北来得三晤……”函，中间正好隔了30年。简尺中的风调、才情……却依然如昔，这是使我极高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的《访美观感》中收有他的一篇报告，关于访美的种种都谈到了，这里也并没有更多的东西。此外，讲到了他的《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管锥编》，又提到了一些海外学人辛勤搜集资料，对他进行专题研究的事。这种研究态度曾经是令我吃惊过的，看来简直就像乾嘉经师对待先秦诸子一样。吃惊之后也不免发生一点小小的感慨。30年来，记得他的人是不多的。新文学史研究者忘记了这位惊才绝艳的小说家；选了一本别具炉锤的宋诗，又几乎成了“白旗”。记得1962年他到上海来过一次，出席大学文科教材会议。我设法挤进会议室去看他。在会议桌前相对，没有讲话，不过至今我还记得他当时眉宇之间的瞬息变化，“年光逝水，世故惊涛，”这一切，都在不言中进行了尽情的表述、交流。那次的经验也是奇妙的。没有问他“文革”中的经历，最近从一篇文章中知道，他在干校中当过信差。这在那种场合已经算是一种“美差”了，也许是对我们的学者的特殊照顾。几年以后这位“信差”拿出了100万字的《管锥编》，海外学人热情地研究他的身世、著作……这是正常的、应该的。我并不完全同意他悔其少作的那些意见。

《管锥编》是一部有趣的著作。我说“有趣”，也许有人会不同意；也许我还没有读通这书的必要功力。但我还是要说，这是一本有趣的著作，比起我过去读《义门读书记》、《潜研堂集》、《二初斋读书记》、《读书胜录》……来有趣得多了，而广博深厚当然又不是能期望于过去的学者的。《倘湖樵书》、《辨讹类编》、《癸巳类稿·存稿》都是可观的著作，但与《管锥编》都不是一类。更不必提不可能出现于过去的著作中的新方法与新材料。此书出后，我想，有些史学、文学以至辞书工作者可能都会考虑增订、修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吧。

三十多年以前，我曾劝过一些亲近的朋友，宁可作一个“才人”，也不要作“学人”。今天看来，这意见当然是过于偏颇了。不过当时那样说也有一定的理由。因为那是个完全没有做学问的条件与可能的时代，而学人的道路也确是艰苦、寂寞的。在默存先生身上，才人与学人却得到了十分理想、

完美的结合，这可并不常见的现象。

他写给我的两首诗，都是旧作。《蒲园且住楼作》一律是我特别欢喜的。

夹衣寥落卧腾腾，差似深林不语僧。捣麝拗莲情未尽，擘钗分镜事难凭。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已怯支风慵腊月，小园高阁自销凝。

像李义山么？有些像。但义山没有这种深微、细密、凸现的写法。产生于不同时代的诗，当然不会有完全的一致。这是一篇精致的短篇，却只用了56个字。如果学他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这诗是会使我们联想起玉溪诗中坐在“隔雨相望”的“红楼”中的那位穿了白袷春衫的少年诗人的吧？这应该就是作者自己。不过研究诗比研究《管锥编》还要更困难得多，我不想更深入下去了。

1980年4月4日清明

## 绣鞋

三四个个月前在朋友那里看见一叠旧扇面，其中有两幅出于明末的周延儒和马士英之手，就借了回来。想写两篇小文章，因为手头无书，无从着手。荏苒至今，已将半载，而朋友却已逝世了。人事变幻，真不能不使我兴慨。扇面不能久留，文章必须赶写。资料查起来实在也太费事，好在30年前曾写过一篇《鸳湖曲笺证》，那里面就有颇为丰富的故事，足够引用，乐得偷懒，想想也不能不惭愧。

我有一部万历刻的《状元图考》，有大量极精美的插图。自明初开科以来每位状元公都有一张图，另附说明，大抵记着他们曾做过什么好事，上帝见喜，终于中了状元之类的“故事”。这种书大抵在“考棚”之类地方发卖，每逢大比之期，就要重印，自然也趁此增入前科新状元的材料。我所有的一部最后一张就是周玉绳（延儒），可见书的印行，已在他高中之后。画面画的是怎样的故事也已记不清，反正还来不及预言他被崇祯帝赐死，则是无疑的。

这位宜兴相国的故事说起来也话长。这里只能简单地讲一下。他本来是和东林作对的，但后来却为张溥所争取，将他捧上台去，作了首辅。但结局却不好，赐死。周延儒并不是什么好人，可以说是劣迹多端。他那第二次出山的前后，就是一篇极精彩的故事。《霜猿集》有一首诗咏之：

新来艳质可怜身，绣幕留香别作春，再召东山为国计，画船箫鼓闹江滨。  
诗后有注曰：

洞庭山富家娶妇，少而美。夫死，妇独居，一日闻街头鼓乐声，谓侍儿曰，谁家娶亲？盍往观之。遂出门，坐花轿中，下太湖而去。富家讼之县，县申道，下檄缉捕甚急，娶亲者惧事泄，以其妇盛妆送宜兴周延儒，大见宠悦。无何，太仓张溥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然无行意，曰，不如在家寄乐。溥进见张道台，令以朱单捕妇，语侵相国。溥见宜兴，出单于袖中，宜兴大怒。溥曰，此小事不足介意，今高卧不起，将来祸有大于此者！直兴悟，遂行。坐楼船，树大纛，上绣“东山再召”四字。乃赛江神，酣饮弥月，始进京。

这真是出色的故事，大约也是当时的所谓“小道消息”之类，后来就统统称之为“野史”，以区别于道貌岸然的“正史”。不过古往今来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小道新闻，往往倒十九是正确的，其价值有时要超过正史万万。明末的政治、社会，已经腐朽到了怎样的天地，从这里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张天如（溥）是复社党魁，一般都看做好人的，然而那手腕却如此。不过我们还不能不承认他是个政治家，他用来说服周延儒的恰恰是政治上的利害。周延儒私纳民妇，对百性的态度可谓淫横绝伦；他对皇帝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这是不问可知的。也是《霜猿集》，有另一首诗：

花为容貌玉为床，椒殿承恩卸却妆。三寸绣鞋金缕织，延儒恭进字单行。  
下有注曰：

上昼幸妃，见妃（田妃）绣鞋精巧，举而视之，有细书一行曰“臣周延儒恭进”。上不悦，由是薄延儒。

这个故事简单，但刻露。我相信大抵也不会是捏造。像这类款式的贡品，真是千千万万，如“御墨”、“御用瓷”……简直数不胜数。不过把名字绣在妃子的绣鞋鞋底上，那就只能出之于“天才”，常人是万万想不到的。崇



祯帝发现此事以后的反应，则殊非周相国所能料及。因为照常规说来，这样做是会格外讨得皇帝的欢心的，不然他为什么要在妃子鞋底绣上自己的大名？十拿九稳的马屁的穿绷，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还并非常见的特例，我们应该从此体会出人民的苦难是如何的深重。

1979年5月2日

## 春灯燕子

阮胡子（大铨）写过四本有名的曲本。它们是《十错认春灯谜记》、《燕子笺》、《勘蝴蝶双金榜记》、《马郎侠牟尼合记》，今天都还有明刻本传世。大铨写这四种曲，有意和汤显祖的“四梦”争胜，这在《春灯谜》前的手书自序中可以看出。他说：

余词不敢较玉茗，而差胜之二。玉茗不能度曲，予薄能之，虽按拍不甚匀合，然凡棘喉 齿之音，早于填时推敲小当，故易歌演也。昭武地僻，秦青何勘辈所不往。余乡为吴首，相去弥近。有裕所陈君者，称优孟耆宿。无论清浊疾徐、宛转高下，能尽其致；即歌板外，一种 笑欢愁，载于衣褶眉棱旨，亦如虎头道子，丝丝描出，胜右丞自舞郁轮远矣。又一快也。（此序写于癸酉即崇祯六年三月）

他指出了汤玉茗的弱点两条：不懂歌唱；没有老伶工的合作，不能有很好的演出实践。这两条都是实在的。

阮大铨在《双金榜》序中还提到他的创作经验。

此传梗概，胎结久矣。一针未透，搁笔八年。偶过铁心桥，一笑有悟，遂坐姑孰春雨，二十日而填成。平生下水船，撑驾熟烂，此不足言……

所说也确是写戏的人的经验之谈，而用语又是那么俏皮，并带有浓厚的禅宗语录味道。此外，使我大吃一惊的，《春灯谜》前面，赫然有“山阴友弟王思任”的题叙。王思任正是大骂马士英，提出“吾越乃复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响当当口号的名人，他却对大铨极力称赏，序中说：

时命偶谬，丁遇人疴。触忌招 涓，涓泾倒置，遂放意归田，白眼寄傲。

这里所说，正是大铨因投在魏忠贤门下，列名逆案，落职归田的事了。王思任对此寄以同情，实在不能不使我惊奇。《牟尼合记》前面又有“香草垞禅民”的题词，看那印记，知道就是文震孟。他是启祯之间东林眉目，天启二年状元，有极高的声望。文震孟在序里虽然不谈政治，但对大铨剧本的成就则推崇备至，这又是不能不使我吃惊的事。作《石匱书》和《梦忆》的张宗子，也说“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这和“小人无不多才”是一致的，而惋惜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了。此外还有抗清死节的邝露，是大铨的学生，在诗集《峤雅》卷首还刻入了大铨的诗话，极尽尊重。我举出这些事实，倒不是想为阮胡子翻案，只是希望提醒《桃花扇》的读者，不可将明末党争政局看得过于简单。孔尚任是在写戏，而戏剧矛盾是必须集中、鲜明，不可能将许多细节都写进去。杨龙友这个人物，就是有意安排了来作为依违于两者之间的代表的。在杨的身上就有着文启美、王季重……的影子。《桃花扇》写阮胡子叫自己养的班子排了精彩的戏本，请清流名士们来看，最后讨了一场大大的没趣。戏是写得极好的，也符合历史真实，不过也确有简单化的倾向，阮大铨被写得近于《借东风》里的蒋干，他的阴鸷险狠的本质就被削弱了。而四公子们也真写得像一群不通世事的大少爷，不问青红皂白就应邀跑来看戏吃酒，竟连主人是谁都不清楚。这其实是不大可能的。阮胡子当年想请酒看戏，像文震孟那样的名人，绝不会不肯赏光，他实在也用不着那样鬼头鬼脑。

我们如果要求孔东塘严格依照历史真实，做到无一事无来历，那是过于

天真了；但看了《桃花扇》就以为彻底了解了南明的历史，也不免头脑简单得可怕。天下哪里有这等便宜事！

1979年5月6日

## 马瑶草

明末的马阮，即马士英与阮大铖，已经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坏种，是久有定论的了。从晚明以至今日，出现于史学家和诗人之口的斥责声，一直都没有停歇过。只是在五六十年前，出现了一位姚大荣，以同乡的身份写了一本《马阁老洗冤录》，为士英辩诬。我曾翻阅过这本“奇书”，但并未被姚先生说服。其实就是在当时，在清流中间，对士英的评价，也并非一面倒的，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也还有过不同的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是夏完淳在《续幸存录》里的意见。他是将士英与鼎鼎大名的史阁部对比立论的，也的确大胆：

史道邻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马瑶草守已狼藉，不脱豪迈之气；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瑶草亦非令仆之才……

夏完淳的意见和曹孟德有些相近，他并不否认史马两人在道德人品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当时的客观具体情势出发，主张两人的职务应该调换一下，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不过终于还只能是书生的迂阔之谈。他没有通盘考虑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全局，这实在并非一两个个人物所能左右的。他的这议论也不能不引来清流人物的许多不满。

另外还有一种议论，就是“小人无不多才”（樊樊山语）。那是在否定了马阮之流的大节之后，进而指出他们虽是坏种，也还有其“才能”。这才能，是指他们的诗文词曲序画而言的。这自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人间坏种多矣，但能做出大大的坏事，给民族、国家、人民带来特大灾难的，也还要靠他们的“才能”。

阮大铖有诗集，有《春灯·燕子》的曲本，知道的人颇不少。但马士英的诗、画流传下来的就很少。马士英是能画的，清初的刘大山（岩）有《题马士英画》一诗，在《大山诗集》卷四中：

福人醉不醒，幕府凯歌休。君臣鸟兽散，兹事羞千秋。断续焉中看字样，凤阳提督金陵相。尚有闲情作画师，六代山川恣跌宕。小部新翻燕子笺，吴绫细楷朱丝缠。司马填词宰相画，孝陵王气飞灰烟。吁嗟鼠子金衢走，人间尚惜迂痴手，看画君须掩姓名，画工莫问为谁某。

刘岩的诗集流传很少，还是康熙时所刻。作者的诗笔也何让于梅村！真是慨乎言之，马阮并论，弘光一局，在他看来简直是一场奇耻大辱。诗未透露了一点消息。在清初，马士英的画还是流传得有；作为画人，也不是凡品。不过人们看见那署名就觉得可耻。乾隆中吴兴姚世钰也有《题马士英画》一诗：

剩水残山信手为，百年留得墨离离，与人家国浑闲事，那不常称老画师。

可见百年以后，马士英的画迹也还是有流传的。忘记是谁的诗了，有“××青楼冯玉瑛”之句，诗注说，人们讨厌马士英的为人，但又不忍毁弃他的作品，于是就把画上题属的“马士英”加上点画改为“冯玉瑛”，而且指实为一位善画的名妓。这诗的作者是晚清人，不过今天冯玉瑛之作好像也从来没有发现过。

至于马士英的诗文，那就流传得尤少。我只在阮大铖的《咏怀堂丙子诗》前面看见过马士英所作一篇小序。文章写得是不坏的。记得他特别抓住了阮大铖诗里的“禅味”加以发挥，而且引用了他自己的一联断句：“深机相接

处，一叶落僧前。”也确表现了一些禅宗的意蕴。当时阮胡子正在南京祖堂山献花岩畔避风头，同时埋头写剧本。

这回是从燕赏斋主人的藏扇中看见了马士英的一幅草书金扇，草书有颇深的功力，使人想起张瑞图、王铎等明末书家，那风气是一致的。原扇失去一行，诗云：

，浙比鱼龙乡。流止同一观，湖山孰低昂。晨昏蟾蓄泄，  
王气聊相当。荷芰接松楸，映带生空香。夏深水鸟散，莫乱澄湖光。即  
事尽幽赏，蒲风生夕凉。

属款是“为维城词丈书马士英”，“马士英印”（白文方印）。

这诗，和上面所引的断句风格是一致的。放在《咏怀堂集》中，也毫无愧色，不但禅味颇浓，而且气象比起阮司马还要来得雍容阔大一些。看来，“小人无不多才”这话还是不无道理的。

据燕赏斋主人见告，若干年前叶玉虎（恭绰）看见此扇，曾为之惊赏。叶玉虎说他曾藏有阮大铖的字幅（按，已影印入《山精舍本《咏怀堂诗》》）但平生不曾见过马瑶草的墨迹。我想，做为反面人物的遗迹，这种事物也自然有其文献价值，殊不必义愤填膺、拉杂摧烧之的吧。

1979年5月5日

## 消夏录

长夏无事，以读书自遣。陶渊明确说，“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忘食”不一定办得到，多少忘掉一些暑热，倒是可能的。近来记忆力衰退，有许多从前看过的书，还曾写下过批注，几乎都全然忘却了。重读时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愉悦，也不免有些惘然。想想还是多少记一点下来的好。古人著作中笔记一项特别丰富，那部分原因就在此。做这样的工作，重要的是见识。不只是议论，就是选材，也往往可以看出读书者的见解。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暴露自己思想，趣味……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渠道。不过我想，只要采取老老实实的实事求是态度，一定是会得到读者谅解的罢。

### 钱大昕论诗

钱竹汀（大昕）是我所佩服的作者，我有一部原刻的《潜研堂文集》，还是马笏斋的藏书。随意翻阅，很有兴趣。钱竹汀是著名学者，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文史考证方面。不过他也作诗，他有一种非常难得的老实态度，他知道作诗不是自己的特长。他在诗集自序后面，写了一段附记：

予既以有韵之文，受知圣明。然性不喜瞰名，检点篋中，所作亦无甚称意者。故从未敢刻以问世。而江南书肆选刊近人诗，往往滥收拙作，真贋相半。偶有一客过予，诵所见佳句，听之愕然，谢以非某作，句亦殊不佳，客怏然而退。予于诗虽非专门，而寸心得失之故，要自知之。固不欲掠它人之美，亦岂可以恶诗冒为已有。兹取前后所作，钞为一集。不敢自以为是，亦欲存庐山之真面云尔。

这篇短文写得好。表面看来，钱大昕是一位彬彬有礼的儒者，但实际上是很严肃的，还有点厉害。那位想来奉承的“客”，碰了一鼻子灰而逃去，在钱先生笔下，是活生生的。这自然并不是小说，但确是写出了社会上的一种典型。很真实，很有深度，因而也就很有意义。

钱大昕的严厉，使读者不易觉察，固然与他的修养、文字有关，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他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吹胡子瞪眼，声音也不奇怪而高，只讲道理，不学泼妇。看似平易，其实是比一切“英雄”们都厉害得远。他还很有点幽默感，他并不曾有意丑化，但那位“客”的脸谱我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因为我们都有同样的经验，一下子就联系起来。

沈德潜选过一部《七子诗选》，其中就有大昕的诗。沈是钱的前辈，但作风很坏，大有那位“客”的气味。我怀疑，附记里的有些话，就狠狠刺了他一下。自然这不过是推测，但我相信，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 诸葛亮与魏延

《三国志演义》描写诸葛亮与魏延的故事，把魏写成一个“脑后有反骨”的角色，暗示只有诸葛亮能掌握、使用他；诸葛一死，魏延就再也无人能加以制驭，最后还是靠了诸葛的“遗策”才杀了这个“祸害”。不能说完全没有史实根据，但确是大大地小说化了，也大大地歪曲了事实的真相。

魏延是个很有见识才干的将领，比马谡高明得多。他在伐魏的战略上，与诸葛有明显的分歧。他主张出子午谷直取长安，诸葛亮不予采纳，却选择

了兵出祁山的迂远路线，而且前后试了六次之多，结果还是失败了。一般人都把这作为诸葛谨慎小心的证据，陈寿还批评诸葛，“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其实这是一个很不易为人理解的悲剧。

魏延的作战方针是一条出色的奇计，诸葛不会不理睬、赏识。但他不能采纳；又不能明白讲出自己的理由来。魏延当然想不通，难免对丞相有意见。这就是悲剧的实质。

王船山是早就看出了那秘密的。他认为，刘备死后，阿斗胡涂无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能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明知出祁山不易完成北伐大业，但还是先后六次执行了同样的战略。碰了壁要转弯，这是猪都懂得的道理，难道诸葛就不懂么？

诸葛亮苦在明明知道在客观条件限制下，只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才能争得生存，但又不能公开宣布；相反，在口头上还必须高唱“北定中原”的调子，否则人心就有瓦解的危险。他当然不能向魏延推心置腹地说明。而魏延自然也摸不出诸葛的心思。这真是一个悲剧。

诸葛亮的《出师表》虽然提出了伟大的战略目标，但却缺乏必胜的信心。通篇充满了悲壮气氛，但缺乏誓师的雄壮气势。过去读来总觉得有些奇怪，其实，那原因也是不难理解的。

### 马士英与杨龙友

我在《春夜随笔》中曾经谈到马士英和他的画，其实清人文集中有关材料还有的是，只是手头无书，记忆不济，不能广为征引而已。今天翻阅张商言（垧）的《竹叶庵文集》，在卷八中又发现两诗，原题云《题马士英画二首》，题下小注云“即王阮亭尚书所题诗之帧，今陆丹叔同年藏之”。

此君作画题辛未，门馆清闲消夏宜。尚是江南无事日，未曾庐凤督师时。

一般不骂杨龙友，桃叶江声骂汝多。剩水残山能几笔，六朝难画画陂陀。

张商言的诗写得不坏，特别是那第二首，道出了清初文士中间流行的一种批评尺度。诗人还是明白的，大约也多少知道一些杨龙友的底细。

杨是马的亲戚，是典型的清客。他是“画中九友”之一，会画两笔画，也会作诗。看来他在马贵阳身边是负责联络清流的工作的。成绩似乎也还不坏。他实在应该感谢孔尚任，一曲《桃花扇》帮了他的大忙。观众大抵是同情他的。但他在南明一局的政治漩涡中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也还是不甚清楚。说他是中间派，也不一定恰当。杨龙友不只是“画中诗酒”而已，他还会抓枪杆子，当然也是借了马士英的权势，不过实在胡涂得很，在金陵瓦解的混乱中，左冲右突，毫不讲究策略，最后终于胡里胡涂地死于乱军之中了，这当然也是他毕竟和马阮不同的所在。不过吴梅村早就指出了他望风先遁的不光彩纪录。过去研究南明史的人有一个十分简单化的标准，不论一个人为何而死，如何死法，只要是在甲乙之际丢了性命的，就一概称之为死难的烈士，丝毫不作具体分析，这是很可笑的。南明史至今留下来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笔胡涂帐，着实有必要加以清理。

杨龙友的画流传下来的也很少，30年前我曾看到过故宫所藏的一幅墨竹，上题有“龙友墨戏”四字。虽然是文人画，到底也还有一些功力的。推

想他的绘画成就也不一定就在马士英之上。

我还藏有杨明远的《怀古堂诗选》，其中有不少有关杨龙友事迹的第一手史料。不过此书至今还没有回到手中，因而无从征引。记此备忘。

### 武则天的结末

《资治通鉴》实在是一部好书，也是我的爱读书。当然我并不想从这书里学到什么政治斗争手段与统治经验，我是多少当它做文学作品读的。前人说“六经皆史”，不无道理；我也想说，诸史皆文，当然这中间有高下之别，但《通鉴》确是上乘之作无疑。

偶然翻到了唐中宗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等入玄武门杀二张的一节。这时武则天已经病得很厉害，她的两位面首张易之、张昌宗乘机用事。张柬之等定计，抱持太子到玄武门，“斩关而入”，杀易之、昌宗，然后来到武则天长生殿病榻之前。“太后惊起”，先问，“乱者谁耶？”后来看见太子，又命他回东宫去，无效。人们反而提出“天意人心，久思李氏”，要她交出政权，传位太子。武则天此时大抵已经明白大势已去了，也不想再做无益的挣扎。只是她还对两个人发了两次牢骚。一个是武则天所信任的宰相李义府的儿子李湛。武则天对他说，“汝亦为诛易之将军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另一个是崔玄，武则天对他说，“他人皆因人以进，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

这些真是所谓十足的废话，一些作用都没有的，只能表示她在事变面前束手无策与软弱。崔玄的回答是“此乃所以报陛下之大德！”一句话把她顶了回去。这以后武则天还说了些什么，司马光没有记下来，大概是些更为无聊的谈话。不过《通鉴》不删上面的两段对话，却是有见识的。这不但极精炼地刻画了武则天的虚弱，同时也还说明她直至此刻还对杀了她的面首恨恨不已，以及对“任人唯亲”政策的极大的幻灭感。她实在没有料到，她最后的精神支柱，竟自如此地垮掉了。读者也清楚地明白，武则天这时是彻底完蛋了，她的一切倚靠，一切希望，都不复存在了。

如此看来，这两节都不是什么“谈话”，加以记录是正确的。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明白，一些论者称赞武则天有知人之明，任人唯贤，到底有多少说服力。

又过了将近一年武则天才最后死去。但实际上她此刻已经死掉了，无论在精神上或肉体上都是如此。

与二张一起杀掉的还有张昌仪。昌仪刚造起了一所“逾于王主”的新宅第。有人夜里在大门上写下“一日丝能作几日络？”的话，就是说“能作乐几日？”擦去了，又写上；一连六七次，“昌仪取笔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故事，用不着在这里再作多余的分析了。

1979年8—9日



## 关于《随想录》的随想

听说《随想录》要印成一本书了，很是高兴。这些文章陆续发表时，我曾先后读过，作者大概说了些什么话，是有个约略的印象的。为了印证旧有的印象，我又找出旧报翻了一下，旧报并不完整，但可以证明我的印象还是准确的。这是一本真实的书。

我还有过另一种奇异的感觉，这又是一本悲壮的书。我这样说，因为我的确感觉到这些文章中的每一句话都是通过作者自己的心写下来的，都经过自己良心的检查。“良心”，按照一位著名诗人的意见，“就是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我同意这个说法。

作者写的其实也不过是一些“身边琐事”，不过由于作者生活的时代是不平凡的时代，因此“身边琐事”也就往往有了更深广的内涵。作者在许多地方都说过，因为他可以利用的时间不多了，因此就不能随意浪费，要抓紧时间讲自己所要讲的真话。而讲真话，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不容易的。需要勇气，有时还需要非凡的勇气。这就是为什么会使我感到这是一本悲壮的书的原因。

作者要讲的真话，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讲到了自己的毛病。例如，作者讲了他的一些场合真诚地讲过一些“豪言壮语”；在另外一些场合又曾“响应号召”对一些人和作品作了并非出自本心的“批判”。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其实有些情形，读者、人民心里是明白的，并不需要作者自己站出来解释。但他这样做了，说明他是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而且并不将自己除外，不是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见有些自命“一贯正确”者，为了自己“形象”的“完美高大”，花了许多力气，而得到的往往只是相反的效果吗？

作者最近经常说起，一个人的思想是时时在变化的，这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有时回顾两年、一年、甚至半年以前写的文字，有些认识就又有新的发展变化了。这自然说明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是个飞速进步着的时代。两年以前作者为《家》的新版所写的“后记”中说过：“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更好一些。”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估计不够准确，但所能举出的论据也只是书店门口长得出奇队伍。今年年初我写过一篇短文《补课》，也是想说明这点意思，不过吞吞吐吐地说得很不清楚。现在，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总算初步弄清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卖弄了十多年的其实不过是从旧货店里里找出来的“出土文物”。作者在一筒《随想录》里，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办法，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而且承认，在今天的马路上，也还会时常遇见在散步的高老太爷。

作者很喜欢讲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作县官的父亲的衙门二堂里偷听打小板子的故事，这已经写在《随想录》里了。作者还记下了他在巴黎瞻仰卢梭的石像时的感想：“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看起来，这些好像都已经是“陈旧”“过时”并不时髦的思想，但是没有办法。正如我们有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依旧不能不一步步脚踏实地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走过去一样。想一厢情愿地跨越时代，那结果已经是人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了的。

作者还告诉我们许多故事，发生在前些年的希奇古怪的故事。这些故事我们大抵是稔熟的，也许在有的朋友听来不免有些陌生，以为是讽刺。不过，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这些故事也正有着强盛的生命力，一时半时不会为人们所忘记。就像曾经在上海这地方不可一世过的两位“长官”，（可惜其中的一位已经不在人世了，而我们至今也还不能不“姑隐其名”，使读者读起来也难免气闷。我们实在对这群恶棍宽容得过于长久了。）一位给作家规定了严格的时限，超过规定一天所发生的事也不许写，用的是比科学家还要科学的方法；另一位则主张出版社要出人材，大约是指跟“走资派”对着干的人材吧。这些都是《天方夜谭》的作者也想不出来的“妙计”。不过我希望读者不只当作笑话来读，必须想到，掩盖在这些“笑话”背后的是无数善良的人的血和泪；并且关心还要多久，还需要经过怎样的努力，我们才能最后杜绝这样的“笑话”在我们居住的这块地方重复发生。

不能不想起鲁迅先生。在先生的杂文中间，很有一些是论及30年代旧中国的那个文坛和作家的。我还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先生要把许多精力花在这些地方呢？后来逐渐悟出了一点道理。作家不是遗世独立，文坛也并非与世隔绝的处所。“剧场小天地，天地大剧场”的原则还是可以适用的。记得鲁迅先生曾指出过去许多人挤进文坛的方法。有靠太太的投资的，有先作官的，也有“捐班”的；这样，坐着金子或其他材料制成的坦克车的X品文官或“诗人”就凯旋而归了。也有的人变了一通戏法也取得或保持了“作家”的桂冠。先生指出的这些“文坛登龙术”，虽然已经是50年前的往事，好像到今天也并未完全失传。《随想录》里记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不，不只一个，像这样的故事绝不只有一两件。一些过去起劲地“批邓”、“批走资派”的“作家”，在“四人帮”倒台以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有些“聪明人”很快想出了办法，用“四人帮”替换“走资派”，只要请排字工人抽换几个铅字，连人和作品就都是崭新的了。于是他们照样在文坛上走来走去，点头微笑，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有的人还堂皇地在会上介绍“深入生活”的“经验”，我怀疑这是弄错了讲题，应该更正为魔术家的心得才对。

《随想录》的作者却告诉我们：“人们经常通过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很少有人只是因为想做作家才拿起笔。”可见他走的是一条另外的道路。作者在很多地方表示了他对读者的信赖与感激，使人读了十分激动。他感谢读者给予他和他的作品的保护；他声明他的作品没有给骂死，是因为读者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没有读者，就不会有我的今天”。这些话是真诚的，在谈天中，我听见更多同样意思的话。我以为，靠了这些，他才没有走一条“既保险、又省事”的道路，因而有着比一切“既得利益者”都高尚的灵魂。

从他这里的有些叙述以及过去的作品中很容易留下一个并不准确的印象，仿佛作家的命运是寂寞的，孤独的。事实是恰恰相反的。读罢《随想录》引起了很多很多新的“随想”，但我想说的，主要就是这个。

1979年12月6日

## 涉江词

去年秋天到南京旅行，借住在南京大学的招待所里。朋友送给我一册新出版的《古诗今选》（上册），是南大自己印行的。晚上回到宿舍，灯下翻看。《今选》所收是从汉乐府诗起迄于唐代前半期的作品，大半都是名篇，但也有一些不常见于通行选本，选者的手眼很有一点特色，诗后所加的案语，也多有一些使人耳目一新的意见。觉得是一本颇有意思的书。

第二天朋友陪我出游，走到玄武湖边，看见墙上贴着这本书的广告，自然要看一眼，不料却以现编选者之一的沈祖棻的名字四周加了黑边，就向朋友打听，才知道她不久以前（1977年夏）在一次车祸中死去了。听了不禁怅然。

后来在一次座谈会上认识了程千帆教授，他也是《今选》的选者之一，是沈祖棻的爱人。当天晚上他请同学送来了两本书——《涉江诗词稿》。附来的信中有两句说：“今送上亡妻遗集二册，可见一女性在抗日战争中（词稿）及文化大革命中（诗稿）的心灵活动。”这就使我忽然想到，文学史上很有一些作者是在某个时期突然搁下了习惯使用的文艺武器，换了另外的手法进行创作的。这原因自然很复杂，我想，最主要的可能是觉得某一形式已经不宜抒写自己的情感了。在《涉江诗词》的作者，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不知道。我还是先来读她的同。在外面跑了一天，时间很晚了，也有点疲倦，不过还是读下去了，在灯下竟一直读到夜深。

过去我也喜欢收集一些词集，特别是女词人的集子，数量也很不少，不过总是失望的时候居多。以清代女词人而论，除了徐灿（湘苹）之外，似乎就没有发现过什么值得注意的作者。如季娴（季振宜的姊姊）、顾文婉（顾梁汾的姊姊）、吴藻（苹香）这些作者，也都没有写出过怎样出色的篇什，他们共有的特色似乎都是那种临于公式化的吟弄晨风夕月、花鸟闲愁。这几乎已经是一种公例。只要一开卷就能知道的了。《涉江词》也是出于女词人之手，也同样写的是一位少女、少妇直至中年的心情变换。《涉江词》五稿，起1933年，迄1949年。是作者24岁到40岁中所作。但不同的是，作者生活在一个大时代里，她无法摆脱时代现实的震撼、感染。应该说这是作者的幸运，因而使她得以高出于300年来的女词人。何况，即使是同样的传统题材，她那枝灵秀的笔，也会写出完全不同流俗的句子。

开卷第一首“浣溪沙”的最后一句就是“有斜阳处有春愁”。似乎一开始，作者就已在“鼙鼓声里”吟唱了，时代的脚步声从这里就已经开始了。

接下去就是一连串的乱离、迁徙的日子，作者写得最多的也是思乡、念远的心情，在她的笔下似乎总是摆脱不开浓重的离愁。“一别巴山掉更西，漫凭江水问归期，渐行渐远向天涯。”（浣溪沙）这是从重庆去雅安之作，在船上，她怀念苏州的故园：“家近吴门饮马桥，远山如黛水如膏”。接下去，“门前芳草连天碧，枕上花枝间泪红”；“明朝还怕，剩水残山，春归无地”；“轻寒莫放重帷下，万一江南有雁来”；“登楼欲尽伤高眼，故国平芜又夕阳。”多么浓挚的离愁，但这不是千百年来词人笔下摆弄了无数过的那种离愁，是在民族抗战中一位女词人梦里的呼号，它们是有千钧的重量的。

词人的笔灵巧得很，词人的心更是灵巧，似乎只有女性才能有如此细致、微妙、变幻的心情，也只有这样一技女性的笔才能加以描绘。“一点愁心无

处寄，付与杨花，洒作弥天泪。”“才道这回，遣得愁心，又被两眉留住。”“何苦，连梦也不如休做。”“风中乱絮旧情轻，雨后零红残泪坠。”“飞红宛转托春波，流尽年光桥下水。”像这样的句子，是抄不尽的。其中有許多，正是词家的典故，但一经经营，就都成为自铸的新词。下面抄一首“浣溪沙”，正是俊句如云，放在旧选名集中也毫无愧色之作：

向晚东风拂面温，天涯旧月映眉颦，谁家玉笛怨黄昏。

似酒浓春都化泪，如花坠梦旋成尘，梅边空忆去年人。

记得那天晚上在旅寓读《涉江词》，读到“丙稿”，几乎使我惊唤起来的是，在这里竟自发现了我37年前在重庆土纸印的《大公晚报》上读到过的一组《成都秋词》（虞美人）和《成渝纪闻》（减字木兰花）。当时我曾将题为“涉江近词”的这两幅剪下来，一直带在身边。这两张剪报一直跟着我到昆明、桂林、印度……一直跟着我回到重庆。在写《关于美国兵》时，禁不住抄下了其中的几首。当时，我不知道这词的作者，也无法去打听，这个悬了三十多年的谜底，竟自在今夜揭开。而这位女词人竟已在一年前不幸逝世，终于失去了向她致敬的机缘。为了真实地叙述我当时读后的感触，请允许我抄下我的一节旧文。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去年（或者已是前年了）《大公晚报》的副刊上曾经刊载过几首“涉江近词”，是《成都秋词》和《成渝纪闻》。照我看来，其中关涉到美国兵的地方很不少，先抄两首“减字木兰花”：

弦歌未了，忍信狂风摧蔓（蕙）草，小队戎装，更逐啼莺过粉墙。  
罗衣染遍，双脸燕支输血艳，碧海冤深，伤尽人间父母心。

秋灯罢读，伴舞嘉宾人似玉。一曲霓裳，领队谁家窈窕娘。红楼遥指，路上行人知姓氏，细数清流，夫婿还应在上头。

这两首都《成渝纪闻》，大概都有典故可寻，可惜作者不曾把它写将下来，然而细译词意，则嘉宾的骄横与豪门的无耻，已经明明白白不必研究了。其余的几首，还有不少妙句，稍摘如下：

酒楼歌榭消长夜，休日还多暇；文书针线尽休攻，只恨鲜卑学语未能工！

休夸妙手，憎命文章供覆瓿；细步纤纤，一夕翩跹值万钱。

这是词人的吟咏，我觉得很有意义。至少留下了这么一段事实，再过多少年就会是可珍贵的历史……

现在真的又过了三十多年，《涉江同》也真的成为历史文献。我今天也依旧不想改变我过去的意见。有趣的是，十多年前，一些可怜的叭儿指责我那本《关于美国兵》是洋奴文学；今天，中美两国人民又恢复了传统的友谊，也许那些旧日的叭儿，会又觉得这些话依旧是该死的吧。其实问题是清清楚楚的。任何时代，在叭儿们的手下，是出现不了各国人民之间真正的纯洁友谊的。

随着时局急遽的发展变化，词人笔下日益减去了纤细轻柔的韵致，终于出现了“眦裂空余泪数行，填膺孤愤欲成狂”这样的声音，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那段日子写下的。她回到珞珈山后，有“鹧鸪天”词：

惊见戈矛逼讲筵，青山碧血夜如年。何须文字方成狱，始信头颅不直钱。愁偶语，泣残编。难从故纸觅桃源。无端留命供刀俎，真悔懵腾盼凯旋。

这自然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在解放战争中例行逆施的愤怒控诉。女词人拍

案而起，大学的研究室不是桃源，再也坐不住了。《涉江词》的至此戛然而止，应该是必然的结局吧。这样的作品，是应该存留下去的。

1980年4月26日

## 善本的标准

我有一个习惯，每买到一册新书，往往要在书前书后写一些字。按习惯，这是应该称之为题跋的。我所写的一些，离真正题跋的要求很远，但另外又想不出什么合适的名称，现在姑且也称之为跋吧，我在新买的一册《鲁迅图片集》前面跋曰：

此册为“四人帮”叭儿所编，出版之日，“四人帮”已近末日。北折价新书，中有拆换贴补多处，然不能救其总倾向也，因可觚石一歌之流伎俩之一般，遂买之归，立些存照。此十年间所刊“奇书”多矣，惜多未留存，补牢无及。盖囿于偏见，必好书始藏之，遂有此失。所谓“善本”之定义，殆非重加论定不可。温记所感如此。

这里使用了文言，也还是“积习”所致。但因水平所限，与传统的题跋之古色古香者，距离甚大，也许读者还是能够谅解的吧。我在这里提出的是我久已孕藏于胸的一点感想，那就是“善本”的标准问题。

“什么是善本？”数千年来，人们提出了无数答案，各不相同。其所以有如此的差异，大抵是由于标准不同之故。富翁买书，是为了保存财富，装点门面，附庸风雅那当然以“贵”为标准。一分钱一分货，价钱大的，当然就是善本了。学者意在研究，也买不起大价的，他们就以实用为标准，只要有识见，少错字，内容丰富完整的书就算做善本了。还有一般的读书人，那标准就要更低一些，只要使他们得到满足的书，也就是他们的善本。此外还有许多说法，但大抵逃不出这个范围。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为市场风气所左右的善本标准的升降。即以近数十年而论，宋元版当然一直是善本，但在过去，四部里的“经部”是最受重视的。科举废后，“经”就从宝座上跌落下来了。有一个时期，重视起“集部”来。到了清末民初，禁书大红，这自然是受了民族革命的影响。后来好运就轮到戏曲、小说和地方志。小说的走运是因为“五四”以后重视了俗文学。至于地方志价格飞涨，那原因就更能发人深省，因为帝国主义十分“关心”“地大物博”的中国，想收集资料，掌握中国的风俗、地理、物产、矿藏之类的情报了。

以上这些分析，十分粗略。但我觉得，上层建筑的作用与反作用，从中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十年以来，“四人帮”为了他们罪恶图谋的需要，制造了大量的书册，真是看了使人眼花缭乱，读了使人义愤填膺。但扔到茅厕坑去，却不是一个好办法。还是完整地留下一份来，加以分析研究，好好进行总结。那无论为今日，为明天，都是一件大功德事。何况这些书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可珍的“历史文物”了。

岳飞的集子，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但是流传下来了。但秦桧的文集呢？没有了对立面，要研究历史，就会感到困难。这道理长久以来是很少有人理解的，真是可惜得很。我自己曾经收藏过阮胡子（大钺）的三种原刻诗集。几年前就被正人君子指责为“立场反动”，随即抢去了。他们的理论根据是：阮大钺是历史上著名的坏人，收藏他的诗集，那立场自然就错了。至于为何还要抢去呢？也很易解。因为这些差不多已经是“孤本”的诗集，能卖出大价来。总之，他们所尊奉的还是善本的“旧标准”，因而不免总要做出可笑的事情。

1978年10用

## 诸葛的锦囊

好久不读《三国演义》了，不过印象还在的。特别是诸葛亮，不时要想到，觉得他委实是一位有代表性的聪明人的典型。

刘备应孙权之邀，过江招亲。诸葛派了赵子龙将军随行，承担保卫之责，临行之时，交给赵三通锦囊，其中各藏妙计一条。遇到极大困难时，扯开一观，就会得到解脱困境的妙法。这是大家都故事。

我现在只记得那第二次。刘备招亲之后，十分开心。蜜月持续得太久了，不但全然忘却了荆州，连赵将军也轻易不肯接见。刘备的这种坏脾气，好像也传给了阿斗，“乐不思蜀”的那一幕，就是乃父东吴招亲的翻版。这是值得历史生物遗传学者加以注意、研究的。

刘备这种坏脾气的确给赵将军带来了绝大的困惑。他不得已，从怀中摸出了锦囊。扯开一看，“呵，呵，是了！”马上进宫，谎报曹操大军进攻荆州。果然有效，刘备终于从粉红色的梦境中惊觉，头脑清醒起来。

千百年来人们都十分佩服诸葛亮，当作神仙，这是上了《三国演义》的当。即以此事而论，诸葛料到东吴招亲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是他长久对刘备进行观察、分析以后获得的结论，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他据此做出决策，封入锦囊，交给赵子龙去执行，至于这决策是否正确，他其实也拿不定，还得由实践来检验一番。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证明诸葛的判断与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算得是一条个别的客观真理。

同样的事例还有“空城计”。那全过程中的诸葛亮都是心旌摇摇，强作镇静的。因为他的此“计”正在接受着实践的检验。直到司马懿大军后撤40里，他才叫出了一声“惭愧”！这说明，实践的检验完成、通过了。但这条“空城计”的真理性可真短暂得很，司马发现上当之后，马上又杀回来。这时诸葛如果抱着旧经验不放，照旧坐在城楼上面，无疑就要束手就擒。只是赵老将军的一支人马的出现，将司马挡了回去。诸葛亮可实在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

诸葛亮有丰富的知识。在高卧隆中的日子里，他很读了不少书。也并不像梁效所说，专攻法家著作，他倒是博览的。他一切从实际出发，绝不搞“本本主义”。当疑难不决时，也绝不从袋里摸出什么鬼谷先生的小册子，寻章摘句，他只是装作出神似的盯住他那把鹅毛扇只是看（据舞台演出），其实只不过是在考虑问题，一般观众却偏偏相信扇子上有什么花样，那又是上了当了。

他也并非一贯正确，有时也会失算的。人尽皆知的是他误用了典型的“本本主义者”马谡，失守了街亭。马谡的肚子里装满了兵书，背得滚瓜烂熟，随时能够选出一句来，活学活用。不幸的是他见了鬼，偏偏选了“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条，结果在“死地”上一败涂地了。韩信的幽灵也不曾给他以援救。

诸葛亮是实事求是的。他犯了错误，马上给阿斗上疏检讨，“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总结经验，严于律己，承担责任，请求处分，同时又斩了“本本主义者”的马谡。看来好像很触了一次大霉头，失尽了面子。然而不然。他的威信反而更高了，古今一切看官、读者，从未由此得出结论，说他是个大傻瓜。

如果他反其道而行之，兵败之后，死不认帐，“空城计”不带“斩谡”，



却搬出图书馆里收藏的各种兵家典籍，咬文嚼字，曲解附会，千方百计证明自己依旧是正确的，那他早就被观众赶下台去了。

千百年来，人们承认诸葛亮是一位可爱敬的典型的聪明人，并非相信了他的自我宣传。他的集子早就散佚了，经过历代学者的搜辑，也只剩下了薄薄的一本，而且还不尽可信。人们是从他的毕生实践中得出结论的。

据说过去有些将军都是爱读《三国演义》的，把它当做战争教科书。我倒有些相信。我也颇想找一本来重读一过，但并非为了学书不成要去改行学剑，我觉得这本小说里很有些值得注意的思想材料，应该好好学习。

1978年9月26日

## 怕鬼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何其芳曾经编过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前面还写了长序。编这书的用意是激励中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做，发愤图强，蔑视古今中外一切鬼物。好得很，好极了。这本书里收集了许多从旧小说、笔记中找来的不怕鬼的故事，它说明，中国人民从古代起，就是有不怕鬼的传统的，即使是长期在严重的封建、迷信的压迫之下，也没有能熄灭这一盏思想之灯。

这本书出版以后不久，江青就指使她的同伙借批判鬼戏为名，抛出了批评“有鬼无害”论的名文。那主要论点之一就是，人们看了鬼戏，就会相信人世间真正有鬼，就会使迷信思想泛滥……坏处真是大极了。在这里简单地归纳一下，大约可以称之为“怕鬼论”，是和《不怕鬼的故事》唱对台戏的。

那结果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切沾点鬼字边的戏曲都不得上演了，发展下去，就“打倒”、封禁了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作品。我这样说，并非夸大其词，因为江青之流的“理论”与“推理方法”本来就是这样的。他们最善于抓住“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一吹一扇，就能卷起漫天的狂风恶浪，可惜的是不能持久。就算是12级以上的台风吧，寿命也短暂得很。

奇怪的是，前两年重印了鲁迅先生的作品，《无常》、《女吊》这两篇文章却依然在的，不曾遭到“抽毁”的命运。总算这位“女皇”的皇恩浩荡。

这样，在那几年几乎无书可读的时候，我就经常翻翻《无常》和《女吊》，少说也各看了十多遍了，而至今不厌。记得我每次读到“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吧，‘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就会感到热血沸腾，精神振奋，坚定了和一切箱魑魅魍魉血战到底的决心。那效果，恰与江青的“理论”正好相反。后来我渐渐悟出，这就正是使她胆战心惊、切齿痛恨的主要原因。

《女吊》里歌颂的是绍兴戏台上的一个女性的吊死鬼，被鲁迅先生称之为“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真可谓大笔特书，在《鲁迅全集》中，还少有同样的例子。

那几年，对江青之流的高论，又哪里有说半个“不”字的自由！不要紧，还是关起门来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原来早在40年前，先生就为我们预先做出精确的批判了。他说：

自然，自杀是卑怯的行为，鬼魂报仇更不合于科学，但那些都是愚妇人，连字也不认识，敢请“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不要十分生气吧。我真怕你们要变呆鸟。

鲁迅不是算命先生，然而他竟看得这么远，这样准。真称得起是英明顶见，不能不使我深深佩服了。自然，即使是鲁迅，也没有能够料到40年后上演的这一火炽的阶级搏斗大剧的性质。鲁迅还是太忠厚了，“呆鸟”这个字眼使用得不那么恰切，“低估”了这群反革命野心家。我想，问题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从鲁迅先生开始，没有谁赞成或鼓励过自杀，也没有谁提倡反科学的迷信。就是“鬼戏”（这个词，就是存心不良的。全世界有谁把《哈姆雷特》叫做“鬼戏”呢？）人们也只是肯定那些“带复仇性的”和带有其他积极意义的作品，绝未照单全收，一切皆好。江青之流的攻击不过是诬陷。江青一伙在前些年害死了不知多少革命者与无辜的人，他们心里又哪能不怕，怕化为厉鬼的冤魂向他们索命！反动派发了狂，就会一脚把科学踢开，求神拜佛，画符念咒，无论什么事都是干得出的。

且看他们怎样对待那些在他们的淫威之下死去的人们吧。最早被称为“畏罪自杀”，后来改良了，改称为“不明政策”。“四人帮”又有什么“政策”，还不是把一切不是他们一伙的都赶尽杀绝吗？把人搞死以后，连死尸也不放过。他们绝不吝惜自己身上涌流了来的脓水，就向死难者身上无情地浇去。

陈毅元帅的名句：“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在江青看来，真也无非是“鬼戏”一路货色。然而它说明的却正是，中国的英雄儿女即使战斗至死也还是不怕鬼的。实践证明，这不是迷信，而是科学。愤怒起来的中国人民只一脚就将这批鬼物踏得无影无踪了。

1978年9月

## 西太后与现代化

写下这个题目，自己也不免觉得有些古怪。

孟心史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中有一篇《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是很有趣的文章。它报道了早在1903年、整整75年前的光绪癸卯，中国铁路史上的两项新工程。那时芦汉铁路北段已经工竣，又增修了由京至芦、和由高碑店至易县的两节。当时芦汉路的督办是鼎鼎大名的“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北洋大臣则是袁世凯。陶兰泉（名湘，是有名的藏书家）则是盛宣怀委派办理颐和园装电灯和芦汉路北京事务局的大员，算得上极时髦的洋务好手。

那是75年前，修铁路和装电灯都是地道的现代化新事物。这两项新建设都是在西太后关怀之下进行的。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皇太后对现代化的兴趣与关心，但也不能不注意她的特别动机。装电灯是为了在颐和园里更酣畅地享乐，白天玩不够，晚上再来玩，这时候电灯比起蜡烛之类可就显出非凡的优越性来了。修铁路则是为了上坟——恭谒西陵。总之，西太后的“洋为中用”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是天差地远的。

孟心史记述道：

兰泉承宣怀旨，车中备铁床、茵褥枕被。花车原有卧榻置不用，计吸鸦片烟非此不适故耳。床横置，面车窗，以巾幔围之。……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为绣墩。（注）

看看这些办法，实在也不能不佩服陶兰泉的干练，确有一些创造发明的真功夫。花车的卧榻无论怎样讲究，抽起鸦片来总显得逼仄，转动不便。现在换为铁床，难怪总管太监李莲英事先审查时，要连呼“晓事”了。不过这一点，是常人也还可以想到的。出色的是用水银铺底的如意桶。那构思之奇妙，真是常人所不能了。中国的水银矿开采，历史不能说不久。但除了用来做防腐剂，使尸体不坏（通称“水银葬”）外，只有这一用法最为别致，是连洋人也不曾想到的。

西太后重视现代化的事例当然远不只此。去过颐和园的人，大抵都看到过一处十分高大的楼阁式的戏台，这也是当年西太后试验现代化手段的地方。这座戏台是有转台的装置的，而且在高空还有种种特别设备。不但舞台场面可以快速转换，避免了落幕换景等等麻烦；连天兵天将的从空而降，也毫不费力。这自然是机械化的结果。可惜这座戏台久已废弃不用，我虽多次参观，都不曾见过那实际应用。只是从老太监之流的口中，听到“老佛爷”在这儿看戏看得如何开心之类的回忆而已。

总之，西太后的关心现代化、重视现代化，是无疑的。而现代化又是要从洋人那里学来的。而从辛酉以来，她对洋人的态度就有了确实的变化。她深知“外患固宜亟平，内忧尤当早虑”的道理，而“海疆不靖”，则是由于“在事王大臣筹画乖方所致”。她看出，花了大笔银子去建设海军，不是个好办法；还不如用这笔钱来造颐和园，就在这园里搞“现代化”玩玩来得稳当、实惠。

为什么要关起园门来搞“现代化”呢？那是因为她认识到，现代化是万万不可公开推广的。一旦公开，蚁民们就会睁开眼睛，看到新事物，想到新问题，心也就会活起来。那可是对她的江山十分不利的。在戊戌一役，她是

得到过切实的教训的了。因此，尽管她自己玩得起劲，但对蚁民们还是不停地痛斥“奇技淫巧”。连如意桶那样的好东西，也不肯推广。这就是用一张“洋、名、古”“封、资、修”的大封条企图把一切外来的现代化新事物统统挡之于国门之外的“妙策”的先河。

西太后往矣。这位“慈禧……（共 16 字）皇太后”的手腕，今天看来虽然并不怎样高明，但她到底昏天黑地地搞了 50 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灾难；60 年后她的私淑弟子江青给人民带来的是比她的前辈更为深重的特大灾难。就这一点论，是青出于蓝的。在对待现代化的问题上，江青也有了重要的发展，虽然终于跳不出西太后的掌心。但人民到底也大大进步了，江青费尽心机，也不过只捣乱了十年光景，连西太后的五分之一还不到。这样看来，那可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1978 年 10 月 18 日

（注）水银比重较高，“粪落水银中”，未必能“没入无迹”。此成为陶兰泉推测夸饰之词。

## 慈禧太后吃饭

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里有描写崇祯帝在宫里生活的内容。有的读者读了很有兴趣，说写得好；也有人怀疑那真实性，觉得靠不住。这种议论都不怎么经得起推敲。300年前电影还没有发明，无法留下照相或纪录片来；崇祯帝也来不及写自传。因此，这一切都是死无对证的，只好听任小说家来编排。而小说家又并非历史学者，是不负绝对真实的责任的。

不过姚雪垠在有的文章里又曾谈到，他曾如何广搜史料，详加考证，表示他的作品里虽有艺术的想象、夸张，但基本上却是不无根据的，看来，这里是出现了矛盾了。而这矛盾又不只出现在历史小说上，举凡历史剧、历史电影……大抵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也读过一些晚明野史，就不记得曾看到过记述明朝皇帝怎样在宫里吃饭、消遣……的作品。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里好像也不曾记。当然，我的见闻寡陋，这是不能作为定说的。可是记载大官、贵戚生活的笔记就很有有一些可作为借鉴之用。如著名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那一幕，就被陆次云（？）描写得活龙活现。但那也不过是小说，随意想象得之也说不定的。

看来，只能采取“折中主义”，从事历史题材写作的作家，当然要以想象为主，但要尽可能有所依据，至少要采取谨严的态度，不要信口开河、闹出笑话是要紧的。

因此，我对一些历史题材的电影有时就会感到有些不满足。好像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古装电影”，演员大抵穿了京戏或越剧的服装登场，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明代，（清朝的服饰，大家倒还多少有些印象，因此较为谨慎）一律乌纱、蟒袍……古人固然比较“淳朴”，不像今人那样常常举行时装展览，在服装上掉花样，但一套衣服两千年不变，那是谁都不会相信的。类似的问题还多，风俗习惯，家具、用品……都是难题。因此，写历史小说，拍历史电影，都不是轻松的工作，不能完全采取以意为之的态度。不过又不能太迂。现在出土文物日见其多了，可以考证确凿的事物也很有了一些。如果事事照办，那就不得了。例如，桌子的出现晚得很，至少在战国时代还没有，那么拍起屈原的电影来，如果死抱住历史的真实，屈原和婵娟就只能在地上爬来爬去，要进行表演是困难的，摄影师也会感到头痛。

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然也并不是不可解决的。

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有时我们确实掌握了千真万确的历史实况，但如果写进了作品，有些读者是会说你造谣的，或谓之恶毒的讽刺。

例如孟心史记陶兰泉回忆所见慈禧太后在火车上吃饭的场景：

太后在车中，停车进膳。皇上同桌，侍食于下，后妃立侍于后。传菜从东南门进，即撤一菜从西北门出，如是川流不息，至膳毕止。太后下箸，皇上亦下箸；太后以空碗分赐后妃，但见后妃就碗食之不已，不知其果否下咽。太后箸止亦止。自皇上以下，侍太后食，手口若机械之相应。想宫中无日不然，难乎其为日用饮食矣！

这里描写得极为生动，也是完全真实的。陶兰泉亲眼看见，都有些难以相信。他怀疑，天天在宫里吃饭，难道都是这个样儿不成——嘴巴和手丝毫不得背离太后的动作，要求完全合拍，堪称绝对服从的典范，令希特勒见之，也必自愧弗如的。

这材料出于著名清史学者的著作，大约人们总是会相信的。但如有某个作者，将这场面写入小说，那就非被当做“讽刺作家”不可，然而，岂不冤哉！

上好的讽刺作品，往往不在讽刺作家的文集里，倒往往藏在历史记载中间，近来我是愈发相信了这种意见。

1978年10月18日

## 韩信的哲学

昨天晚上偶然翻阅吴江计默的诗集。计默是计东的儿子，也是清初的著名文士，也是继承了父辈的遗民思想的。他的《菴村诗集》开首的三首《述古》诗，就是明证。这是三首五古，述说的是张耳、陈余、韩信与田横的故事。我们只要想想作者所处的时代，这些古人的经历，和当时的社会、民族之间的种种现实矛盾，就能清楚地知道，这些古诗不只是借古喻今，简直就是坦白地声明了他自己的态度，自然也希望朋友们和他一样，采取同样态度的了。

这样立意明确的诗篇，而且就在开卷之首，清初那些奉命锻炼文字狱的叭儿们竟自视而不见，轻轻放过了。可见乾隆皇帝所任用的是怎样一批无用的狗才。

《述古》的第一首是：

陈余并张耳，于魏称名士。如何耳独王，余顾死泚水。吾闻监门时，吏笞余欲起。耳也蹶之受，小辱无遽死。两人事成败，只此识臧否。不见圯上翁，留侯为纳履。

张耳和陈余是好朋友，又同为魏国很有声望的人士。秦灭魏，悬赏捉拿他们。他俩改变姓名到了陈，充当一名“里监门”的小卒过活。管他们的吏因为一件小事要打陈余的屁股，陈余忍不住想站起来反抗，“张耳蹶之，使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余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余谢之。”

这是很有名的故事，就见于《通鉴》卷七。诗人的意思很明白，他认为有许多“小事”，是不值得用死的代价来计较的，因为这对整个的斗争事业无益。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小不忍则乱大谋”，说的也不过是同样的意思。

“小辱无遽死”，这虽然只是简单平淡的一句诗，给我的印象却极深。特别是在经过了十年动乱之后。怎样才算是“小辱”呢？超越了怎样的限度才算是“大辱”？十多年来，那么多革命老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以至几乎全体中国人民，受的都是怎样的“辱”呢？许多人因为不懂这个“道理”，站起来反抗，被迫害而死了。今天，在痛定思痛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看清过去的种种之后，不去纠缠某些个人恩怨，求得全国的安定团结。那标准，我看也还是在于分清“辱”之大小。

在林彪、“四人帮”尽力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策时，有些人执行了甚至是创造性地卖力地推行了这种“政策”。被迫害者所遭到的凌辱，就不只是个人精神肉体上的，而且是有关党和国家的尊严的。有些可以“忍受”，也应该忍受，张良给黄石公拾鞋子，韩信还乖乖地从流氓的胯下钻过去，都是可以理解的。难怪计默要称赞他说“淮阴真国士”。绛侯周勃下狱以后，日子也不好过，后来他不能不感叹地说，“今天我才知道狱吏的尊贵！”太史公也只是用了这么一句话，就将老将军所受的全部凌辱写出来了，周勃也正是忍受了这一切，才有可能建立后日的奇功。也是太史公所写过的那位李将军（广）就差得远了，他也受过小吏的侮辱，一朝

重掌兵权，首先就将这小吏调到帐下，杀掉。因此，李广终于算不了一位真正的英雄。

无论什么时代、什么阶级，是都要讲究斗争的策略的。鲁迅在30年代就



反对过赤膊上阵、有勇无谋的许褚、李逵式战法，难道我们会因此而责怪鲁迅的斗争性不强么！

不论是张耳，还是韩信，他们都是旧时代的人物，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也完全是另外的一套。韩信是很聪明的，但终于还是在长信钟室里完成了他自己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努力讲求斗争的艺术时，切不可忘却一条明确的判断大是大非的标准。前面这些话也绝非意在替软骨头们辩解。为什么我们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时总是会想到张志新烈士，也就因为她是最懂得并能以生命保卫这一标准的真正的时代的英雄。

## “蠹鱼”的悲与喜

《文物》1979年第12期发表了一篇介绍《虬峰文集》的文章，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石涛生卒年问题，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说是新发现，其实是应该使人感到惭愧的。《虬峰文集》这书，早在1936年就由孙殿起著录在《贩书偶记》里了。北京图书馆也早已藏有此书，当然说不清是何时入藏的。但多年以来，没有人去读却是事实。在这中间，有关石涛的研究著作却发表了不少，热闹得很。其实激烈争辩的问题就明白地记在睡在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中间。

这使我不禁联想起许多事情。

过去，善本书多半藏在个人手里，广大的研究者不能方便地利用，这自然是很不合理的。不过今天国家图书馆里的藏书又怎样呢？情况似乎也并不使人满意。至少对收藏和利用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就一直没有安排妥当过。好像图书馆的唯一任务就是“藏”，千方百计地“藏”起来。自然，也不能忽视图书馆工作者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不过也不能否认，这还是藏书家的旧传统，也是一种旧框框或禁区吧，要打破还是很困难的。

同时，也不能只责怪图书馆。读者一方也是有责任的。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去打开这个禁区的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久以前在南京遇到一位研究《红楼梦》的朋友。我说，住在南京，有好些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又有不少并未消灭净尽的清代遗迹，更重要的是有人民，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民。曹雪芹和他的家庭成员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几十年，这里肯定还有不少有关《红楼梦》及其作者的材料未被发掘出来。我建议，把清初直至嘉、道出版的地方文献、诗文集、笔记……仔细地翻检一过，再结合实地调查，人物访问，肯定会有丰富的收获，能为《红楼梦》的研究打开一个新局面的。

朋友很赞成这个提议，但叹息这工作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那么何妨发动学校、研究机关、社会力量呢？有在很好指导下工作的几十、几百位研究生、研究员，就能不困难地展开这工作。同时，研究专题还可以开辟得更广泛些。注意目标不一定局限在一个方面，可以同时有许多专题。这样搞下去，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是必然可以出成果的，这是百年大业的基础，应该尽快列入日程的。

《老残游记》的作者曾经描写了他到海源阁访书吃了闭门羹的故事，并作诗一首，那最后一句是“深锁琅嬛饱蠹鱼”。这是一百多年以前发出的叹息。我们希望，在今天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日子，不再继续听到这样的叹息了。

## 于陈端生二三事

### (一) 《绘声阁续稿》

关于《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生平，郭沫若同志写过好几篇长文加以考订，最后写定了“陈端生年谱”。所据资料，最可信据的是作者在《再生缘》每卷的开首和煞尾的自叙；其次就是作者的妹子陈长生的诗集《绘声阁初稿》。这都应该说是属于第一手资料。至于陈文述的《西泠闺咏》，虽说是以同时、同里、同族人记近时事，却并非全可信赖，虽然他记下了可珍贵的《再生缘》的作者和她的身世的一些线索。

《绘声阁初稿》，收入“织云楼合刻”中，初刊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慎余书屋藏版。这是归安叶氏女史的家集。最后一种即叶绍榘的妻子陈长生的《绘声阁初稿》。更后26年，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在广西续刻了长生的《绘声阁续稿》，合原刻四种重印，前增海盐朱方增的骈文序一篇。由于刻版于西南，这个本子的流传就更少了。就在这个《续稿》里，保留了长生诗38题。其中涉及陈端生的有三题。

### (二) 陈端生的卒年及其他

《绘声阁续稿》第11页，有“哭春田大姊”诗两首：

捧到乡书意转惊，尚疑恶耗未分明。牵萝不厌茹荼苦，咏絮真同嚼雪清。久任劬劳难撒手，重亲膏沐倍伤情。残编未了凭谁续，那得奇缘说再生。

素食频年礼辟支，玉关人返鬓先丝。可堪宝镜重圆日，已是瑶钗欲折时。机畔尚余新织素，筐中应贮旧吟诗。河于分袂成千古，泪洒西风酒一卮。

这两首诗，提出了不少事实的铁证。首先，由陈端生的妹妹肯定了她的《再生缘》十七卷残稿的著作权。其次，证实了春田确是端生的字，与长生字秋谷取径正同。证明了郭老论断的精确。

其次，两诗对陈文述不负责任的记载，做了有力的驳正。陈文述“绘影阁咏家春田”诗小序里说的“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春田死。”现在证明是不确的。陈文述不过是为了把端生身世弄得愈发哀感顽艳而信笔挥洒，和《文章游戏》、《妆楼摘艳》之类的编者玩的是同一性质的把戏。

端生在夫婿遇赦归来以后，还生存了一段日子，虽然这时日是很短促的。因此，长生才说她“重亲膏沐倍伤情”，那时她已病重，所以才说“瑶钗欲折”。

两诗对端生的晚年生活，也做了如实的反映。丈夫遭戍以后，范家的家境是很艰苦的。端生像杜甫笔下的“佳人”一样，过着“牵萝补茅屋”的艰苦日子，支撑着这个家庭。一女夭逝以后，还剩下了一子，抚育的劬劳使她不忍撒手抛撇以去。同时，她在晚年是信佛的，而且频年素食，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像陈端生这样的女作家不得不走上的一条悲剧的道路。

两诗还涉及了郭老和陈寅恪先生同样注意到的“织素人”问题。这个“织素人”，的确是“舍陈端生莫属”的。

就在这两首挽诗之后，隔了一诗就又出现了“喜蓉洲甥至京有怀亡姊感

赋”的七律：

轻装匹马 游燕，话到乡关倍黯然。忆尔垂髻如昨日，感余薄鬓已中年。辛勤负笈轻千里，检点缝衣痛九泉。莫向天涯悲旅况，三余努力课陈编。（ 蠹蚀不可辨）

这位蓉洲甥，无疑就是陈端生的遗息。“年谱”，“生子一，名丁郎”条当据改。因为丁郎见之于陈云贞《寄外书》，是《文章游戏》编者的创作，不足据的。

这个年纪不满二十岁的少年，在丧母以后不久就远道来京，相依姑母。长生的诗里也只及亡姊，不提姊夫，固然由于避忌，而端生身后范家境况的衰落，也从而可知了。

### （三）“忆旧”十章

《绘声阁续稿》有“忆旧诗十章”，前有小序。这一组诗是长生的自叙身世之作，但在她出嫁之前，是和姐姐生活在一起的。因之其中有一部分也正是陈端生前期生活的写照。小序是骈文，概括甚密，抄之如下：

屏烛销红，惊回昔梦；砚花写绿，吟入新秋。长生家本西泠（杭州），生依北阙（北京）。忆自探奇蜃海（登州），低鬟而甫胜金钗；索句鱼城（苏州），转扇而始调绿绮。既则维扬听月，白下看山，历齐晋之关河，绘潇湘之烟雨。或慈闱问字，痴争咏絮之名；或官阁奉觞，轻试调羹之手。固已花间翠阁，处处妆楼，水上红旗，年年画舫矣。迨夫虎林遄返，问寝依然；雁里言归，承欢不再。遂乃重辞乡国，三上京华。结庐于红杏坊头，赏酒于绿杨市上。琴书四座，细熏郎署之香，刀尺三更，代听金门之漏。今者班清玉笋，君换头衔；座拂菱花，侬惊鬓影。金堤尘土，认他马迹重重；锦瑟华年，数到鱼鳞六六。抚今追昔，似露如烟；写我清襟，借兹彩笔云尔。

写这十首诗的时候，叶绍桢在北京作翰林院的冷官，长生随任，年 36 岁。所谓“三上京华”，第一次是指在北京出生；第二次是指癸卯（乾隆四十八年 1783）绍桢举京兆（见崔龙见“合刻诗”序）而言。按《续稿》时序排列的序次，此十诗作于端生死前两年。那么端生逝世时长生 38 岁。与郭老《年谱》中所推相去不远。现在选有关涉的几首诗，抄在下面：

髻年何处认芳闺，回首蓬莱梦已迷。海气凉侵衣袂润，岛云浓压画楼低。花间泻露红犹渍，镜里梳鬟绿未齐。镇日牵衣随阿母，幽吟只在曲廊西。（右“忆登州官署”）

这是第一首。按《年谱》，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八月，端生、长生父玉敦改官山东登州府同知。姊妹都随任，端生这时已撰《再生缘》九至十二卷，而长生则仍是垂髻少女，牵母衣而问字，初学作诗。第二首是“忆姑苏官署”，有“银烛光中促理妆”之句，殆是初嫁之日。第三首是“忆扬州官署”，有句云，“花下琴书供索句，樽前姊妹惜离群。”是嫁后怀念端生之作。这时长生初婚，虽已离开母家，但仍在江南，下面“忆金陵官署”一首中有“伶俜始作辞家女”之句，这以后她就随任到翁姑蒲州官署去了，也有诗。下面是忆济南、长沙官署的两首。其次是“忆钱塘故居”：

碧窗曾记馆双鬟，行遍天涯又重还。裙衩绿湔沿岸水，镜台青借隔江山。开奁姊觅吟余稿，掠鬓亲怜病后颜。底事牵衣愁远别，罗襟犹染

泪痕斑。

长生这一次回到杭州，又得与端生重聚。诗里真切地抒写了她们姊妹俩浓挚的感情和这一段愉快的日子。不久，她就“重辞乡国，三上京华”，江干一别，竟判人天了。下面还有“忆吴兴故居”和“都门旧寓”两首。无可记。只从诗里知道所谓“织云楼”，是吴兴叶家故居里的一境而已。

#### (四) 其他

《绘声阁续稿》不知道是否是编年的集子。如果按照时序排比，则这38题是在四年（或三年）中间写成的。而从“喜蓉洲甥至京”一首以后的一首起，就开始了从北京到云南的纪行诗。路上走了大约半年左右，在“初至滇南学使署（在昆明）感赋”两首里，有附注说，“先君子（指陈玉敦）于乙巳岁（乾隆五十年）摄云南府篆，旋乞病归，今隔十八寒暑矣。抚今思昔，易禁该然。”这是长生此次入滇在嘉庆八年癸亥（1803）的铁证。如果《续稿》中诗没有太多的刊落，而诗的编排是按照时代序次的话，则《年谱》里有许多关键性事件发生的时日，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性了。

1961年

## 放翁诗

### (一) 杏花、春雨、江南

对陆放翁的诗，一直不大有好感。想来可能是受了林黛玉议论的影响。《红楼梦》第48回，写香菱学诗，向黛玉请教，香菱说：

我只爱陆放翁的“垂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切有趣。

这番议论被林姑娘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

想想也可笑，印象里似乎是林黛玉把陆放翁一笔抹杀了，但这回找出《红楼梦》来看，才知道并非如此。林姑娘所批评的只是“这样的”“浅近的”诗，并非专指陆放翁，也没有说他的诗全是“浅近的”。香菱所举的那两句的确不算好诗，陆放翁也的确作过不少这种并不高明的诗，这都是事实。林姑娘的议论，看来还是有道理、有分寸的。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留下那样的印象。可能是对林黛玉过于迷信，而理解问题又十分片面之故。

放翁的诗后来也陆续读了一些。不过他的《剑南诗稿》太丰富了，实在没有通读的勇气。我也只是通过选本领略了一些剑南名作。最近无意之中抽出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来翻阅，就又接触到剑南诗。最引起兴趣的自然是那首“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这真是老相识，从小就熟读、爱读的名作。而且这诗也的确很“浅近”，没有什么江西诗派的艰涩、古奥。但谁能否认它是好诗呢？

说真的，从前喜欢它也只是喜欢全诗中的“小楼”一联。这也不能说错，这写得实在是好。江南春的神魄被这14个字描绘尽了。不是十多年前还出现过一个剧本取名为《杏花春雨江南》吗？眼前书桌上有一块同治旧墨，前面一枝杏花，细书填绿也是这六个字。看来这和邱迟的“暮春三月……”16个字同样成为描写江南的千古不朽名句。如果不联系全诗、全文，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写景名句。

钱氏的注里提到陈与义的名子，“杏花消息雨声中”，王季夷词“小窗人静，春在卖花声里。”都是好句，但也都比不上放翁的名句。

也许是年纪大了几岁，近来对这首诗的理解也更深了几分。陆游写这首诗时是淳熙十二年，诗人62岁了。被任命为从六品的知严州府事的地方官，皇帝在他去陛辞请示时指示他“可以多作诗文”。这在念念不忘中原的诗人听来是多么大的讽刺！分明已经被看做一个只能弄弄笔头的“作家”，而在当时，这也正是“废物”的别名。陆游自然是不可能理解他的爱国诗篇会带给人民多少鼓舞的。

他真的响应了皇帝的意旨，写了这样一首诗，申述他对于世事，看得像纱一样的淡薄了。他只能过那种“闲适”的生活，天下真有不得已而做“雅人”者，睡在床上听雨，这说明他的睡眠并不怎样恬适，他写字，写那种很费时间的“草书”；他分茶，这也是很困难的一种技术，作《茶经》的陆羽

就把这列为“茶有九难”的第二难。他用了一个“戏”字，可见并非内行，只是聊做“雅人状”而已。

说起草书，还可以举出最近影印的《陆游自书诗》真迹。这是一卷道地的草书，也正好是矮纸长卷，若论书法，也未能算做如何的精能。但确有草法，不过那已经是80岁时所作，笔意更为颓唐了。

诗的结尾两句，用了一个典故，揭露了当时临安的不可一朝居。那里多的是官僚、地主，虽然“钱唐日日雨如春”，但没有一个人心中还有中原，还有沦于异族铁蹄下的人民。

能说这是一首“闲适”的诗吗？它不像陆游一些别的作品，并没有直接写出抗敌的字样。而且写来写去都是些封建士大夫的“雅人韵事”。写字、吃茶、听雨、卖花声……但不能说这就是一首“闲适”的诗。

这首诗确实流露了颓唐的意绪，玩世的态度，这都是事实，但我觉得也还有它值得体会的另外的一面。放翁诗其实并不“浅近”，倒往往是人们理解得“浅近”了。看来，我的这点浅薄的体会，也还得感谢林姑娘的启示。

## （二）陆放翁与柳如是

就在写“小楼一夜听春雨”那首诗的前一年，淳熙十二年的春天，61岁的老诗人写过另一首著名的七律“病起”：

山村病起帽围宽，春尽江南尚薄寒。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断香漠漠便支枕，芳草离离悔倚阑。收拾吟笺停酒碗，年来触事动忧端。

和“小楼”一诗一样，这首诗里透露的是相同的感情。同样，这不是全然颓废的感情。我甚至觉得比起他在诗里明写忧国壮志的还要来得动人。虽然在这里他只提起生病、春寒、惜花、焚香、吟笺、酒碗……这些封建士大夫的生活琐事和凄凉、零落的情怀，但重要的是判断他在这些细节后面表现的是怎样的心情。

这首诗也是属于无待诠释一类的。钱默存这本选注是很用功力的名作，但我还是不能不表示一点意见，那就是有些地方不免失之于凿。如他说“芳草”一联，另引了三处放翁诗，仿佛这芳草就是指的旧京的春草，这样来坐实放翁的忧国之思。其实这不一定。照我简单的想法，诗人看到春草绿，就不免想到流光如驶，想到“闲”与“老”，于是“悔”了。他悔的是虚度年光，而不在“倚阑”本身。而这草，也正不一定非要生在哪里才能算美的。

另外使我感到兴趣的是，明末柳如是有一首“春日我闻室”诗，用的韵脚和放翁此诗全同，更奇的是风神也十分逼肖，甚至用字遣词都能看出放翁的影响。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  
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  
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  
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

柳如是的作此诗是在下嫁钱牧斋第二年的春天。牧斋为她造了一座房子，取名“我闻室”。出典是佛经里的“如是我闻”字样。《牧斋遗事》在引此诗后评曰，“盖就新去故，喜极而悲。验裙之恨方殷，解用之情愈切矣”。这不能说没有说到一些真相。这正好说明了一个住进了金丝鸟笼里的女人的

心情。她不无依恋地向过去的的生活告别，那种生活是愁苦的，但却还是比较“自由”的。“何人晓”、“独自看”，着实写出了这种寂寞的情怀。

柳如是和陆放翁似乎是牵扯不到一起去的，但奇怪的是诗人爱国的情怀，竟引起了这个小女人的苦闷。于是就用了原诗的韵脚，而且把一些用字遣词的方式也借用过来了。但这两首诗都是好诗，都写出了他们具体的真实的感情。

可能人们会说我这种说法牵强附会，但我却坚信，这中间肯定有一种因缘。

### (三) 诗人与驴子

钱钟书先生在注放翁“剑门道中遇微雨”诗时，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看法。那就是诗人和驴子的关系。钱先生引了李白在华阴县骑驴，杜甫诗“骑驴三十载”，郑綮的“诗思在灞桥驴子背上”……证明驴子似乎成了诗人特有的坐骑。我想佐证还不只此，从记忆里搜索，一些古画上的诗人韵士，也往往骑的是一头驴子，而很少有骑马的。这是什么原故呢？

我想总不能说诗人都是胆小鬼，怕从马背上跌下来。何况骑驴也并不安全，它发起脾气来，照样也会后脚乱踢，把人扔下背来，而且骑驴也并不舒服，坐久了屁股往往疼得可以。想来这恐怕还是与“吟诗”有关。诗人要推敲，要细细地思索、酝酿，驴子走起路来慢腾腾地，一颠一顿，有节奏，有韵律，大约对作诗是很有好处的吧？放翁诗的本身，似乎也提供了一种解释：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而骑驴入剑门。

到过剑门的人都知道，那种险峻的处所，栈道似的山岩小径，何况还下着小雨，骑马奔驰是不可想象的。还是骑驴来得稳当一些。

此外，我想这和古代的经济生活也是有关系的。马，是大牲畜，是作战和耕作所不可缺少的。恐怕只有阔人才乘得起。请想，“貌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这是何等郑重的写法！李白被皇帝“召见”，才派了马去接他入宫；杜甫大小也是个官儿，又住在首都，但却骑了30年的驴……可见在当时马并不是一般人都能乘得起的。正像今天的诗人，并不见得认为公共汽车比小汽车更风雅些，或者坐在小汽车里诗兴就会逃走。难道像沙丁鱼似的挤在公共汽车里就保险能诗兴勃发么？

这样看来，上面的那句似乎应该修改一下，“驴子仿佛是古代社会地位并不太高的诗人特有的坐骑”。这样，似乎比较合乎实际些。

剑门，我是曾经走过的。那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比陆游幸运得多，不必骑驴，我是作为“黄鱼”搭在一部木炭汽车上入蜀的。但一经过那里，不由得立即想起了放翁的这一首诗。那山水真是奇绝，汽车路想来总比宋代的山路宽得多了，但依旧狭得使人吃惊，路边就是“下临无地”的深渊，那“剑门”，正在一条山路转折的地方，远望正如两把锋利的剑，孤峭地插在山堆里。中间露出一条缝，透出青青的天色。我们还在剑门的小店里过了一夜，在昏昏的灯火下面听一个老头儿说“渔鼓”的印象，至今还十分清晰。

剑门过去就是剑阁。这又是个有名的地方，记得当时我以极大的兴奋跳下汽车奔到一座碑亭前面，定睛一看，不禁失笑，随之也嗒然意尽了。原来那石碑上工整地刻着六个大字：



唐明皇闻铃处。

1965年

## 后 记

将这两年所作的杂文选编成集，取了“榆下说书”这样一个名字。榆，说的是我家后面的一棵参天的老榆树，它的树梢比四层楼还高。到了夏天，就像一把绿色的太阳伞。“说书”，意思是说，这些文字大抵说的是与书有些关连的事情；同时也是说，这只不过是一些漫谈。取书本中一点因由，随意说些感想，和说书艺人的借一点传说敷衍成为故事的有些相像。既无系统，又少深度，就连材料也是零碎的。

我只能写点这样的文字，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在学校里学习的和走进社会以后经历的，都是全不相干的另外的事物。这就使我不可能得到心要的系统的训练。一点零碎的常识，也大抵是多年随便买书、胡乱翻书中得来的。好像摆着一个寒伧的地摊，只有几件破破烂烂的货色。心中有数，绝不敢叫卖百货商店里的高档商品。地摊上的旧货又大半陈旧残破，不过有些目前还可以将就使用，也有这样那样的买主选中买去。仔细想想，这本小书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实在是非常可笑的。

另外还有一种原因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地摊”在若干年前就理所当然地被“砸烂”了。想恢复起来是困难的。有很长一个时期我做的就是没有本钱、没有货色的生意。全靠头脑里残留的一点记忆。而记忆近来又大大衰退，零零落落。有些真切，有些就模糊。因此记得实在的就多说一点，拿不准的就避开不谈。在这种情况下，小本经营或无本经营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空话多而实例少。虽然尽量避免，总免不了出现事实上的错误和悠谬的意见。这就不只希望读者予以见谅，还要加以纠正了。

近十年前，康生曾经给过我“以伪乱真”的四字评语。也许是八个字，记不真切了。至今也还是不明白，怎么会荣幸地得到了这位“理论权威”的关心。有人说这是康生看到我的藏书上的题记以后的“批示”。我有一个坏脾气，买到一本书，翻过以后总要写下一点题记来。有时也说一点有关版本的意见。我的鉴定力并不高明，上当受骗的事是常有的，我也从不失悔，只是将那付了学费取得的经验写进题记里。至于是否曾经出于某种动机，把明刻说成宋版，把残本说成全书……那就要请“专家”、“学者”的大小“英雄”们来判断。他们遵照康生的意见，把我的藏书全部“没收”以后，经过长年累月的鉴定、编目、研究，我写的题记自然也都全部看过，他们是应该有发言权的。

至于康生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的版本鉴定学力，我也并不盲目崇拜。例如，有一部原刻的萧云从《楚辞图》，我在题记里指出是“乙酉刻本”，也就是南明弘光刻本。而“专家”所制定的目录里则说是乾隆刻本。那书的字体刻工确也有些与乾隆本相近，但到底并不是。这书到今天还被扣在那里，也许是被当作以清刻冒充明刻、“以伪乱真”的标本了吧。

这也真是算不了什么的小事。

康生只不过是批了几个字，也许只不过说了一句话，有人就得意地、神秘地辗转传说了。在那时候，谁能知道一半句“顾问”的说话，可是了不起的、真正值得夸耀的财富。没有一点关系，能知道吗？康生说了某人是“坏

人”，传述了康生这句话的，就自然成为与“坏人”不同的“好人”，这也是明明白白的。

从这时开始，一直到宣布依“法”全部没收，很有一些人表现了非凡的“革命热情”。不过就在当时我也多少看透了这些“英雄”的心。他们肚皮里盘算的和嘴里叫喊的，看得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正是那个时候流行的风气。从康生那一伙开始，到大小“众路英雄”，他们的终极理想或有大小高下的不同，但在思想方法、具体手段上则并无多少质的差异。仔细想来，他们接受的也不过是几千年世代相传的过去了的“英雄”们的衣钵。几乎同样或相类的事迹，就大量地记在例如《资治通鉴》这样的书里。也许当代的“英雄”们并不人人读过《通鉴》，但竟全部无师自通地熟练掌握了那一整套法门。这才真是一种严酷的现实。想改变这种现实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绝不是“没收”或“销毁”这种手段所能奏效。在这本小书里有时就说的是这样的意思。

我是主张不可忘记过去的。不论这过去的是几千百年或几天。不然就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吃大苦头。

时时记住过去就会使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么？我看也不一定。我相信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没有一天不在前进，虽然对进步速度的判断是有争议的。有时我向嫌进展小、慢的心急朋友建议，不妨取一张去年今日的日报，拿来和当天的报纸相比，看那重大新闻、批评或表扬的事物……很容易看出今昔之异。是不是真的有了进步，也是易于判断的。当然，对前进步子的大小、迟速，免不了还会有不同意见。但进步总是不能否认。这里用的其实还是回顾过去的方法。譬如过去我们只能称之为“那个理论权威”、“那个顾问”的康生，今天说起来就不必转弯抹角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这本书里也还留下了一些这类的“谜语”，我也不一一加以改正，因为这反映的也正是一种历史现象。

1980年11月28日

